书趣文丛·第五辑

高伯雨

听雨楼随笔



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



辽宁教育出版社





总策划 脉望

书中的情趣

书里的风景

书外的故事

书人的心境



ISBN 7-5382-5012-3/I·258 定价 21.00元

高伯雨

听雨楼随笔

书趣文丛第五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雨楼随笔/高伯雨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书趣文丛；第五辑）
ISBN 7-5382-5012-3

Ⅰ．听… Ⅱ．高…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8609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347千字　印张：15　插页：2

印数：1—6 000册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俞晓群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张　红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邀校对：洪光仪　　责任校对：马　慧

定价：21.00元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囿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

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孑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序

随笔的体裁是近代才有的吗?

不是，古人的专著就很多是随笔。有的已经组织起来，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有的在整篇之中还寓有散的形式。作者将平日所见所闻以及随时所得的感想，笔记下来，无意作成文章，而文章的真意味就在此。

很远的不必说他了，像曹丕的《典论》，萧绎的《金楼子》，就流传到今天的片段看来，都只是信笔写去，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读者自然觉得亲切有味。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看看书名好像是古板而枯燥的，可是一大部分是笑话和故事的集合体，其中反映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情况，成为研究南北朝后期历史的良好有用资料。

唐代古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的文集里，最好的文章并不是《原道》、《平淮西碑》之类，还要推《张中丞传后序》、《段太尉逸事状》等等，因为这些文章只是记片段的事实，不是作论，也不是作碑。《黔之驴》更好，《画记》也好。因为这些都只是随笔，都只是平常的见闻和偶然的记载。题目不在乎大，只要用朴素而灵巧的笔法写出来，即使专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妙的。

唐宋人渐渐有专用随笔的体裁著成书的，宋代这种名著更多起来，如欧阳修的《归田录》，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于是随笔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著作体裁。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再将资料连贯组织起来，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这就成为掌故学。

掌故学的用处是什么呢？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动不停的，而已经变动了的事物，往往如云烟之逝，要想追摹起来以供参考，就很不容易。历史本身是不会留下纪录的，如果不依靠具体的事物映写下来，则所了解的历史不能真实而正确。掌故学的作用就是把关于变动了的事物种种知识积累储存起来，以供应各种需要——特别是历史研究的需要。

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

我是为了替高伯雨先生的书作序，却从随笔到掌故学扯了一大篇，是不是废话呢？

不是。为了让读者对于高先生的著作感到更深切的兴趣，是有介绍之必要的。

我所熟悉的掌故专家以随笔擅长的，一南一北，有两位。高先生以外，其他一位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当

然，此外一定还有，不过他们两位著述较多，接触较广，而且从事的时期较长。徐先生现在年高，不再能亲自动笔，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大家所先睹为快的了。

他们两位从事掌故之学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有两点我们应当注意。第一，他们不是为掌故而掌故，却是从其他方面兼收并蓄了许多的知识，然后来谈掌故的。比如说，他们所谈的近几十年的掌故，实际上是几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罗列胸中，所以谈起来原原本本，不是道听途说。第二，他们对于资料的运用都十分谨慎。因为资料的来源非常复杂，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不存在问题。前人的记载常有不经意的错误，钞书刻书当然都可能有错。著书有时仅凭记忆，或者受到情感的影响，也可能有意无意地错。甚至自己亲笔题署的字也错，郑重刻在碑志上的也错。尤其是有些人说亲身见闻的事也不一定可靠，因为一方面传述的人尽管说的是亲见亲闻的事，可是他只看见听见当时发生的某一场面，而于事情的全部联系未必了然。另一方面，这些人自己有了成见，看问题总不免有点主观，再加上有些人为了贪图动人耸听，不惜以伪乱真。这种情况就使得掌故之谈更不容易谈了。他们两位却都是对于鉴别真伪一点不肯放松的，一字之差也必须追根究底，不容许含糊过去。自己所说的话也总是保持一定的分寸。如果有疑问而实在还没得到正确的解答，也必有一番交代。其谨严负责的态度，是符合学术要求的。

我们对于这两位的评价，不能有所轩轾，但是高先生毕竟年纪轻些，他已经吸收了徐先生的优点，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自然更能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对他的期望特别殷

切。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读者所热烈欢迎的。首先，我们喜欢他那种轻快的笔调，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真是读之唯恐其易尽，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问世，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这种文章风格是从子书及唐宋人作品中汲取而加以变化的。

但是，在读者把卷之余，无不游目骋怀，心旷神怡，作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才能有此成果，我们除了应当知道感谢以外，还应当知道这门学问究竟对我们起些什么重要作用，才能了解作者的真正贡献。

贡献是相当大的。高先生自己说过，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这话未必尽然。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对比恰恰不是留恋，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为了做一个新时代的人，更应该读他的书。

瞿兑之

一九六三年九月

苆雨楼随笔

目录

清代三元

明清科举考试分三个阶段，先考秀才，考中了就有资格考举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有了举人资格，可以入京应礼部考试（亦称会试，天下举人皆集中考试），中式后就是贡士，第一名的称会元，再经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如能乡、会、殿皆第一，就称为三元，这是不容易得到的。

三元之称，自宋、明已有，清代开科一百十二次，得状元一百十二人，只有三元二人而已，可见其为如何难得了。

清代两三元，一为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辛丑科的钱棨，一为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庚辰科的陈继昌。嘉庆朝以后即无复有三元，陈继昌亦可谓结中国三元之局的人物。

钱棨，字振威，号湘舲，江南长洲人。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己亥恩科乡试，中式解元。这科的江南正考官是礼部侍郎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七年壬申进士，散馆授编修），副考官是著名书法、金石家翁方纲（字忠叙，一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顺天大兴人，与谢墉同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内阁学士，左迁鸿胪寺卿）。

解元到手后，钱棨并不是联捷会元的，他中举后，应该在下一年（即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会试）入京会试的，但这一科他没有去考试，再隔一年为辛丑正科，他应会试中了会元，接着殿试钦点状元，于是成为清朝第一个三元了。

乾隆皇帝是中国一个既风雅又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以后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皇帝出现过。在他登基后四十年，忽然在他手上点出一个三元，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吟诗作对是他优为之的，金殿传胪之日，他写了一首诗志喜云：

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
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
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藩。
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
讵止求端士；所期进谠论。
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

钱棨本是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年）博学弘词科授职编修的钱中谐的玄孙（中谐字宫声，号庸亭，顺天昌平籍，江南吴县人。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三甲第三名进士，以知县应博学弘词科，取一等第十四名。遗著有《篚裀集》、《湘耘篇》）。他本是单名一个起字，入学时，学政梁国治认为太过模仿古人（因唐诗人钱起，以湘灵鼓瑟得登上第），给他改作棨

科举故事，传胪后一甲一名进士，照例要把皇帝在传胪时赐给的金花，转送给国子监老师的，恰好钱棨的乡试座师翁方纲正做着国子监司业，这朵御赐金花便归翁方纲所得。翁氏既为国子师，又是新科状元的乡试师，一时传为科举盛事。（按：国子监是官署名，它的最高长官称“国子监祭酒”，清沿明制，增设满缺一人，于是祭酒为二人，从四品。司业正六品，满、汉、蒙古各一人。依照郑玄所说“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周朝已有此称。晋武帝根据郑玄这句话，设立“国子学”，也称“大学”、“国学”。

唐代才改名国子监，其性质略如国立大学，但又不是平民可以入学，非公卿大夫子弟不收录。）

翁方纲的乡试门生得三元，在他是一件光荣而又快慰的事，他的《复初斋诗集》卷二十三，有《三元喜宴词四首为钱湘舲作》和《三元花歌》，都是志一时盛事的，因与三元故事有关，录给读者参考。

三元喜宴四首为钱湘舲作

百年雨露沾儒绅，复旦光华照凤麟。庆际日中闻喜宴，欢腾天下读书人。扶摇九万程兼到，礼乐三千笔有神。金榜蕊珠光一片，斗台直上彻星辰。

御诗勉励继王曾，倍切臣心矢战兢。甲乙科连为世瑞，百千年内几人能。一枝桂馥恩沾独，三叶杨穿捷报仍。回首江城攒烛夜，蓬莱合作五云蒸。

吴下科名盛接联，侍郎学士敞华筵。状头未后祥逢丑，老辈彭家寿比钱。（谓芝庭先生）福禄文章诸郡羡，江湖诗话后人传。湘舲不止湘灵句，一曲峰青又姓钱。（是日姜度香司寇、彭镜澜、褚筠心二学士偕吴郡诸公置酒）（按：原注的“芝庭先生”是彭启丰，雍正五年丁未状元，以会元获上第，只差没有解元，否则雍正五年已先出三元了。启丰长洲人，官兵部尚书。他的祖父定求亦以会元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状元。祖孙皆会状。姜度香名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彭镜澜名绍观，号容若，启丰子，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褚筠心名廷璋，字左莪，长洲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进士，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

曙光北阙瑞云红，东序南宫喜气同。钟鼓戟门槐叶雨，笙歌艺圃杏花风。金书宛委香添篆，碧树珊瑚羽翩桐。分得一枝袍袖底，上林春在锦函中。（每科司成例分状元花，今予以所得三元花，铭楼藏之，并歌以纪。）

三元花歌

周官进士选俊造，乐正司业师司成，今甲乙科即此制，书升论秀于群英。大国三人献三岁，射宫礼乐等有程，月舫灯球到唐宋，看花紫陌争光荣。元和始噪张三头，光化进士琅邪评，袍笏祥符昉自宋，金花帖子稽咸平。脊令原上锦标接，龙虎榜唱知诰名，前则淳化后皇祐，元献郊与文简京。壬寅榜首得文正，王佐器早同时倾，莒公沂公雨宰相，科第照耀连台衡。阅四百年丑到丑，（宋皇祐己丑冯京，后直至明正统乙丑商辂）淳安太傅来登瀛，我朝文教迈前古，百年礼乐腾光晶。南宫或接芙蓉镜，鳌头或冠呦鹿苹，帖经射策咸第一，独难三试相合并。圣人道法备声振，四库谟典敷训行。士抱实学方特达，所以期许尤不轻。今春上苑万花气，沐浴百宝含粹精，玉衡桃耶红云杏，桂林之桂琼林琼。错采镂金一枝出，玉堂天上香满城，天下学人合赞诵，望其跗萼叶与茎。是日贱子忝司业，彝伦堂宴听箫笙，回思前秋涉江采，纫襟敢诩为国桢。圣日光华五云照，小臣不敢矜师生，适逢桥门摩石鼓，分得葩翠连朱樱。钱郎东吴起寒素，我诗窃比芝庭彭，愿励丹诚矢葵向，更茂萋萋谐和鸣。此花虽是科名草，此根早向文字萌，芝草醴泉不世出，凤凰麒麟应瑞呈。直恐莒公沂公辈，无此花赐词垣赓，镌铭贮箧拜稽首，

佳日更酣钱郎觥。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藏有《国朝三元题咏》一册，未说明辑者是甚么人。这部书我未见过。他说钱棨中会元是出在第五房房师王增所荐(王增字方州，号西霞，浙江会稽人，李慈铭的乡先辈，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因事降知县，官至怀庆府通判)，王增有和翁方纲那四首律诗，可惜未能钞录于此。

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钱棨在上书房教一群王子王孙读书，因为偷懒，不按时到书房授课，得革职留任处分。四年后，即乾隆五十八年才擢升右赞善，翌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刑部侍郎胡克家)。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上一年七月他派往云南做学政，刚升内阁学士就逝世了。

清代第一个三元谈过后，我想抄写与钱棨同时的赵翼所谈历代的三元，因为自唐到清不过十七人，可见三元之可贵，然后再谈结三元之局的陈继昌。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八载：

《摭言》：唐大中中，张又新号张三头，谓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也。《说储》又载：唐崔元翰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则并中四元矣。《宋史》列传第七十六卷论，论宋进士自乡举致廷试皆第一者。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是宋时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岩叟传》：以明经科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则亦一三元也。但明经非进士科耳。至《孙何传》：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则进士科三元又有孙何

矣。《杨寘传》：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廷试时，仁宗临轩启封，见名喜动颜色，遂擢为第一，则寘亦三元也。(《宋史》论但称王曾等三人，而何寘二人俱不及，盖以何寘并未宦达耳，按何官至知制诰，掌三班院，而寘传云：其友梦寘作龙首山人，寘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其终于是乎，已而果卒。)《金史·杨伯仁传》：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谓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时称为孟四元。盖金时尚多一府试也。(亦见《归潜志》及《中州集》。)《辍耕录》：元时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举，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为湖广宪佥，后降于贼，有吊四状元者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时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泰不花死台州。)公平(李齐为高邮知府说张士诚，后被戮。)争似子威高。(李黼死江州。)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陶九成云：论优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也。则王宗哲愧此三元矣。

《明史·商辂传》：辂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然《鸡窗剩言》记：黄观，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擢置状元。后殉建文之难，亦见傅维麟《明书·忠节传》。则洪武中已有一人，不独商文毅也。(按《明史·黄观传》，但云以贡入太学，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而不言乡试亦第一，又《选举志》亦谓三试第一，明代惟商辂一人，则观又似止会状元而非三元。)本朝百馀年来，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棨以己亥解元，掇辛丑会状，遂备玆盛事，盖气运鸿朗，久道化成，是

以灵秀呈露，蔚为上瑞，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按:《闻见录》欧阳修以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说，王鏊以解元、会元赴廷试，人皆必其三元，会商文毅阅卷，不欲人与己同，乃置之第三。此皆两元而不得状头者。(伯雨按：商文毅即商辂，浙江淳安人，上引翁方纲诗提到他的。他在明宣宗宣德十年乙卯中解元，英宗正统十年乙丑会、殿试皆第一。科场中人以为自商辂得三元后，浙江文风大盛，至清代不衰。商辂以状元入相，七十生日，李东阳贺以联云:“自古年华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

赵翼所举的三元，从唐朝的张又新到明朝的商辂，一共十馀人，到他所见的钱棨为止，以后的陈继昌，就不及列入他的书里了。按:张又新是张鷟(字文成,能文章,遗著有《龙筋凤髓判》、《朝野佥载》，陆泽县人，即今日河北省的深县)的曾孙。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宋仁宗时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卒谥文正。王岩叟字彦霖，山东清平县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宋庠，字公序，湖北安陆县人，与弟宋祁齐名，人称大宋小宋，封郑国公，谥元献。冯京字当世，湖北江夏人。冯京的名字，为一般香港人习知，“错认冯京作马凉”这句话，几乎人人都会讲，但冯京是三元及第人物，就少人知了。以前见过宋人笔记谈及冯京家贫，读书山寺，久未得肉食，就和同窗朋友把和尚的狗宰了，烹而食之。和尚告到官府，县官见冯京是读书人，罚他写一篇《偷狗赋》，其中警句有:“僧既可厌，犬诚可偷，辍琳宫之夜吠，充绛帐之晨馐。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这个偷狗三元，也可谓斯文无赖了，县官只讲爱才，不重法

律，恕他无罪。

孙何字汉公，河南汝阳人。杨寘，字审贤，合肥人，少时已能文，宋仁宗时，应国子监、礼部试皆第一，既试崇政殿，仁宗临轩拆弥封，见杨名，喜动颜色，顾宰相曰："杨寘也！"擢第一，遂为三元。授通判颍州，还未上任，就短命死了。

宋以前的三元，有文名的不过二三人，到清代那两个，亦非突出的人物，不过拥有三元的衔头，为一时的流俗所钦羡而已。

结三元之局的那个陈继昌，是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癸酉解元，正考官孔传纶（浙江钱唐人），副考官吴颐（江苏长洲人），当时榜名守壑，并不叫继昌。下一年会试，他没有考中，一直隔了三科，才中嘉庆廿五年（一八二〇年）会元，殿试状元，遂为清代第二个三元，也和钱棨一样，并非联捷的。

嘉庆皇帝临宇已二十五年（七月逝世，宣宗继位，明年改元道光），在他手上中个三元，足与他的老子媲美，欣喜之馀，步先王韵作诗志喜，可惜全诗已忘记，只记得"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这几句。"旧相"指已故大学士陈宏谋，继昌是他的玄孙。

结三元之局的陈继昌，字哲臣，号莲史，广西临桂人，官至江宁布政使（继昌一向身体不好，道光廿三年授甘肃布政使，未赴任改江宁布政使，廿五年以病免）。相传他得三元后，曾刻"古今第十七人"一印，盖言自唐张又新至今，三元共十七人，倒也给他说对了，自他高中后，历道、咸、同、光四朝十馀科，竟未出过一个三元，信乎三元之可贵了。旧日苏州和桂林，各有三元坊一座，是地方人士建立以纪念这两位清代三元的，抗日战争期间，故友简又文先生寓居桂林，归来和我谈陈继昌故事。他说，陈得三元后，文名籍甚，有一年他放江南主考，江南为人文之

区，凡来做主考的，大都是侍郎、学士，现在放个修撰，一班士人乡绅都有意轻之。考试结束后，恰好江宁城中的关庙落成，士绅请主考题联，继昌早已风闻人家对他轻视之说了，乃题联云：

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
单刀会鲁肃，江南文士尽低头。

众人读后大惊，信乎陈三元乃才子也。这个故事颇有趣，但未必为事实，因为陈继昌一生从未做过江南主考，只在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年），一任陕西乡试副考官，终其身亦未任学政，所传关庙联，恐系他的乡人"张冠李戴"耳。

有关陈继昌中三元的故事，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上，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今录如次：

桂林相国陈文恭公，世居横山村，筑培远堂。嘉庆丙子（一八一六年，即嘉庆廿一年），相邸不戒于火。五世孙哲臣（字壑），癸酉解元，尝梦状元名继昌，遂改名，以庚辰领会状，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一五七〇年），有云南按察使副使包裕，游还珠岩诗刻云："岩中石台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天子圣神贤哲出，庙廊继步策华勳。"后四句，陈公名字悉见，亦一奇也。相传伏波岩下有石如柱，向离岩二尺许，谶云："岩连石出状元近"，则竟相连矣。状元夫人为李侍郎宗瀚女侄，李寄诗云："矫矫文公五世孙，南交科第夺中原。三头掌故今双绝；千佛名经有几尊。独秀高惊天极柱；一枝青出桂林村。相期位业齐王宋（按：指王

曾、宋庠)，培养贻谋属相门。”“胪传大宋已更名，世美家声叶凤鸣。刚道珠岩浮柱合；又传石刻满城惊。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谶早成。圣代得人方共庆，肯教温饱负平生。”“剥复天心未易量，祝融扫荡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旧平原宰相庄。人羡唐夫年始壮；我怀君子泽弥长。泥金漫说门楣喜，白叟黄童尽若狂。”先是，广西贡院前大楼久圮，形家谓宜改建，甫落成而陈遂捷三元，制军阮宫保(按：是时阮元方任两广总督)诗云：“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姓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注：近科状元吴信中、洪莹、蒋立镛、吴其濬、陈沆、陈继昌，皆余门下之门生也。)陈会试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绍所荐，荐之后，总裁黄左田宗伯钺，梦有人持阮元名帖来拜。及定元，以广西卷书榜，得两元。大司农卢南石先生谓黄曰：“梦合矣。”楷常札述其备细于阮宫保。宫保答诗云：“第一房中晓镜开，荐贤我亦梦中来。事从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抡桂岭；姓名端合借云台。凭君入格非常事，应有朱衣暗里回。”

按：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正考官户部尚书卢荫溥(字南石，山东德州人，乾隆辛丑进士)；礼部尚书黄钺(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庚戌进士)。副考官刑部右侍郎吴芳培(字云樵，安徽泾县人，乾隆甲辰进士)，工部右侍郎善庆(字乐斋，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壬戌进士)。至于荐陈继昌的第一房同考官刑部员外郎王廷绍（字善述），则是顺天大兴人，嘉庆己未进士。

阮元诗注中近科六个状元，除嘉庆甲戌的龙汝言外，皆联翩

而至，从嘉庆十二年戊辰（一八〇八年）起，至廿五年庚辰，十三年间那六个状元：戊辰吴信中、己巳洪莹、辛未蒋立镛、丁丑吴其濬、己卯陈沆、庚辰陈继昌，都是阮元的门下门生，事甚少见，无怪阮元引以为荣了。

《越缦堂日记》说过，士子得解元，又得会元，到了殿试时，读卷官一定把状元留待他，使他成为三元，一来向皇帝巴结，圣朝出了一个三元，二来亦成科场佳话，此说亦有相当道理，清代最后一次会试几乎出产一个三元来结束考试之局和三元之局。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年）是最后的乡试，三十年甲辰，是最后的会试，以后不再有解元、会元、状元这些名目了。福建的癸卯解元为闽县人林志烜，下一年他入京会试，众考官已定他为会元的了。如果他以解元得会元，则状元必归他所有，林志烜就成为清代第三个三元了。

林志烜本有此望，偏偏有个程咬金拦腰杀出，则谭延闿也。甲辰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裕德，副考官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科举故事，乡会试的第一名，由正考官定取，如果由各房同考官荐到副考官处的，得元颇难。闻之老辈，林志烜一卷已由裕德取阅定将取为会元（是时尚未拆弥封，裕德亦不知林乃解元也），恰好谭延闿一卷有人荐到副考官张百熙处，百熙读后，大为激赏，就向裕德力争，以湖南卷为元，百熙对裕德说："敝省三鼎甲都有了，单独没有出过会元，现在科举将废，此后更无希望，请成全敝省，这科的会元留给湖南好吗？"

裕德虽以官职较尊而为正考官，但科第则稍后于百熙，翰林素重前辈（百熙同治十三年甲戌翰林，裕德光绪二年丙子翰林，后张一科），既然前辈搬出大道理，且持之甚力，很难推却，细

读延闿一卷，文字亦佳，就以湖南一卷为元，林志烜就没有三元了。（延闿显贵后，对张百熙后人扶植颇力，人称厚道。）

乡、会、殿皆第一名，人称三元，而县、府、院皆得案首（第一名）则为小三元，也是很难得的。不过，三元是全国性的，小三元则是地方性，且一省之中可以同时出几个小三元，与全国只出一个三元大不相同，如果有人得小三元，进而得三元，那就破天荒了。

一般人大都知道三元是甚么，但小三元又是甚么呢？似乎就少人知道了，既谈过三元，少不免要略谈一下小三元，并且介绍一下二十年前在香港逝世的一位小三元。

科举时代，凡读书人如要应政府的考试，不论你年龄老少，一律称为童生，七八十岁老公公和十二三岁小童第一次应考时，都是童生，有些人从少年时代起，考到六七十岁才考到秀才，从此童生之名才去掉。童生考试第一个阶段叫县试，由知县主持，考取后，由县官录送被取人姓名，册报本管知府，使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考，录取后，由知府将录取名册，造送院试。院试由学台主持。（学台的正名为学政，三年一任，每省一员，由政府简派大员充任，体制宛如钦差，与督抚平行，且可以专摺奏事。）

县府取录的第一名叫"案首"，院试时，如无重大过失，案首没有不被取中为秀才的（秀才是俗称，院试取中的人称为"入学"，正式名称为生员）。一个童生，如果县试、府试、院试都得案首，就叫做"小三元"，以别于乡、会、状的"大三元"。

应考的人中了举人，入京应会试，中了会元，只要他的字写得出色，文章又能言之有物，切中时弊，再凭"运气"，到殿试时，读卷大臣没有不成就好事，取他做状元的。"小三元"却没有

这么便宜了。因为大三元最易过的是第三关(即殿试)，而小三元最难过的是第二关(府试)，能平安过了第二关，小三元稳稳到手了。

凡在县府试得案首的人，到院试时，学台必取他入学，因为学台要顾全知县知府的面子，以报他办差殷勤盛意。童生县试得第一名，到府试时未必就第一名，一府之中有很多个县，每县都有一案首，就有竞争了。知府要拔取人材，未必以县案首为府案首。但有时也以县案首为府案首，那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原本拟定的府案首，临时发生事故；一经府试的案首，院试时，院案首就可操胜券，小三元便产生了。现在有一故事可以说明。

光绪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有童生某甲，一连三场都得到冠军，府试案首，似非他莫属了，而三覆试题为"吾不试，故艺"，某甲的文中忽然大谈西学，中有声光电化，生理血球等名词，时当戊戌政变之后，对西学甚有顾忌，因被抑置第五。但以案首变更，恐外间有人误以另有人贿赂夺取之，于是即以别一县案首充府案首，以澄清谣言。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三日，香港新界元朗，有一位小三元黄濬源先生，以八十二高龄谢世。黄君于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元朗创办钟声学校，自任校长，一九五三年退休(退休后，其令子黄剑白为校监，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一日，黄剑白先生逝世，报载年龄八十有馀，不知馀数多少也)。黄君入学时名钟声，字子律，广东宝安县二区沙头乡人。光绪廿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科考，由知县查铁如录取为县案首，府考时由知府施典章取为府案首，院考时，由学政文治(字熙臣，满洲人，同治四年乙丑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左侍郎)取录为院案元，时年二十四岁。到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岁考，由学政朱祖谋取录一等第四名。(朱

祖谋即鼎鼎大名的词人朱古微）

黄瀋源是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生的，死时八十二岁，如果他能活多一岁，到一九六一年辛丑，便可以在海外来个"重游泮水"的盛大纪念庆典了。黄君殁后，各方所送挽联，亦有提到小三元的，例如华封学校教职员一联云："早岁捷足小三元，毕生尽瘁菁莪，方期乐育英才，大雅前驱长领导；今夏称觞祝上寿，举世正钦耋耄，讵竟倏歌薤露，旻天胡竟不憖遗。"（附注：院试分"科考"、"岁考"，学台先考已经中了的秀才，学台三年一次岁考，秀才必须参加，不能逃避。应岁考揭晓，其优劣可以多至六、七等，一等的升为增生，再考一等，可升廪膳生员"。"科考"是考童生的。学政三年两考，即指"岁考"、"科考"而言。）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草成

光绪壬午乡榜名人点将录

今年岁在庚午（一九九〇年），又是马年了，笔者属马，虚度八十五春秋，但记性尚强，忽记起一百〇八年前的一个壬午，也是马年，这年是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凡午年便举行乡试，这个壬午科，全国十八省总共考取了一千五百四十五名举人（以现代教育制度而言，科举时代的举人，略似高中毕业生，进士乃为大学毕业生，得有学士学位），全国的人才，何止此数，论者谓当时的教育，只在制造“官材”，中了举人便有官做，所以取中的名额不得不严加限制，例如江南（包括江苏、安徽）为文风最盛之区，这科亦只取正榜一百四十六名，副榜二十二名（副榜俗称半个举人，已属正途出身，可以做官，但不能应会试，仍须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始可），以江南地面之大，而“高中毕业生”仅得一百四十六名，人才贫乏得可怜，因此到了光绪末年，才有废科举广设学堂之议。

壬午科取人才虽然如此之少，但这一千五百多个英才（个个有资格当官）之中，却有二三十个是一代的大名人物，其中有宰相、尚书、诗人、文豪、官僚、政客，为此榜增光不少。笔者封建意识甚浓，不得不沿俗例，首先点徐世昌，他是翰林拜相，入民国后，又是民国的第四任大总统，壬午榜的大名人物，不得不推水竹邨人徐世昌居首位了。

徐世昌字卜五，又字菊人，号弢斋，别署水竹邨人，直隶省

天津县人，出生于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光绪八年壬午科，中式第一百六十名举人，出第十一房。这科的顺天乡试，大主考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尚书徐桐，都察院左都御史乌拉喜崇阿，左都御史、顺天府尹毕道远、左侍郎孙家鼐。同考官十八人（名衔略）第十一房考官是翰林院侍讲学士钱桂森，徐世昌的文章由他阅定，荐给大主考取中的，因此徐世昌也称他为座师。

徐世昌的前半生与袁世凯关系极为密切，他能考取举人，还是袁世凯给予金钱帮助，才能入京应顺天乡试的。原来徐的先人在河南省做小官，徐也住在河南，不知甚么缘故，或因家境拮据，未能回乡应县试，所以未青一衿，才以监生资格考取举人的（要入学成为秀才，然后有资格乡试，否则拿几十两银子捐个监生，就可以应顺天乡试了）。中举之后，又有资格会试，有希望中进士、点翰林了。

沈祖宪、吴闿生合著的《容庵弟子记》，是民国二年这两个门客撰写的袁世凯传记，其中记袁徐订交经过有云：

> （光绪四年）十一月，于夫人生长子克定于陈州。……公（指袁世凯）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倚为生……时吴公重憙守陈州，约公为诗酒友，雅敬爱之。天津徐相世昌，以孝廉馆淮宁县署，往游公别墅，阍者外出，公方在仰山堂读书，徐公不问主人，迳入，公起立揖谈，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公无力入都应试，公助以川资，始克成行。

所谓“以孝廉馆淮宁”云云，考光绪四年徐世昌尚未得举人，而下文“无力入都应试”，会使读者误以为“入都应试”乃在中举以

后，入京应进士试，而其实不然也。作者于此叙事似欠分晓，应作入京应乡试才是。（作者吴闿生乃古文名家、桐城派宗匠吴汝纶之子）。

沃丘仲子费行简的《当代名人小传》徐世昌传云：

> 世昌深沉过于世凯，而机智不逮，亦晚近之才士也。字菊人，天津世族。祖官南河河工通判，因居于汴。及昌家已中落。逾冠即奔走大河南北，为诸牧令司记室，月俸不逾十金也。已而举于乡，朋辈宴集，酒馀各言志，至世昌曰苟捷春官，当以知县指汴，若除杞县、太康，必以俸钱多致宾客，其志盖如此。丙戌成进士，选庶吉士，己丑留馆，授编修，素俭于学，所习惟小楷试律。时京师主文事者为翁同龢、潘祖荫，皆尚淹博，故久之不获一差。……时编检有八红八黑之目，世昌即八黑之一也。……世凯骤贵，乃援之绾新建军营务。其先居汴时，以少年好骑猎，二人已结昆弟交。……（此书于民国八年在上海崇文书局出版。）

所叙尚称翔实，世昌早年家境，实不充裕，故此希望能得进士，或庶吉士散为知县，指名为河南省之杞县或太康，然后多致宾客。沃丘仲子识其志小，安知日后为尚书相国，外任亦总督耶？（河南省最富庶县份，有"金杞县，银太康"之谣。）

至于所谓黑翰林，亦为事实。因为翰林是金马玉堂人物，清高无比，而一年的官俸，不过一百几十两，在京城里养一头家是不够开销的，惟有三年一次，希望能简放试差或学差，捞它一二千两银子，以资生活（试差是派往各省考试举人的主考官。学差是三年一任的学政。翰林得学差不易，简放的多为经已开坊的老

资格，新进者不易得也）。所以一个翰林刚好放完试差，又放学差，富贵迫人而来，人称为红翰林。至于入翰林已十年，仍未得一差者，则被称为黑翰林，几乎为同侪瞧不起，只好另想出路了。

徐世昌既属黑马，但有“贵人”扶持，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奏调他入参戎幕。彼此一帆风顺，跟着袁世凯水涨船高，新设东三省总督一职，藉袁世凯庆亲王之力，竟由世昌获任为首届总督，以钦差兼管三省水军事务，红极一时。他是光绪廿三年到小站当差的，到卅三年不过十年，便已官居从一品，后来又调任为邮传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宣统三年授太保。革命军起辞职，移居青岛。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总统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出任国务卿一职。民国七年，新国会选徐为大总统。任期未满，直系军阀把皖系军阀打败，徐的总统也跟着下台。从此离开政海，隐居天津，集一班文士辑《清儒学案》、《晚晴簃清诗汇》等书。平居以书画自娱，作品皆署水竹邨人，偶尔作诗。巴黎大学赠以文学博士。华北陷敌，日人威胁利诱，他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不予一瞬，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死于天津，年八十五。《光宣诗坛点将录》赞云：“田间释耒东海徐，寄情水竹恣娱嬉。扬榷风雅愿在兹，诗成早筑晚晴簃。”世昌以胜朝大老，为国耆宿，不以诗见长，而获入《点将录》，以其晚节弥坚也。

徐世昌在河南和袁世凯相识时，连小小的一个功名——秀才都没有，出仕的希望甚微，除非拿一大笔钱去捐纳，弄个异途出身，并非无望。一日，他和袁世凯一同去找一个很有名的看相算命先生。相士相他是大贵之命。世昌笑道：我连入学都没份，怎会有发达之日呢？相士说：阁下的命，逢马年必发，明年壬午，

你不妨一试去考考，包你必中，此后经过第二个马年，你就渐入佳境，到了第三个马年，你飞黄腾达，内而八座，外而兼圻，然后拜相入阁，皆此三马有以致之，如有一句不实现，鄙人不敢相天下士了。

归途时，袁世凯怂恿他快快捐个监生明年入京应北闱试，一切费用，由他筹措，不用担心。果然马年一试便中。第二个马年，是十二年后的甲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国日本打仗，下一年割台湾，朝野一片发奋图强，亟谋改革之声，响遍国内，袁世凯亦在小站练新兵，招世昌相助。第三个马年是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政府改新官制，东三省建制为行省，设东三省总督，内定以徐世昌为总督，下一年丁未往履任，所谓三马俱发，势不可挡，诚富贵逼人来矣。相士之言完全应验，只是他未能看出入阁之后，不出十年，徐世昌竟然身居"九五"为民国的大总统。传说那个相士已看出一日之中，有两个"皇帝"同来关照，他不敢道出你们将来是会登大宝统治中国的人君，恐怕闻者掩耳疾走，不想请教，岂不是赶走生意吗?

清代行省共分十八，后来台湾新疆先后设省则为二十，在光绪壬午乡试时仍为十八省，所以壬午乡试同年录一书的全名为《壬午科十八省正副榜同年全录》，第一页即列出各省取中名额：

(一)直隶二百八十二名　副榜四十九名

(二)江南一百四十六名　副榜二十二名

(三)江西一百零四名　副榜十八名

(四)浙江一百零四名　副榜十八名

(五)福建一百零三名　副榜十七名

(六)湖北六十一名　副榜九名

(七)湖南七十二名　副榜九名

（八）河南八十二名　副榜十三名

（九）山东七十四名　副榜十三名

（十）山西七十一名　副榜十二名

（十一）陕西五十二名　副榜八名

（十二）四川九十八名　副榜十二名

（十三）广东八十八名　副榜十四名

（十四）广西五十一名　副榜九名

（十五）云南六十五名　副榜十名

（十六）贵州五十名　副榜八名

（十七）甘肃四十二名　副榜六名

名额是固定的，除非政府对某省加恩，增广名额则为例外。光绪元年以前，只有十六个省份有乡试，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奏准陕甘分闱考试，以省甘肃士子老远跑到陕西省城应考，劳民伤财，考生称便。至于江南省则为江苏与安徽合称，安徽士人要跑到苏州应乡试，也是非常不便的，一直到光绪廿九年科举废止仍不改。

直隶省名额达到二百八十二名，则因为盛京（奉天一大地区）的考生都包括在内，又各省的士子捐监生后可以在顺天府考试，在北京做官的子弟也可以，因此名额要特别多些。还有，直隶省是京师所在地，顺天乡试，在顺天府举行（顺天府是一个特区，设府尹，直属中央政府，颇类国民政府时代的南京市市长），所以乡试特别隆重，主考官多至四名，且简派一二品大员充任，而头场试题也由皇帝钦命，其他各场始由考官命题，非常隆重。别的省份，每省每科只有一个解元，独有顺天乡试，每科有两个解元，第一名举人，一定要取中直隶省籍，第二名一定取其他各省籍的人，此人亦为解元，不过称为“南元”。举个例子，南通状元

张謇便是，他应江南乡试多次皆不取中，就捐个监生应顺天试，给他中了一个南元，他是江苏省人，以考得第二名之故。

上文曾说壬午顺天乡榜人才极盛，现在请看这批人才的姓名，所谓点将录也：

解元黄耀奎（天津县廪生）、汪凤藻（江苏元和）、文廷式（江西萍乡）、升允（蒙古）、恽毓鼎（顺天大兴）、何藻翔（广东顺德）、徐世光（直隶天津，世昌胞弟，名次九十五）、端方（满洲）、邹嘉莱（江苏吴县）、徐世昌（天津，名次一百五十四）、朱祖谋（浙江归安）、严修（天津）、皮锡瑞（湖南善化）。数之得十二人（解元除外），皆清末民初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大名人物，其中有总督、总统、督办、外交大员、词人、诗人、教育家、经学家、收藏家，可谓漪欤盛哉矣。

点将录之称，首创于《东林点将录》，其后专评论诗人者则有《乾嘉诗坛点将录》，民国初年又有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壬午榜中颇有诗人，凡在《光宣点将录》中有名者，亦援引之入文，以增读者趣味。

汪凤藻是南元，字云章，号芝房，年三十二岁，光绪九年癸未进士，授编修，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以编修赏侍读出任驻日本公使，其后人汪荣宝、汪公纪先后皆使日。

文廷式第三名，年二十六岁，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点将录》拟之活阎罗阮小七，赞云："胡无人，汉道昌，但歌大风云飞扬。纯纯常常，乃比干狂。（廷式自号"常纯子"，著有《常纯子枝语》。）道希《云起轩词》横厉盘郁，苏辛之遗。诗亦风格遒上，音节抗坠，所谓变徵之音也。"

廷式字道希，号芸阁，博学强识，长于史部，遗著有《云起轩词》（门人徐乃昌所刻），遗诗则叶恭绰所刻。

第四名举人升允，年二十五岁，蒙古镶黄旗人，字吉甫。官至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后，为宗社党积极人物。（溥心畬先生为其女婿。）

第十五名举人恽毓鼎，字薇孙，年十八岁。顺天大兴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著有《崇陵传信录》。

第六十七名举人何藻翔，年十六岁，广东顺德人，字翽高，自号邹崖逋者。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官外务部，曾随张荫棠使西藏，著有《藏语》、《邹崖诗集》、《岭南诗存》等书，民国十九年庚午死于香港，年六十六。

藻翔诗甚工，描写西藏风土人情诸作，尤为难得。辛亥革命事起，他立即辞职，晚年隐居香港，以教读及行医为活，香港的金石家邓尔雅、女画家张丹都是他的学生。

第八十七名举人端方，年二十一岁，满洲正白旗人，字陶斋，是清末的大官僚，做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以收藏金石书画享盛名。宣统三年辛亥，四川人民起义，端方奉命带兵入川，为义军所杀。

第九十五名举人徐世光，年二十六岁，世昌弟，字友梅。世光藉其兄馀荫，在山东任道员，甚得意。辛亥后在青岛隐居，后来世昌出任国务卿，袁世凯发表他办理濮阳水利工程，隆其体制，有类前清的河道总督，世光乃欣然就职。晚年退居天津，办理红十字会，为著名的慈善家。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逝世。

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邹嘉莱，年三十岁，江苏吴县附生，光绪十二年进士，字孟芳，号紫东。奕劻内阁时任外务大臣。民国十年死，年六十九岁。

光绪八年壬午乡试，顺天一榜，人才至盛，第一百五十名举人徐世昌之后，又有一位大词人、一位著名教育家、一位著名的

经学家。他们是朱祖谋、严修、皮锡瑞。这三位文化人获隽，为顺天乡榜再增光彩。朱祖谋中的是第一百七十八名举人，年二十一岁，浙江归安人，监生。祖谋原名孝臧，别署上彊邨人，又号彊邨、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云：

> 字古微，一字沤尹，归安人。清癸未(按即光绪九年)进士，授编修，预修《会典》，甲午大考二等，迁侍讲。拳匪祸作，召对廷臣，祖谋越次言董福祥不可用，外衅不可开，几得祸。后帝后西狩，困危城中，与宋育仁等共赋庚子秋词自遣。历迁至礼部侍郎，督广东学政。任满乞休归，遂不复出。
>
> 宣统御极，召令入觐，不赴。辛亥后隐居沪上。祖谋洁身远名，早辞簪绂，世鲜其传。工为词，精雅峭丽，并擅胜场。间为诗，亦有法。

朱祖谋先生中举后，下一年中进士，年才二十二岁，可谓少年科第，他任广东学政时，取中汪精卫为秀才，后来汪发达至沪上，知先生家境不裕，每月奉四百金，遭先生婉拒。民国二十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于牯岭路南阳西里私第，年七十五岁，溥仪在北方谥以“文直”。朱先生早年不擅填词，庚子年在北京受王鹏运影响，才致力为之。沃丘仲子说他偶然写诗，亦有法度，其实何止有法，简直也是诗人。《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天寿星混江龙李俊拟之，赞云：“早为折槛之朱云，晚作竹石俱碎之晞发”。庄生云：“凡外重者内拙。”注云：“古微襟期冲澹，尤工倚声，所刊《彊邨词》，半塘老人谓为六百年来，真得梦窗神髓者。晚际艰屯，忧时念乱，一托于词，实能兼

二窗、碧山、白石诸家之胜，非一家所可限矣。所刊两宋词集，多人间未见之本。”

第一百九十一名举人严修，年二十二岁，直隶天津人，廪生。他在天津办的南开中学、大学，是人所共知的，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逝世，年七十岁。《当代名人小传》记云：

>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清丙戌（即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编修。甲午简任贵州学政，屡上疏请废制义，后蕲开经济特科，定天算舆地诸学艺岁举法。德宗嘉之。戊戌政变，乞休去。辛丑至日本考察学务归国，袁世凯延主直隶学务。其时北洋大学及诸专门学校，皆所经始，以绩晋五品卿衔。复私立中小各学，称南开学校。既而学部成立，以世凯援引，超授学部右侍郎。宣统初，乞病退，仍主持顺直（按：指顺天、直隶也）教育。辛亥，世凯组织内阁，授学部大臣，不赴。为议和北方代表之一。入民国，曾被推为财政总长，亦辞弗出，袁氏促之力，乃藉辞赴欧美各国考察以避之。既还，优处乡郡，不入京师。袁氏诸子若克定、克文，皆其弟子，世凯亦视为畏友。其组织天津自治，修赞助力为多。以澹于荣利，故屡辞簪绂，然亦未尝自标高尚。居今之世，犹艾丛之芝兰矣。

沃丘仲子所写的小传，已概括其生平。（但有若干舛误之处，未能一一指出，以无关宏旨也。例如他是光绪九年进士，却说成是光绪十二年之类。）严氏以编修骤升侍郎，非世凯力不及此，但他并不党于世凯，故未被人指目，沃丘仲子称其艾丛之芝兰，允矣。

第二百三十四名举人皮锡瑞，年三十岁，湖南善化人，拔贡生。锡瑞字鹿门，一字麓云，十四岁中秀才，隔一年就成为廪膳生、廿四岁，举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中举后，曾三次入京会试，均报罢。因为没考取进士，就潜心讲学著书。先后主讲湖南、江西各大书院讲席。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鹿门先生在南昌经训书院讲学，以西京微言大义教诏学者，说经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一时高才隽秀之士，咸集其门。中日战争后，国人高言变法，湖南设时务学堂，光绪廿四年戊戌，长沙又设立南学会，聘鹿门为学长。政变后，清廷"秋后算帐"，对他降罚也很轻微，只革去举人，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年后才开复他的举人。京师大学堂成立，经史文三科需教授甚殷，张之洞三次电请他北上任教（其时之洞以大学士管部，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已知道鹿门先生学问），他都以事辞却。

皮先生平生学问，尽萃于《尚书大传疏证》（此书初名《尚书大传笺》），先后花了十二年功夫才完成，后来续有著作，如《九经浅说》、《今文尚书考证》、《汉碑引经考》、《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皆为当年学子学习。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戊申二月初四日，卒于故乡里第，年五十九岁。

顺天乡试副榜，取录四十九人，其中较有名气的为震钧、梁于渭、杨士燮。第二名震钧是镶红旗满洲附生，年二十六岁，他后来有没有再考取举人，成进士，现在不予查考，他的一部《天咫偶闻》是纪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名著。第二十九名梁于渭，广东番禺附生，年二十六岁，后来再考举人中式，得以中进士，在北京六部做小官，因为不得点翰林，精神大受刺激，疯疯癫癫，人称梁疯子。因不得意于仕途，反而成全了他的艺术事业，潜心绘

画，不上衙门，十年之间，在京师艺坛有相当地位。后来索性辞职还乡，在广州以卖画为生。第四十名杨士燮，安徽泗州人，增生。因为他的兄弟杨士琦清末民初在政坛上是当红人物，所以士燮在宦海也颇得意，但没有甚么建树。

江南乡试正考官是礼部右侍郎许庚身（浙江仁和县人），副考官侍讲衔翰林院编修谭宗浚（广东南海县人），监临是安徽巡抚裕禄（正白旗满洲人）。

第一名解元林介弼，年二十八岁，安徽怀远县优附生，没有甚么时誉，但第二名举人在清末民初却是一个著名工业家，在政海中又是一个颇见活跃的人物，就是许鼎霖，年二十五岁，江苏赣榆县附生。光绪末年，许鼎霖和南通张謇一起，被称为“民主派”人物，为了改革政治，常常往北京开会。南北报章不断提到他的大名许鼎霖，字久香，因此，大学士张之洞对他的一名一字颇有印象。当时北京盛传一个有趣的故事。

张之洞喜欢在公馀之暇邀集一群幕僚名士打诗钟和对对联。一日，张之洞退朝，偶有所触，遂出上比“烟惹御炉许久香”征对。一时无人能对，到了晚上，有人送到一信给之洞对出云：“图陈秘戏张之洞。”之洞看后连声“混帐”，这件事就传开去，人家说许久香可以对张之洞了。久香于民国四年乙卯九月七日，死于上海，年五十八岁。

第五名举人蒯光典，年二十四岁，安徽庐州府附监生，分部行走郎中，下一年成癸未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江苏淮扬道，候补四品京堂。光典字礼卿，为清末著名的翰林，又喜欢讲新学，设金粟斋译书处，翻译日文科技、政经书籍，有名于时。（包天笑先生年少时，即曾在金粟斋译书处服务）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与《当代名人小传》同为姊妹篇，

是书由上海中原书局出版，我得的一部是一九二六年第六版）有蒯光典小传云：

> （光典）幼好学为古文词，已而综博典籍，精研六书，以翰林改官道员，督淮南盐，擢京堂，为欧洲留学生监督。殁。光典于书无所不窥，尤熟许叔重《说文》、陆德明《释文》、《南北史》、《文选》及诸史舆地，皆有笺注别记，考证异同，张之洞谓其学兼古今，殊当之无愧。而政事非所长。督盐时，之洞欲大革宿弊，光典徒能为文告，无综核才，属官蒙之，私销日多。

活写出书生从政非所长的一幅图画。光典督办淮南盐务，是个肥缺，因为没有办事才干，不懂得盐政的利弊，为下属蒙蔽，私盐反而盛行。

光典死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年五十四。据李审言说，他刻有《金粟斋丛书》，又有《三十年野获编》，未见出版。

第二十名举人唐文治，年十七岁，江苏太仓州人，附生。文治字蔚芝，号茹经，生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光绪八年应为十八岁，但榜年作十七，盖少报一岁也（旧时的人可以随便填写年岁，任人增减）。中举后，他又受学于黄以周先生之门。光绪十八年壬辰成进士，官户部主事。翁同龢是他的座师，赏识他的学问，请他到家中做侄孙辈老师。

光绪廿四年，文治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又为庆亲王奕劻所赏，几乎成为庆王集团一个智囊人物。英皇加冕，清廷派贝子载振为专使，往伦敦祝贺。文治，载振之师也，庆王生怕载振少不更事，特命文治为随员。专使团历聘欧美后回国，文治眼界大

开，有新人物之称。光绪二十九年升商部右丞，辅助尚书载振，皆庆王之意也。因此他不免有豪门走狗之讥，使他很不高兴。后来改设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但因出差往盛京，尚书一缺由文治署理。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发生杨翠喜参案，载振大受攻击，庆亲王、唐文治劝他辞职，由文治代草辞章。不久后，文治为了避指为庆党，辞去农工商部左侍郎之职，专心办理教育事业。

唐文治辞职后，光绪三十三年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即今日的校长之称。此校原为南洋公学），后来改为南洋大学，一直任校长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辞职后，在无锡创办国学专修学校。抗日战争发生，无锡国专迁往内地，文治虽然年已七旬，亦随校迁徙，继续讲学。

民国三十二年壬午（一九四三年），唐先生以乡举重逢，举行重宴鹿鸣之典，摄影留念，时年已七十八矣。一九五四年逝世。遗著有《尚书大义》、《诗经大义》、《紫阳术发微》、《茹经堂文集》等。

第三十八名举人李经方，年二十七岁，合肥县廪贡生、官生。经方字伯行，李鸿章长子，但非亲子。原来鸿章中年无子，焦虑万分，以季弟昭庆之子经方为嗣，后来生子经述、经迈，但仍以经方居长，不过袭侯爵的却是经述而非经方。鸿章死后百日内经述亦死去，遂由经述之子鸿章冢孙李国杰继袭（抗战初期，国杰有降敌嫌疑，为特工误杀）。

经方死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阴历八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我对朋友谈到台湾事，叹息李经方早死十一年，否则由他经手割台湾与日本，又由他经手接台湾归来，他可谓死得瞑目。

甲午中日战争，我国大败，下一年中日议和告成，以台湾割给日本，清政府那批憎恶李鸿章的人，故意要窘辱鸿章父子，指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鸿章认为这是一件极端屈辱和棘手的事，示意经方力辞。（翁同龢乙未年四月廿四日的日记有云："柳门来（按汪鸣銮字柳门，和翁氏为一派——引注），倦极未晤，留字告余，合肥不令经方去台"。经方遂以病告，但清廷不准他推避又再下严旨切责，措词极为严峻，有云："现在日使将次到台，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延迟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此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于四月廿七日致电李鸿章的。廿八日，李经方已有覆奏，不敢再辞。前此清廷下严旨切责李鸿章，鸿章知不能再推辞，致电经方有"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等语。经方遂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完成割台使命，忍辱归国。

李经方年少时学习英文，进步极速，曾纪泽《使西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十七日云："至李相署，与李伯行一谈。伯行聪慧绝人，从朱静山暨白狄克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英书西报之属矣。"到底他的英文程度如何，未知，但在此之前他做过驻英使馆参赞，又游历欧美各国，甲午前曾为驻日本公使，光绪三十三年任驻英公使，大概英文也有相当造诣的。他最后的官职是邮传部侍郎。入民国后，常居大连，偶来京津访旧，后殁于大连。

经方亦颇能诗，民国十五年，他在北京观段祺瑞下棋，有《观段执政与客弈》七律一首，诗云："俨同运甓惜光阴，镇日敲棋玉漏沉。代谢几人称国手；后先一着见天心。漫夸黑白分疆界，转瞬兴亡即古今。局罢请君观局外，纵横南北气萧森。"其时北京

局势岌岌可危，南方的革命军又准备北伐，李经方借观棋寄其感慨之意，不失为一首好诗。

第四十八名举人杨士琦，年二十一岁，安徽泗州附生。士琦字杏城，一向追随袁世凯的策士。光绪末年，以世凯之力，在商部、农工商部先后任丞参等职，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任邮传大臣，民国初年任参政院参政、政事堂左丞。徐世昌任国务卿时，左丞的杨士琦几乎是实际的国务卿，可见袁世凯对他的倚任。

杨士琦是个阴谋家，很容易便为枭雄的袁世凯所赏识。晚清政海传光绪帝死于非命，亦出于杨士琦所献之策，因此他后来亦死于毒药水。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此事颇详，亦极有趣，不妨摘录：

> 袁（世凯）既死，杏城退居沪上，置宅亚尔培路巨籁达路角，所谓杨五爷公馆。纳小菠菜、小白菜为妾，皆殊色也。一日，杨晒箱箧衣物古玩，毒药水瓶在箱内，杨郑重嘱家人云：此种药水最毒，一点入口即死，移放高柜，令家人不得近，乃出外拜客归家，排闼而入，其子（或曰毓珣）正与小菠菜、小白菜同榻。杏城气极而晕，僵坐沙发，口中言都要处死。小白菜乃取毒药水滴入茶中，令家人送杏城饮之，片刻而死。此为轰动上海毒死杨氏家主之大案，亦可谓自食其报矣。……

所谓毒药水乃士琦以重金购自洋人，其物无色无味，光绪被毒死于前，其后乃为赵秉钧，人皆知为杨之杰作。杨死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能诗，其遗诗名《泗州杨杏城尚书诗集》。

第五十三名举人杨士晟，年二十五岁，泗州附生。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士晟字蔚霞，士琦的兄弟行。他成进士后在江苏南汇、崇明、无锡历任知县，过道班后仍留江苏当差。入民国，得士琦照应，于民国三年至十一年充苏州海关监督兼苏州交涉员，后来调充瓯海关监督。

第六十名举人朱孔彰，年三十七岁，苏州府增生。以著《中兴将帅别传》享名学术界（三十年前逝世之史学家朱师辙，其子也。）

第七十名举人朱铭盘，年三十岁，江苏泰兴县优贡生。铭盘字曼君，与张謇、周家禄同在朝鲜吴长庆幕府。长庆死后，他们各奔前程，不久即谢世。《光宣诗坛点将录》拟之为地恶星没面目焦挺（一作张謇、梁葓、吴涑）。赞云："出手能教铁牛服，奇男子，真面目。"诗云："快意高歌宝剑篇，少年结客出幽燕。不知谁是丘心坦，此取声名四十年。"论云：曼君少负逸才，跅弛不羁。其诗俊逸绝伦，泽古甚深，盖才人兼学人也。啬翁早掇巍科，晚膺佐命，湖海声名，超超玄箸，亦以才胜也。公约有俊选之致，温叟擅深湛之思。不谓江东菰芦中生此麟凤。"（按：啬翁张謇，公约梁葓，温叟吴涑。）

章士钊先生有《论近代诗家绝句》，关于朱曼君事，可参考。诗云："东藩凭轼下来休，风雨胡床共一楼。他日诗篇应有影，斜阳征马立金州。甲申，吴武壮援韩之师归，顿置金州，曼君在幕。后三十年，日本大将乃木希典句云：'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曼君诗中，岂乏此境。"

"牝朝奸佞隐相君，长揖横刀似不群。一机辨奸同斩马，西京故自重朱云。曼君曾为武壮以书痛斥世凯，原札影本附《桂之华轩骈文集》中。贞壮曾语余，有海州丘心坦者，为徐海间大侠，

以材武从曾湘乡大军，积功至副将，弃之，乃以候选县丞终于丁沽。曼君与之交甚挚，集中所称丘生、丘大履平即其人也。”

汪辟疆注云：“丘亦工诗，有《归来轩诗》一卷。记其为题画芍药曰：‘曾记花时共倚阑，春残我亦别淮干。可怜旧梦无寻处，忍把将离作画看。’又有五十自寿联云：‘一生事业归来草；百战功名未入流。’其风趣可想。余未见《归来轩集》。贞壮云。”

按：武壮为吴长庆谥号。贞壮为诗人诸宗元之字。

第一百十七名举人夏孙桐，年二十八岁，江阴县职监生。孙桐后来中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授编修，官至浙江湖州知府，工倚声，有《悔庵词》，亦能诗。

第一百十八名举人陆建章，年二十四岁，安徽寿州附生。这个陆举人到了民国初年，由文质彬彬的孝廉公一变而为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后来搞特工的那班头头，不得不奉之为近代的特务祖师爷了。我们请看沃丘仲子在《当代名人小传》怎样写他：

> 建章善阴谋，能反覆云雨，在北洋武人中有“诸葛”之号，而竟戕于徐树铮手，真杨炎所谓英雄末路者矣。字朗斋，北洋武备学生，受知袁世凯，保道员，改授广东总兵官。入民国，为军政执法处长，兴告讦，布侦探，自以杀乱党邀宠袁氏。……世凯爱其谀，授为陕西将军。

当反袁帝制时，云南广西义军起，段祺瑞说服镇守汉南的镇守使陈树藩独立，以兵攻打北军的陆建章，兵围西安，陆建章兵败逃走。后来建章知道陈树藩之反戈，系出于段祺瑞的指使，对祺瑞深恶痛绝，发誓要报复。冯国璋任总统后，竭力倡议南北和平，而段祺瑞却主张武力统一南北。建章乃北上助冯国璋逐段祺

瑞，并劝曹锟重新加入冯氏集团，增加直系势力，与皖系的段祺瑞抵抗。

陆建章到了天津，正值督军团在此开会，徐树铮听说建章已到，便致书建章，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建章自恃本人是北洋派老辈，新进的徐树铮看来不敢对他不利的，便坦然而往，尚未倾谈，即为卫兵从后面开枪把他打死。这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的事，立即引起主和派极大震动。

七年后，是为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徐树铮入京见段祺瑞执政后，十二月廿九日乘专车离京南下，车至廊房为陆承武所杀，承武乃建章之子也。据树铮之子徐道邻所说，陆建章是冯玉祥的舅父，冯嗾陆承武杀之也。

江南乡榜的"精英分子"，至陆建章止，但副榜二十人中，还有一个出类拔萃第二名的张一麐，年十三岁，元和县附生。张只考取了半个举人，到光绪十一年乙酉，他才应顺天乡试，中了一名资格完备的举人。他出生于同治六年(一九六七年)，到光绪八年已经十六岁，但报减三岁。中举人时实在是十九岁，算是少年得志了。

一麐字仲仁，光绪廿九年应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袁世凯赛其才华，立即聘入幕府。民国成立后，仲仁任总统府秘书及政事堂机要局长。袁搞帝制，他不赞成，辞职南下。民国十年脱离政坛在故乡苏州，为地方服务。抗日军兴，他又倡"老子军"杀敌，但未成事实。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一连三届皆获选。

民国廿八、九两年，张一麐常居香港，和许地山等提倡新文字，要使文字大众化，易晓易写，但没有成功。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廿四日在重庆病故，年七十七岁。遗著《心太

平室集》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出版。

江西省的正考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新授江西学政陈宝琛；副考官翰林院编修黄彝年（河南商城县人，光绪二年丙子进士），监临官是江西巡抚李文敏。江西一省取中举人定额为一百零四名，第一名黄镇英，年三十九岁，龙南县拔贡生，藉藉无名，只有第二十一名的陈三立在此百人中独放异彩。陈三立年三十岁，义宁州学附生。

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官吏部主事。光绪廿三四年间，宝箴在湖南响应政府行新政，三立助其父大力推行，延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新派人物一时集于长沙，为各省奉诏行新政最卖力的分子。戊戌政变后，宝箴革职，三立亦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即致力为诗。

《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天魁星及时雨拟陈三立，赞云："见一善，尝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世高谈空户牖。撑肠万卷饥犹餍，脱手千诗老更醇。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

三立为清末四公子之一，晚年隐居北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逝世，年八十六岁，有《散原精舍诗文集》行世。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云："诗癖堂堂征在今，新诗改罢复长吟。骨头输与海藏叟，大戟长矛相向森。（自注：海藏为诗，一成不改，自言：'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山公知赏语肫肫，迈迨文章各有神。三世亲承君子泽，并着躬拜振奇人。（自注：光绪丁酉，湖南时务学堂招考，中丞公监临收卷。吾交卷时，公诏语移晷。'振奇人'，先生挽外舅北山先生所用语。来吊时，跪拜涕泣，口呼彦复，观者均极感动。）""羔雁何能尽纬奇，技辞苦语倘难知。至情不碍开云手，第一崝庐谒墓诗。"

陈三立与其帅陈宝琛及陈衍的诗，当时有同光体之称，陈衍对他也很推崇，《石遗室诗话》有云："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于当代能诗钜公，尝云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盖其恶俗恶熟者至矣。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并与其乡高伯足极相似，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景，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

第四十六名举人陈家瑶，年二十七岁，瑞金县拔贡生户部山东司学习七品小京官。这个陈家瑶即后来戊戌运动时一个急进派人物，与康有为同一阵线的陈炽。他未中举前已是年轻的拔贡生，授七品小京官，在户部办事了。

陈家瑶后来改名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他在户部熬了十多年，已升郎中，后来考取军机处章京。他曾游遍沿海各省，又在香港、澳门留心考察，主张学习西洋政教科学，中国才能富强。光绪廿四年戊戌，他在北京组织自强学会，自任提调。这个会认为中国应该设议院，改行君主立宪政体，并主张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商业，取消厘金。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被杀，康梁师徒出走，陈炽受到极大打击，不久即逝世，年四十六岁，遗著有《庸书》《续富国策》，颇工诗，有《衷春林屋诗》。徐世昌和他是壬午举人同年，《晚晴簃诗汇》收其诗七首，评以："次亮入值枢曹，喜谈时务，惜未中年而殒。其诗托意绵邈，骨秀韵清。"

陈炽在"革新运动"时，大言炎炎，颇为朝野人士侧目，他本是翁同龢的下属，翁氏日记中记其数事，略可见其为人，分录如次：

(光绪廿一年)五月三十日：陈次亮(炽)来，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遗，其实纵横家也。

(光绪廿三年)六月十三日：陈次亮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批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

(光绪廿三年)八月廿七日：陈次亮竟得心疾，奉其母来，迫其母去，颠倒昏谬，旋即奉讳，本拟赙助，今送十金耳。

这三段记事，第一段欣赏陈次亮的言论，以国士待之，但又贬他为策士之流。第二段大概是陈次亮对行新政有所条陈，请翁同龢代奏，折中有提到翁氏名字，故抹去之。第三段说陈次亮奉母来京师侍养，但又迫母亲回去，不久后他的母亲死了，为人如此昏谬，本想以物质助他办丧事，但这样的人不足帮助，只送十元为奠仪，以示对他深恶之意。

相传翁氏日记，有关戊戌新政时期(光绪廿三、廿四年)，在党祸发生后，他把日记略作改动。这三段记事，恐怕也有改写过的嫌疑，避免他与新党有任何关系也。

康有为中进士后，以主事任职工部，那时候他已高谈政治改革，畅论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故此与陈次亮成为同志。王伯恭记其与陈次亮一事，甚可一谈。王氏所著《蜷庐随笔》康有为一段记云：

有为既捷(指他中了光绪廿一年乙未进士)，声名愈大，而趾高气扬亦愈甚。是年秋间，余遇有为于陈次亮座上，闻两人相对妄谈，疾掩耳而去。……乙未之秋，余访陈次亮于西珠市口，坐未定，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主人略即欠身，客便就坐。问其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次亮手摩其首

曰："头痛。"康叹曰："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陈亦咨嗟不已。因言两江曾帅又出缺，今任何人为宜乎？因泛论当时人物。既而曰：刘岘壮似可，且曾督两江，固当不至蹉跌。康鼓掌称善。陈言便可决计，无用游移。两人问答如此，直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一为新进之主事，乃妄人耳。余亟掩耳而去。已而两江一席，果属刘公，亦可谓善于揣摩者矣。

此处之"两江曾帅"是两江总督曾国荃，刘岘庄乃刘坤一之字。其实曾国荃早在光绪十六年十月死于江督任上，政府即以前江督刘坤一继任。坤一于光绪五年已授江督，未到任，召京，开缺。以左宗棠任江督，光绪十年，以礼部尚书曾国荃为江督，十六年曾死，又以刘坤一补授。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刘奉命到山海关督师，政府调张之洞署理江督，廿一年十一月，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坤一亦回任两江。此乃顺理成章之事。王伯恭记此段谈话，似与事实不符，惟形容康陈为大言炎炎之人，则可供参证耳。

江西正考官既是陈宝琛，此人又是同光派诗人的领袖，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有极高位置的，不可不略作介绍一下。他是福建闽县人，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橘隐，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做翰林官时，常上书议论朝政，为光绪初年名翰林之一。执政大臣讨厌他动不动就批评政治，知道他只是书生，未必会做事。中法战争时派他为南洋帮办军务大臣，协助两江总督曾国荃，但亦无表现，后来因保举唐炯、徐延旭落职，遂归隐故乡凡二十年之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以张之洞举荐，奉召入都补原官（原任内阁学士），总理礼学馆，不久升山西巡抚，尚未赴

任，开缺，以候补侍郎充毓庆宫师傅，教宣统读书。这是陈宝琛在清朝的宦迹。

在小朝廷时代，陈宝琛最为溥仪所敬重，引为心腹大臣。九·一八沈阳事变，他反对溥仪出关投日，因此没有跟着去"满洲国"做官，民国廿四年春初在北平逝世，年八十八岁，溥仪谥之为"文忠"，赠太师。

《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宝琛拟天机星智多星吴用。赞云："胸藏万怪貌婀婀，是大宗师，是德充符。"注云："弢庵太傅，高风亮节，士林楷模。当溥仪被挟至津门，弢庵伏地陈七不可，且言：'上必去，臣亦不能相从矣。'痛哭而返。有诗数首，词至哀恸。盖深知托命倭人，匪惟速亡，且无以对宗邦，上父母丘陇也。弢庵诗初学黄陈，后喜临川，晚以久经世变，深醇简远，不务奇险而绝非庸音，不事生造而决无浅语。至于抚时感事，比物达情，神理自超，趣时弥永。余曾以和平中正质之，弢庵为首肯者再，以为伯严、节庵所未道也。"

浙江省正考兵部左侍郎许应騤(广东番禺县人，庚戌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朱琛(江西贵溪县人，辛未进士)。监临是巡抚陈士杰(湖南桂阳州人，己酉拔贡)。浙江和江西一样，正榜取一百零四名，副榜十八名。但浙江这一科却没有甚么知名人物。解元是陈翊清，年二十五岁，慈溪县学增生。

福建省正考官礼部右侍郎宝廷(宗室，镶蓝旗人，戊辰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朱善祥(浙江秀水县人，丙子进士)。监临是巡抚何璟(广东香山县人，丁未进士)。

福建省举人取中定额是正榜一百零三名，副榜十七名。解元是郑孝胥，年二十一岁，闽县学附生。孝胥一生变化极大，是民国初年一个传奇人物。后来他追随溥仪，主张溥仪出关在日本人

摆布之下成立"满洲国"，为开国的第一任总理，以致身败名裂，为千古罪人。民国初年他还未和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发生关系，所以民六丁巳复辟，他未尝插手。到民国十二年始由陈宝琛推荐给溥仪，说他有办事才干，能整顿内务府多年积弊，溥仪派他为"内务府大臣"。但干了两个月，毫无办法，知难而退。到溥仪被逐出宫，他追随左右，遂成为溥仪的心腹大臣，陈宝琛几乎败在他手上。

《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陈三立、郑孝胥二人为诗坛头领，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拟郑孝胥，赞云："慷慨北京卢俊义，金装玉匣来天地。太平车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货去。吁嗟乎！日暮途远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诗云："肯向都官拜路尘，花间着语老犹能。只缘英气平生误，未信寒蛟竟可罾。"

汪国垣教授论之云："苏戡急功名而昧于去就，陈弢庵、张孝谦尝论及之（张名孝谦、商城人，光绪丙戌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盖以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吾友程穆庵闻郑死，有句云："片语教亡臣有策，终身为虏我何尤。"严于斧钺矣。若就诗论诗，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难可泯灭，孔子不以人废言，兹仍旧录，而并为著论于此。"（伯雨按：张孝谦是光绪十五年己丑进士，非丙戌，选庶吉士后授职编修，非仅庶吉士矣。又按：程穆庵名康，为顾印伯诗弟子。程千帆所辑《光宣诗坛点将录》于此段有按语云："千帆谨按：先君《哀郑重九》云：'高名一代海藏楼，晚饭千秋质九幽。片语教亡臣有策，终身为虏我何尤。'注云：'海藏早岁读书福州，有诗云：夜起之号，盖以此也。孝胥每年重九必有诗，故人呼之为郑重九。'"）

第二十二名举人林群玉，年二十七岁，闽县学附生。群玉后

来改名纾，字琴南，号畏庐，又号冷红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地明星铁笛仙马麟拟之。赞云："铁笛裂，中情热。"注云："民国元年徐树铮办《平报》，林氏日撰杂文刊登，名曰《铁笛亭琐记》，旋出单行本。后售予商务印书馆，乃改名为《畏庐琐记》"。论云："畏庐血性男子，任侠负义。戊戌二月，割胶州。畏庐联公车，与总理衙门堂官争甚力，革去举人。诗初学娄东，非其志者。辛壬以后，渐近苍秀。晚学坡公简斋，七言律视前更进矣。石遗尝称其题画绝句。畏庐固工画，然以余所见者，唯《江亭饯别图》简远秀逸，它不称是。"

林纾以家贫，早岁即在外找生活，曾在杭州教书，后来得任京师大学堂教员，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仍任教职，从游生徒凡二千馀。新文学运动时，他竭力反对，有顽固派之称。他虽在清朝没有做官，但对于光绪宣统二帝却忠心耿耿，时时亲往崇陵拜祭，例有祭文，自署"举人林纾"，看来他的举人未尝被革，如果革去，就应该自称"前举人"才对。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影响很大，对于介绍西方文学之功不可没。遗著除译著小说一百七十馀种外，有《畏庐诗存》、《畏庐文集·续集、三集》、《畏庐画集》，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八十七名举人陈衍，年二十七岁，侯官县学廪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拟之。赞云："取威定霸，桐江之亚。"诗曰："一灯说法悬孤月，午夜招魂向四围。记取年时香宋句，老无他路欲何归。"注云："石遗老人初治经，旁记许长，多可听。中年以诗鸣，顾非甚工。至说诗，则居然广大教主矣。朱武在山寨中，虽非十分本事，却精通阵法，广有谋略。陈衍，字叔伊，又字石遗，号匹园，侯官人，光绪壬午举人，官学部主事。民国任福建通志局总裁。民国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有

《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元诗纪事》、《辽诗纪事》、《宋诗精华录》等。"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云："众生宜有说法主，名士亦须拉拢人。石遗老子我不识，自喜不与厨师邻。""石遗编《近代诗钞》大半与己唱和之作，以厨师张宗扬之诗殿焉。石遗诗非极工，而论诗却有可听，甚自负。余早年遇于闽子营郑叔进座上，谈及编《元诗纪事》甚悉。及甲戌来金陵，一日，余与石遗登豁蒙楼煮茗，从容询曰：'君于清代学人位置可方谁氏？'石遗曰：'其金风亭长乎？'时黄曾樾亦在座，因问余：'君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陈先生配何头领？'石遗不待余置答，遽曰：'当为天罡耳。'余笑。石遗岂不知列彼为地煞星首座耶？殆恐余一口道破耳。时座中仅三人，慈荫亭当能记及之。此一事与《点将录》有关，因记之以谂来者。——方湖注。"（按：方湖为汪辟疆之号。）

陈石遗中举后，并不是一官到手的，仍须走江湖四出觅食，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在上海时，陈季同、寿彭兄弟和洪述祖合资办一个《求是》杂志，月出三册，内容以翻译东西洋科学介绍政经为主，请石遗为主笔（季同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为参赞，精法文，对林纾译小说大有帮助。寿彭则精英文。洪述祖即戏剧家洪深之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湖北办新政，读《求是》文章，问郑孝胥陈石遗是甚么人？可叫他来谈谈。石遗便于光绪廿四年正月到武昌，两人谈得很投机，之洞叫他辞去《求是》来武昌为他办刊物。恰好《求是》停办，石遗就一心在湖北，后来张之洞招他入幕府办事。

张之洞入京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招呼陈石遗为候补主事，又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习。在北京侨居数年，和当代诗人名士酬唱，声誉大起。民国后，曾主编《福建通志》，厦门大学聘为教

授，晚年隐居苏州，但时时回故乡探视亲友。民国廿六年夏在福州逝世，年八十二岁。

光绪壬午乡试，十八省正副考官三十六人，最为当时人士议论的就是福建正考官宝竹坡（廷）了。因为他出差时居然买民女为妾，然后上书朝廷，请予处罚，听说摺中有“微臣好色成天性”等语。因为他是诗人，又是福建主考，《光宣诗坛点将录》给他一个颇好的位置，所以也应一谈。

《点将录》把他和李慈铭列为“掌管钱粮头领二员”，而李慈铭对这个“同事”却攻击到体无完肤。书中以天贵星小旋风柴进拟宝廷，赞云：“金枝玉叶，美无度兮，琨瑜竹箭，丰其获兮。梦觉高唐（借用），自朝暮兮。吁嗟小旋风，无赫赫之功，甘送老于一第。”论云：“亲贵中能诗者，前有红兰主人（蕴瑞，字兼山，号红兰主人，安和亲王子。有《玉池生稿》），近则推偶斋侍郎也。偶斋门人多当代豪俊，郑苏戡、陈石遗、林畏庐、吴彦复、康步崖尤有名。柴进在山寨中亦平平，其能为人所推许者，亦以广收亡命，济人缓急也。”注云：“宝廷，字竹坡，号偶斋，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戊辰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七年，授内阁学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出典福建乡试，还途纳妾，自劾罢。光绪十六年卒，年五十一，有《偶斋诗草》。”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宝廷娶妾，中途自劾云：“‘侍郎宝廷奏：典闽试归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谕：‘交严处’。旋议革职。宝廷，字竹坡，宗室。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才子自命。癸酉（按：同治十二年）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潞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谈。今由钱塘江入闽，与江山船妓狎，归途遂娶之，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

浦，有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宝廷大惧，遂道中上疏，以条陈福建船政为名，而附片自陈，言钱塘江有九姓渔船，例备官坐，舟人有女，遂买为妾。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闻其人面麻，年近三十矣。宝廷尝以贺寿慈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劾之去官，故有人嘲以诗云："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一时传诵，以为口实云。"

诗写得极有风趣，讽刺性也很强，相传出于易哭庵（顺鼎）之手。按：同治十二年癸酉乡试，浙江正考官为侍读徐致祥，副考官侍讲宝廷，这是宝竹坡入翰林后第一次得到试差，九年后已是侍郎，再得就"撞板"了。李春山真名李铭钟，琉璃厂书铺宝名斋老板，与工部尚书贺寿慈有"丑闻"，为张佩纶劾罢，事在光绪五年。传说贺寿慈的侍妾是李春山所赠，而李之妻为贺府婢女，冒称正室者，张佩纶查得证据入奏之语。而贺也自认与李春山无"真正亲戚关系"。

宝竹坡娶江山船女事，《孽海花》小说有很精采的描写，近读汪辟疆教授《汪辟疆文集》有《宝竹坡遗事》一则，中有录竹坡自作之《之江行》诗，即记其事，为使读者参考，摘录如次：

> 余曩在京师，亦颇闻都中人述其事（即宝廷娶船女事），女名雨林，其妹名月林，当时皆为竹坡所得。竹坡罢官后，日以诗酒自娱，常携雨林姊妹来西山，后益自颓放，家中落，几贫不能自存。未几雨林以不服北方水土，质弱苟延，香魂旋化，竹坡益无聊奈，一日大醉，外出访友，醉后惊风，行至大街某肆门首，倒地遂没。没日始知之，乃舁归邸

寓。一时闻者，为之叹惜。

湖北省正考官是翰林院检讨陈存懋(江西赣县人，同治甲戌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管廷鹗（山东莒州人，光绪丙子进士)，监临官是湖北巡抚彭祖贤(江苏长洲县人，咸丰乙卯举人)。解元是张东煜，年三十二岁，黄安县学附生。这一科湖北举人没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

湖南省正考官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叶大焯(福建闽县人，同治戊辰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杨文莹(浙江钱塘县人，光绪丁丑进士)。监临官湖南巡抚卞宝第(江苏仪征县人，咸丰辛亥举人)。解元陈嘉言，年二十八岁，衡山县学廪生。和湖北一样，湖南这科也没有知名人物。

河南省正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吴树梅(山东历城县人，光绪丙子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郑嵩龄(江苏上元县人，同治戊辰进士)。监临官河南巡抚李鹤年(奉天义州人，道光乙巳进士)。解元李见荃，年二十岁，彰德府学廪生。这一科河南出了一个大官，一个大文豪，值得一谈的。

首先是第六名举人文豪秦树声，年二十岁，固始县附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地暗星锦豹子杨林拟之。赞云:“笔管枪，七宝装，遭人而问，善刀而藏。”论云:“右衡年未三十，誓不读齐梁以下书，由是尘根所触，香味溢襟袖，更参之杨马以振其采，寻之庄骚以婉其情，根之于经子以礦其骨，自负其文甚至。诗乃馀事。然书味外溢，真气内充。中州诗人，右衡为冠(稍前有何吟秋天根，能为陆剑南，同时，商城张孝谦，能为元遗山，次则张晋之良暹)。”

秦树声字右衡，一字晦鸣，号乘庵，光绪十二年丙戌进士。

癸卯廷试经济特科，置二等，由工部主事升御史出守云南曲靖府知府，后来简放广东提学使。《石遗室诗话》记右衡好古的名士作风云："闻其在官时，上书大吏言事，字写十七帖，发电文用骈体。余辛亥岁暮怀人绝句：'中州人物推秦七，奇字蟠胸杨子云。奏记长官皆草圣，聱牙急递尽骈文。'"

关于秦树声的宰历和生平，记述得比较详细而确实的还是沃丘仲子的《当代名人小传》，摘录如左：

> 树声亦清室遗臣……字幼衡，通眉长爪，清瘦雅和。以进士分工部。时祭酒盛昱为文坛主盟，树声其弟子也。博涉群书，兼及梵典。以狷洁，官久不迁。及壬寅(按：光绪廿八年，一九〇二年)始得记名御史，已亦简授云南曲靖府知府。适日俄战作，入谢时，力劾奉天将军增祺，两宫为动容。既之滇，总督丁振铎其乡人，且稔交，然振铎庸暗，以冗阘缄默为治。初、树声移权云南守，颇劝之振作，意遂相左。后锡良至，道中咨以利弊，论多窍要。良曰，滇吏庸庸，不图乃见此才。数荐诸朝，调守云南府，迁迤南道。后戴鸿慈入枢府，树声师也，力称其贤，遂擢臬司(按：树声于宣统元年以迤西道擢按察使，非迤南道。宣统三年三月调充广东提学使，故与广东士人甚稔熟。——伯雨引注)，然其当官实鲜建树，察吏尤疏。……又谓案牍山积，殊无所用，则取以作草，或裹之以吸烟。对客第作清谈。……时李经羲督滇，好谈文艺，实则鲋陋，树声恒讥之，经羲亦訾树声疏放，非政事才，密言于朝，调补广东提学使。未几，革命事作，乃之上海，鬻书为活。已聘修清史，还京师居焉。虽仕达而俭素若寒士。……树声工为骈体文，古洁有法，诗

好摭奇字，真意反晦，自夸其书，而实不足名家。

秦树声能诗，但很少见他的诗作，也未见有诗集行世，我只见他为朱彊邨题画的七律一首，题作《题朱古微同年霜腴图》，可见其一斑。诗云："战胜萧辰道自肥，其如百卉已云腓。倚梧私恨灰心晚；无镜终疑惜羽非。凿齿大风同日月，腥鳞涎甲满裳衣。夏黄公亦岁寒侣，收肃琼明一钓矶。"

河南第八名举人冯汝骙，年二十岁，祥符县廪生，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官户部主事．后来做江西巡抚。辛亥革命，他已将政权交出，离开南昌乘江轮往上海，在船上不知何故自杀，其时宣统尚未退位，仍谥之曰忠愍。

山东省正考官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贵恒（满洲镶白旗人，同治十年辛未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檀玑（安徽望江县人，同治十三年甲戌进士）。监临官山东巡抚任道镕（江苏宜兴人、道光己酉拔贡）。

第一名举人陈传弼，年三十九岁，潍县副贡生。这科山东没有甚么知名人物。

山西省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李联芳（陕西平利县人，同治十年辛未进士）。副考官宗人府主事龚镇湘（湖南善化人，同治七年戊辰进士）。监临官山西巡抚张之洞（直隶南皮县人，同治二年癸亥探花）。

第一名举人王廷芳，年三十岁，芮城县学廪生。也和山东一样，未见有任何出色的举人。

陕西省正考官内阁侍读学士邵曰濂（浙江馀姚县人，同治七年戊辰进士）。副考官掌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湖北蕲州人，己丑进士（按：应为同治乙丑进士，而非光绪十五年己丑。）士彬字

百质，散馆改刑部主事。光绪末年以御史外简潮州府知府，有惠政。监临官是巡抚冯誉骥(广东高要县人，道光甲辰进士)。

第一名举人白友元，年三十八岁，西安府咸宁县学廪生。陕西这科只有第十一名举人李岳瑞享盛名，中举时年二十，西安府咸阳县学廪生。岳瑞字孟符，号小郢，光绪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主事，官至工部郎中。戊戌政变时，因主张变法，与张元济(菊生)同日革职，永不叙用。岳瑞工诗词，《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拟之。赞云："粥粥若无也，无不尔或承。"论云："秦中近代以诗名者，有宋芝栋、李孟符二人。芝栋官侍御，仪度冲和，诗则沉着绵丽，萧然意远。……孟符水部，熟于晚清掌故，尝草《春冰室野乘》，言皆有据。其人襟怀散朗，诗亦蕴藉如其人。惟俊伟之概不能以博洽掩也。"

章士钊在《论近代诗家绝句》的注语中，透露《春冰室野乘》是李岳瑞为他主编的《甲寅》杂志写的。诗云："楼上缸花影已残，春冰犹带几分寒。依稀记得传柑梦，写似闲沤仔细看。"注云："辛亥之变，君成《惜衣红》、《烛影摇红》、《六丑》诸词寄沤尹，哀感堪入词史。《六丑》结云：'向夜阑更续传柑梦，缸花恨结。'""建安才调义熙声，野史无妨记甲寅。谁料郢云还未散，越吟有客署遗民。"注云："吾编《甲寅》杂志，倩君撰记事一种，即《春冰室野乘》是。君诗馀名《郢云词》。自署'民国遗民'乃太炎事。"

《春冰室野乘》后来在民国十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岳瑞之子李浩然时任《新闻报》主笔，与世界书局主人沈知方颇有交情也。《郢云词》由朱彊邨收入所编《沧海遗音》中。

四川省正考官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乌拉布(镶黄旗满洲人，同治甲戌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张人骏(直隶丰润县人，同治戊辰进士)。监临官是四川总督丁宝桢(贵州平远州人，咸丰癸丑进

士）。

第一名举人谢世珍，年十九岁，安岳县附生。四川这一科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死戊戌之难，一个在上海做遗老。第十六名举人刘光第，年二十一岁，富顺县学生。《点将录》以天异星赤发鬼刘唐拟之。赞云："夜走郓城县，有时醉卧灵光殿。"诗云："不照穷檐照化城，迟来世界住光明。舍身已见游山愿，空有高歌一往情。"论曰："裴村比部诗多奇气，缒幽凿险，开径独行，各体皆高。戊戌六君子中，晚翠而外，当以比部及漪青京卿诗为最工。读《介白堂集》，恍若游名山大川矣。"

光第字裴村，光绪九年进士，官工部主事。戊戌维新，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其后被杀，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录其白莲一首，以见其诗风。"野风香远忽吹回，一片明湖净少苔。残月自和烟际堕，此花方称水中开。碧波瑟瑟情无限，玉珮珊珊望不来。姑射神人窥天末，乾坤可爱是清才。"寄托深远，是我爱诵的一章。

第三十八名举人王乃徵，年二十一岁，中江县附生。《点将录》以地灵星神医安道全拟之。乃徵字聘三，晚年在上海做遗老，改名王济，以医自活，又号病山。光绪十六年进士，由翰林擢御史，有直声，官至贵州布政使。《点将录》赞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白日当天心照之。"论云："病山诗工甚深，曾见其《嵩山游草》，风骨韵味，俱臻胜境。改易以后，寓居沪上，以医自隐。"

广东正考官是二品衔宗人府府丞吴廷芬（安徽休宁县人，同治癸亥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萧晋蕃（湖南长沙县人，同治乙丑进士）。监临官广东巡抚裕宽（满洲正白旗人，官学生）。

第一名举人叶诗咏，年四十三岁，广州府东莞县学附生。第十八名举人丁仁长，字伯厚，年二十岁，广州府番禺县学附生，

下一年成癸未进士，授编修，官至侍读。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云："仁长法其乡陈澧，学兼汉宋，制行甚严，平居不苟言笑，立身亦雅饬。而恬静不求闻达，未有讲学名。宣统初，溥仪就学，有荐仁长于朝者，以其称疾不起，遂命陈宝琛授帝读。"

仁长死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年六十六岁。他的举人同年秦树声也是同年死，亦六十六岁。

第三十二名举人刘世安，年三十一岁，广州驻防镶黄旗汉军，廪生。后来中光绪十五年己丑第三名进士。世安字静皆，授职编修。虽是探花出身，但仕宦不达。

第八十七名举人周之桢，年三十五岁，潮州府澄海县学增生。周先生是港口乡人，中举后，先祖曾聘他在书斋醉经小筑授先君读书。

广西省正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胡胜(顺天府宝坻县人，同治甲戌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庞鸿文(江苏常熟县人，光绪丙子进士)。监临官广西巡抚倪文蔚(安徽望江县人，咸丰壬子进士)。

第一名举人翁裕珍，年三十七岁，象州学廪生。

第二十一名举人刘福姚，年十七岁，临桂县学附生。福姚字伯崇，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状元，官职虽止于翰林院撰文，和刘世安一样，官非甚达，惟诗词却有一手。

云南省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张英麟(山东历城县人，同治乙丑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冯金鉴(浙江桐乡县人，丙子进士)。监临官云南巡抚杜瑞联(山西太谷县人，咸丰壬子进士)。

第一名举人陈荣昌，年十九岁，昆明县优贡，考取知县。下一年联捷成进士，授编修。字桐村，号小圃，官至山东提学使。民国成立，袁世凯命为山东教育厅长，他婉拒说，身是汉人，不敢背民国，旧为清吏，不敢忘故君。愿为民国国民，不为民国

官，即日还乡。云南人士奉为大老，唐继尧以至后来的龙云，皆以师道事之。荣昌工书法，文亦雅饬，民国以来云南碑板，多为其撰写。

第二十八名举人王人文，年十六岁，大理府太和县学附生。人文字采臣，下一年联捷成进士，历官州县，又做过广东按察使、四川布政使，辛亥革命时护理四川总督。入民国参加国民党，为参议院议员。

贵州省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潘衍桐（广东南海县人，同治戊辰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袁善（江苏丹徒县人，同治辛未进士）。监临官贵州巡抚林肇元（广西贺县人，优廪生）。

第一名举人阮廷猷，年四十四岁，贵阳府属岁贡。

甘肃省正考官四品衔詹事府赞善杨颐（广东茂名人，同治乙丑进士），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江澍畇（江西弋阳县人，光绪丁丑进士。江翰林即民国名人江亢虎之父，也是旧北京广和居名馔“江豆腐”的创制人）。监临官是陕甘总督谭钟麟（湖南茶陵州人，咸丰丙辰进士）。

第一名举人刘先衮，年三十八岁，合水县学附生。

癸卯经济特科

光绪廿九年癸卯（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廷开经济特科，其目的在网罗人材，共济时艰，摆出一副“求治”与“中兴”的面目，而其结果则是胡里胡涂，草草了事，所得各方面的人材极少，而应试入彀者的出路也不如人意。

今年阴历为癸卯年，去上一癸卯适一周甲，经济特科为清末一大掌故，在六十年后的今日为文论列，助其谈柄，也许为读者所乐闻的吧。

癸卯经济特科之开，可以说是慈禧太后一种骗人的甚至是做出来给“列强”看表示她有维新之意的手法。光绪廿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八日，她在西安行在假皇帝名义下一道谕旨，开经济特科：

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天下之广，何患无才，其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达，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请旨办理。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思得贤以辅治，尔诸臣当详加延揽，各举所知，共济艰难，

以维邦本，使中兴人才之盛，再见于今，则深宫所祷求之者也！（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4668页。）

其实这次的经济特科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经济特科的举行，虽在光绪廿九年，但倡议则远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处钞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份"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摺"，文中大意主张要维新政治，就得破除常格，以蓄人才，请即设经济专科，不拘资格，照康熙乾隆两次博学鸿词的前例，不管是已做官或未做官的人，布衣可以授职检讨，知县而可以擢为编修，道员而迁翰林院侍读，他们出来做乡试主考官，与进士出身者同例（因为非翰林出身例不放主考），"有非常之才，即有不次之擢，理故然也"。康熙乾隆两次的词科，录取者皆授以翰林之职，严修之意，就是要仿此办法，并且不单是只举行一次，而是要定期举行，"或以一二年为期，参酌春秋闱之例，昭示大信，永定章程"。（严摺见《戊戌变法》第二册。书为中国史学会一九五三年出版，由翦伯赞等人编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研究严修这一摺奏后，于光绪廿四年正月初六日覆奏，大致赞成此议，它说"大抵以近世士大夫颇多讲求实学，而书院学堂之设，所成就仅及少年新进，而耆儒宿学，及已经通籍者，不入院堂肄业，将无由邀朝廷特达之知，因请设经济特科"。经济特科的名称是由经济专科蜕变而来的。疏上之后，清廷亦下谕旨准予举行经济特科，其详细办法，具见《光绪朝东华录》，这里不再钞录。

上谕一出，有些省份的总督、巡抚，为了经济特科拟议章程而上了奏疏，特科考试，大有在不久之内即可举行之势。但霹雳

一声，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出垂帘"训政"，她一连下了几道懿旨，尽罢新政的措施，"考试制度，悉照旧制……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见是年八月廿四日懿旨。）计自光绪廿四年下诏开经济特科，到光绪廿九年重开，前后六年，前开后禁，既禁又开，"盲人瞎马，彷徨索救，狐埋狐搰，举动多可笑也。"（见孟心史先生所作《己未词科录外录》所评癸卯经济特科之语。文载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此举固可见慈禧之无识，其再开经济特科之懿旨，有所谓"母子一心"之语，暗提前事，以示前非"母子一心"，现在时势变易，儿子在变法时所办的经济特科，为了"中兴"，也得"母子一心"来举办了。

经济特科的保荐办法，是由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出具考语，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办理的。在戊戌正月到八月政变期间，已经有不少人被保荐应试。根据胡思敬（此人极端反对戊戌变法。清亡后做遗老，又参加复辟党）所作的《戊戌履霜录》的《内外荐举经济特科人名表》，共计一百三十四人，是由十七位举主荐举的，但实际被举的是一百二十人，因其中有十四个人是被不同的举主荐举的，所以重出。最有趣者其中有戊戌罪魁康有为、梁启超，为内阁学士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所保荐，梁启超又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所保。死难的六君子杨锐为张之洞所保，林旭为礼部侍郎唐景崇所保。

第一次所保的人才中，倒也有不少，今试列举一二。计有：王咏霓、毛庆蕃、蒯光典、易顺鼎、邹代钧、徐建寅、钱恂、胡惟德（此二人系后来著名的外交家，前者为钱玄同胞兄）、黄绍箕、汤寿潜、陶保廉、郑孝胥、梁士诒、汪荣宝、张一麐、王仪通（即后来的王式通，因避讳改名）、蔡元培、陈懋鼎、严复、唐

才常、黄忠浩、陈三立、宋育仁、寿富、丁立钧、张謇、麦孟华、于式枚、钱能训、严修、狄保贤、熊希龄、曾习经、徐勤、罗普、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等。据胡思敬说，这些人才是保荐的，但张百熙于戊戌政变后却说他不是保荐康梁，而是"咨送"应试。当政变之后，张百熙以曾保荐康梁，得镌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即开复，仍在广东学政差上。据说这是刚毅替他在慈禧面前讲好话的结果。（百熙致瞿鸿禨函有云："百熙不肖，以暗于知人，几获大戾，为师友辱，然区区愚忱，迫于救时，切于报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方咨送某某时，尝声明酌中采取等语（意谓考试之事，究属以言取人）……仰荷东朝天覆之恩，不从吏议，且未久即蒙开复，不知何以为报。……"此函系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在广东学政差上发的，函后附有《题东坡居士居儋录》诗三首之一，并有跋语及小注。诗注有云："百熙以主事康有为讲求时务，所识通雅之士多称其才者，因以其名咨送特科，当声明'蠲除忌讳，酌中采取'等语。既念与主事素不相识，其心术纯正与否不可知，复据实陈明，并将该员业蒙钦派差使，可否免其考试，请旨办理。"跋语又有："刚（案：指刚毅，其时刚毅奉命往江南广东搜刮，当面与百熙所谈也）云：'东朝初颇生气，谓：张某里边人，何亦如此！'枢廷当奏，张某此片，不能保他，因曾咨送考试，恐其心术不可靠，故尔声明如此。东朝意亦释然，此所以不久即开复也。"百熙致瞿氏函甚多，今存其哲嗣兑之先生手上。）

癸卯经济特科，原定会试以前举行，后来因为会试不能在北京（因联军的条约规定，肇事地方停止考试若干年），改在河南，又以保奏人才的摺奏未汇齐，遂改为在会试之后。这次内外大臣所保荐的人，一共有三百七十馀名，但实际参加考试的人共多少，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原保人于每个被保人的姓名下，要

注明原有功名、官职、籍贯、简历，并附以评介之语。这批人才比较知名的，有如下这些：范当世、罗振玉、俞陛云、陈衍、杨守敬、陈毅、陈曾寿、缪荃荪、张謇、李维格、曹元忠、王季烈、沈曾桐、孙诒让、刘廷琛、蒯光典、李希圣、魏瀚、王咏霓、马贞榆等等。

内外大臣保荐人才之时，也有不少人才不肯被保举的，也有认为这是野狐禅而非正途的，兹就手头所有材料说一下。

海上漱石生(真名孙玉声。廿九岁入上海"新闻报"做主笔，写有小说、杂文颇多，秀才出身)的"退醒庐笔记"卷下"周病鸳"一则云：

> 光绪季年，余主政新闻报之暇，戏创笑林报，延之(指周病鸳)襄理笔墨。……时某钜公至沪，网罗英俊，保试经济特科。一夕设宴徵及余与周，索署履历。时周已薄醉，狂笑对曰："我二人有何经济足资保举，所具者仅嫖经酒济耳，岂亦足以列荐剡耶？明公休矣，请勿复言，言则我二人将拂衣去也！"某钜公乃废然而止。……

这个某钜公乃湘乡曾广汉(字慕涛)，同时，他也想保荐另一位小说家李宝嘉(字伯元，著有《官场现形记》等书)。据小说家吴沃尧所作的《李伯元传》(载中华书局的《清朝野史大观》第十一册)说："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徵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俟今日矣。辞不赴。会台谏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诸弹章。君笑曰：真乃知我者！"吴氏文中没有说明什么人忌李宝嘉而予弹劾。近人江庸(一九六〇年二月死于上海，年八十三)所作的《趋庭随笔》，有谈到两次经济特科保举的人，

并及李宝嘉，见该书第二十页，今将全文录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家父与乔茂蘐丈同客长沙，适值召开经济特科，茂蘐丈荐刘培村于湘抚陈右铭太年丈，乃以人才与杨叔峤同举，遂罹八月十三日之难。右铭太年丈虽坐此去职，然初不识培村也。是科所举共二十四人，以寿富伯茀居首，为竹坡侍郎宝廷之子，死庚子京师之变。其馀如曾广钧重伯，屠寄敬山，易顺鼎实甫，俞明震恪士，汪康年穰卿，谢钟英钟英等，皆以文学有声当世，家父亦名列荐牍。同时江苏学政瞿鸿禨子玖，亦保家父暨陈三立伯严，孙诒让仲容，丁立钧叔衡，夏震武伯定，汤寿潜蛰仙，邹代钧沅帆等十五人(是年保举特科皆咨送总理衙门，唯瞿附片奏)。其事旋罢。二十九年重开经济特科，瞿已为军机大臣，张劭予侍郎以家父及孙葆田佩南，沈曾植子培、陈遹声蓉曙，蒯光典礼卿，章梫一山，秦树声幼衡等十九人应诏，家父虽至京师一行，仍未与试。此次徵辟仅三百馀人，本不为多，因光禄寺卿曾广汉保有上海游戏报馆主笔李宝嘉伯元，群议为滥。然伯元所著小说如《官场现形记》诸书，盛为今日主张白话文者推许，是人亦曷可轻耶？

江庸之父江瀚，字叔海，前清官至布政使，颇精于经学，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年)死于北京。乔茂蘐名树枏(乔大壮之父)，刘培村名光第，杨叔峤是杨锐，皆死戊戌之难，陈右铭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陈三立之父)。张劭予是张仁黼之号(字孟藻。原名世恩，河南固始人，官至吏部右侍郎)。

与江瀚同样到京师一行而未赴试者，似当时大有人在，就我

手头上检得的材料来说，即有叶景葵其人。叶君为光绪癸卯进士，后为上海著名的银行家，死于一九四九年。他的《卷盦书跋》(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页三十“经济特科同征录”条有云：

> 是年余入京殿试，离叔岳夏厚庵先生教复家。先生相待极厚，视同犹子，谆谆嘱付，谓特科非正途，万不可应试。余遵其教，故举而未试。……

作者在文中没有一字提到这部《经济特科同徵录》是怎样的书，是什么人编著的，真是可惜。今查系张一麐所编的，张在这科考中了。

经济特科的初试，于光绪廿九年癸卯闰五月(一九六三年癸卯则闰四月)十六日在保和殿举行，据《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所说，应试者共一百九十一人，临场不到者五人，阅卷大臣八人为裕德、张英麟、徐会澧、张之洞、张仁黼、戴鸿慈、熙瑛、李昭炜。张之洞本非京官，但他在此时因事入京，碰上这个机会，他就被派为阅卷大臣之一，庆亲王对其他七人说，张之洞是老辈，一切请教他便可。

特科考试，定为论一篇，策一道。论题是《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策题是《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

闰五月二十日放榜，共取中一百二十七人，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名，名单如下：

一等：梁士诒、杨度、张一麐、宋育仁、陈曾寿、陆懋勳、秦树声、王季烈、胡玉缙、罗惇曧、许宝蘅、俞陛云、何实濬、徐沅、罗良鉴、邓邦述、章钰等。

二等：桂坫、端绪、沈瑞麟、袁嘉谷、吴曾祺、周学渊、欧阳中鹄、周蕴良、聂其昌、袁励准、唐文治等。（二等的一名桂坫，字南屏，一九五八年四月死于香港，年九十四。）

据许溯伊（同莘）所作的《张文襄公年谱》（此书初稿于一九三五年载《河北月刊》，我曾读过一部分，一九四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沪版）光绪廿九年条下云：

二十七日，保和殿覆试经济特科录取人员。二十九日召见。六月初二日，奉上谕：经济特科覆试，取列一等袁嘉谷，张一麐，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钟善、钱銶、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钟、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初十日引见。各予升序有差。（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文襄癸卯入都纪恩诗，有派两次阅特科卷一首。先是内外大臣所保过滥，已有责言，然太后求贤意切，视之甚重，另旨特派公阅卷。阅卷以外臣领首，旷典也。阅卷之日，庆亲王奕劻谓诸阅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辈，诸公一切请教可也。甲乙皆公所定，第一梁士诒，第二杨度。人言啧啧，弹劾纷起，指梁士诒为新会族人，有梁头康尾之谣。樊川适入都，召对时力诋保荐之滥，善化在枢府，嫉之尤甚。孝钦为所动，至覆试时，遂改派荣中堂庆为阅卷领衔，公虽亦在内，

非前比矣。荣相极赏识袁卷，公谓此卷不过圆畅，嫌其空疏，荣相大不以为然，竟置第一。阅卷后送军机处覆校，善化又加淘汰，仅取二十七人而已，且擢用极薄，不及鸿词科远甚，故诗用郑獬事。……”)……

文中的“香翁”指张之洞，以其字香涛也，“善化”指瞿鸿禨，湖南善化人。张之洞本来是取梁士诒第一的，怎知有人向慈禧说坏话，指梁士诒为梁启超的兄弟，又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头康尾”(康原名祖诒)，与革命党有关。这时候，北京刚好捕获与唐才常有关的党人沈荩(闰五月二十五日被捕入刑部狱，六月初八日杖毙。闰五月二十日初试放榜，二十七日举行覆试，六月初二放榜)，慈禧和一班昏庸的大臣以为革命党已混入北京，并且也有被保荐应特科考试，梁士诒、杨度，也许就是与会党有关的人，于是疑神疑鬼，更换考官，也不请教“香翁”了。张之洞当然扫兴，他的《广雅堂诗集》有《纪恩诗十五首》，第四首云：“国势须凭杰士扶，大科非比选鸿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派两次阅特科卷)”虽不敢稍露出怨望之意，但第三句却很有趣。(阮指阮元，兆指乾隆间的大将军兆惠，高宗曾派他做殿试读卷官。郑獬字毅夫，宋仁宗时进士第一，以反对王安石行新政为人所称。)

关于“梁头康尾”一事，近人笔记述者颇多，但最好还是引“当事人”梁士诒的年谱一说：

先生对策，洞澈古今，对于币制之整理，尤多所阐明，且每项均多引历朝祖训，以免顽固者藉口，用心甚苦。乃公议为首选。是役共取录一等四十八人，二等七十九人。先生

为一等第一，桂坫为二等第一。皆粤人，亦巧合也。榜既发，未覆试，顽腐官僚竞作飞语，谓其中多革命党人。军机大臣某尤恶特科，于召见时，太后询之曰："外间言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有所闻否？"对曰："一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太后益不悦，第二场覆试，易阅卷大臣四人，草草了事，仅取一等袁嘉谷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等十八人，汰者百人，用俱不优，较戊午、丙辰两特科相去天壤。（按：文中之"飞语"，通常作"蜚语"，出史记，但汉书作"飞语"，非原书错字。又，文末之"戊午"，应作"己未"。）

又云："……群疑渐息，张文襄之洞亦颇悔不能坚持正义，乃为特科纪恩诗，中一首云……（诗已见上文）其意可见矣。"某军机指瞿鸿禨也。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于廿七年后所作的《古红梅阁笔记》（刊《心太平室集》卷八），述特科的经过颇简明，今摘录之。文云：

是时刑部方有杖毙富有票党人沈荩一案，其与权要素通声气或夙列清班者，往往已经保荐，不愿应试，谏垣交章论列，皆（认）为党人混入，京僚主张严格。……传闻文襄初定仍取百余人，庆亲王奕劻传旨，不得过三十人，盖内廷畏革命党混入，京僚预备散诸各省。余卷本列第一，拆封见一江苏举人，以煌煌大典之特科，而首列本无官阶，过于减色，乃以原定第十名之袁君易之。袁为云贵总督王文韶所保，又新科庶吉士，授职编修，免其散馆。余以第二名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按：考试规则，填名次后拆弥封即不得更易，

今随意更改，可见不公。又，张君言保袁嘉谷者乃王文韶，似误，王文韶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任云贵总督，或其后王保之，但行文应在云贵之上加一"前"字始见清楚。)

一等一名的袁嘉谷(字树五，号南耕，云南屏石州人)是癸卯科的庶吉士，揭晓后，六月初十日，中式的人就被带去见皇帝，皇帝给予"升叙有差"者甚薄，中式的人，原来没有中进士的，并没有赐进士出身(例如康熙己未的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以布衣召试，授检讨，陈维崧由监生授检讨，叙用极优)，只有袁"状元"以庶吉士立即授职编修，免其散馆，叫做看在"状元"份上稍予优叙而已。(新科进士于朝考后，得点为庶吉士，入庶常馆肄业三年，届期须经过散馆试，成绩优者始分别授编修、检讨，因庶吉士非官也。)

特科人选揭晓后，士论颇为不满意，大概取舍不公，也没有什么人才，比起初试时张之洞所取的差得远。之洞所取的有梁士诒，杨度、陆懋勳、王季烈、罗惇曧(即名诗人罗瘿公)，邓邦述、章钰、吴曾祺、周学渊、王清穆、唐文治。其中有理财家，经学家，文学家，水利专家，版本目录专家，而梁士诒尤为此中大名鼎鼎人物，后来官至国务总理(等于清代的宰相)，袁嘉谷死至今二十馀年，已经没有人能道其姓氏了。湖南人王湘绮对于特科也极失望，初时他得到儿子代功北京来信报告，湖南有五十六人应试，他很高兴的说："可雪两次鸿儒之恨"(指己未、丙辰两次。见湘绮楼日记癸卯闰五月廿一日)，后来王代功落选，杨度复试被汰，湘绮大不谓然，写信给他的第四媳妇杨庄(字少姬，杨度之妹，才女也)，有云："特科第一二人皆被黜落，湘绮弟于不取一人，乃以石屏州人为状元，虽不知详细，甚悔令功儿应

试，他日或诬以康党，未可知也。”（见《湘绮楼笺启》。他又说杨度得一等第二名，系靠日本人之力，不知何据，但亦颇有道理，因为杨度初试中式后，有人说他是党人，传说已将他扣留。但杨已事先逃出北京往日本了。被扣的假杨度即释放。因此湘绮才有神经过敏，说他靠日本人之力得中式。又，他的所谓“或诬以康党”也是针对当日时事而发的，可与上文参看。）

有清一代，云南未出过状元，这次袁嘉谷在保和殿考试得第一，云南人认为是邦家之光，将他称为“同状元”，与“同进士”差不多，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于是昆明遂筑魁星楼志喜。林庚白的《孑楼随笔》有一段云：“余于庚申游昆明，去城三十里，见有石碑巍然，书‘大魁天下’四字，即嘉谷所树。中国人之热中功名如此！”袁于“大魁”之后，一任浙江提学使，后调任日本留学生监督。入民国，因他与蔡锷、唐继尧等有关系，二十年来一直在故乡做元老，与陈荣昌、周钟岳、赵藩、王人文等齐名。他的学问平常，不为张之洞所赏识是张之有眼力。著有《卧雪堂诗话》、《滇绎》，又曾在清史馆任协修，撰地理志云南一省。

关于《经济特科同徵录》，张一麐的笔记有云：

> 予初至北洋时，官报局总办张逊之孝谦属编《经济特科同徵录》，将前后公牍名单档案汇成一册付印，视鸿博时代之《鹤徵录》如大巫之与小巫矣。（按：李富孙著有前后《鹤徵录》，详记两次鸿博的被徵被选人。秦瀛的《己未词科录》则记康熙一科。）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乾隆朝剃头案

旧日的丧礼，人子死父母，除了三年穿孝之外，在百日内不得剃头，搞到头发好像“江南草长”一般，胡须满面，变成一个怪人。如果今日的香港有此种“孝子”出现街头，我猜报纸一定给他来篇特写的。

我刚刚从理发店坐了四十五分钟回来，忽有所感，就草成此文。我不是天才，我不像爱因斯坦一样六个月还不理一次发，我每十天必入美发院一次剃头。假如到今日我还有父母之丧可持，我也不会以“怪人”出现，还是十日去光顾一次的。因此我觉得做现代的人最有福，如果做“大清子民”，说不定有时候就会剃头有罪的了。在那时候，为人子居父母之丧，如在百日内剃头，最多是为社会人士所不齿，如果出来做官，碰到“国恤”(即帝后逝世)，在服丧期内剃头，一下子就有了罪名，重则问斩，轻也充军，甚可怕也。

清朝的同治皇帝死后，天下的职官，无论大小，一律要过了百日才能剃头。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署云贵总督岑毓英，奏参州判朱允慎，于国服期内剃头，贡生王荫祥因为和朱允慎有私怨，就以此为藉口，带齐人马，到朱允慎的厘金局，将朱允慎毒打一顿。是年十月，清廷分别将他们治罪，上谕说，他们都是目无法纪，“朱允慎情罪重大，姑念该革员素有痰疾，误会日期，著照所谓援照嘉庆年间曹自辉免死发遣成案，从宽发往新

疆效力赎罪。王荫祥著即斥革，发往近边充军，以示惩儆！"这一处分，可说是轻描淡写之至，如果在乾隆之世，碰到那个喜怒无常"天威莫测"的十全老人，则朱允慎之罪大矣。乾隆年间大官在国服内剃头惹祸一案，颇可一述。

本来居丧不剃头，古无此礼，就是"大清律例"初时也没有的。满清初入关之时，遇到帝后逝世，只有京官在百日内不剃头，因为他们要参加百日祭之礼。外官就不论满汉大小，一律二十七日释服，随即剃头。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三月，清高宗东巡，自济南回京，是月十一日，孝贤皇后死于舟次。清高宗对于这个老婆十分宠爱，哀悼逾恒，也是人之常情，但犯不上因为死了太太，官员办事有些错误，就大开杀戒，拿人家来消气，专制君主的淫威，一至于此，百世之下，读史的人，对于这个十全老人是只有痛恶而无同情的。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醇(字质甫，号金门，乾隆四年进士，授编修)在廿七日后释服即剃头，这一剃就惹到大祸。原来金文醇自以为出身翰林，是"金马玉堂"人物，对于同城的满洲官员多瞧不上眼。碰着他在国恤内剃头，一个旗籍武官立即向副都统告发。副都统平时也不满意金文醇的态度，今儿有了把柄在手，哪有不奏他一本之理？碰巧这个时候，山东巡抚阿里衮参奏沂州营都司姜兴汉，说他贪财纳贿等等罪名，其中还有一项是"国服内剃头"。这一项本是陪衬之笔，并非所参的大前提，阿里衮也不过以为姜兴汉不应为而为，所以在此参案内附带一笔，并非着重于此的。因此阿里衮奏章入京后，内阁在奏章内摘由，也不将剃头一语摘入，仅及贪婪诸状而已。怎知这个乾隆皇帝别有会心，他说贪婪罪轻，违国制罪重，必要治姜兴汉违制之罪。于是金文醇与姜兴汉，一南一北都在此时内被捕入京，刑部定他们斩立决

(即不待秋后，立即行刑)。

乾隆帝死了一个太太，不止官员遭殃，就是太子和部院大臣也因此得到严厉的责罚。照他老人家之意，以为非如是不见得十分"哀悼"也。先是，孝贤皇后死耗到北京时，大阿哥(后来改封定亲王)因为哭临不尽礼，皇帝不好严刑太子，只得学"左传"的办法，"刑其师傅"，于是教汉满文的师傅都得到罚俸处分，已算很轻了。又因为翰林院奏上的册文，内有"皇妣"字样，满洲文译作"先太后"，这一大错误当然不可恕，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刑部尚书阿克敦都被革职，交刑部收监治罪。过了些时，又因为刑部所拟的罪名太轻，立将刑部尚书、侍郎革职留任，将阿克敦改为斩监候。后来又因为工部所制的皇后册谥册宝太过粗陋，尚书哈达哈、赵宏恩，右侍郎三和、何国琮皆革职留任；左侍郎索柱，涂逢震俱降官调用。于是清高宗的说话就是法律，他吩咐立下了定制，国恤百日内，剃头的人，立即问斩，将此载入会典律例。同时又谕令各省督抚，凡现在剃头已被发觉者，严参勿纵，未发觉者免究，但旗人则要追究，不能放松一步。接着他又密令各省督抚，凡剃头的官员，将他们的姓名秘密奏上来。立法之严，真是无以复加了。剃头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但在专制时代，有时竟会连头都斩了去，我们的祖先真不容易做呢。

当金文醇这一案发生时，一个满洲人盛安正做着左都御史，他是个长厚君子人，不久他署理刑部尚书，召见时，他对皇帝说，金文醇剃头，是沿袭汉人的习惯，并且事前他已请问过上司才剃头的，所以情还可恕，皇帝也以为然，于是盛安回到刑部，想把金文醇的罪名改为斩监候，他的同寅恐怕一改了会激起皇帝之怒，力主不可。不久后，有人在皇帝跟前大造盛安的谣言，清高宗叫他去问，盛安就趁此机会，欲将金文醇斩立决改为斩监

候，力援雍正年间李斯琪例为请(案：汉军佐领李斯琪，以孝恭皇后之丧，二十七日后即剃头，拟斩监候，后来又赦免了)，这几句话竟然使得清高宗大怒，将盛安交给刑部治罪，部拟斩监候，他的儿子喀通阿也充军到热河。

盛安一案，发生于是年七月，到闰七月，南方又发生剃头案，主角都是方面大员。这一年福州将军新柱入京，路过淮安，南河总督(管理南方黄河治理的最高官员)周学健因公出巡，没有见到新柱，而淮安官吏对于新柱，招呼也不很周到，新柱一肚子气，入京后，对皇帝说周学健因为二十七日后就剃头，所以不敢和他见面，怕露出马脚。这是新柱公报私仇的伎俩。同时，江苏巡抚安宁，本是内务府旗人，以前久在内廷供奔走之职的。孝贤皇后死后，安宁所进的表文，不见有哀敬之意，乾隆帝打算要重重的责罚他，有些太监和他有交情，便通知他最好举发周学健剃头一事，可以将功赎罪。安宁立即劾周学健及所属官吏，说他们都在二十七日后就剃头，不剃者，只淮徐道定长一人而已。高宗降旨将周学健拿交刑部狱，又令管河大学士高斌籍没周学健衙门的财物，江西巡抚开泰籍没他原籍财产。这一案发生后，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都分别自行"告发"，说他们及两省的文武官员，都在二十七日后剃头，请皇帝重重治罪。皇帝降旨大骂塞楞额，说他以满洲大臣尚且如此，更何论于汉员了。便将塞楞额逮捕，禁于刑部监狱，并查抄他的家产。彭树葵、杨锡绂两人，因为他们是顺从总督的，从轻发落，只罚以革职留任，罚他们出钱修筑直隶城墙，并宽免周学健之罪，派去直隶城工效力(所谓"效力"，并非罚以体力劳动，只是派他在工地办事，算是苦差了)。金文醇，先前已改为斩监候了，到现在大概是十全老人的"哀痛"已过，脾气也好了些，居然把他

释放出狱，也派去直隶城工效力。不久后，塞楞额以罪大，赐令自尽。这一案，直接犯罪者共五人，处死者二人，到此已告一段落了。但案中还有案，真有《山重水复》之妙。

周学健本来已改为城工效力的了，后来因为江西巡抚开泰抄他的家产时，发见山东兖沂曹道吴同仁写给学健之弟学伋一信，其中有谢他荐举，以二千金为酬谢之语，同时，两淮盐政蕴著又劾学健在任时，赃私狼藉，于是仍将周学健逮问入京，赐自尽，承命查抄学健衙门财物的髙斌，有心瞻徇，并且发还他的家人衣饰十八担，有严旨诘责，令他不必入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先前没有举发学健剃头，得革职留任处分，现在他上奏河工内汉军旗人，也有违制者，请察劾，有旨着勿问。这一剃头案，大小官员被罪者二十馀人，赐自尽者二人，处决者一人。我们听惯了雍乾之世常兴文字狱之事，剃头获罪之狱甚罕闻，故值得一说。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

明清公主选驸马趣史

明朝的公主选驸马，完全以平民为对象，不许文武大臣子弟有份儿，只要平民子弟年少貌美者，就有做驸马的资格，（这是明朝中叶的事，明初及明末，不尽如此，驸马亦有选自贵族子弟者。）过后还可以封侯。明孝宗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年），德清公主要招驸马，太监李广受富人袁相的重贿，在孝宗面前极力赞袁相怎样品貌兼优，这个皇帝信以为真，便选袁相做驸马，结婚日期已经定好了，后来有一班御史查出这件事，纷纷向皇帝奏知，指出李广受贿，皇帝降旨斥去袁相，另行再选，对于李广则置而不问。这不算奇，最奇怪者无如那个昏庸绝顶的万历皇帝了，他的胞妹永宁公主将选驸马，最为万历宠信的太监冯保受了北京大富翁梁某数万金之赂，选其子梁邦瑞为驸马。梁邦瑞是个痨病鬼，早晚要登仙界的，北京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为永宁公主可惜。这时候张居正当国，力主不可，但冯保在太后、皇帝跟前说得天花乱坠，事情就定了。到行礼那一天，夫妇合卺交杯，梁邦瑞鼻血双流，衣袂沾湿，狼狈不能成礼，那班太监还走去御前道喜恭贺，说是见红吉兆，大喜也。公主结婚不过四十天，驸马便一命呜呼了，在此期间，公主并未享闺房之乐，守寡三年，抑郁而死。这都是做母亲做哥哥的胡涂，明朝诸帝大都宠信宦官，无不误事。

明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以武宗的第四女永淳公主及

笄，世宗加意为她选个好驸马，时高中元年方十六，随其父尚贤住在北京，中元风骨秀异，有璧人之目，因此也被列入预选。照明朝规矩，选驸马时可以挑选三个人一齐入宫，作最后决定。当入宫时，那班宫女太监见到高中元，为之神眩目骇，以为驸马之选老高无疑了。怎知皇太后看中了高中元的同乡河南人谢诏。高落选后，回到故乡，下一年中了举人。

公主下嫁谢诏之后，因为驸马的头发稀少，时为北京人士嘲弄，心中已大不高兴（据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所载："谢诏选后，京师人有十好笑之谣，其间嘲张、桂骤贵暴横者居多，其末则云：'十好笑，驸马换个现世报。'盖谢秃少发，几不能绾髻，故有此讥，然诏直至嘉靖末年卒，享富贵者四十年"。）后来听说高中元貌美才高，又中了举人，不胜艳羡。过了几年，高中元成进士，入翰林，有名词垣，公主听了更是懊悔不已，不时形之颜色，并且说："早知嫁了他就好了！"谢驸马听到了真是惶惧无计，不知怎样巴结公主才好。一日，驸马想到了一计，佯对公主曰："高中元是我的同乡，公主既然喜欢他，我想在中元节那天请他来吃饭，公主在窗内饱看一顿，不是很好吗？"公主大喜，准如所请。届时，公主在窗内外窥，则见那个貌美才高的高中元已经是个身材高大满脸须髯的河北伧父，不是江南的风神俊秀的璧人了，公主见了为之嗒然，夙慕顿尽，反而伉俪之间更增恩爱。人们都说谢驸马能以小智回天人，亦非凡俗之流，宜其享福数十年云。

明清两朝的公主与驸马，有不少受制于"管家婆"的，这也是做父皇的胡涂。明帝多昏庸，只听太监宫女的话，不知是哪时候起，公主下嫁，必定派一个年纪较大的宫女同到驸马府，替新夫妇料理家务，甚至有时还要做"卫生顾问"。此举本来无可非议，

因为十五六岁的小夫妇，未必懂得处理家事，而人伦大礼也未必通晓，闺房中有个“顾问”，当然可以少些意外。无如管家婆到了驸马府之后，倚仗宫中之势，从中牟利，公主驸马如果不拿出一万八千来赏赐，休想谐鱼水之欢。明人《野获编》记管家婆事极有趣，今录如下：

> 公主下降，例遣老宫人掌阁中事，名管家婆，无论蔑视驸马如奴隶，即公主举动，每为所制。选尚以后，出居于王府，必捐数万金，遍赂内外，始得讲伉俪之好。今上(按：指万历皇帝)同产妹永宁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镪不足，驸马郁死，公主居孀，犹然处子也。顷壬子(按，万历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之秋，今上爱女寿阳公主(按：《明史》作寿宁公主)为郑贵妃所出者，选冉兴让尚之，相欢已久。偶月色，公主宣驸马入，而管家婆梁盈女者，方与所耦宦官赵进朝酣饮，不及禀白，盈女大怒，乘醉挟冉无算，驱之令出，以公主劝解，并詈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辰奔诉于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肤愬，增饰诸秽语。母妃怒甚，拒不许谒。冉君具疏入朝，则昨夕酣饮宦官，已结其党数十人，群捽冉于内廷，衣冠破坏，血肉狼藉，狂走出长安门，其仪从舆马，又先棰散，冉蓬跣归府第，正欲再草疏，严旨已下，诘责甚厉，褫其蟒玉，送国学省愆三月，不获再奏。公主亦含忍独还。彼梁盈女者，仅取回另差而已，内官之群殴驸马者，不问也。

本来皇帝女，皇帝女婿，其贵无比，偏偏受制于太监宫女，这么一来，做公主又有何好处，那个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临自杀前以刀

挥其女长平公主，断其臂，曰："你们生生世世不可生帝皇家！"其实早距此数十年寿宁公主也该自说了。沈德符是万历时人，他所记的大都可信，同时有谢在杭(万历三十年进士)者，万历四十年前后，恰在北京做京官，他的《五杂俎》也有记冉驸马梁盈女的事情，与沈氏所记大有出入，现在也钞出来给读者参阅。

> 国朝驸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于畿辅良家，或武弁家，择其俊秀者尚主之，后即居甲第，长安邸中，锦衣玉食，与公侯等。其父封兵马指挥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驸马虽贵为禁脔，然出入有时，起居有节，动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奶母阉竖之老者，威震六宫，掌握由己，都尉反俯首受节制，凡事务结其驩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间，近日如冉都尉兴让，可鉴也。冉都尉所尚主，乃皇贵妃之女，上素所钟爱者，伉俪甚笃，无间言。奶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动行节制，冉不善也。又恃宫中爱婿，时与龃龉。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传呼开邸中门。故事，中门非奶媪不开，盈女不时至，都尉排闼而入。有顷，盈女至，出谇语，都尉乘醉击之，翌日入朝奏闻，盈女率其党数十人伏阙下，要而殴之几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弃衣冠，从间道归里。上益震怒，遣缇骑迹之，夺其父母爵禄，廷中大小臣工力谏，俱不报。冉既自归，上怒不解，谪羁太学习礼，自壬子冬至今半载，尚未得与公主相见也。时论以冉固未得善处之方，而奶媪一老宫婢，遂能炀灶蔽明，荧惑主聪，一至于此！盖床笫之言易入，浸润之谮难防……

沈谢两人都是万历年间的人，两人皆有文名，留心故事，而所记

的却有很大差别，可见书不可尽信，要信时，不妨多参考一下呢。明宫这种黑暗制度，满洲人入主中国后，立即接收过来了。公主下嫁，那个管家婆也利用权威，干涉到闺帏之事，公主如有宣召驸马侍寝，每次都要纳通行费若干，才能直入闺房，通行无阻，否则管家婆就说少年夫妻要谨慎闺房，善保玉体那一番大道理，说出来何等冠冕堂皇，公主驸马都是面嫩的青年，怎敢回驳一句？等到钱财到手，又是另一番话了。因此清朝的公主多不能享家室之好，即有儿女，也是妾媵所育的居多。（据清宫一老太监对我说，皇帝大婚之夕，例有管家婆在床帷后暗中照顾，怕弄出意外，帝后皆不知也。他说光绪帝大婚，数日后，管家婆闻皇后在龙床上唉声叹气曰："注定你家福薄，没有儿女！"据一般人推测，同治光绪皆孱弱之辈，多不能生育云。）

道光年间，传说有个公主下嫁符珍，因未能满足管家婆之欲，符珍不能入内者三阅月。公主忍无可忍，回宫中问父亲道："爸爸到底将孩儿嫁与谁人？"道光帝带笑道："傻孩子，你的驸马不是符珍么？"公主道："既是符珍，为什么孩儿三月来未见他一面呢？"道光帝还不算胡涂，立即彻查此事，将管家婆召回，并下诏以后不许有此例。可惜自道光以后，想有此例也不行了，因为咸丰帝只有一男一女（女早死），同治帝一无所出，光绪帝亦福薄，"注定没有儿女"，溥仪今年五十四岁了，未闻有一男半女，爱新觉罗一家，竟然应了纳拉氏床中的叹息，真是有趣的事。

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

慈禧医病纪实

一九七五年五月，沈苇窗兄来访，他说："陈存仁有一册马培之的《纪恩录》送给你，过两天我带来。"我说："不好罢，他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书，我怎好接受这样大的礼物。"沈兄说："书是他托上海的朋友钞的，用原子笔复写两份，陈先生多了一份，他知你有需要，故此相赠。这是他一番好意，不可辜负。"

多年前我在上海曾买过一册《纪恩录》，香港沦陷时失去，现在重得，使我对于西太后医病的经过，知道得多些。这书的初版印行似乎是光绪十四、五年（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之间，现在的钞本，扉页题"光绪壬辰仲秋重镌，板藏孟河马氏宗祠内"，这本书就是根据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壬辰）再版本所钞的了。

首先刊载的是俞樾（曲园）、陈康祺的序文，一作于光绪十二年，一作于十四年，书后一跋，是光绪十二年九月赵彦晖写的。序文之后，载江苏巡抚吴元炳奏牍，略说光绪六年六月，接军机大臣字寄，本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慈禧太后病已数月，太医院所拟药方，未见大效，饬外省巡抚详细延访精通医理的人，无论官绅士民，立即派员伴送来京，江苏省资送的人，即乘坐轮船，以期迅速等因。现查得武进县孟河镇地方职员马文植，素精医道，遐迩知名，接到徵聘信函，慨然应允，料理行装，即日就道。但马文植说："草茅之士，罔知仪节，且年逾六旬，手战腿强，运动未能自如，拜跪恐难合度。其子直隶候补同知马翊廷，

亦素知医，现在天津，拟即携带入京。”

《纪恩录》是日记体裁，除办公外，也记他和北京一些官僚治病和饮宴应酬，起自光绪六年七月初六日，至翌年四月十八日到家止。马文植此行，带第四子紫辉、两个仆人，初八日到苏州省城，住金狮巷金养斋亲家宅中。初九日，巡抚吴元炳设宴饯行，并晤见伴送入都委员忠诚（字一心，官道员）。十五日在上海乘坐招商局轮船“丰顺”号，直放天津。

> 十七日，辰刻进大沽口，午刻到天津，暂寓紫竹林旅馆，夷场风景，与镇江相似，而华丽则不及歇浦。饭毕，入城晤盛杏荪观察，嘱致薛抚屏信。薛君名福辰，山东候补道，以医学为李傅相保荐，六月二十三日晋京，据称奉诏请脉已一月余。……

按：薛福辰是薛福成的哥哥，他是直督李鸿章、鄂督李瀚章、鄂抚彭祖贤共同保荐的。又有山西巡抚曾国荃所保荐的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也在此时为西太后医病。马文植没有等到把西太后的病医到完全康复，就称病恳求准许回乡，薛、汪两人，因系现任官员，西太后痊愈后，很高兴，赏薛福辰头品顶带，补授直隶通永道（他本是山东候补道，并非实职，要候补一个时期的），赏汪守正二品顶带，调补天津府知府。这两个以医术受知的官员，升了官，但安排在直隶境内任事，是有深意的，大抵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入京为西太后治病。

> 十八日，辰刻，忠观察招同进城谒李傅相，适盛杏荪亦以公事见傅相。问何日自家启行，并沿途一切，谦光盛意，

备极周洽，且云：吾四弟妇之病，重赖诊治，得庆生全，至今感纫，余逊让。时以急于进都，不及多留，随即辞出。忠观察由水路至通州，余乘车行。八十里，晚宿蔡村。

二十日，申刻到崇文门，税关查验，以无货物，出钱三百六十文，随即入城。酉正到小安南营，住马松圃太守宅内。儿子翊廷自五月谒选入都，先寓此宅。二十一日，同儿子翊廷至杨梅竹斜街永和店，候盛旭人亲家，复进城谒翁叔平、广绍彭两尚书，暨吴江沈相国。日暮归寓。

二十四日，忠观察到京，嘱移寓内城冰盏胡同贤良寺。随套车同翊廷进城，至贤良寺，住在大殿东厢，寺内已有江西保送之赵君德舆、伴送之端石如太守居焉。下午，忠观察投文，又着家人来寓知照，明日五鼓进内，在景运门外朝房等候，届时当着人来引导。……时潘蔚如中丞同寓贤良寺大殿东首，亦系吴中丞保荐，先余一日到京，以抱恙未能进内。是日余回寓已晚，未之见也。

这里的几个人名，要略说一下的。盛旭人名康，是盛宣怀的父亲。叔平、绍彭，是工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广寿之字，广寿是满洲镶黄旗人，后来转任吏部尚书，光绪十年八月死。吴江沈相国是沈桂芬，江苏吴江人，字小山，号经笙，道光廿七年编修，官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故称相国，马文植拜见他后几个月，沈桂芬就死了。潘蔚如，江苏吴县人，监生出身，光绪六年正月，在湖北巡抚任上免职，后经吴元柄保荐入京治病，光绪八年十月，授江西巡抚。至于江西保送的赵德舆和伴送的知府端石如，不详，待查。贤良寺本是雍正帝之弟允祥的怡亲王府，后来舍为寺院，当时外省大吏入京，都喜欢住在那里，李鸿章入京

议和，即死在该寺中。

二十五日。寅刻乘车约里许，进东华门，天微雨，步行至景运门外西首平屋暂憩。忠观察已先在内相待，时天犹未明也。顷间恭邸驾至，忠观察导余在景运门阶前站迎。恭邸问余年岁几何，且谓闻名已久。其后李、宝、沈三相国，王夔石侍郎先后至，一一见毕，仍至外朝房坐候。卯正，军机散，忠观察导至内务府衙门，见恩露圃、广绍彭、志蔼云三尚书，师继瞻侍郎，广孝侯内大臣。继晤崇心堦郎中，及太医院院判李卓轩。卓轩问余向读何书，且云圣躬自二月至今未庆大安，头绪极多，大要起居饮食，时有不适。余云：李东垣有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病在脾胃。卓轩接云是极。即约明早寅正进内引见。忠观察偕余退出，从大院经阿哥所，殿皆覆盖碧瓦，历箭亭过上驷院、国史馆，经大院南行，出三座门，过石桥，出东华门，觚棱高峻，体势尊严，令人肃敬之心，有加无已，夜间过时，昏黑中未及瞻仰也。随与观察分道回寓，午饭后诣潘蔚如中丞处问疾，潘中丞嘱诊脉疏方，并纵谈古今医事。

恭邸是恭亲王，李、宝、沈三相国，沈为沈桂芬，宝为宝鋆，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李是李鸿章，因为，在光绪六年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中，李姓的只有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一人，李鸿藻是光绪七年六月才以兵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的。恩露圃名承，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恪。志蔼云名和，号春圃，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二年庶吉士，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师继瞻名曾。广孝侯、崇心堦不详。

李卓轩为李德立之字。太医院的主管长官名"太医院院使"，汉一人，正五品。右左院判，汉一人，正六品。（太医院中无满缺，大概满人没有精通医术的吧。）

二十六日，卯初乘车至东华门，忠观察家人导引步行入景运门，西行经乾清门，门外金狮二，金缸四。至堂郎中直庐，忠观察在焉。卯正，慈安皇太后、皇上召见，内务府五大臣、太医院李引余至内右门门外朝西一间，与堂郎中直庐毗连。门以外有侍卫护守，门以内有两太监护守。入门历直卫至月华门，经启祥宫，过如意门、吉祥门至钟粹宫，鹄立檐下。宫殿三楹，正中用彩画玻璃窗隔，辟分前后。顷间，内监传进，伏见慈安皇太后面东正坐，座前长几一张，不垂帘；皇上坐几前，行一跪三叩首礼。皇太后问文檀何处人？对以江苏常州府、武进籍。问多少年纪？对以六十一岁。问旱道来，水道来？对从海道来。问几时到京？对二十日到。问在家行医有几年？对得之祖传。又谕云：西太后违和，数月未愈，汝须慎重。应云是。命下去。余起立，退下三步，转身仍随诸大臣出内右门，至堂郎中直庐坐。有顷，慈禧皇太后旨下召见，即出直庐，立于阶下，五大臣仍由西来，薛福辰、汪守正从东来，相见各揖，随内务府大臣至乾清宫后，大臣进内，余与薛汪二君止宫门首恭候。内监款以茶，汪子常见余未挂珠，向内监索珠一串畀余，以符体制。大臣出，余随至长春宫候懿旨。少顷，刘李二太监传进，至体元殿立阶下。内殿与钟粹宫格制相埒，正中窗格一启，刘李二监在窗内传呼，余随五大臣及太医院李进内殿。慈禧皇太后面东坐，前设小几，垂黄纱帘幔，行一跪三叩首礼。问何处

人及年纪，一如慈安皇太后所问，对亦如前。内务府大臣跪在余左，大医院跪在余右。慈禧皇太后命文植进诊，膝行至几前，几上置两小枕，太监侍立两旁，启帘请脉，左右如法。私谓内大臣，脉已请过，应否面奏。皇太后问内大臣，马文植云何？大臣将余言奏上，奉旨着即面奏。对云："两寸脉虚细，左关沉弦，右关小滑，两尺濡细，缘积郁积劳，心脾有亏，肝气亦旺，脾经又有湿痰，荣脉不调，当见谷少，头眩内热，腰痠肢倦，胸闷不舒胁痛诸证。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太后复详谕毕，随命下去，详细立方。余退出，仍立阶下，薛汪二君进请脉毕，同随至东配殿，各立一方。余以面奏之意，先叙原委，决定药剂，稿成呈内大臣，请侍医看过，嘱医士用黄笺恭楷进呈皇太后御览。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书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

上文提到内务府堂郎中，堂郎中这个官名有些特别。清代六部中有郎中一缺，在侍郎之下，官正四品，这是当时一般人所知的，堂郎中就不大为人所熟识了。原来这个缺，只内务府独有。内务府的堂郎中，又叫坐办堂郎中，正四品，为内务府中最重要的官员，上可以代总管大臣处理一切事务；下可以指挥群僚，查核七司等处题本、堂稿、黄蓝册、督催、文职铨选等事，因权力大，故只设一人，终清之世，并无增减。堂郎中既是内务府一个大员，所以在朝堂有值庐一所。

七月二十六日，臣马文植恭请慈禧皇太后脉息：两寸虚细，左关沉而微弦，右关沉小带滑，两尺沉濡，缘积郁积

劳，心脾受亏。心为君主之官，脾为后天之本，二经受病，五内必虚。肾虚不能生木，木失畅荣，脾乏生化之源，荣血内损，以致经脉不调，腰痠、肢体倦怠、谷食不甘、虚热时作。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是也。谨拟养心调脾之剂进呈。

当归　白芍　白术　淮山药　生地
茯苓　陈皮　川续断　牡蛎　红枣
藕　合欢花

顷间，李太监传旨云："马文植所拟方药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大臣面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少顷，内监传旨："今日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伏念文植蓬庐下士，闻见浅陋，猥以服习经训，厕名医学，慈颜初觐，遽沐褒嘉，奖励逾恒，为诸臣工所罕被，敢不惮竭悃诚，以期仰报高厚于万一。是日赐饭，设两筵，中一席内务府大臣，旁一席，外省保送诸医及太医院也。珍错罗列，计四十簋，醇酒酪浆，美逾恒味，小人之腹，得饫天厨，亦云幸矣。未刻，内监传旨散直，随内大臣趋出，堂郎中及司员、笔帖式七八人，站内右门外，候诸大臣，并索今日恭拟药方，抄送军机及亲王府。诸大臣出门，向西至景运门外朝房，余至内务府朝房小憩，司员陪坐，叙谈半晌，仍由景运门出……乘车回寓，拜赵德舆郡尉，赵君七月八日到京，连日请感冒假，未曾进内，余略谈片刻，回至寓所。

这天所记，是第一次见到马文植所开的药方。依旧例，御医所开的药，煎成两碗，由太医、配药医士、内大臣等人尝后进御，书中没有提到他要尝药之事，据任锡庚所作的《太医院志》

载："凡烹调御药，本院官请脉后，开方具本奏明，同内臣监视，每一剂备二服，合为一服，候熟分贮二器，本院官先尝之，次大臣尝之，其一器进御。亦有将方奏明，交与内药房按方烹调者。乾隆五年以后，凡药均由内臣烹调，自是医官不复制药。"（任锡庚不知何许人，据《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所载，他曾在太医院任事，一直到民国五年才退休）。《大清会典》则仍有御医尝药的明文。

是日日记最后一段，马文植记他所见西太后所居住的长春宫一般情形，可备掌故。按：咸丰十一年，慈安、慈禧分别进封为皇太后后，慈安居长春宫的履绥殿，慈禧居长春宫的平安室（一九二二年，溥仪结婚，他的淑妃亦居长春宫），现在我们请看马文植怎样描绘长春宫：

> 历想大内规模，慈禧皇太后居长春宫，对面即体元殿，自中雷隔开，俱饰玻璃窗彩画花卉虫鱼，上悬"蟠桃永庆"匾额……后面即太后请脉之处，宝座设于东面，内置矮几，两旁俱陈设白玉珍玩，西设长几一，八仙桌二，珊瑚两株，约高三尺余，左右古钟鼎彝器，光耀骈罗，皆未几见之物。体元殿向前即太极殿，左即东配殿，缭曲三楹，每间俱横安一榻，依窗第一间供白衣大士，盖太后敬香处也。榻上曲几，置棋盘，水晶墨晶棋子两筒。中左两间，陈列杯瓶壶榼，皆白玉为之。最后者金梗梅树，碧霞梅花，金梗桃树，碧霞桃子，盆盎俱饰金翠，珊屑为泥。便殿门题楹帖，皆慈禧皇太后御书，中悬龙虎二字。东配殿对面为李太监居所，中一大院，古柏苍松，中间以繁花如绣，陆离眩目，不啻神仙洞府，为之神往不置。

八月初，又有两个外省保送入京的医生，一个是盐大使薛宝田，字莘农，一个是广文(按：大使与广文，皆低级官吏，广文即府县的学官。)仲学辂，字昴亭，杭州仁和县人。他们也住在贤良寺，八月初二日，他们已先和马翊廷会过面，晚上就要会见马文植，先探问一下西太后的脉象。(薛宝田著《北行日记》，亦记为西太后治疾事。)

马文植的长子翊廷对他们说，他往兵部尚书广寿处诊脉，广寿对他说，他们父子住在贤良寺很不方便，不如搬到他家里，因为他的府第里，有空置的屋子五楹，另有门出入，可以供他们父子居住，薪米由他供应，一来可以住得舒服，二来也方便为他诊治。

初六日，黎明进内，薛莘农、仲昴亭先到，俱在内务府朝房坐谈。卯正一刻，慈禧皇太后传薛宝田、仲学辂先进问话，退出。慈禧皇太后传薛宝田、仲学辂先请脉，次则薛福辰、汪子常，再次则赵德舆与余，再次则太医院。是日分为四班，进诊毕，同至东配殿。薛莘农、仲昴亭各立一方，余六人会议一方，凉热稍减，腹中气串作响，胸中嘈杂，食不易消，谨呈原方，去柴胡、丹皮，加砂仁、泽泻二味进呈。赐饭毕，旨下："明日薛宝田、仲学辂毋庸另立方，合而为一，今日仍服原班公议之方，钦此！"散出后，挈大儿至锡腊胡同广大司马处诊治外症。大司马申说移居之意，邀往相宅，面北五椽，甚为爽朗，约十一日移寓。

八月十五日。黎明进内，余与薛抚屏、薛莘农、汪子常请脉。将出宫门，皇上驾到请慈禧皇太后圣安，内务府大臣

师曾行一跪三叩首礼，余与诸人站立两旁，恭候驾过，天威咫尺，幸获瞻仰，洵为荣遇。……是日赐饭，常馔外加点心烧烤四盘，因中秋庆节，故得此异数也。

十六日。微雨，黎明进内，仲昂亭、薛抚屏、赵德舆请脉，公议立方，去益智仁，加藿石斛一味进呈。赐饭毕，太后旨下，命马文植至宝公府为福晋诊脉。福晋为慈禧皇太后同胞姊妹，故又命佟医士及内务府司员翁同往，着李总管先行知道。遵旨退出，前往宝公府，门卫森严，规模壮丽，文植进诊，审是颠病，已十年卧床不起，但食生米，不省人事。诊毕，辞不可治。公爷坚命立方，因拟泻心汤加琥珀、龙齿、麦冬、竹茹。辞出。宫中自十一日起至十六日止，每日皆御赐果碟两席，蜜饯各种，俱装花卉。又赏鲜果四盒，白梨、苹果、牛奶葡萄、白桃，自内务府堂官以次，均可携归，矜为宠异。

十七日。黎明天气甚凉，着棉袍褂进内。余与莘农、子常请脉。面奏宝公爷福晋病情不可治。退出公议立方，去石斛，加苍术、木香进呈。……

十八日。黎明进内。是日湖南巡抚保荐新宁县知县连自华，字书樵到京召见。……

二十日。黎明进内，余与汪子常、赵德舆、连书樵请脉。文植奏云："昨值秋分大节，脉象和畅逾恒，太后洪福，大安在即矣。"太后闻之，喜形于色。退出会议立方，加牡蛎，去苍术进呈，旨下命马文植再至宝公爷府中请脉。趋出即往复诊，据云已两日不食生米，神气已稍安静，用原方加减。……

这个宝公爷福晋，据马文植说是慈禧的胞姊妹，当然不会有错的，但不知是姊还是妹。我们只知道慈禧有一胞妹，嫁醇亲王为福晋。不曾听说又有一姊妹嫁宝公爷为“福晋”。这个宝公爷是甚么人，在清廷当甚么差，据浅陋所知，都未见有文字记载。《清史稿》皇子世系表中，也没有宝亲王的封号。

马文植为慈禧治疾，到八月以后，渐有起色，但有时又反不见好，他和李德立都归咎慈禧不节劳，要处理政务(他对于权力是不肯放松一时一刻的)，又饮食不时，喜欢吃生冷鲜果，以致医治进度很慢，马文植往往在请脉后婉言进谏。八月廿六日，湖广总督李瀚章保荐的程春藻(字丽芬，是湖北的盐法道)到京，已和马、薛、汪等医生请脉。到九月底，慈禧忽然命只留马文植、薛福辰、汪守正三人诊治，各省所保荐的，可以各归原省。于是薛宝田、仲学辂、连自华、赵向天等人分别离京了。

> 九月二十七日。黎明进内，抚屏下班，余与丽芬、子常请脉。皇太后询程春藻进诊，何与诸人不同，寸脉确在何处？奏云：高骨乃是寸脉。懿旨复问：本之何书？奏云：本之王氏脉经。
>
> 三十日。黎明进内。奉旨：“诸医各回原省，留马文植及薛福辰、汪守正照常请脉。嗣后分为两班，太医院一班，马文植、薛福辰、汪守正一班。进诊二日，下班一日，钦遵！”……

马文植的医学深湛，因此为西太后所赏识，留他在京服务，但马医生却不愿久在京师，恐怕一时不慎，出了乱子，那时罪名就担当不起了。他总是想脱身而走，但又无法摆脱。他曾暗中托

翁同龢、广寿觑机会在慈禧面前为他讲几句话。

十月初五日。黎明进内时，忽觉眩晕，至朝房，卧于炕上。辰正传进，即起立正冠。晕跌在地。内大臣见余年老失足，命人扶起，许为面奏，谓余且休息数日，再行进内，命苏扶拉出东华门，升车回寓。

自此之后，马医生就请假五日，到十月初十日，他的病还没有好，又续假十五日。假满后，他觉得病虽好些了，但身体衰弱，精神烦瞀，决心请退，便具疏交内务府代奏，请放归故里。

二十六日。翁叔平尚书来云，今早朝面奉慈安皇太后懿旨云，慈禧皇太后圣躬尚未全愈，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着再赏假十日，不准回籍！

到十一月初六日，马文植销假，仍照常入宫请脉，而西太后的病，也在此时渐渐好了，廿九日诊毕，两宫皇太后赐马文植等三人各白银二百两。十二月廿七日，慈禧赐他"福"字和绸缎一袭，白金二百两，慈安赐白金二百两。

下一年为光绪七年，二月下旬，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病重，廿五逝世，马文植亲往弔唁，大有感触，加以又得故乡家信，太太病重，更是归心如箭。三月初一日请假五日，初七日，两宫皇太后赐他白银四百两。

十五日午刻，志蔼云尚书来问疾，余卧尚未起，尚书私谓四儿云：而翁病剧，吾当代为陈情，不使久留京师也。

二十一日，内监某来问病，晤于卧榻侧，少顷即去。

志和于十五日问病后，大概已代为奏明病况，但西太后不放心，派个可靠的太监去看问，看他是不是诈病，再作定夺。

三月二十五日。病益剧，自顾衰朽，重负圣恩，内疚滋甚。不得已，复申请内务府代奏，乞赐回籍调理。是日志尚书面奏，仰蒙太后垂询臣文植病状，当时内大臣暨汪守正等等咸以文植委实病重，臣等亲见。（按：汪守正于三月十二日往问文植病，见他心神恍惚，言语颠倒，就说，他的病不是短期可愈，答应他可以向内大臣请代奏。）

二十六日卯刻奉旨："马文植着回籍，钦此！"是日午刻，又奉旨赐臣文植白镪六百两，扶病望阙谢恩。……

马文植随于廿八日收拾行装，四月初一日离京，取道天津南下，初四日上"保大"号轮船，初五开行，初八日到上海。

四月十一日，抵苏州。……旋谒吴中丞，告知慈圣渐复康豫，中丞喜甚。……

他在金养斋亲家处休息到十五日，才趁小船往无锡，十六日到常州，十八日午后到达孟河家中。这次入京治疾，往返共九个月零二十二天。马文植回家后两个多月，七月初四日，西太后就赏他匾额一面，由北京递至江苏巡抚，命发交马氏收领。和马文植同时医治的御医，有薛福辰、汪守正等，他们都得到封官，而马氏只得匾额，有人窃为马文植不平。其实始终从事的是薛福

辰、汪守正、庄守和，拟方时虽由马氏主稿，但他却没有完成任务，藉口疾病，请放归乡里，就此卸责，律以古人所说“君臣之义”，似已大有违背了。数月后，西太后的病已大有好转，可报“大安”了，她就在六月廿五日用皇帝名义，下一道谕旨，对于曾为她效力的大小臣工，都有赏赐。谕旨说：

> 慈禧皇太后自上年春间圣体违和，多方调摄，现已大安，朕心实深庆幸。惟念慈躬甫就绥和，仍宜随时静摄。……上年宝廷奏请饬各省保送医士……旋据李鸿章、李瀚章、彭祖贤保送道员薛福辰，曾国荃保送知县汪守正，吴元炳、谭钧培保送职员马文植到京，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各该员，同太医院院判等，每日进内请脉。所拟方剂，均能谨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前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着记名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加布政使衔。知府用、候补直隶州知州，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着记名以知府遇缺题奏，并赏加盐运使衔。署右院判庄守和，着补授左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还花翎。四品衔御医李德昌，着补授右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带花翎。……前署右院判李德立之子、兵部主事李廷瑞，着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并钦奉懿旨，薛福辰、汪守正、庄守和、李德昌、马文植，各赏给匾额一方，以示优异。总管内务府大臣恩承、广寿、志和、师曾、广顺，内阁学士宝廷，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陕甘总督曾国荃，湖北巡抚彭祖贤，前江苏巡抚吴元炳，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谭钧培，均着交部从优议叙。

薛福辰本是道员，现在成为特旨道员，并赏二品的布政使衔，已是二品大员，可以红其顶珠了（道员只四品官，不能戴红顶）。汪守正只是知县，赏加盐运使衔，是从三品官了。庄守和的右院判是六品官，赏给三品顶戴。李德昌的御医是七品官，升为六品。已故右院判李德立之子，本是兵部主事的六品官，升为正四品的郎中，一遇到有人出缺，便可补上实职。西太后一病，大小官员都升了官，真是皆大欢喜。

从前有人说西太后这次生病，患的是小产后血崩，御医们不敢公然在脉案上写此一笔，更不敢从这方面下药，因此屡医不愈，耽误了一年多才医好了，她怎能不高兴，“特派恩施”呢。关于西太后小产的传说，终于是传说而已，当然是没有证据可以留给后人作证的，宫帏隐秘的事很多，为了权力斗争而进行谋杀的事，更是多到不可胜数。阴谋完成之后，当事人绝口不谈，参与行事的人，自然也不敢对外泄漏丝毫秘密。外间即使有所怀疑，也只能是怀疑而已。古今中外的宫廷大都如此，清宫虽然有“较为整肃”之美称，但也不例外，就以慈禧医病一事而论，的确有些令人怀疑。传说马文植为她切脉时，看出她的脉象是小产后失调，引致流血不止，元气大伤，他就觉得这差事真不好做，如果对内务府大臣以至太医院等人说是小产失调，后果将是如何，他是知道的。所以急于设法脱离这个多事的圈子，尤其是太医李德立病了不过十五天，忽然死去，更使他心惊胆战。不久后，他获准归乡，还未动身离京，慈安太后甚至未经发表过她有病，而骤然逝世。从这些事情看来，一个太医死了，十五日后，东太后又死了（三月初十日死的，十五日后，马文植即奉“着即回乡”之旨），是不是很令人玩味呢。慈安之死与后来光绪之死为清代二大疑案，一直到今日还没法揭破此谜，恐怕永远也不能的了。

《纪恩录》有一记事，也颇耐人寻味的。八月二十九日记云：

黎明进内，辰刻传进，太医李卓轩私谓余曰：禁中恒例，凡入月皆遣中使赴药房取当归、益母草、焦山查、艾叶四味。今晨请脉，当加意慎重。

这是李德立私下对马文植说，西太后月经来潮，叫他用药时要小心一点，这是否暗示她的血崩症又复发了呢。过了几个月后，李德立的私语，转辗传到西太后耳朵里，就不免忽然病重，继而谢世了。

慈禧画像记

北京颐和园有慈禧太后两幅造像，都是光绪廿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她六十九岁时的作品，一幅悬在乐寿堂，是西法拍的照相，一幅悬在排云殿，是美国女画师卡尔的油画像。两幅相的年貌看来相差三十多岁，拍的那一幅，和慈禧的六十九岁年龄相符，画的那一幅，看来只不过是个三十来岁的徐娘。有人怀疑卡尔女士巴结慈禧，不敢将她的丑老之态照样写出来。此说盛传颇久，但究其实情，并不如是。现在这两幅像仍照旧时一样放在原处，也没有变动。

关于卡尔女士的画像，有很多故事可说，她本人也写过一本书叫《慈禧画像记》，中国有译本，说些什么，久已忘记了。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卷六，有两首诗，题目是："排云殿设孝钦皇后画像，望之如四十许人，图为美国克女士所绘，时后七十余矣。"诗云：

蓬莱正殿对仙山，环珮归来缥缈间。王母楼居三十载，至今鱼鸟识天颜。

寂寞金环掩碧峰，殿前清露滴杉松。玉阶秋叶无人扫，山鸟穿窗窥御容。

诗后又附以注云："侍郎裕庚之女德菱，法兰西产也，孝钦爱之，

常居宫中。德菱与克女士谋后金，绘御容以献，后喜受之，索值十万金，退之不可。后怒甚，竟与之，泣曰：'一像安用十万金，天下谓我何？德菱以洋人欺我耶？'自是不许德菱入宫。"

这一说是很有趣的，但不完全是事实(画像时亦非七十余)，杨云史写此诗时约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之间，对于前朝不胜其眷恋，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大做其遗老也。他说德菱(应作德龄，其妹容龄今尚居北京，为唐宝潮夫人，唐君已于一九五八年逝世。)的母亲是法国人，那是讹传的，民国初年的随笔家，有不少说裕庚在上海取一法国籍妓女，生下此二女，这是诬蔑之辞。她们的母亲是满洲人，裕庚做驻法公使，她们在巴黎长大的。德龄是否与卡尔谋慈禧之金，今不可知，但绝不是"画像以献"，慈禧贸贸然收下了，卡尔就勒索十万金的。此像一共费时一年才写成，要慈禧坐着，由卡尔对着她的"御容"一笔一笔的写。介绍卡尔写像的是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一共画二张，一存排云殿，另一幅送美国圣鲁易参加展览会。画成后，慈禧打算送卡尔一些礼物，比较大方，但伍廷芳对庆亲王说外国人不讳言钱，正是"公之所送未必我之所好"，白银为妙也。结果慈禧命送一万元，并一枚勋章，由外务部转去。今人张慧剑的随笔(刊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新民报》)说卡尔乃裕庚所介绍，"当时盛传此女师索画价至三十万美元，虽无可考，而国库所担负于此女师者，仅饮食与马两项，日已须二百余元，盖裕氏全家与女师俱就食于宫舍(裕两子勋龄、肇龄、特开一席)……"除"三十万美元"外，余皆事实。慈禧指定颐和园附近醇亲王奕谡的花园为卡尔之居停，又命德龄母女搬去同她一起居住，每日陪她进宫画像。以招待费一日二百元来计，一年就七万多，加上赏赐及那一万元笔金，也差不多十万元了。

至于卡尔女士画出来的慈禧"御容"何以活像三四十岁女人，其中有一段故事的。原来画像时，慈禧不耐烦一坐就坐一两个钟头，她问卡尔可否令人代坐，卡尔说，画面部时最好不要别人代坐，画衣饰时无妨。但慈禧还不肯就范，时时叫德龄穿了她的衣服，坐在宝座上给卡尔照画，因此有时就不能画得准，画成后，走了大样，慈禧见了反而大喜，欢喜她为其"驻颜"云。

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

李鸿章手下两个红买办

李鸿章任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的时候，他手下有两个买办，在北方近在咫尺的，有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买办吴懋鼎，字调卿；在南方的有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徐润（不过他当买办，亦只数年而已），字雨之。他们在买办业中可说是显赫人物，为国家办了很多有利有建设性的好事。（吴懋鼎是安徽婺源县人，徐润是广东香山县人。婺源今改属江西省，香山则早在六十年前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县，本篇行文，提到这两个买办，有时不称他们的名却称字，不是对他们特别示敬，因为他们发迹后，社会上一般人多知徐雨之、吴调卿，其名反而不彰，故为行文方便，亦称其字了。）

徐雨之是早期买办群中较有文化的人，又属于广东帮，而广东帮又是买办阶级中的老大哥，所以先介绍他给读者。

这个广东买办，可以勉强把他纳入读书人阶层，他读过十年八年书，后来自修，用功古文，居然能写得一手颇为通顺的文章，晚年并自撰年谱，把一生经历分年记录，留给后人参考。我们不要以为写自传，写回忆录等事只属于文人阶层，不知为洋人服务的买办，也有自著年谱的，可为买办放一光彩。他的书名叫《徐愚斋自叙年谱》，他死后，叶恭绰先生鼓励其后人印行，遂出版以赠亲友。（旧时香港学海书楼藏有一册，一九五九年前，我常往参考，也摘抄了所需的材料。以后再去借阅，则已不翼而

飞，不知去向了，也不便动问俞叔文老师。后来《洋务运动》出版，也节录此谱，大加删节，谱主的家庭琐事及其他往来人物，多被削去。)《年谱》于民国十六年付印，为之校理者阚铎(字霍初，光绪末年，毕业日本东京铁路学校建筑科，在江南两湖一带的官厅工作，任文案、秘书、科长、参事等职，喜与文士交游。故友章叔醇的岳丈。)有跋文云：

> 壬戌之秋，访亡友徐君见缑(廷爵)于上海……见缑出示其先人雨之先生自叙年谱《大事记》、《上海杂记》及中外名人记原稿，属为理董，谋付剞氏。已而又以所写副本见寄于天津，尔后把晤，时用敦促，辄为参订体例，编成一帙，以《大事记》系之年谱，复于《上海杂记》，依类为次，厘为内外两篇。甲子冬(甲子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见缑归道山，乙丙(按：乙为乙丑，丙为丙寅，即民国十四、十五年)之际，少芝(廷銮)、超侯(廷勋)两君时来问讯……丁卯(民国十六年)夏日，少芝、超侯乃议定付印，铎重违宿诺，力任校理，积日盈百，始克蒇事。……共和十六年九月，合肥阚铎。

现在就徐雨之自叙的年谱(以下凡提到此谱，均简称为《年谱》)把他的生平行事，述之如下：

徐润是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二十八日(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广东香山县的北岭乡出生，父亲徐佩珩，字宝亭，时年二十二岁，母亲年二十一岁。他的伯叔都是买办，只有父亲不是，曾做过军官，参加对太平军作战。伯父徐昭珩，字钰亭，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四叔瑞珩，字荣村，上海英商颠地洋行买

办，另一个叔父蕙珩，字瑞亭。

谱主出生后，他的父亲给他命名以璋，字润立，又名润，号雨之，别号愚斋。八岁开学，跟王丹书读书。到十四岁那年，他的四叔荣村从上海回乡，见他稍肯读书，认为可以培植他成材，希望在商场或科举场中取得成功，征得他父母同意，带他到苏州跟随名师。他十五岁时，是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和叔父同往上海。《年谱》咸丰二年栏下记事云：

> 二月初一日，离澳门，下香港，随同先四叔荣村公乘英公司轮船，二月十二日抵吴淞，晚开到上海。是时官舱客位，每位收船价一百二十八元，散客收三十二元，加饭资两元。抵申后，寓小东门咸瓜街亦昌丝茶土号。先四叔雅好文墨，延有杨镜泉、纪眉峰二夫子，皆饱学士也。诗词之外，并精星学，推余命，谓有翰苑望，不宜落市井。先四叔送余至姑苏西园杨子芳老伯家读书，至五月节，因口音隔阂，不惟书不能读，话亦不明，于是仍回上海。先伯钰亭公谓既不读书，当就商业，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师事寄圃，同学郑济东，许兴隆与余，三人学丝、学茶，不分彼此。余先学丝，看丝之西人名韦伯氏，茶师西麦氏，皆相待甚优。余黎明即起，习字数百，又学算于陕筑甫。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深相契重。宝顺行旧东必理氏去世，韦伯氏即嘱余继寄圃师之任。

这是徐雨之叙述他十五岁到上海读书，有人算他的命，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他的四叔送他到苏州从师，但因口音关系，乃回上海。他的伯父是宝顺洋行的买办，便介绍他入宝顺为学徒。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副买办曾寄圃病死，行东韦伯派他充任副买办，是年二十四岁。

宝顺洋行在上海早期的洋行群中，营业额之广，仅次于怡和洋行，有一年生意好时，生意额至数千万两，怡和也得让它首屈一指。徐雨之在这家大洋行当副买办，地位提高了不少。宝顺既是上海数一数二的洋行，就算不是买办，一个稍高级的职员，也比其他大商号的店伙有面子得多，当咸丰八年他十九岁时，已任职帐房的"帮帐"（即帮理帐务）并兼充各职。是年八月，宝顺的大班必理氏在上海病故，由韦伯氏继任为大班。韦伯氏一向很爱重他，所以徐雨之在行内甚有发展。二十一岁时，雨之回乡结婚，自记云：

> 冬，回乡婚娶。荣村四叔助洋一千元，上海各帮亲戚朋友送衣帽、袍料，不计其数，所收礼洋，多至一千六七百元。其时申市生意发达，交往甚多，又藉伯叔余荫，行中招牌，自己职守，以致人情如此之多，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又承行东韦伯氏云："现在君已有家，月给薪洋五十元，俾无内顾忧。"（按：谱主十九岁时，任帮帐之职，月薪为二十八元，现在加至五十，几于一倍，可谓优厚，其实洋行职员的收入，不恃薪水，而靠佣金及下栏，生意越大的，佣金越多。）

谱主婚后下一年廿二岁，仍任帮帐如故，未任副买办时（即廿四岁前），因积蓄已有可观，便与曾寄圃和一个朋友合资做私伙生意，在二年之内，先后开设宝源，立顺兴、绍祥各货号，经营丝、茶、麻、烟叶以及鸦片，后来又投资钱庄、布庄，有些生

意很顺利，能赚钱，也有亏本的。

咸丰十一年，谱主二十四岁，是年记事云：

> 主帐，上堂督理各职。宝顺洋行办房，先伯钰亭公主席，曾寄圃师副之，后曾寄圃师因曾乾记讼案，遽伤于酒，递遗之事，韦伯氏大班派余承之。头绪纷繁，颇觉累坠，幸帮理有年，尚知条理。韦伯氏云：帐房薪水照旧出支四百，另贴八十两，各伴照给。并嘱留谢介鹤、金子香两先生筹办汪乾记未了讼事。至龚孝拱、容纯甫两先生，留之与否，君自决主。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惟老买办(按：即谱主的伯父徐钰亭)在行，必须一一禀告。

谱主于是年记宝顺洋行一笔赚钱的生意，可见外商洋行，不论甚么生意都做，现在摘录他所记的事：

> 日本所出宽永铜钱，以紫铜为质，字样清晰，惟份量轻薄，远不及我华制钱。比时初开横滨埠，本行由夹板船运到此项钱文，计六十三万五千零八十二文，初到申时，少见多怪，无人过问，且以数目太钜，市口不宽，不无疑惧。延积半年，由搁筑甫先生运筹，先提数千贯分销各地，尚可通行，缘其时江浙所铸烂板私钱，每千值银五钱外，后来宽永随销随广，流行内地，竟涨价银七钱三四分之多。此票生意，满拟难望得利，不料统盘计算，竟得盈余银数万两，可谓喜出望外者矣。

宽永是日本一个年统，宽永铜钱，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在上

海、宁波一带流通，徐雨之这次办来获利，可说机缘凑合。当民国八九年之际，吾乡尚通行铜钱，银角子偶然行使，至于银圆，则在大批交易，或购买贵价物品，价在十元、廿元以上者始用之。当时的每一千铜钱中，必掺有烂板私钱数十，我们选择较好的铜钱穿在一起，一串为一百文，买物时，卖者必“一五、一十”数之，看看有没有烂板私钱掺在其中，如有则剔出不计，而买者往往与之计较。为了省闲气，所以我们多精选好钱带出门，宽永钱与好的康熙钱同入选。此种麻烦，一直到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四——二五年)后才逐渐消失，因为铜元角子已代替了铜钱的地位，在市面渐通行了。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年)，谱主二十六岁，他私营的生意尚称稳健，发了些财，便想衣带荣身，便花钱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报捐花翎，是年韦伯氏职满回国，他教徐雨之大力投资地产，记云：

> 韦伯氏临别赠言，与新大班希厘甸同一宗旨，均谓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贡数语，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路、河南路、福州路、四川路等，可以接通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云云。历验所言，果有效果，足征先见之明。以今计之入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零六十四间，且谓不免过贪耳。
>
> 钰亭公六十寿诞，极一时之热闹。十一月间，五姨太举一子，名玉生，老年得子，更为喜欢。

谱主的伯父是宝顺洋行买办，人称老买办，他的五姨太太生

一子，可见洋行买办的生活优裕，有妻妾五六人之多，寒士为之羡煞。

徐雨之果然听韦大班的话，先后买了三千多亩地皮，建造屋宇二千多间，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以前，年可以收租十三万两之谱。他投资地产，如果不破坏，他的后人席其余荫，继续添置，到民国十二年以后，上海地产涨幅之巨，令人震骇，哈同见到徐家地皮之多，收入租金之厚，亦为之羡慕不已。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年），雨之三十二岁，《年谱》是年记事云：

> 荣村公来申，拟做生意，买茶寄番四千余件，后合开通源杂粮土号，资本二万五千两，荣村公五千，潘爵臣、容纯甫、李贯之并余名下各五千，派李贯之为经理。营村公与容纯甫同寓号内。甫及两年，全军覆没，误在贪多嚼不烂之故，以致失败，庄上往来，由余经手，加亏千余两。

这家通源号店铺，股本二万五千两，两年后失败，钱庄上往来，是由雨之介绍的，大概欠庄款来往帐，雨之除股本五千两外，更要负担保之责，赔偿钱庄欠款八千余两。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韦伯氏提升徐雨之为副买办，告知他以后由他主持办房，去留职员，但龚孝拱容纯甫二人留与否，由他决定。龚是龚定庵之子，有狂行，但学问极优，传说火烧圆明园是他带领英军往发财的，何时在上海得以在宝顺洋行与容纯甫为上宾，无可考查。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人，道光末年即往美国留学，娶美妇，一八五五年归国，因为他是香山人，又曾在上海北京的美国官厅做过事，与洋人有关系，所以

寓居宝顺洋行内为上宾，雨之接任副买办后，有没有逐客，不可知，但数年后，纯甫又和雨之叔侄合股，经营字号，可见他们仍有关系的。

容纯甫生平，知识界中人大多知道，不必介绍，后来因参加戊戌变法活动，西太后通缉他，他即往美国，死后也葬在美国。容纯甫是我国最早提倡西学和改革的人，他曾往太平天国游说李秀成，他的议论不为接纳，便回到上海，又往北京活动，后来见曾国藩、李鸿章，向他们献派遣幼童往美国学习之议，曾、李皆赞成，先后分四批，派一百二十人往美国，这是我国派遣出国留学生之始。

自同治三年以后，宝顺洋行的生意渐差，到同治六年，谱主有离开宝顺之意。是年《年谱》记事有云：

> 同治五六年(一八六五、六六年)后，宝顺洋行获利颇难，因南北花旗开仗后，各埠生意颇清，东洋、北洋、上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复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无可收拾，更值该行股东拆股，各处收束，余遂蓄意离行。

下一年为同治七年，谱主三十一岁，他离开宝顺后，创设宝源祥茶栈，而较早他在河口、宁州、澧溪等地所设的茶栈，生意极旺，畅销国外，获利甚丰。这年，他又和上海的茶商及社会名流，在上海汉口创立茶业公所，他和唐景星都被推选为董事。自此之后，徐雨之渐渐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商界名流了。他又爱才，能提携后进，同治八年《年谱》附记一事，可见他颇能培植人材，今录之如下：

永平张籽云，在申充会捕房及新衙门委员来托，有旧交黄爱庐先生后人建笎，字花农，年十九岁，为其门生，荐在宝源祥本号，学习茶务，人甚驯谨，一无嗜好，且工书画，颇肯用心。迨后同治十二年，余奉札接办招商局务，因派花农去天津充当总管栈事，公余之暇，手不释卷，由此书画之名益著，不数年提升总办，代理津海关道，简放江海关道，仍署理天津关道，补湖南臬司，升江宁藩司，因病开缺，赴沪调理，光绪三十二年，腊月病故，是年五十七岁。此皆李傅相，盛宫保一手提拔，得至于此。乃兄黄建藩，字守溪，同治八年冬来申，寓于本号，九年派赴镇江，代理通源土号经理，未甚得志，去津当差，迨花农接任关道，乃代理商局遣差，后奉调广东电报局总办，因病回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病故，是年六十七岁。

黄建笎是甚么地方人，他的出身是甚么，谱主没有说明，他以一介寒儒，初出道时是商人，经过李鸿章、盛宣怀大力提携，居然由天津海关道升湖南按察使(光绪廿八年一月)，光绪廿九年五月，又升江宁布政使(光绪三十一年开缺)，都是二三品方面大员，可见他是有点本领的，但徐雨之能赏识他于微末之时，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得展所长，尤为难得。

上海广东商人最先有团体组织是广肇公所，它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九年，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这个组织也是徐雨之发起的。《年谱》同治十年壬申(一八七二年)栏下附记云：

创议成立广肇公所缘起。先时，余与叶顾之、潘爵臣二

观察（按：观察为四品道员的别称）合买二摆渡地方吴宅一所，计地基十亩，价银三万一千两，未几，诸同乡创议公所时，叶顾之观察权知上海县事，同与是议。先四叔荣村公唐景星诸公创捐集款，设席于余之宝源祥号。是晚诸同乡频赞成叶公建议，将余三人合置吴宅产业，照原价让出作公益之用。三人各捐银千两，首为之倡。陈善昌、汪裕昌等各踊跃书捐，当晚已集一万零八百两，续捐亦近万两。所短之数，议将产抵于麦加利银行。继由唐茂枝、韦文圃、周云甫诸君，与余复议创集同乡三益会，陆续筹还抵款。此后凡广肇两府之事，俱归公所经理……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李鸿章卸两江总督署理之任（因曾国藩往山东剿匪），专主清剿太平军残部，调兵到浙江、福建，徐雨之积极帮助转运饷械，受到李鸿章赏识，奏保四品衔。他在上一年，经李鸿章劝他在上海皖营捐输分局，报捐以员外郎分发兵部行走了，现在因皖军屡克城池，他也略有功劳，故李鸿章奏保他为四品官。李鸿章又对曾国藩称赞徐雨之深通洋务，常与洋人往来，所以曾国藩就派他主持挑选幼童往美国学习的事。《年谱》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年，到今年已两周甲，一百二十年了。）栏下记事云：

冬十月，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陈荔秋、容纯甫带领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经费由海关发给，坐办刘开生观察。同治十一年壬申七月初八日第一批官学生名单：

曾笃恭（广东海阳县，年十六岁，丁巳）

黄仲良(广东番禺县，年十五岁，戊午)

梁敦彦(广东顺德县，年十五岁，戊午)

陆永泉(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邓士聪(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蔡绍基(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蔡锦章(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黄开甲(广东镇平县，年十三岁，庚申)

张仁康(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庚申)

史锦镛(广东香山县澳门，年十五岁，戊午)

钟俊成(广东香山县中山村，年十四岁，己未)

陈荣贵(广东新会县，年十四岁，己未)

石锦棠(山东济宁府，年十四岁，己未)

程大器(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钱文魁(江苏上海县，年十四岁，己未)

欧阳赓(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己未)

何廷梁(广东顺德县，年十三岁，庚申)

陈钜溶(广东新会县，年十三岁，庚申)

黄锡宝(福建同安县，年十三岁，庚申)

钟文耀(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庚申。西山村，父羽廷，上海道，留派水利局编译。)(按：作者注语“西山村”以下各语，盖言钟乃西山村人，父羽廷。“留派水利局编译”，指钟文耀回国后派在水利局工作。)

詹天祐(安徽徽州府，年十一岁，辛酉。寄居广东省城。父作屏。闽省船政局习机器)(按：清廷撤回留美幼童后，归国者尚多学业未成，乃分派往各机关学习，詹天祐入福建船政厂。)

吴仰曾（广东四会县，年十一岁，壬戌）

潘铭钟（广东南海县，年十一岁，壬戌）

容尚谦（广东香山县，年十岁，癸亥）

曹吉福（江苏川沙县，年十三岁，庚申）

罗国瑞（广东博罗县，年十二岁，辛酉）

刘家照（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辛酉）

谭耀勋（广东香山县，年十一岁，壬戌）

牛尚周（江苏嘉定县，年十一岁，壬戌）

邝荣光（广东新宁县，年十岁，癸亥）

主事陈公兰彬，同知容公闳带往。

四批留美幼童，共一百二十人，俱于光绪元年全部出国，他们到美国后，李鸿章奏准清廷，动用美金四万元在康州的哈德福买下了一幢房子，为管理留学生的委员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随同留学生赴美的还有厨师，理发匠、医生，甚至中文教师都有，可以自成一国。管理留学幼童的委员陈兰彬，是洋务派，人极开明，三年后回国服务（他极力主张设立驻美公使，及派员游历欧美。他本是翰林出身，而十分崇洋又带领幼童出国，守旧的李慈铭在日记中骂为卖国、汉奸），由一个委员吴子登接任。吴子登见这班留学生渐染洋化，甚么都是美国的好，觉得很不顺眼，乃奏进清廷，于光绪五年把全部一百二十名幼童撤回中国。其中有很多仅完成小学学业，多数读中学的还未卒业，他们逼于命令，只好半途而废，其中有几个家境有能力的就自费留下，继续学业。诗人黄公度听到这个消息，为之嗟叹，因赋罢留学生诗一篇志概。

这四批留学幼童，虽然学业未终，但回国后，多数由政府安

排职业，派在海关、船政、矿务等机构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也有不少成为专材，对国家大有贡献的。

现在把第二至第四批幼童名单，全部列后，以便读者参考。（第三批第一名的周长龄，即近五十年在香港政坛享大名的周寿臣。四十年前，罗香林先生欲撰留美学生早期史一文，问我索取留美幼童资料，并欲得其名单。我叫他往学海书楼钞徐润的《年谱》。现在此书已"失踪"，大陆亦不见有翻印本，因此这些资料似乎尚有保存价值的。）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十八日第二批官学生名单：

容尚勤（广东香山县，在美读书多年）

苏锐钊（广东南海厅，年十四岁，庚申，技艺）

丁崇吉（浙江定海馆，年十四岁，庚申，中馆，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邝永钟（广东南海县，年十三岁，辛酉，技艺，父美珍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陆锡贵（江苏上海县，年十三岁，辛酉，中馆，父秋桃天津习律）

吴应科（广东四会县，年十四岁，庚申，技艺，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吴仲贤（广东四会县，年十四岁，庚申，中馆，父济时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宋文翩（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辛酉，技艺，父达泉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黄有章（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辛酉）

梁普照（广东番禺县，年十三岁，辛酉，开矿，父焕南）

李恩富(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辛酉，入律，兄醴泉天津习律)

张祥和(江苏吴县，年十一岁，癸亥，技艺)

王良登(浙江定海县，年十三岁，辛酉，中馆，父贤嵩闽省船政局用往津习律)

温秉忠(广东新宁县，年十二岁，壬戌，技艺，父清溪天津习机器)

陈佩瑚(广东南海县，年十一岁，癸亥港入律、父炽堂天津习律)

王凤阶(浙江慈溪县，年十四岁，庚申，开矿)

陈乾生(浙江宁波鄞县，年十四岁，庚申)

广国安(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庚申)

方伯梁(广东开平县，年十三岁，辛酉，技艺)

曾溥(广东潮阳县，自幼习洋文)

梁金荣(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庚申，中馆)

李桂攀(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庚申，中馆，父石泉天津习律)

邝景垣(广东南海县，年十三岁，辛酉)

邓桂廷(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辛酉，中馆，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唐元湛(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中馆)

卓仁志(广东省香山县，年十二岁，壬戌)

梁普时(广东番禺县，年十一岁，癸亥，中馆，父焕南天津习律)

蔡廷干(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辛酉，中馆，父召佐天津习机器)

张有恭（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壬戌，中馆，天津习机器）

容揆（广东新宁县，年十四岁，庚申）

另有粤东富户子弟七人搭附，委员黄平甫带往。

同治十三年甲戌八月初九日第三批官学生名单：

周长龄（广东新安县，年十四岁，辛酉，中馆）

唐致尧（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壬戌，中馆）

康赓龄（江苏上海县，年十二岁，癸亥，中馆）

林沛泉（广东番禺县，年十二岁，癸亥，中馆）

徐之煊（广东南海县，年十二岁，癸亥，小馆，父纫秋天津习矿务）

朱宝奎（江苏常州府，年十三岁，壬戌，入律，父云山天津习律）

郑廷襄（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壬戌，小馆）

祁祖彝（江苏上海县，年十二岁，癸亥，小馆，父照熙上海制造局习机器）

曹嘉爵（广东顺德县，年十二岁，癸亥）

薛有福（福建漳浦县，年十二岁，癸亥，技艺，父荣樾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徐振鹏（广东香山县，年十一岁，甲子，小馆，父德广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宦维城（江苏丹徒县，年十岁，乙丑，小馆）

程大业（安徽黟县，年十二岁，癸亥，小馆）

卢祖华（广东新会县，年十一岁，甲子，中馆）

容耀垣(广东香山县，年十岁，乙丑，中馆，父名天天津习律)

杨兆南(广东南海县，年十三岁，壬戌，技艺，父钰馨闽省船政局习机器)

黄季良(广东番禺县，年十三岁，壬戌，中馆)

杨昌龄(广东顺德县，年十二岁，癸亥)

袁长坤(浙江绍兴府，年十二岁，癸亥，中馆)

孙广明(浙江钱塘县，年十四岁，辛酉)

邝贤俦(广东南海县，年十二岁，癸亥)

唐绍仪(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癸亥，中馆)

梁如浩(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癸亥，中馆，天津习机器)

沈嘉树(江苏宝山县，年十一岁，甲子，小馆)

吴敬荣(安徽休宁县，年十一岁，甲子，小馆，父子麟天津习矿务)

朱锡绶(江苏上海县，年十岁，乙丑，小馆)

周万鹏(江苏宝山县，年十一岁，甲子，小馆)

曹嘉祥(广东顺德县，年十一岁，甲子，中馆)

曹茂祥(江苏上海县，年十岁，乙丑，小馆)

司马祁兆熙带往

光绪元年乙亥九月十六日第四批官学生名单：

林联辉(广东南海县，年十五岁，辛酉，中馆，天津习律例)

陈福增(广东南海县，年十四岁，壬戌)

黄祖莲(安徽怀远县，年十三岁，癸亥，小馆)
陆德彰(江苏川沙县，年十三岁，癸亥，小馆)
沈德辉(浙江慈溪县，年十二岁，甲子)
林联盛(广东南海县，年十四岁，壬戌，中馆)
刘玉麟(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癸亥，中馆)
黄耀昌(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癸亥，小馆)
邝炳光(广东新宁县，年十三岁，癸亥)
吴其藻(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甲子，中馆)
陈金揆(广东宝山县，年十二岁，甲子，小馆)
沈寿昌(江苏上海县，年十一岁，乙丑，中馆)
王仁彬(江苏吴县，年十二岁，甲子，小馆)
盛文扬(广东香山县，年十二岁，甲子，中馆)
潘斯炽(广东南海县，年十一岁，乙丑，中馆)
唐荣俊(广东香山县，年十四岁，壬戌，中馆)
吴焕荣(江苏武进县，年十三岁，癸亥，小馆)
周传谔(江苏嘉定县，年十三岁，癸亥)
金大廷(江苏宝山县，年十三岁，癸亥)
沈德耀(浙江慈溪县，年十四岁，壬戌)
唐荣浩(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癸亥，中馆)
陈绍昌(广东香山县，年十三岁，癸亥)
邝国光(广东新宁县，年十三岁，癸亥，中馆)
梁丕旭(广东番禺县，年十二岁，甲子，中馆)
冯炳钟(广东鹤山县，年十二岁，甲子，中馆)
朱汝淦(江苏华亭县，年十一岁，乙丑，小馆)
周传谏(江苏嘉定县，年十一岁，乙丑，小馆)
陶廷赓(广东南海县，年十二岁，甲子，中馆)

梁金鳌（广东南海县，年十一岁，乙丑）

谭耀芳（广东香山县，年十岁，丙寅）

参军邝其照带往

徐雨之自三十五岁起（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是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行了大运，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招商局成立次年（同治十二年），他与盛宣怀同被李鸿章委派为招商总局会办（总办是唐廷枢，官衔是道员），他在招商局先后投资四十八万两，并向亲友招徕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被推为商董，成为招商局较有实权的人物。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他与唐廷枢等人集股创办仁和水险公司，后又开办济和水火险公司，徐雨之共投资十五万两，为我国自办保险事业之始。后来他们将这两公司转让给招商局经营。

光绪二年冬，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有全盘出让之意图，徐雨之为招商局以二百二十二万两把旗昌全部资产购下：

有瑞生洋行卜加士达来云：旗昌轮船公司有机可图全盘出让，约银二百五六十万两，数日之内必须定见。适唐景翁（唐廷枢字景星）在福州，盛杏翁（按：盛宣怀字杏荪）赴湖北武穴，无可与商。乃与司友（按：即公司的同事）严芝楣通宵筹计，旗昌全盘何止仅值二百五六十万，除轮船不计外，即以码头栈房而论，如金利源、金方东、金永盛，一连三处码头，可泊轮船六七艘；中栈码头一处，水步最深，可靠外洋大轮，又宁波码头及相连顺泰码头，并天津栈房码头，长江各埠码头栈房均系扼要之区，乃即定议商买。越日，还价元二百二十万，午后得覆让至二百二十五万，大有迁就之意，

因即加增二万，共计二百二十二万两，两造允可，先付定银二万五千两，另给凭信，订定先交银百万，其余分期陆续付解，商定大略，然事后追维，未免出于冒昧，为功利在众友，为过则一己独承，戆大之事，此其一也。然彼时电线未通，乃专人至福州促唐景翁返沪，余即持二万五千之定单赴武穴，就商杏翁，并将此事如何匆迫复述一遍，承杏翁赞许大有识见，乃同回南京。适唐景翁亦至，公同商酌，梅方伯、桂芗亭、黄幼农观察均以为是，约同上辕禀见。沈文肃公初以无款拒之，继经杏翁指筹各款，约近百万，措词得体，颇动宪听，然款项仍未足，须再筹商。次日，杏翁复同梅方伯等禀见，又指某处有二十万金可拨，并经梅方伯等赞助，事得有成，沈文肃公乃一面出奏，一面拨款协助，当于光绪三年正月初五日，照草议合同交银二万五千两，一面收回旗昌轮船十六号，并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码头栈房，由担文律师一手经理，归商局接管，而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之力为多也。后查顺泰码头于光绪九年沽于怡和，得价三十八万，似此旗昌之产，除净实付一百八十四万耳。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有私函给唐廷枢、徐润，赞扬他们收购旗昌轮船，谓此后两兄之肩负更钜，责成更重云云。

徐雨之大手笔收购旗昌洋行陈旧的轮船和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栈房、码头，得到李鸿章赞扬，写信勉励有加，在雨之是一件大快意的事，但据我所知，旗昌公司的轮船已非常残旧，急欲以低价卖去，获得现款，再购入三四艘新轮船，故此招商局所

得的是旧船，看来并未能获大利。但旗昌的栈房、码头，却使招商局此后数十年赚了很多钱。当我在上海做事时，三大轮船公司（怡和、太古、招商），招商的轮船不及怡和、太古之多，但码头之利，则怡和、太古远不及招商。话得说回来，雨之为招商局谋百年之利，到四十年后已见端倪了。

招商局收购旗昌事，后来惹起一片政治小风波，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奏，指徐雨之购买旗昌旧船，等于以新制之价购入，使招商局吃大亏。又说当时旗昌即将倒闭，股票跌得厉害，而招商局此举，好像使它吃了人参，股票价值大涨，让美商获得大利。

李鸿章立即为雨之辩护，说招商局此举"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并说，徐润是个"殷实明干"的人材，颇堪信用。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李鸿章对他的下属徐雨之是何等信任，无怪这个红买办（其实此时雨之已脱离买办阶级，而是一个指省浙江的候补道，是国家的四品大员也。但雨之并不想投身政海，虽然官职是道员，但并不往浙江报到，仍以商人姿态活动。）红极一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不断委他差使。李鸿章之兄瀚章是湖广总督，光绪十七年（一八七八年）瀚章以徐雨之办理漕粮海运出力为由，向清廷保奏加雨之二品衔，两年后，李鸿章又保奏他以道员本班尽先补用。

光绪十七年，雨之奉到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复回开平局会办矿务，他又伙合李云书、周金箴等友，合办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他又倡办建平金矿，早在光绪十二年，他伙同唐廷枢用招商局公款投资安徽池州煤矿，为股东之一，又得到李鸿章支持在池州矿附近，招股兴办贵池煤矿，想藉此吞并池州矿，但贵池煤矿由于招股未足而停办，吞并池州矿之目的，因而也未达到。

徐雨之的事业极多，不便一一详记，但他所经营的各种事

业，最值得欣赏的就是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他与从弟徐秋畦、徐宏甫合资创办同文书局，对文化界大有贡献，同文书局石印的大部头书，如《殿板二十四史》、《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至今还为读书界所重，即如所印小说，如《石头记》、《三国演义》等，至今很值钱。

《年谱》于光绪八年壬午四十五岁栏下的附记云：

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开办，甲午年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

同文书局石印的书，《康熙字典》大陆的书局近年皆有影印发卖，《图书集成》是大部头书，页数众多，成本极重，以清廷之力，亦止印一百部，除内廷贮藏外，并颁给各省督抚各一部，军机大臣和六部尚书各一部，《王文韶日记》记所得一部有云，此书每部成本在四千余两云云。在百年前已如此，今日售价万余元港币，亦不足为奇也。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以前，徐雨之经办各事业很是顺利，他又谨遵前宝顺洋行大班韦伯氏的话，投资地产，大买上海地皮三千余亩，建房子数千间，用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即收租年达十二万两，地产之多，几欲夺上海地产大王汪远泽堂之席(汪为上海丽泉洋行买办，后来和丽泽洋行闹翻，为大班士蔑中伤离开，隐居不出，地产业亦失败)，其时哈同尚未发迹也。但徐雨之好景不常，中法战争发生，上海受到影响，市场混乱，地产跌价，使他几乎破产。正在困难之际，他的同僚盛宣怀，因为他欠招商局十六万多两，以徐润"朘公营私，亏欠局款"向李鸿章具禀，将徐润革职。

徐雨之亏空公款，离开招商局后，很是失意，除筹还所欠招商局款项外，他还雄心勃勃，向朋友借资二十多万两经营茶业，结果还是受到亏损。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因为徐雨之办理煤矿有成绩，邀请他赴台办鸡笼(即今日之基隆)煤矿，一月后因水土不服，抱病回上海。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雨之还清招商局欠款后，经李鸿章向清廷奏请，准予开复原官(即二品衔候选道)，于是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委他会办香山县天华银矿，后来因为招股不足停办。

自从还清局款后，徐雨之的事业又再蓬勃起来了，李鸿章卸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后，继位的是浙江仁和县人王文韶，他们先后派差事给徐雨之。(当他欠局债时，刘铭传于十二月下旬，由芜湖派差官送来元宝一百只，并无书函，仅由差官传达口讯，据称主人吩咐，见徐大人，劝勿灰心，认真行事，发达后还我云云。原来刘于光绪五年时到过上海，和徐雨之见过一面，竟能雪中送炭，甚属难得。当时刘是直隶提督，后来他由福建巡抚调

台湾巡抚，故有邀徐往台办矿务之事。）

两个总督委派雨之的差事，只能大略一说，计有办理升平局、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永平等处金矿（雨之有机会畅游避暑山庄，并著有《热河日记》）。同时，他又在天津、塘沽一带大买地皮，建造屋宇，开办广益房产公司，在锦州大凌河与人合办天一垦务公司。此时他的“买办底子”已完全洗脱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实业家了。

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直隶总督荣禄，把雨之撤去永平矿的职务，但他的办实业雄心未泯，在上海和朋友合资，收购云彰衫袜厂，改名为景纶衫袜厂，聘用在奥商洋行任买办的汪少云为经理。

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三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徐回招商局重任会办，到光绪三十二年，招商局总办杨士琦调京服务，袁世凯就委雨之代理总办。此举，原想依靠雨之从盛宣怀手中夺回控制权，但盛宣怀把持招商局多年，羽翼已成，不易控制了。

雨之重任招商局总办后，也想为袁世凯卖力，他拉拢一些香港股东站在自己一边。可惜他到职只不过几个月，多疑的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解除雨之代理总办之职。

这回的徐雨之，真是“无差一身轻”了。他的官是二品衔道员（捐官只能到四品道员），差是代理招商局总办。既没差事在身，于是整顿自己的事业，他把景纶衫袜厂的外股收买，增加资本，改为独资经营的企业，同时又扩充设备，业务蒸蒸日上。他死后，该厂由其子孙经营，在民国时期一直开办，为上海数一数二的大衫袜厂。

徐雨之整顿自己的事业后，不久，差事又到，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杨士骧，委派他稽查省港招商局事务，他又上天津，到广州、香港走一遭，这年他已七十一岁。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初九日，雨之病终沪寓，享年七十有四。

徐雨之一生，最伟大而历经百余年不衰，且经后人接手至今仍极辉煌，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无如他办理招商局，打好了初期的招商局基础一事。李鸿章于卸任北洋大臣调入北京内阁办事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叫他写一个关于办理招商局经过的节略，大概是要分给朝中王公大臣阅览的。细看内容，似乎有点“丑表功”，但按之实际情形，确为事实（节略文长，不录）。

李鸿章手下的两个红买办，徐润已谈过了，另一个吴懋鼎（字调卿），似乎比徐润更红，他的“红”是因他得到李鸿章的信任，不断委任他差事，并且可以和李鸿章当面讲私人说话，为李办一些私人的事，颇类于“豪门走狗”。在伺候李中堂的大大小小群僚中渴望欲得此差遣而不可得者，吴竟得之，这还不是红到发紫，千万人所羡仰吗？徐润就没有这“福气”，大概他读过一点圣贤书，自有他要树立的品节。

吴调卿发财后，也拿出一二百万元来办工厂，但他办的实业未如徐雨之的伟大，雨之各事业中为政府选派幼童一百二十名，往美国留学，和创设同文书局，为文化立下一点功劳。这两事至今百余年，仍为人所称述。吴所办的工业，在六七十年前已为人所忘记，更没有人称引了。两人成就之处，大有分别。雨之在中国历史上，尚能占一小席地位，但吴则殁而名不传，即以人名大字典所收的人名来说，徐雨之常见，吴调卿不常见，近年中国出版的《近代中国人名大字典》收录的人名以数万计，其第五六五页，就有徐的名字和简括介绍他的事业。吴则未见其名。

吴调卿九岁时，随母亲移居苏州，大概他的父亲在苏州当笔工，收入甚微，吴家在安徽很贫困，不得不离乡井。调卿在十七岁时，经人介绍给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请收录他做学徒，学习生意。调卿倒也很有上进心，公暇就努力学习英文，以便与洋人沟通。

也可说是吴调卿走了好运，汇丰银行自光绪二三年间已有在天津开设分行的打算，不知怎的这个消息被吴调卿打听到，便拜求席立功提拔，推荐他负责往天津筹备，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席立功向东家建议。席立功见吴调卿在行学习已将十年，平日对他恭顺、听话，是个可以随便差使的人，况且吴为人伶俐，口齿也好，很会巴结上层，英语也颇讲得来，便有心提拔他，向东家推荐天津汇丰银行分行的第一任买办，经东家答应了。这回吴调卿真是“行运行到脚趾尾了”了。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吴调卿到天津筹备开设分行，两年后分行开业，吴调卿立即成为商界名流，交官结府，和地方绅士名流交际了。

至于吴调卿怎样结识李鸿章，传说这段故事并不曲折，但极有趣。当吴调卿初到天津时，人地生疏，办事有时不会顺利，但已经在上海出发前，由汇丰东家写信给他介绍天津的各国领事，请予协助。不久后汇丰的大东家又亲到天津，看看筹备情形。大东家是金融界巨子，到了李鸿章管治的地方，不止在礼貌上要去拜见总督，而且还要请求多方面加以协助的。根据吴调卿之子吴焕之近年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供有关他父亲的资料，其来源得自父亲口述(吴调卿死时是一九二七年，去今已六十余年，六十年前听过的话，五十年后重述，多少有些“走样”的)和家中老人，汇丰银行办房的老职员。据说，汇丰大东家拜

访李鸿章，也带了吴调卿同行，当面介绍吴给总督，说他是天津汇丰银行的买办，将来中堂有甚么吩咐，叫调卿便可。

李鸿章问吴今年多少岁，何方人氏。吴一一蓮对。李知他是婺源人(本属安徽)，很高兴的说："啊，我们还是同乡啦！我这里办洋务的人不多，你以后可常来走动。"汇丰银行的大东家和英国领事，见到吴很受李鸿章的赏识，因此大东家对吴更加倚重了。

自此之后，吴调卿果然常往总督衙门走动，给李鸿章办了很多公私皆有的事，渐渐得到李的欢心和信任。他给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买英国军火，介绍天津英商谦顺洋行办理买了一批枪炮，甚合李意，称赞他能办事。后来又把淮军银钱所历年的积余银两，一部分给吴为他放放，收取利息。

这个淮军银钱所是甚么机构呢？吴焕之没有加以说明。原来李鸿章率领淮军打仗，清剿了捻军，继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并督练海陆军，他带兵三十年，在直督任上二十五年(同治四年四月到光绪廿一年正月召京止，足二十五年。廿五年又外简两广总督，廿六年重任直督，至廿七年死)，淮军的名目当然没有了，但三十年间节余的存款，已有百数十万两。李因设立淮军银钱所和淮军粮饷局两个机构，管理这笔余款。

甚么叫节余呢？这是清政府以至民国政府的会计名词。凡中央政府所属的衙门，每年收到政府发给的经费，年终要做报销，政府通过后，一定尚有用不完的款项，这些银钱，属主管长官所有，可以自由运用。有些清廉自守，一丝不取的，就留下来为本衙门或地方做福利，很少缴还的。但军队每年所领的经费很庞大，带兵的人，绝不会把节余归还政府的。李鸿章带兵数十年，节余款项很多，所以他设立这两个机构来管理。

清末曾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曾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也在淮

军粮饷局当过差，民国年间亦在北京追随溥仪，直到民国二十年左右才死去。他曾对某些遗老透露一个故事。据说，李鸿章入阁办事后，借居贤良寺，门可罗雀。继直督者为王文韶。文韶是进士出身，操守与官声颇好。一日，他检阅前任移交的文件，见淮军银钱所与淮军粮饷局节存余款千多万两，吃了一惊。这笔钱本非公款，前任尽可以携之而行。不必移交后任的。王文韶不胜浩叹，对左右的亲信说："我王某做官三十年，非分之财，一向不敢取，但对节余款项，却不如李中堂那样一丝不染。李中堂在京日用浩繁，自即日起，两局每年分送李中堂五千两，让他老人家过得畅快些。"

王文韶这些话是袁大化闻自粮饷局旧人，后来由袁在民国后传出的。《王文韶日记》去年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起自同治六年，止于光绪末年，所刊不全，他任直隶总督四年的日记不见，不然的话，便可知袁大化说的是否可信了。（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光绪廿一年，以前云贵总督召京，正月十九日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七月九日实授。廿四年四月召京继翁同龢为户部尚书，五月入值军机处。袁大化字杏南，安徽涡阳人，秀才出身。辛亥革命时，被举为新疆巡抚，但后来他回到北京，却是拥护溥仪的复辟党健将。）

淮军为甚么有这许多余款呢？似乎应说一说。原来李鸿章与曾国藩皆为"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死后，就只有他了。西太后和醇亲王非常倚任他，凡有李鸿章的奏请，无不批准，很少有驳回的，因此，淮军的积余渐多。其次就是李鸿章成立这两个机构，派可靠的人管理，吴调卿得李信任后，李就派他做淮军银钱所的总办（此说是吴焕之讲的），淮军余款，由他去放息。

据吴焕之说，他父得李鸿章信任后，可以直入李的签押房

（清代衙门的一个长官的办公室，非邀请不得擅进的），吴焕之在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有很有趣的描述，今录如下：

> 我父遇事拜会李鸿章时，李多是在他的签押房单独接待。有时李拿出数万两的银票交给我父说："调卿，你给我放一放。"由于李信任我父，所以也不要甚么字据。李鸿章故后，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经计算本息共银一百五十万两。当我父将这笔存款提出面交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时，讵料李经方说："怎么，中堂只有这两个钱吗？"我父十分恼怒，就对李经方说："我很后悔把这笔款子送来，我若不送来的话，你能知道吗？"结果弄得不欢而散。

以银钱交人放息，而不要有字据，当然这是对其人有信心，但又有一说，清末的大官僚见不得人的钱银，如果存在银号生息，多不记名，由银号掌柜暗中记下是某某大人的款子，提取时，只认人。这样可以避免御史弹劾时，派人查帐，露出真相。李鸿章每次以数万两的银票叫吴放一放，到他死时，连本带利有这个数目，李经方兄弟应该满足的。

吴调卿凭着李鸿章大力提携，当了不少红差，又报捐道员加二品衔，所当的差使先后有关内外铁路总办、农工商总局督理，后来因"私通外国"罪名，清廷把他管理农工商事宜撤职，算是他卖国的罪证。左派文人，对买办都喜欢以卖国一词加之，这回由吴调卿的后人道出，可见吴效忠祖国不如效忠异国之劣根性，徐雨之绝不会做这等事的。

吴焕之前文有一段记事，颇值得一看的，录如下：

庚子年前，我父与德商兴隆洋行合资在天津英租界广东道，开设"天津打包公司"，我父投入的资金为该公司总资本的二分之一(款额不详)。庚子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在津的各国洋人将数百个儿童集中到这个打包公司里，借以避免发生意外。我父获悉清军准备炮击该公司，即告知英国驻津领事，英租界当局乃将集中在天津打包公司内的儿童全部迁出，后来清军果然发炮轰击公司，房屋中弹被焚，但并未伤人。事后，英国公司将这一事件的始末报告其本国政府，因此，《辛丑条约》中赔款项下，遂将天津打包公司损失列入，我父得到赔偿五十万两。这笔款是由上海汇丰银行拨给的。此外，英皇还赠与我父"维多利亚"勋章一枚。

袁世凯得悉我父曾将炮击天津打包公司消息事前透露给英国领事，遂和邮传部侍郎、矿务大臣张翼二人联名，以我父身为国家大员兼充外国银行买办、私通外国并有康(指康有为)党嫌疑为由，向清廷奏参。那时光绪被囚，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召见李鸿章。李鸿章闻知后，遂和领班军机庆亲王、军机大臣兼武卫全军总统荣禄共同力保(我父系荣禄的门生)。同时，我父曾借慈禧万寿的机会纳贡银二十万两，修建京师内外城官医院为太后"造福"，且大太监李莲英亦从旁援助，所以清廷"上谕"仅是"吴懋鼎毋庸管理工商务事宜，着以三品京堂候补"，原有的顶戴尚得以保持。一九〇四年，我父辞去汇丰银行买办，自此以后即未再担任公职。

李鸿章自光绪廿五年陛辞后即往广东，廿六年又召入京为和议大臣，廿七年秋逝世，两宫回京时经过河南得死讯后即以袁世凯继任直督，二年之间，君臣未见一面，李何能力保?

吴于一九二七年死于天津，遗产达四五百万两。（沈苇窗兄相告：吴的书画收藏有韩滉《五牛图》，曾由其子携来香港，后归北京。）

郭嵩焘画像纠纷

中国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不喜欢和各国交往，以天朝自居，乾隆末年与嘉庆初年，英国派遣特使来聘问，希望互派使节增进贸易，都给中国拒绝，还有礼貌地把英使遣送回国。到同治年间，有几个稍见开明的大臣才建议，派人出洋考察，而派的只不过是芝麻绿豆般的京官，并非甚么专使特使的名义。不久后，又雇用美国人蒲安臣为外交代表，赴各国接洽修约。（蒲安臣 ANSON BURL INGAME 1820--1870，美国第一位驻华公使，在职期间，深为总理衙门大臣所信任，一八六〇年任满，清廷即聘他为外交官，在俄国办事时逝世）然亦非中国派驻外国的正式使节，一直到光绪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年），中国在无可奈何之下，才派郭嵩焘为首任驻英钦使。

郭嵩焘在英国三年，很不得意，内部则有副使刘锡鸿处处捣他的蛋，使他非常愤怒，几乎要辞职，后来政府把刘锡鸿调走，更定下不设副使之例（当时设副使的用意，盖以使臣出使万里之外，一日死去，有副使可接替，而更大的作用则在互相监视）。岂料刘走之后，又有一件使他颇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上海《申报》有一篇文章描述他在伦敦一个英国画家为他绘像的事，引致《申报》主笔杨乃武被逼辞职。

清朝早期派往外国的钦使群中，只有郭嵩焘一人最为懂得外情，而且明达事理，他的乡后辈李肖冉（原名犹龙，中年后以字

行，湖南长沙县人，生于光绪七年，死于一九五三年，年七十四岁，以秀才留学日本，一度任梁启超的秘书，其后任湖南大学教授，著作甚富。）在《星庐笔记》称其：

> 咸同中兴，英贤辈出，湘人尤立功名天下，然而深怀卓识未有及湘乡郭筠仙侍郎者也。读书观理，深察南宋以恬之气足以误国。至谓宋弱明亡，皆此气焉致之。出使海国，见西方政学之良，远过三代。当时众论大哗，斥为汉奸。侍郎亦谢事还湘，著书终老。……

这短短百多个字，略可见郭氏一生的轮廓。他是湖南湘阴县人，字伯琛，号筠仙，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年）进士，授职编修，在北京任职时，已留心洋务。他认为中国不能死抱着天朝外夷的界限，应该立即打破，要和外国交际。同治初年，一任广东巡抚，因广东邻近香港，使他多见一些西洋事物和阅读多一些西洋政制的书，对这方面的知识增加不少。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英国驻华使馆一个翻译官马嘉理取得中国旅行证件，往云南公干，在云南被杀，英公使以此为藉口，百般威胁，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欲从中为英国获取更多利益。清廷派李鸿章与英使在烟台商谈此案解决方案，订下烟台条约，并答应派公使常驻英国，增进两国邦交，清廷就选中郭嵩焘为驻英首任钦使。当时无公使之称，一年后郭氏始兼任驻法公使。

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印郭嵩焘日记全部，自述他在广东任上种种不快意事（左宗棠暗中排挤他，要把他的死党蒋益澧升为巡抚），接着军机大臣沈桂芬又故意把难办的事要他去跳火坑，把"谢罪使"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日记中对沈极不满多处指沈构陷），

使他往外洋走一趟。清廷已决意派他出使英国，但他自离开广东后就已萌退志，恳求政府准他辞职回乡养病，但政府不肯，他只得拜命。光绪二年七月十六日日记云：

经笙（按沈桂芬字小山，号经生，江苏吴江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六年死，谥文定，与左宗棠交厚，又为军机领袖恭亲王奕䜣倚重，是个有权的宰相）相国来言："乞假疏留中，而传旨谕令十九日预备召见。"乞病召见，从无此事，诸君以此相留难，朝廷一切委己以听之，而迫我以不敢辞之势，亦可谓神奇矣。……（按：七月十一日日记有："方右民奉恭邸命，持示李相烟台来书，中云赫德言速遣使臣至本国会议，或不至兴师。于是诸君据此相要，嘱无遽请假。处此真属万难。"按：右民为方汝翼之字，直隶清苑人，举人出身。其人似乎是军机，或总署的章京，现在无法可以知道。李相为李鸿章，已在烟台与英方使臣开会，英使威妥玛口口声声如不派使臣来英议事，就出兵打中国。气焰之盛，甚有趣！）

召见的日期已定，郭嵩焘已骑上虎背，只好准备陛见。经慈禧太后一番温谕又极体贴的"天语"，就不便辞职，往火坑跳一遭了，召见时与慈禧的对答，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读之可明瞭当时外交的情况。今录如下：

十九日。寅初入东华门，至九卿朝房小坐候起。魏赓臣已前至枉候。已而传柏王带见，进入月华门。卯正，军机大臣始下。从柏王至养心殿东暖阁跪安毕，问："李鸿章烟台三

次来信，见否?”曰:“皆已见得。”曰:“此事怎么样?”答:“李鸿章信言威妥玛议有章程，数日即可定局，想此数日必有信。”问:“威妥玛实是难说话。”答:“据臣愚见，滇南正案必与一了。正案了，则凡所要挟皆可据理以折之。正案不了，即要挟多端，终久据此为口实，永无了期。”曰:“然。”问:“所要挟实在有不能答应者。”“要挟最大者，无过口岸。给与一口岸，便已跨越千数百里，而所得口岸租地，至小亦须十余里，都化为洋地矣。此重要挟为最大。”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臣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问:“威妥玛、梅辉立两人本领如何?”答:“威妥玛负气，却是阳分人;梅辉立更深沉。”问:“汝病势如何?”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问:“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顾柏王言:“他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因叩头:“承太后天谕，臣不敢不凛遵。”又谕:“总理衙门言语。如今那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

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答：“李鸿章为国宣劳，一切担当得起。此岂可轻议。”曰：“然。”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问：“汝在南边到几处？”答：“自广东北至直隶各海口，臣皆普遍走过一回。”柏王奏言：“曾从奴才父亲办过天津军务。”问：“可是咸丰年间？”答：“咸丰九年。”问：“汝在南书房几年？”答：“只一年余。”谕：“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身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又问：“现在服药否？”答：“正在服药。”问：“然则尚须调养？”答：“正在调养。”曰：“如此你便间一两日至总理衙门，于调养亦不相碍，却是得常去。”大致如此。然所以慰藉之，反覆申明，有重述四五次之多者。在家安排面谏之言，竟是不能说，惟能感激懔遵而已。因诣恭王、柏王、治贝勒、宝中堂、沈中堂、毛煦初、董韫卿、崇地山、翁叔平、夏子松、黄恕皆。过总署一饭。又诣李壬叔、丁冠西谈。韫卿约明日仍至总署，答言：“谨遵谕旨，三两日一至。”因以兵律一则，属急商之沈中堂，函复合肥相国照办。是日雨，寒，竟日未尝止息。

按：赫德是总税务司，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1831—1878），英国外交官，生于澳洲，其父为该地公务员，一八四二年全家回英国。梅氏在英受完教育后，曾往美国服务报界一年。一八五九年来华，为英使馆翻译学生，后升汉务参赞，又称汉文正使。死于上海，他著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日记中提到他，因他也在烟台议事也。

郭氏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从上海放洋，馆员中直隶州知州黎庶昌，兵部员外郎张德彝，户部员外郎凤仪，三品衔候选道马格里。（黎庶昌是三等参事官，其余三员皆为三等编译官）。而马格里又是英国苏格兰人，他有一个中国别字，叫做清臣。（他本是军医，随同英法侵略军攻打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人，后来替曾国藩、李鸿章练兵，造军械）其余随员有李荆门、刘孚翊、张斯栒、姚岳望、黄宗宪五人，武弁则有郭斌、罗云翰，周长清、纪端、贺志斌、龚绍勤等。

据姚岳望（字彦嘉，江苏阳湖县人，以候选通判为驻英使馆支应官）对他的族侄姚公鹤谈郭公使在英国因画像而惹起一件小小的国际交涉。姚公鹤后来所著的《上海闲话》中曾详记之。开头一段所说："公鹤八九岁时，族伯彦嘉先生自英伦回（族伯讳岳望，以光绪二年随郭筠仙出使英法，旋于五年冬回华。至公鹤之得闻族伯语，乃在光绪十一二年间，闲赴家塾晒先君子，力劝子弟辈于诵读之暇，不可不购阅新闻纸以通知时事，盖得风气之先者也。嗣闻谈及上海申报登载郭星使画像事，颇饶兴致，此实上海报界以记载不实致遭外界诘问之最初历史矣。稍长阅郭星使日记，于此案亦略具一二，然终不若族伯言之首尾贯彻也。以次录之，既足当历史上之纪念，亦新闻记者自警之资也。"（按：姚公鹤说郭筠仙日记，不知是指他的《使西纪程》否？我所见的这部书，却没有提到画像发生纠纷事。姚君所见的，或郭氏另一种日记，也未可知？但未闻有另一种也。姚君久居上海，他这部《上海闲话》，原刊一九一五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小说海》月刊，后来以版权卖给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出单行本。一九二六年孙传芳势力下的上海，交涉公署署长许沅，与租界当局交涉收回会审公廨，姚君为该署顾问，亦以其为"老上海"也。）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记这件事，是用文言写，我现在用浅显的语体文改写于此。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日，《申报》的一条新闻叫"郭星使驻英近事"。据说，英国的报纸，凡提到中国的公使，往往涉于诙谐，近日见某报记载一事：英国有一个展览会，会场中陈列一幅画像，像中人赫然为大清国驻英钦差郭嵩焘。据画师顾曼说："我要给郭钦差画人像时，见他有迟疑之意，过了好一会才勉强答应。我又再婉曲陈说，郭大人始肯坐下来给我画。我要看看郭大人的手，但他将双手笼在袖里，不肯拿出来。我要拉他的手出袖，他觉得非常尴尬。这一幕完了之后，郭公使正色对我说：画他的像，一定要将他的一对耳朵都画出来，如果画一只，不画另一只，人们见了，就会以为那一只给割去了。郭公使又说：他帽子后的那支花翎也要画出，使人家见到了才知他是一位高级的官吏。我说，帽顶给帽檐遮着，翎支又在脑后，怎能画出来呢？郭大人听了，就把他的头俯低下来，问我道：现在你看见了吧？我答道：大人的翎顶虽然是看见了，但大人的面目何存！我们相与大笑。后来郭大人和我讲好：他可以不戴帽子，只将帽子放在一旁，要我将它写入画里。我答应照办。我又请郭钦差穿起朝服来画像，他很庄严地说：如果我穿起朝服，恐怕你们英国人见了都要跪下来拜天朝的钦差了！……"以上都是那个画家顾曼所说的话。该西报又说，画像画成后，郭公使见了很赞赏，认为画得精妙绝伦，有意请顾曼给公使夫人也画一像。(公鹤按：以上皆《申报》转译西报之语。清末，南京开南洋劝业会，申报以出版的第一号报至开会闭幕那一日之报，参加展览，我那时候在津浦南局工作，曾往会场欲检阅《申报》此段记事，但因为不知载于何日，所以查不到。)《申报》寄至欧洲后，为郭公使所见，于

是引起大交涉。

《申报》登载这段新闻，事先似乎应该考虑两个大问题：一、郭嵩焘是否有画像的事；二、即使有请顾曼画像的事，但在画像时，曾否有讲过那一番话。这两个问题不先解决，那么，钦差之生气，是恼《申报》无端造谣吗？还是恼它颠倒事实？现在我得先把当时画像的事实说一下。

中国派驻英法的副使是刘锡鸿。刘于光绪三年，偶然在一个画展会看见一副天主圣母画像，觉得很是精妙，但因为定价太贵，买不起，就托马格里设法找个画工来照样临摹一幅。马格里就介绍画家顾曼应命。临摹完事，正使郭嵩焘见了，大为赞赏。顾曼说，既蒙钦差赏识，他很是荣幸，愿意为钦差大人写一幅像，不计工值，只求略赐润笔就满足了。郭公使很欢喜，就讲好了笔金二十镑，正要讲到拟定日期来绘像，公使又说他不耐烦久坐，可否先以照相作为蓝本，由顾曼对着画。顾曼说可以。第二天，郭公使和顾曼、马格里一同往照相馆拍一张相。当拍相时，公使吩咐摄影师，他帽子上的顶珠一定要拍出来，否则人家不知道他戴的是甚么品官的帽子，又面不可太正，亦不可太偏（因为太正，则帽后的翎支看不见）。摄影师一一依照办理。顾曼拿拍好的相回去照画，十日后，先将画稿送到公使馆，请钦差赏鉴。这是当日画像的实在情形，整个公使馆的人员都知道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而《申报》所记的却又是那样。郭公使阅读《申报》这一记事时，恰在巴黎，他读后非常骇异，明明没有此事，何以《申报》乱造谣言，于是吩咐马格里写信去诘问画家顾曼为甚么无中生有，一方面又致电上海《申报》，查究这段新闻从甚么报纸译出。

马格里给顾曼的信，由其家人作复，据说顾曼画师和家人出

游度假，现在到了甚么地方，无从得知，等他回国再行答复。至于《申报》方面，则两次电询，均无回音。到九月初，顾曼有信寄去巴黎中国使馆，他说他本人现在伦敦以写画为活，实在没工夫到巴黎面陈一切。上海《申报》所载各节，全属子虚。他靠卖画做生活，现在名誉受到影响，此后生意必然难做，既然《申报》说是从外国报纸译出，他惟有一面致函各报，辨明并无其事，一面追查这一新闻究竟是那一家报纸在何时何日登载，以为恢复名誉之地。

郭公使打两次电话给《申报》，《申报》置之不理，第三次去电，并附以回电费用，电中警告《申报》，如果再不答复，定向法庭起诉。到九月初十日，《申报》的复电到了，据说这一则新闻系译自本年四月某日的《欧卧兰美报》。郭公使就派马格里到该报查询，所得的结果是该报本为一周刊，逢星期日出版，《申报》所说的某日，并非星期日，而该周报并没有《申报》所说的那一期出版。马格里恐怕《申报》复电月日有错误，便把该周报全月若干份买了回来，细加检阅，并不见有这样的记载。郭公使因此更加震怒，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后来有人对郭公使说，根究《申报》译载那一家外国报纸为一事，先行致函《申报》及各西报证明新闻错误又为一事。前一事不妨暂时缓为根究，而致函更正之举，似不可缓。郭公使很以为然。不久后，马格里也将画家顾曼找到，带他往见郭公使，由郭公使叫马格里和顾曼各拟一封辨白的函件，写成后，译为中文，经郭公使加以润饰，然后分别寄上海申报馆及欧洲各日报登载，以明真相。马格里那封辨白的信，由他本人详细说明郭公使与画师顾曼谈话的内容，因为画像之时，全由马格里为翻译也。顾曼的更正函件如下：

敬启者：顷阅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登载驻英法钦使近事一则，有人说是由我口中传出来的，我觉得非常诧异。我很看重名誉，不甘缄默，特陈数语，以辨其诬。查《申报》所载，系关于钦使在伦敦请我画像，画成后，悬在画廊一事。所记的内容，十分谬妄，我现在正在追查原委。为了避免外界误会，请给我辨正一下。我替郭钦差画像，系由马格里先生介绍的，带见时，我先向钦差取得一副照相为蓝本。画成后，请钦差到我的画室观看两次，钦差极称许，我正感谢不遑，何至有捏造讥嘲之理？况且我和郭钦差言语不通，谈话时，一切由马格里先生传译。现在马先生来诘问，真使我无词以对。报纸以无稽之词，说是由我之口传出，我是不承认的，就是马格里先生司传译之责，也不肯承认的。以上各情，除函达上海《申报》先行辨正并根究来源外，并请贵报登刊，如贵报的读者得知《申报》此段新闻传自何人，刊于何日，请早日通知我，无任感盼。画师顾曼谨启。

关于马格里辨正的函件如下：

敬启者：前于巴黎读得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所载中国钦差画像一事，不胜诧异。查顾曼为钦差画像，是我介绍的。画成后，钦差不十分满意，经顾曼再三修改，钦差才说略得形似。后来悬挂在画廊展览，见者皆极端称赏，顾曼之名，由是鹊起。因为英国人以中国钦差初次到英国本土，视为罕有之事，顾曼为钦差画像，遂得藉此沾光。当他写画之时，彼此语言不通，双方皆由我传译。如果照《申报》所说

的，则我追随钦差将及两年，从未见他有此举动，似此凭空侮慢，使我何以自处？后来回到伦敦，即往诘问顾曼，他指天誓日，坚不承认有此事。我在伦敦遍查各种报纸，也看不见有这段新闻。我认为此种讥嘲文字，或别人故意诬蔑，故借画像为词，或出自顾曼，皆无足轻重，因为顾曼不过是一位画家罢了，他敢于随便讥笑外国使节，自然有人责他荒唐，乃《申报》竟然说英国报纸，凡提到中国钦差，每涉诙谐，但我追随钦差在伦敦，所见的报纸，对钦差无不致其歆敬之意，绝不闻有涉及诙谐不庄之语的。西洋各国，无不讲情理，无不讲法律的，各报纸的主笔先生，也多为明白事理的知识分子，所以对于各国使节，从不肯有所讥嘲，如果照《申报》所说，则甚非我们英国人所乐闻了。现在顾曼已有辨正，我更希望你们把我的来信登在贵报，以纠正前所说的尽是诬词，顾曼个人的得失不足和他计较，但我觉得他是由我介绍的，而言语又由我传译，此种诬蔑之词，实使我无颜以对钦差，所以迫得向贵报沥陈一切。马格里谨启。

自从顾曼、马格里的信件登入外国报纸之后，外国人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而郭钦差以事隔多年，怒气也稍息了。过了不久之后，经公使馆人员详细调查，始知《申报》所登载的，确有来历，但不如西报之过甚其词，而西报之所以得此新闻，则蛛丝马迹，又复别有原因。现在再将事后馆员所查得的消息，汇述如后。这时候，郭钦差已任满回国，这件公案，也没有结果了。

当顾曼为郭钦差画像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原来顾曼的一个弟弟叫顾丹，在伦敦的《电讯报》做主笔，他听说哥哥为中国的钦差写了一幅人像，就向他问长问短。顾曼一生中初为中国大官画

像，未免有点矜夸，就对弟弟说，中国法律，有割耳朵之刑，所以为达官贵人画像时，一定要把他们的两耳露出，否则会引起人家怀疑画中人是受割耳之刑的。所言不经，大都类此。顾丹听了之后，偶然对报馆的同事谈及。后来又恐怕于兄有碍，于是又向另一家报纸名叫《喀尔司喀尔纳报》的供应这段奇闻，该报遂于四月十六日登出。事经顾曼、顾丹、《电讯报》、《喀尔司喀尔纳报》辗转附会，传到上海后，又经上海某西报的编者加工渲染，就变成《申报》所载的那段新闻了。当时的《申报》，仍属英国人美查所经营，他们不问事实之有无及真伪，尽情披露，六月二十日《申报》所登的新闻中，所云英国报纸，对中国公使之事，每涉诙谐者，即指《喀尔司喀尔纳报》而言；所云近日见某报云云者，即指上海某西报。及至郭公使致电诘问，《申报》不知怎样答复才好，索性置之不理。后来郭公使将复电的电费一并汇沪，这才知道事情终难隐瞒，只好乱指伦敦一家星期报，以为搪塞，以为就此可以敷衍过去了。怎知郭钦差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追究不已。但《申报》始终不敢将上海某西报之名指出，就是《喀尔斯喀尔纳报》所登载一事，也没有对郭公使说明。此案开始于光绪四年四月十六日英国报纸之登载，而上海某西报则于六月初转登，《申报》则于六月二十日转登。后来巴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辗转函诘，直至光绪五年秋间郭钦差卸任归国，然后才成为毫无结果的一件公案，也可以说是中国报纸最初最大的交涉了。

以上是姚公鹤亲闻诸其族伯所说的，当然可信的程度较多，可惜郭嵩焘自己没有详细记此事的经过，馆员中有张德彝者，著有《随使日记》，有记云："顾曼送来西历五月十七日（原注：即华四月十六日）新闻纸名喀里斯遮尔纳者一张呈览，内言当日画阁所悬千幅皆丹青绝美，妙笔如此，另有可阅者，乃顾曼所画之钦

差像也，其以两耳皆露者，因中国惩治罪犯有割去一耳之律。又红顶为华官品级之别，钦差欲其必露，故工竣始为填画也。星使见而大怒，言顾曼之弟必属该局，令彝次日往究。……顾曼据云：新闻纸所言实非出其口，伊弟顾丹，现在代立格拉霏新闻纸局(按：此即《电讯报》，英文为 Telegraphy，至于“喀里斯遮尔讷”的原文是甚么，无从臆测，此即《上海闲话》中的“喀尔斯喀尔纳报”。——引者注)，与喀里斯遮尔讷局既无交通事件，亦无往来信函，今既访得此纸，自当追究其人。……”所记与上述大同小异。(按张德彝本名德明，字在初，汉军镶黄旗人，同文馆毕业。光绪廿七年以记名道赏三品衔，任出使英义比大臣，下一年专任驻英，光绪卅一年召回，一九一八年一月逝世。——引者注)

顾曼所画的郭嵩焘像，不知郭氏有携回中国否？王先谦有“郭筠仙先生西法画像序赞”，文中有云：“曾劼刚通侯自海外寄归英人石印先生画像，又九年为光绪十五年己丑，先谦始拜观于长沙。”或即此像了。劼刚为曾纪泽之字，他是光绪四年七月赴欧接郭嵩焘之任的，他寄回英人石印郭像约在光绪七八年之间。(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死于光绪十七年，年七十四；第二任公使曾纪泽，也是湖南人，曾国藩长子，光绪四年接郭任，十一年任满回国，十六年逝世，年仅五十二。纪泽努力学习英文，颇肯接受西洋文化，在英之声望远较郭嵩焘及后来的刘瑞芬、薛福成为高。纪泽的手书日记，近年台湾已影印行世。)

画像案的案情大抵如此，我们读上面所引的叙述，还未能完全明瞭它的真相，要知道它的起因和结果，除郭氏自己所写的日记外，重要的参考资料，自以当年英国那几家报纸和《申报》。可惜这些报纸现在没法可以看到(内地已影印《申报》全份，大概在

几年后香港或许有图书馆会购藏，届时方能参考。英国那几份报，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室也藏有)，如能参考，则记叙此案更可以获见全貌了。现在手上有一份最可靠的资料就是郭嵩焘日记，仍然可惜的是，他的日记所记也是零零星星的没系统的记事。现在只能节录他的日记来叙述一下。

郭嵩焘是正钦使，而副使则为广东南海人刘锡鸿(字云生)，郭在日记中记他种种构陷之事，头头是道，画师古得曼(与《上海闲话》的顾曼同一人)在英国报章的讪诲议论，也是由刘锡鸿捣鬼的，但刘锡鸿怎样从中捣鬼，又不见列举事例说明。

《上海闲话》谓当绘像之前，“郭又以不耐久坐，商之顾曼，可否先以照相作蓝本，顾应之，即于次日偕同马格里、顾曼赴照相馆拍照而回”云云。此事见于《日记》中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二月。日记云：

> 二月初一辛巳，为西历三月初四日。古得曼约为制一小像，因偕至罗甫安得费得非尔照相馆照一相为式。美利坚人番得尔威得，用电气照像，就便并一往照。(以下述电气照相之法，不录。)

使郭氏大为不悦而引起交涉的，则可于数月后的日记见之。八月十五日(此在巴黎兼任上)记云：

> 接到上海文报局六月廿八日，由法公司船递到八十七号包封，内总理衙门第廿七号信(六月十六日发)，并咨四件，合肥伯相咨一件(李鸿章伯爵，又大学士，故称伯相。平行机关行文叫作咨文，郭的官阶比李小得多，但郭是钦差，故

用咨。——引注)。并见《申报》载古得曼一段议论，意取讪诲而已。一切并由马格里关说。召问之，马格里勃然为之不平。生平积累浅薄，有大德于人则有孽报，刘锡鸿是也，有小德于人亦得小孽报，古得曼是也。此行多遭意外之陵侮，尤所茫然。……

《申报》载古得曼侮辱之言论内容如何，未见于日记中，使郭氏读后为之不欢者，似当如《上海闲话》所述之语，倘得光绪四年六月廿八日之《申报》，便可知其记载的内容了。八月廿四日日记云：

张听帆告言吴子让已物故，而吾以古得曼造谣生事，方寓书吴子让。至是始致黄泳清一书，属其转告《申报》局主事者。蹇运所值，无所而不颠沛，未知天意之所终极也。

郭氏拟托人向《申报》诘问，其结果将在以后各日日记中分见之，现在把郭氏受此事的困扰及其应付方法，见诸日记中者，分别摘出如次：

九月初九日。详阅六月廿日《申报》，由古得曼狂悖刺讥，以为笑乐，而《申报》既详载其言，又谓英国各种新报，于中国使臣多所诽刺，则亦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与所据何种新报以立言。住英国一年有余，实未闻有刺讥之意，而柏灵新报于刘锡鸿则时有之，而新报独未有一载，然则恐此段《申报》出自刘伯和之请托也。人心险恶岂有穷哉！

"新报"是当时一般人对报纸的通称，并不是外国有一家报馆叫《新报》，例如"柏灵新报"则泛言德国首都柏林的报纸而已。郭氏深怪《申报》单单译登英国报纸打趣他的文字，而柏林报纸讥刺刘锡鸿公使的文字甚多，未见《申报》译登，于是忆疑刘锡鸿在幕后捣鬼(光绪三年三月十七日，清廷调驻英副使刘锡鸿为驻德公使)。数日后，郭嵩焘写家信时，并寄黄泳清一函，请他往《申报》送致马格里、古得曼的谈话，叫《申报》根据两人的言论来更正六月二十日登载的谬误记事。

十一月十三日日记，……古得曼函示《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拉新报》，五月十七日实载有讽刺写相一段议论。马格里甫回苏格兰，古得曼即以见示，不独证其行踪之诡异，马格里于此相与朋比隐秘，亦可想见其大概。"喀尔立斯拉"似即古得曼之弟在此充司事者，其情尤不可恕也。

到了这时候，郭钦使连他的下属马格里都怀疑，以为他和古得曼联同一气来播弄他了，日记中的"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拉"即伦敦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古得曼之弟古丹，即在该报任职。

十二月十一日和廿二日的日记，都有记载与《申报》有关的事，各别录出：

十一日……黄泳清回马格里电报言："梅渣所载新报，出自"罗斯占宣斯代利纽斯"，译言中国新闻也。与前言"诿佛兰梅尔"新报，又属歧出，而皆无踪影。刘锡鸿诪张为幻，其力能播弄西洋人，奇离眩怪，鄙人蹇运，乃皆遇之，岂非冤苦！

郭氏出使英国至此已三年，清廷已派曾纪泽往继任，而曾氏亦将于十二月十二日到巴黎，郭交代后，可以解脱冤苦，不日亦将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辞行，率随员回国了。

十二月廿二日日记……接黎莼斋言，传示刘鹤伯致申报馆钱星伯一书，所言尚尽情事。而刘鹤伯以申报馆主笔为钱星伯，黄泳清又以主笔为沈宝山，大率主笔者当不止一人也。

奇怪的是刘、黄两人说《申报》的主笔为钱星伯(应作昕伯)、沈宝山而不及杨乃武，难道杨乃武乃在"主笔者当不止一人也"之内耶？大概杨乃武只是编辑，发新闻，有时也写些社论，而不是主笔名义。那时候中国的报纸尚属草创时代，组织与编制均极简单，总主笔亦兼总编辑，或总编辑兼总主笔是常有的事，直到二十年后，渐有改进，才略把职权分划清楚。至于杨乃武因何事而开罪郭钦使非去职不可，日记中无记载，只可存疑以待将来有材料始能说明了。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三月初五日，郭嵩焘到达上海，在吴淞口转乘招商局小轮登岸。初六日日记有云：

晚邀唐景星、黄泳清、张听帆、姚彦嘉及英人禧在明晚酌，以刘芝田见贻一席，彦嘉、听帆方谋为余致祝生日，便邀一谈。禧在明致领事达文波之意，告知《申报》馆梅渣于两次《申报》皆自承认，以为此游戏之文而已，无足深论。达文波告以君自游戏，一经按察司讯断，恐获罪非轻。梅渣一意

支吾。达文波之意，亦以为非经律师料理，未足以折其气。初嘱泳清邀陈辉廷令寓书梅渣，至是径须令律师为之。唐景星言达文波声名高出靳林，然余在伦敦曾与达文商办一事，知其笔墨见解并猥下，无异人处，靳林则所不能知也。然景星久与洋人交涉，所见必稍能得其真，不能不听从料理。非与梅渣论得失，但欲穷知造谣之源而已。

至此便欲以法律与《申报》周旋了。梅渣是《申报》老板。按：《申报》的创办人一向译称美查（FREDERICK MAJOR），与其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年）创办《申报》。唐景星为唐廷枢之字，是中国早期的洋务重要人物，其时方任招商局总办，禧在明（W.C.HILLIER 1849—1927）英国的外交官，初任驻华翻译学生，一八七九年任驻华副使，其后又任朝鲜总领事，光绪末年清廷聘为财政顾问官，著有《英汉字典》等书。达文波（ARTHUR DAVENPORT 1836—1916），久在上海任领事之职，一八八〇年至八五年一任天津领事，随即退休返国。旧日天津英租界有达文波路，就是用他的大名。

三月十八日记云：梅渣自知去岁六七两月所列画照、茶会二事，于西洋律应得科罪，邀求英领事达文波为之解脱，愿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其言以为误听谣传语多失实，在后访知颠末，歉仄莫名。并云，日报规则，凡纪述事实，以确访明查为第一要义，总当以此为念，不再有听谣言登报也。吾本无意深究梅渣，得其“误听谣言”一语，亦可以不加苛论矣。

二日后，禧在明、梅渣都登门拜见郭嵩焘，此案似已告结束，以事主不再深究，认为登报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等事发生，郭氏大概已满意，但杨乃武是否在解决此事之前已被解聘，则未可知。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草完

庚子年谈赛金花

今年的阴历年是庚子，六十年前的庚子是光绪廿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至今恰是一周甲。上一庚子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读历史的人大都知道，我不想在此时谈些国家大事，倒是庚子年大出风头的名妓赛金花不妨谈谈。她在庚子阴历八月以后，确实在社会上很活跃过几个月。她死到今已二十四周年，在庚子年来谈谈她在上一庚子的故事，也许颇为"应时"罢。

我现在写赛金花的故事，不像另外一些人所写的她怎样在庚子年结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怎样有义侠的行动，怎样功在国家，功在北京。我从我和她十余次会谈之后，知道她先后曾撒过大谎，后来并加以观察和考证，才知道她撒谎也大有原因的。事隔到今已廿六年，现在让我慢慢道来。

在廿八年前，人们久已忘记赛金花了，到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京沪的报纸忽然又登载她的名字，于是人们又纷纷说她的故事，友人张竞生在上海知道她生活困穷，便发起为她募捐。过了一年，在北京的刘半侬、郑颖孙、商鸿逵去访问她，想为她写一部《赛金花本事》，将版税所得，全部给她为养老之资。刘、商二人我不识，郑君却是好朋友，事后我问郑君，他说这部书未写成，刘半侬即逝世，后来似乎由商君续成。我虽然也曾买过一册，但久已失去。她死后，上海有家投机书商请几个才子急就成书，出版一册"赛金花故事"，无非从报纸上有关她的记事，全盘

照剪下来，倒也洋洋大观，封面还大标“清代纪实史料”，但内容芜杂非常，编者洪渊，字寄萍（大概是假名字），还在书后附以“改正年表（公历一八七四——一九三三）”，说她生于“同治十一年十月九日”，但同治十一年是公历一八七二年，她死于民国廿五年，是一九三六年，这个“编者洪寄萍”连这些小事都错误，可见其编辑能力。既然“年表”著她出生年月日，但著她死时一条则大书“民国二十五年，卒于平寓，享年六十五岁，葬陶然亭。”她搜集报纸登载赛金花死时的情形，但却不从其中考出她死于何月何日，只拢拢统统说她死了、何以只重其生年，而忽略其死日？这也可见其编辑之胡涂。（我的日记记载赛金花死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即阴历丙子年十月廿一日。）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我从报纸上读到有关赛金花的新闻，知她贫困，很为她不平，认为她有功于北京市民，现在北京人竟然忘记她，对她略不加以援助，未免太过健忘了。那时候我住在东城灯市口三十七号的北辰宫旅馆，主人全绍周为人很热心，我便对他说想发起同住的客人前往访问赛金花，捐些钱慰问她。全先生很赞成，教我先将她的故事写一节略，待他通知住客，愿意参加的签名。我立刻照办，并在文中声明，往访时，必定要送钱或礼物（最好是日用必需品如米面食物之类）。全先生已托《世界日报》访出赛金花住址，是天桥附近旧日香厂的居仁里十六号。到访问之日，参加者共有十一二人，我们雇了两部汽车前往。我在车中发觉携礼物的人不足十分之三四，我还以为不送礼的，也许送现钱，怎知大谬不然，这种人也有胆量参加，可见社会上自有些怪人也！

居仁里是一条陋巷，全先生拍十六号的门，主人立刻请进，众人因为我熟悉赛金花故事，推我做代表，我自然义不容辞，向

主人说明来意，并将我送她的白米、面粉两袋交给她，另一红信封，封了十块钱，我对她说，以后我每月帮忙她五元，这是两个月的“礼”，她千恩万谢收下了，连忙在房里拿出一盒名片，在座的人每人送一张，上印“魏赵灵飞”四字。我立即掏出手册，请她签名留为纪念。她是不大识字的，近年为了应付访问的人，也专练写“魏赵灵飞”，但这四个字的笔画极多(六十多画)，她写来极慢而且吃力，还要对住名片照写。单是这样的寒暄法，已去了半小时。

我不好意思初次见面一开口就问她和瓦德西的故事，因见她的名片冠夫姓，便问她有没有魏阜欧(名斯灵，字复瓯，又作阜欧，江西金溪县人，曾任国会议员)的遗像，她连说有有，站起来领我进去她的卧室，墙上挂有她和魏结婚所拍的相片一张，其时赛年已四十六七，看来似三十徐娘，并不怎样美丽，且又身体矮短，实在不合美人标准。魏则人极魁梧，据黄秋岳对我说，魏面目黧黑，亦老丑，赛盖赏识其另一种本领也。(关于魏的故事，林庚白的《孑楼随笔》有一段记之。林熟于民初政坛内幕，且曾屡次参加政治活动，故其所记大都可信。她说："李烈钧开府南昌时，赣人魏某绾度支，癸丑革命既挫，烈钧走海外，魏某囊括国帑以他适，其逾量则悉易黄金，南昌翠花街之金，为之一空。洎烈钧从军讨袁，觅魏某所在，从而贷行李之赀，魏某逆忆党人必非世凯敌，靳不应。索之急，则展转浼陈炯明以金镯一奉烈钧旅费。烈钧怒其贪而负义也，璧还之，笑语炯明曰：'为我告魏某，翠花街之金已尽耶？'洪宪颠覆，烈钧且再起。魏某又趋跄其门，谄媚如故，烈钧优容之。寻魏某纳老妓赛金花，以淫佚死，附会迷信者谓是负义之报。"考赛金花在一九一七年随魏到北京，正是袁死后之一年，庚白所记殊确，庚白是著名左倾的国民党员，他

这部笔记颇可一读。）

看过照片后，我才问她有没有在外国所拍的相片，她说有一些，但已在庚子年失去了。她提到庚子，我便趁势谈起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事，又问到她怎样遇着德国军队奸淫掳掠，怎样救了许多良民，一提到这些事，她好像是很高兴的，从她走难出京，事略定后回到北京起，一直谈到有几个德国军官敲她的大门找花姑娘止。这一大堆话足足讲了一个钟头。和她在报上发表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大概多是事实，否则不会如此前后吻合的。我问她是否和瓦德西同居仪鸾殿，她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她只见过瓦德西一两次，而且见面时间极短。因为有德军到她家里找花姑娘，听到她会讲德国话，大为诧异，第二天便带了两个军官来她家中谈天，但她的德国话讲得很坏，不能畅谈，又再找翻译，那些德国兵才知道她是十几年前中国驻德钦使的夫人。于是对她很是优礼，后来有个比较高级的军官就带她去见瓦德西。她这番话我认为是老实话，但也颇失望，因为我心目中早已认定她和那个德国统帅有风流韵事的，她在枕边一句话，德国军队就敛迹，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现在她说只是见见面而已，难道她害羞，不敢说真话么?

过了半个月，我又和一批女学生带了礼物去送给她，这次只坐了半个钟头。此后两个月内，我去找她谈天有好几次，每次都有礼物，她对我熟落了，彼此谈话多不带客套，她才对我说实实在在只见过瓦德西一次，和他绝没关系。我就指出上海《申报》的北平通信所记她对记者的谈话，其中有记者问她在皇宫住了几天，她答在仪鸾殿一共住了四个月，瓦德西走时，要带她回德国，她不肯，他又叫她随意取宫中宝物，她也不敢。我问她，难道这些话是她撒谎的吗？她微笑答道："可不是?"我说为什么要这

样呢？她答得很有道理，她说："新闻记者和读报的人都好奇，我对他们讲真话，他们不信，还疑我不肯说，我只好胡诌一些来打发他们。二来也可以博得一般人同情，帮帮我忙。像先生您既不是新闻界中人，我怎好对您说假话呢？"我才恍然明白她为什么要骗人的原因。

赛金花虽然在外国住过几年，但计算起来，在柏林的时间不过两年左右，洪钧是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五月初三日发表为驻德俄兼奥荷四国钦差大臣的，十六年归国，除来往行程三个月外，她随洪钧在柏林最多不过二年（因公使在驻在国轮流居住，以住德俄时间为多），以二年短短的时间，学到什么德国话？何况她又未经过德国人教授，怎能会讲话呢？公使馆里连厨子也是中国人，她何从学德语？即使学了些门面应酬话，十年后早已忘记净尽了，所以我敢说她的德语比这儿国际女郎的英语是差十万八千里的。她既不善德语，怎会和瓦德西调情来情呢？可见她说和瓦德西没关系，是老实话。她也否认与克林德碑有关系，也是真话。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申报》载她谈话，说克林德被杀，我国遐立碑纪念他，克妻还不肯罢休，赖赛金花劝告瓦德西，使向克妻三番解释，克妻才不再争持云云。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有"凌霄一士随笔"也引某报这段话，一士兄弟（这篇"随笔"是兄弟合写的，他们今日尚健存，数月前一士还有信给我，谈到病状）云：

> 此赛金花与克林德碑之关系也。而克林德碑之变为公理战胜坊，赛金花亦有可记者。民国七年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终，北京协约国方面之群众，狂欢之余，毁克林德碑。翌年，中国政府以碑石改建公理战胜坊于中央公园，昭参战之

绩，庆战胜之荣也。落成之日，举行盛典，演说者大都作称心满意之谈，盖以强横若德国，陵侮我国已久，今我国竟仗公理之力，居战胜之列，积年国耻，遂得湔雪，其为荣也至矣。时赛金花为国会议员魏斯灵妻，自请演说，则纵论世界大势，而谓中国苟不自强，此不过几块石头搬家耳，乌足以言雪耻？语颇警辟，闻者叹异。(友人张次溪最好事，赛金花死后，他和北京人士设法葬之于陶然亭畔，并请其师杨云史作《灵飞墓诗碣》。次溪的《北京闻见录》也有一段记她在中央公园演说的一番伟论，与一士兄弟所引某报所记者同，今不具录。)

赛金花能说这些话，是令人佩服的，但据她对《申报》记者谈话而刊在《赛金花故事》一书者，则完全与此相反。今录之于此：

问：近来有人又请你演说乎？答：我一生最怕演说。……我还记得欧战和平纪念会，老段(引注：指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也)率众位大官，在东城上街上，拆下那块克林碑(引注：应作克林德碑)、我当日同着魏老爷去参观，他问我为什么不说两句话，你与此碑有关系呢。我即断然拒其演说之情，仅取回红花一朵，存我箱中，作为纪念。问：你与此碑的关系如何？答：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不妥，即因克林夫人要求太苛，仅仅立一石碑，她不答应，我乃从中拉拢，对她说，此碑在中国，只有皇帝家能立，平民是不许的……克林夫人经我这一说，始慨然允诺。……

一家报纸说她在演说时发伟论惊人，而另一家则说她并没有演

说，但“功在国家”(即说服克林德夫人)则一。到底我们信哪一个才好呢？其实尽不可信。克林德夫人无论如何都是当日西欧一贵妇，她肯接见一个贱妓赛金花听其劝告否？即使肯的话，也要赛金花能操极流利的文雅德语，舌灿莲花，方能感动克夫人，绝不能假力于译人的，赛金花办得到吗？世人不察，以为她住过柏林几年，便精通德语，必定是她劝服克夫人了，天下哪有这般容易的事！现居台北的齐如山先生，今年八十六岁了，一九五三年他出版一部《齐如山随笔》，其中《关于赛金花》一章，说到他偶然在瀛台见到赛金花和两个军官，齐如山同赛谈话，又远远看见瓦德西跟站岗的兵说话，这两个军官露出不安之色，其中一个说瓦不会进来的，后来瓦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都不敢见瓦，所以齐如山测度她没有见过，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暂，至于委身于瓦，那是绝对不会有的。齐如山又说到他在那时候做些买卖，碰到赛也办些货，交给德军的粮台总管，赛求齐向那个总管翻译(因齐乃同文馆德文科毕业生)，讲些好话，请他照收了。假如赛的德语讲得通，又是瓦的身边儿得宠的人，她还不直指着那个总管的鼻头，喝他全部收下么？齐如山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可以断定赛以前所说的全是谎言，我极同意他的说法。在庚子年与赛打交道的人，今日生存者恐怕只有齐如山了，所以他的话是值得参考的。杨云史所作的《灵飞事迹》也说到李鸿章绝没有托赛金花之事，杨说，和议时，他父子两人都在鸿章幕中，如果有这些事，总会知道的。

关于赛金花“功在国家”的事情说得太多了，我现在想引两段非常罕见的文字，谈谈赛金花在庚子失势后入狱的情形。首先摘录陈恒庆的《归里清谭》(陈氏是山东潍县人，为清末名御史，此书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上海小说丛报社印行，封面标“谏书

稀庵笔记”，而误署作者为陈庆泩。其实陈恒庆别名“谏书稀庵主人”，书中所叙行事宦历，皆无不相合，与广东籍御史陈庆泩绝无关系，今为正之。）于此，以助读者兴趣。

（赛）于是声名籍甚，车马盈门矣。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余因得识面焉。初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庚子岁，拳匪起……德国元戎瓦达西者，为八国统领，原与金花相识，一旦相逢，重续旧好，凡都人大户，被洋兵骚扰者，求金花一言可立解，以此得贿巨万。洋兵既退，其名益振，人皆称为赛二爷，门前榜曰候选曹寓，曹盖金花之本姓也。家蓄雏妓四五人，以代其劳，终日安居楼上，非有多金贵客，不下楼一见也。夜与同梦者，多紫缰黄绊而至，群呼楼上为椒房焉。其性残忍，一雏妓为其笞死，瘗之楼后，为人控告。时余正巡视中城，委指挥赵孝愚持票往传。至其家，有娘姨数人婉言进二千金，放其逃走。赵指挥本为安丘富绅，不允其请。又诡云：“夜间被窃，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挥将饬城役往购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车至城署。五城御史多与相识，不敢堂讯。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满一汉两司员鞫之。上堂时，满员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视曰：“三爷。你还恫喝我？独不念一宵之情乎？”满员乃由后堂鼠窜。汉司员正人也，谛视其貌久之，心怦怦动，旁有供录者，笔落于地。司刑隶手软不能持锁。司员乃叹曰：“此祸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后患。”此语传出，诸要路通函说项者，纷至沓来，坚请贷其一死。乃定为误伤人命，充发三千里，编管黑龙江，而说项者又至矣。乃改发上海。余闻之笑曰：“蛤蟆送入

湿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复委赵指挥押登火车，送至良乡县，县官恭迎于车站，告赵指挥曰：“下官敬备燕席，为二君洗尘。”乃同入县署，赏名花，饮佳醴。翌日赵指挥回城覆命，余曰：东坡有句云：“使君莫忘霅溪女，阳关一曲断肠声。当为君咏之。”近闻金花已物故，年不过四十也。

所记很有趣，描写其艳冶之处使见之者手软笔落，虽形容未免过火，但不如是不足以见其动人。所谓“相府”，乃恒庆之伯祖陈官俊之旧第也。官俊官至协办大学士，算是宰相。作者谓金花已物故。其实那时候她正和魏阜欧同居北京，下一年在上海结婚。

另一材料是一首写赛金花在狱中的诗。作者吉同钧陕西韩城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她入狱时，同钧正以主事署提牢，其《乐素堂诗存》有癸卯（光绪廿九年）作《狱中观妓赛金花感赋》五古一首，并有小序，今分别录下：

……庚子之变，联军入都，德督瓦某，僭居西苑，金花以能操德语，前往迎近，瓦见而狎焉。瓦好杀，居民苦之，金花为缓颊，多获宥者，由是名倾一时，知与不知皆仰慕之，洋人至影其像以相夸异。其动人欣羡类如此。今夏以毙小婢逮入狱，人皆指为淫报，而怜香惜玉者流，又复群相惋惜，替花请命。嗟嗟！人各有心，憎花者固为方领矩步之俦，而怜花者亦不尽倚翠偎红之辈，其用情皆未可厚非也。余久耳其名，观其像未目睹其容，今闻定谳，拟递籍，行有日矣。窃谓薛涛苏小，好事者想象其美，至于累牍连篇，相与歌咏于数百年后，今绝世名媛，近在咫尺，而不一睹芳

容，讵非憾事？适代署提牢，入狱察诸囚，次及花，果然丽出肌表，虽秋娘已老，犹娇娆如处子，（引注：赛金花是年三十二岁，其入狱在光绪廿九年夏，坊间出版的《赛金花故事》所附的年表，作光绪三十一年，大误。）洵天生尤物哉！见余遥屈一膝似有乞怜意。夫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一入陷阱之中，摇尾而求食，赛金花当得意时，非达官贵人不得一接芳泽，及幽身圜扉，虽以余之卑老，犹若贴耳俯首，望其救援，岂不重可惜哉！诗曰：京都多名妓，艳说赛金花。车马门如市，宾客列坐嘉。争求识一面，声价高云霞。腰乏十万贯，徒抱虚愿赊。一朝入囹圄，阴院黑云遮。妖星临贯索，泪雨湿荷枷。乞怜犬摇尾，束缚兔罹罝。我署提牢职，放饭趁晚衙。鸡鹜群争食，一鹤静不哗。见我屈一膝，请安礼有加。涂泽去脂粉，艳如碧桃葩。小蛮腰肢细，杨柳新吐芽。花甲年逾半，犹如初破瓜。含情羞掩面，犹似抱琵琶。谛视未了了，忽被禁卒拿。须臾双扉阖，深琐不可挝。归来思不寐，深夜趺坐跏。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九日

名妓赛金花的状元丈夫

清末名妓赛金花的故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三十年前中华书局所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卷四，记赛金花出使趣事一则，事很有趣，但不大可靠。书中没有注明来源，似乎是录自蒋芷济的《都门识小录》，今摘钞于此。

> 洪钧简俄德奥荷钦使，纳名妓傅彩云，携之航海，路出伦敦，英皇请公使夫人赴宴，傅盛妆而往。维多利亚颇加青眼，曾用电摄法与之合留小影。故樊云门方伯增祥“倩云曲”（应作“彩”——引注）中有句云：“可怜坤媪山河貌，曾与杨枝一例看！”缪祐孙江阴人，派往出洋游历者也，洪要之俾充参赞。一日，由俄赴奥，公使夫人上火车，参赞随员俱须站班伺候。缪曰：“此班诸君能站，我不能站！”于是一倡百和，纷然各散。事后洪衔之刺骨，五年期满，不为保举。缪往俄京游历，不为咨照，缪大恚。时洪画帕米尔界，有侵溢处，缪著书立说，尽情攻击，自是劾洪者日凡三四起，洪以是抑郁而亡。……

这个说法，除了缪祐孙果有其人而外，类多不可靠。祐孙字幼丞，荃孙的从兄弟行，他在光绪十五年跟洪钧出国时，还向李慈铭索画为纪念。他在俄国三年，著有《通俄道里表》（刊小方壶斋

舆地丛钞），这部书的价值如何，我不敢说，因未见过。至于洪钧画帕米尔界有侵溢处云云，其实此图非洪所画，而是洪所译画，根据俄人之原本也。他所画的，一为《中俄交界图》，是光绪初年俄人所制图的原本，洪钧译绘后，携之归国，用色印，共三十五幅。一九三四年，北京平民社重印，亦三十五幅，但合为一幅。一为《帕米尔山水形势图附说》，今存外交部，是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洪钧在俄使任内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此图未见印本，不久后，帕米尔争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劾洪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致边事日棘，劾其贻误大局。清廷下其事于总理衙门研究。同官皆言洪钧所译之图，本来是以备考核，并非用来做证据的，也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译绘，安能归咎于此图？清廷乃置不问。

其实劾洪钧者只有大理寺少卿延茂及左庶子准良而已，并无"劾洪者日三四起"之事。洪钧以状元出身，平素留心史地之学，著有《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光绪廿三年出版，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也有刊本。此书是他在俄国时所译关于蒙古史西方所传资料，以补元史所佚，在史学中有极大贡献。

李鸿章时主外交，常与洪钧通讯，每致书洪钧，皆备极称许。关于注元史一事，鸿章给他的信有云：

> 近闻博徵西事，以注元史，元太祖用兵西域，最为奇伟，开国既无方略可徵，明初史臣，识限方隅，又不能详具本末，遂令后之读史者如堕云雾，如谈鬼神。近代龚魏（引注：龚定庵，魏默深）诸贤，奋然有志于考索，而未能广致域外之书。前数年，有黄楙材者，著《西徼纪闻》（案：楙材字豪伯，上高人，熟于舆地之学，官至知县，著舆地测量书

十余种），亦颇能言当时兵事大略，惜足迹仅至印度而止，且亦出于潜行窥测，正有类于前人所论张骞常惠情形，自难详审。今执事以辅轩大使，徵海国异书，遂使六百年阙略茫昧之遗编，粲然可睹，且因此上溯汉唐旧史，亦各按籍可稽。若使前贤有知，当复如何惊羡？此非绝代通博之才，而值今日开通之会，是岂易言？执事成此盛业，何止突过晓汀（案：钱大昕），卑视仲约（李文田）而已。

对于洪钧的著述，极为称赞。《清史稿》洪钧传也说他"嗜学，通经史，尝撰元史译文证补，取材域外，时论称之"云云，可见其学问一斑，因为清代百多个状元中，能讲实学者不过数人，洪钧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元史译文证补》，影响很大，出版后，东西洋研究元史的学者如法国的伯希和，汉比斯（L.Hambis 伯希和的弟子）；德国的葛鲁贝（W.Grube），苏联的郭真（S. A. Kozin），日本的小林高四郎，白鸟库吉；我国的历史学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君精于元史，陈寅恪还精通蒙古文、德文）等人，无不案头置有此书，以备参考。

洪钧早死赛金花四十多年，她的名字到今日还为人所知，但一代的史学家洪钧，只为少数研究专门学问的人所称述，而在一般人的口头上他还要得力于赛金花，才被人搬上舞台，写入小说；他死后还要藉名妓之力，才能在流俗人口中传名，这是洪状元生前万万料不到的。

洪钧事迹，《清史稿》有传，很容易看到，但他的墓志铭两种则不易见。现在我将钞录所得，摘要披露，使洪钧本人整个事迹都易于为人考究，也是历史资料也。第一种墓志，是台湾道顾肇熙撰文，吴郁生书丹，汪鸣銮篆盖（吴汪皆洪钧翰林后辈）。文云：

国家自道光二十二年始允泰西通商之请，阅二十年乃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又十年而后遣使聘问诸国，慎简贤能，颁给钦差出使大臣关防，三年一任，盖递重其事矣。同县洪公，以阁学奉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迁兵部侍郎，任满归，奏对称旨，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疾终京邸。遗疏上，天子震悼，有“才猷练达，学问优长，尽心职守，办理妥协”之褒，谕赐祭葬，赏延后嗣，饰终之典，视常例有加。孤子洛既奉公之柩归里，乃邮状抵余台湾，言将以明年九月某日葬公于县之西乡十一都十二图爆字墟，赠光禄公茔次，请为之铭……按状：公讳钧，字陶士，号文卿，先世自徽州歙县迁吴。曾祖讳士树，候选运同，妣王、李。祖讳启立，国学生，妣巴。考讳垣，候选从九品，妣潘，三世皆以公贵，诰赠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年十八入吴县学，同治三年，举于乡，七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凡八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光绪九年也。以母病，疏请开缺归，明年丁太夫人忧。服除，以原官充出使大臣，转兵部左侍郎。一为顺天乡试同考官，视湖北江西学各一，典陕西山东试各一。……公性孝友，幼颖异。家道中落，父兄欲令习贾，涕泣跪请卒业。……自廷试第一，未散馆即视学湖北，感激知遇，锐志报国。属司文柄，简阅精审，惟恐失人。光绪五年主山东试，人文为各省冠。六年视学江西。……九年河决山东，朝廷命侍郎游百川驰往筹度，议开徒骇、马颊二河。公奏其未谙河务。……臬司潘骏文熟悉河务，新获谴，无敢举者，力言其可用。疏入，旋命游百川回京，起用潘骏

文，河患渐纾，实自公发之。……出使外洋，廉正自持，守约不挠。……中外交涉繁要，多以电通信，外国用三马电，中国用四马电，费倍蓰，公创以干支代一十百千字，亦成三马电，岁省经费钜万。其精敏类如此。既入总理衙门，力持大体，勇于任事。淞江教案起，西人获谤书，牵涉湖南道员某，欲得甘心，当路亦思重惩，以儆效尤。公持不可，谓徇人意，如国体何，其人卒得保全，……向者使还，道经红海，感受暑湿，病伏甚深，一旦触发，遂以不起。……公生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五。配何夫人。子一，洛，县学廪生，复由荫生通判改工部郎中。……女一，庶出。公之使海外也，于俄罗斯见元代旧史本回纥文，凡更数译，审为元代藩属旧史，详于西北用兵。公得之甚喜，谓足补元史疏陋，于是徧考元人官私书及关系元史诸记载，手自纂辑，成元史拾遗若干卷。搜异域之佚闻，订中国之惇史，古未尝有也。铭曰："昔班固氏传西域，慨叹汉使益得职，惟公三年历四国。平迁一官依品秩，明修元史病荒率，史臣自贡惮考核。鄂罗斯文本回纥，纪朔漠事颇翔实，公既覼止等球璧。私幸谋于野则获，爰召舌人通累译，手自濡染奋大笔。俾阙者完疏者密，千秋裘非一狐腋，彼楮先生何足述。武库乃有左传癖，旁行斜上成都帙，宜进史宬藏石室。千秋不朽视方策，吾铭匪私秘真宅。"

我们读这篇墓志铭后，知道洪钧有一子，名洛，又有一女，是庶出，但侍妾姓什么，文中没有说明。照例铭文中有提到他的妻子姓何，提到庶出之女时，应该也说"女某某，侧室某氏出"才对，而竟然绝口不提，大概此妾即下堂而去的赛金花，而此女即在柏

林所生的“德官”耶?(赛金花对新闻记者说她在柏林诞一女，名德官。)铭辞中的“千秋裘非一狐腋”，原文“秋”字是“金”字，吴郁生书写时误作“秋”字，遂不可读。据闻刻上石后才发觉，但已经来不及修改了，这在金石史中成一趣事。(光绪廿六年庚子夏，同和修撰在北京为先祖写神道碑，“宦游四方”的宦字，误写作宧字，遂不成辞，刻成后墨拓视之，才知大误。后一字与宦字音义皆不近，只形似耳。吴郁生事可谓后相辉映。)

洪洛之死，在光绪二十年，后来洪钧之孙改葬洪钧，又请其乡后辈费念慈(光绪间名翰林)作墓志铭，今录后与上文合看。文云:

> 兵部左侍郎洪公既葬西津桥之逾月，公子洛以毁卒。其后二年，孙枭始克改卜于大滚山之麓，奉公之柩而迁焉。……俄罗斯为国，古乌孙地也，公求得古元时旧史所载记，皆畏吾文，译归以校史，多所勘正。成元史译文证补若干卷。既殁，陆祭酒师为校写付梓。……子洛……不胜丧而卒，妇陆，事祖姑疾，夜起积寒痹，闻公凶问，惊哭遽绝，今并祔于公墓。洛无子，何夫人命以公从子涛之子枭为之后。念慈与涛同举于乡。……

我们读后，知洪钧只一子，子死，以任洪涛之子洪枭为子。他的遗著《元史译文证补》，是陆润庠校写付印的，洪洛是陆润庠的女婿。顾撰的志文说到洪钧保全湖南道员某，没有举其名，费氏志文说这个道台名周汉。

洪钧的著作，除上举《元史译文证补》外，似乎还有一种未完成的作品，其详细内容今不可知。李鸿章给他的信有云:“执事拟

就西国大政，照中国六曹分门荟萃成书，此真有用巨编，不朽盛业。近述日本政治者，如黄遵宪、顾厚焜等，各有成书，然蕞尔之国，网罗易详，且系同文，则钞集尚多原本。若欧西大邦，取材浩博，又无一处不借资翻译，固非通晓今古而又有大力者不能也。”又云：“近闻槃敦余闲，殚精著述。曩者采风之使，每多排日之编，然皆叙次行程，略同游记，未有网罗大政，汇集成书如尊著所拟义例之宏大者。蔚宗六夷之精思，端明海外之奇作，摩挲老眼，以待异书，犹能效王胜之徧读一过也。”

可惜洪钧此书未能问世，内容不知如何，是否比其他出使者所记大有不同，值得李鸿章这样钦佩。照我忖测，洪钧大概有此雄心，已定下了“义例”，在外国写未完就中止，甚至还没有下笔呢。其实即使著成，恐怕也没有《元史译文证补》那样具有价值，不写也罢。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

钓鱼台岛属盛宣怀？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香港有几家报纸登载病死台湾的一个已入美国籍而又是国大代的消息。据说，死者名叫徐逸，是盛宣怀的孙女，原名盛毓真，因为童年时送给徐淑希为女，故改姓徐。本来死掉了一个国大代是惹不起我写文章兴头的，不过这个徐女士既是美国人，又能做台湾的国大代，已是一奇，何况她又是“钓鱼台岛主人盛宣怀之孙女”（香港某报的标题），那更引起我搦管作文的“雅兴”了。

某报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载泛亚社台北二日电讯说：“徐逸女士因癌于一月廿二日病逝台北。”又说：“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颁发诏书，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等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此项诏书一直由徐女士保管。徐女士为上海持志大学毕业……”云云。

慈禧太后把钓鱼台赏给盛宣怀为产业，的确是有趣的事。中国自秦汉以后，甚少以疆土赐予臣僚，清初赏给有功的如吴三桂、尚可喜之流，也不过封以王爵，就食于南疆，未闻以云南、广东，赐予为产业。慈禧太后手笔之大，的确比她的祖宗慷慨万万！

过了十多天，二月二十日的华侨日报登台北廿六日电讯一则，因为此事有趣，不得不录之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已取到钓鱼台领土主权之最重要证件，此证件亦即为中共欲以七十万美元欲购买而不能得者。保存该件之……徐逸女士病逝以前，已将钓鱼台诏书献给政府，作为政府在交涉钓鱼台时之重要证据。……去年徐女士旅居纽约时，即患癌症，自知不起，乃决定回台疗养。她在纽约时，中共人员欲以七十万美元购买诏书，但为徐女士峻拒。……不久，徐即返回台北，入荣民医院治疗。她在住院期间，与枢机主教于斌、国大秘书长陈建中、调查局长沈之岳等商讨，决定将诏书献给蒋经国院长，作为日后交涉钓鱼台主权之证物。其唯一条件为在该岛收回后，国家确有收益时，请政府以百分之五十之收益，设置盛宣怀奖学金，于斌……等同意此一作法。十二月十三日，在于斌枢机见证下，将所有文件及呈献书点交国大秘书长陈建中，并在病榻上签字。

徐逸在死前还念念不忘钓鱼台的主权，这一点很值得称赞，尤其是她已入了美国籍的一个中国妇女。她不惜以钓鱼台"私产"的注册契据慷慨送给蒋经国，还附有条件，又是念念不忘她的祖父盛宣怀，这都是极有趣的新闻，不过盛宣怀死而有知，对于"奖学金"一旦能成为事实，他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他会问，当他在世之日，几时接受过慈禧太后赏给他的钓鱼台？恐怕他临咽最后一口气时，还不知有此"殊荣"呢。盛宣怀一生以贪污积聚了大笔财产，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死后五十年他的子孙还嫌他的遗产不够丰厚，硬要同他添多几个小岛，真是有趣得很！

慈禧太后以钓鱼台赐给盛宣怀，和一九七二年美国文士艾温伪造侯活·晓士授权为他写传记一事，堪称双绝。一九七二年台

湾的铿事，无逾于此者矣。

一九七二年春，某君从台湾回香港，约我吃中饭。其时正当钓鱼台主权闹到天翻地覆之际。某君说，钓鱼台主权，台湾已有了证据，证明它确属于中国。我说，钓鱼台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还待台湾去找证据？某君说，这证据是新近发现的，慈禧太后把钓鱼台赏给盛宣怀，有诏书可以证明，他曾见过这个诏书的。

这事有些古怪，有关盛宣怀的文字，我看得不少了，竟未见有此记载，就问某君诏书是怎样子的。他拿出台湾出版的一本刊物，其中有那诏书的影印本。“诏书”开头一句是：“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云云。我看了大笑，对某君说，这是假东西，作伪的人非常低能，略懂得典章、制度的人，一看便知是靠不住的了。

现在且把徐逸捐赠给台湾那件“诏书”，录其全文于此，再来详细一谈。

> 皇大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

原来是西太后有病，盛宣怀进献自制药丸，使她服后“甚有效验”，就慷国家之慨，以三个小岛赏给盛宣怀，我们听惯了西太后打败仗，始而割辽东半岛，交涉后改割台湾给予“外夷”，想不到还有以三个小岛赏给“家奴”之举，而且这个“家奴”只不过略

有微功，而赏赐则逾乎格外，西太后手笔之阔，可见一斑。

一九七二、七三年，钓鱼台属盛家"产业"的问题，在台湾、美国也曾喧哗过一阵，甚至香港也有些报刊宣传这件事，东南亚有些报纸也不甘后人。现在且抄西贡出版的《成功日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五日的社论给读者参考。

钓鱼台的主权问题，最近又发生新的争论：其一是台湾省政府把它划归宜兰管辖，日本政府却提出抗议。……另一是，一位美籍华人主妇，向美国国会申请该岛的业权，谓那是前清慈禧太后御赐乃祖成庆伟(即盛宣怀)的遗产。……成庆伟的女孙徐守(徐逸)太太……近已向美国国会申请钓鱼台的土地要求，而获得批准。这事，还是"中间杀出一个程咬金"。依常识判断，该美籍华妇谓钓鱼台为慈禧太后赐给她的先祖成庆伟的物业，似不是虚构。那末，既然如此，钓鱼台岛即该美籍华妇徐守的所有物，对吗？似又不见得。……第一，依历史惯例，灭亡的王朝，一切完了，慈禧太后的钦命，到了民国，当然无效。……如所周知，清朝与列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生前曾大声疾呼；之后，列强也自动取消了。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尚且废除，何有于御赐的土地？倘若王朝的赏赐可以世袭享用，而至于无穷，则封建制度遗留的土地权，至今还有效了。第二，退一步说，假使当时成庆伟获赐该岛土地之后，而行使业权，在岛上作种种的经营。那末，代代相传，到现在还是成家产业，当无疑义。……倘无行使业权的事实证据，当然不能凭一纸前清"御赐"证件而申请管业。第三，就我国的律例言……亡朝的律例不能沿用于民国。……根据上举各点所谓成氏妇人申请

钓鱼台岛的土地权，似乎过于天真。……（按：徐逸说慈禧以钓鱼台赐给她的祖父盛宣怀，何以《成功日报》说成是咸庆伟，或译音之故？笔者附注）

该报没有辨明"御赐证件"的真伪，诚为美中不足，因为如果是真的，则历史上的确有此事发生；伪的，则徐逸就犯有伪造文件之嫌了。

香港的《新闻天地》周刊，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载纽约航讯一则，可见美国也曾有人对此事叫嚣过一阵，虽然为时甚短，倒也吱吱喳喳，颇为热闹过一时。现在摘录如下：

关于钓鱼台的所有权……曾有过争论。各报章杂志也有过片断的记载。美国的华裔参议员邝友良，去年冬在国会作证时，也透露过钓鱼台的所有权属于一位美国华裔公民葛丽丝·徐。但从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见过葛丽丝·徐，也从没有一位记者从葛丽丝·徐手中，获得第一手资料。本报记者穷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纽约访到了这位持有钓鱼台所有权状的"葛丽丝·徐"，她就是徐逸女士，也就是清朝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孙女盛毓真。徐逸女士……经常来往于台北与纽约之间。以下便是本刊访问徐逸女士的报道。……徐女士告诉本刊记者说（按：她所说的大部分和"诏书"所说的大同小异，不再重抄，现在只摘她的话小部分）……钓鱼台岛上盛产海芙蓉，而海芙蓉是她家所特制的风湿药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药。……徐女士……她因长期居留美国，并具有美国国籍，所以她也是有双重国籍的华裔美国公民。因此在钓鱼台争执发生后，她曾默默的聘请律师向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备案，要求美国承认她对钓鱼台的所有权。不久以前，她并向中华民国有关当局就她的所有权问题备案。徐女士在接见记者时，展示清朝西太后给她祖父盛宣怀的诏书，以及她父亲盛恩颐给她的两封信，记录钓鱼台地图的影印本。那两封信中，说明西太后赏赐钓鱼台的经过。

从前有个朋友对我说，徐逸的哥哥在日本东京开设酒楼，他听说徐逸手上有这样的一件“诏书”，笑不可仰，他说：据他所知，当时的太监向盛宣怀敲诈一笔钱，曾派人对盛宣怀说，太后打算以某地赐给他为食邑，如果他要此事成功，就要拿出若干银钱来打点。盛答，待见过诏书之后才拿钱出来，现在只能先付五千两，送给他们喝点酒。不久后，有太监拿了诏书给盛宣怀看，盛知道是假传圣旨，就没有答应了。据说，这是在日本的盛毓度所说的。

太监串同行骗盛宣怀，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一定不会说是以钓鱼台荒岛赐给他的话，因为当日清廷的满朝文武，能知海外有钓鱼台者几人，就是执政诸公如翁同龢、李鸿藻之流，也未必留意到，他们只知北京近郊有个钓鱼台的风景胜地，其中有乾隆行宫，宜于游览而已，太监就更不知有此荒岛了。（北京西南郊有玉渊潭，一九五〇年后改为玉渊潭公园。金代诗人王郁在潭东筑一座假山、莲池、亭榭的住宅，每日除了吟诗作画以外，就手持一竿在潭边、池边钓鱼，因此人们就称这一带为钓鱼台，已有七百余年历史。）

伪造“御赐证件”的人简直是个旅包，他们对于清代的官制、典章，一点都不事先考查一下，一开头就弄出天大的笑话，只要略懂清代掌故的人，便知是赝品了。“诏书”开头第一句称盛宣怀

为“太常寺正卿”，太常寺是管理祭祀事宜的衙门，它的长官称为“太常寺卿”、“太常寺少卿”，满汉皆一人，少卿的官阶比卿低一级。寺与六部为平行机构，不过寺在体制上低一些，是个清闲的衙门，闲曹，不能与六部比。六部的长官为尚书、侍郎，尚书从一品，侍郎正二品；卿有正三品的，也有正四品的，不划一；少卿有正四品的，从五品的。只有太常寺大理寺的卿是正三品，少卿正四品。盛宣怀于“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十月，接受“钓鱼台之赐”，“诏书”上明明说他是“太常寺正卿”。但太常寺，并无“正卿”这个名目。况且光绪十九年的时候，盛宣怀做的是天津海关道（道即道员，俗称道台）兼海关监督，是外官而非京官。作伪的人连这一层最容易查考的事都没注意到，可见其低能。

现在不妨把盛宣怀的宦历略说一下。他在光绪十八年实授天津海关道，光绪廿二年，王文韶、张之洞联合奏请设置铁路公司，并保荐盛宣怀为督办，光绪帝命盛宣怀陛见，九月十三日，盛觐见皇帝，对于筑路、练兵等洋务，大谈特谈。（其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王文韶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失去直督地盘，盛宣怀骤失靠山，道员一缺，朝不保夕，幸而继任人乃王文韶，盛和他也有关系，盛宣怀的父亲当王文韶在湖北任监司时已是老友，所以盛的地位得以不动，光绪廿二年，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路无法维持，拟改商办，找盛宣怀到武昌商量承办事宜，用意是要盛为他弥缝亏空，盛趁此机会向张提出组织公司，经营卢汉铁路，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合拍，于是由张、王二人合奏，保盛为督办。

盛宣怀觐见后，九月十四日即下谕旨，命盛宣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他的本官是道台，开去四品道员之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官阶虽然相等，但体制上，道员不

如京堂之崇（凡是“卿”字辈的官，皆称京堂，亦称京卿），盛宣怀做了十多年道员，至此才有资格直接上奏谢恩、言事。（平时升官有谢恩摺皆由督抚代为转奏，因道员体制较卑也。）

现在试检《愚斋存稿》卷一，奏疏一，第一道奏疏就是“候补四品京堂督办铁路谢恩摺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疏文摘抄如下：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钦此！闻命自天，悚惶无地。……谨恭摺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本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盛宣怀候补了不过一个多月，就补上了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之缺，即上摺谢恩云：

窃臣于九月二十八日陛辞……本月十二日行抵天津，与直隶督臣面商诸务，正拟附轮赴沪，恭阅邸钞，本月二十四日奉朱笔，盛宣怀补授太常寺少卿，钦此！……（亦见《愚斋存稿》。此书是盛死后，其家人收集他生前的文件，请人编为一书。宣怀号愚斋，故以为名。）

自从光绪廿二年九月以后，他是京卿，是当朝大臣了，便不时有奏疏直达御前。我们要记清楚，他之得太常寺少卿是光绪廿二年十月的事，何以会在光绪十九年十月，西太后直接下一道“慈谕”封他为“太常寺正卿”，并以三小岛赐之采药？（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盛宣怀由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少卿，廿六年十一月补宗人府府丞，廿八年一月授工部左侍郎，廿九年八月赏加

尚书衔。他一生中从未做过"卿"，何来"正卿"之称）作伪的人，连盛家子弟所编的《愚斋存稿》都不参考，而盛老四之女毓真，对于乃祖生平宦历和叔伯们所述的祖父"行述"，毫不措意，至死还认为"御赐之物"乃如假包换的真古董，亦太可怜矣！

徐逸的父亲盛恩颐（沪人称老四，他娶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女，但毓真非她所生）有两封给她的信，说明钓鱼台之赐的原因，简直满纸谎言，企图用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他第一信说：

毓真吾儿知悉……台湾海外有三岛……虽属荒岛，然盛产药草，当年吾家全盛时，在烟台、沪、常三处，设有广仁堂施诊给药之用，诏书犹在家中。（"远近知名"以下至"犹在家中"各字，多不清晰，姑以意为之。——引者），并有图说，兹寄汝，望汝能设法前往一看，但如有危险则不可往。……泽臣手示，三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手示二字之下、三十六年之上，盖"盛恩颐印"朱文印一方。）

第二封信说：

毓真吾儿知之……清太医院隶属于太常寺，杏荪公以广仁堂之关系，蒙太后恩赏太常寺正衔，太常寺正为太常之属官，其时杏荪公本职已为头品顶戴、直隶津关道兼海关监督、出使大臣，官阶远高于太常寺正矣。此为杏荪公之轶事，汝曹宜知之。泽臣手示，卅七年十月廿二日。（按：卅七年即一九四八年。仍盖"盛恩颐印"。父亲写信给女儿，不写"父字"或"父谕"，而写别号，并加盖名印，这也是一件奇事。）

盛恩颐既是宦家子弟，而对于他已死的老子宦历和当时的官制，竟然会胡说八道一通。他说甚么“太医院隶属于太常寺”，简直是以意为之，大概因为这两个政府机构都有个“太”字在前头，就死拉活扯，把太医院扯到太常寺脚下，硬要它属于盛宣怀所做“正卿”的太常寺之下，真是随使瞎说。又说甚么他的父亲已得“太常寺正”，真是语无伦次。他拿这些话来说给他的女儿听，还可以骗骗她欢喜一时，而这个徐女士也胆敢拿这些胡说八道的信件来支持她的“管业权”，也是可笑的。清代官制，太常寺和太医院是两个不相统属的机构，它是平行的，太常寺的最高长官称“卿”；太医院最高长官称“院使”。不过当时的人多轻视太医院、钦天监这一类衙门，目之为方技，故不为人重视。其实这两个机构都是讲科学的，其实用之处，比之拜神祀祖的太常寺高出万万，而皆为人所轻，也可见当日不重科学一斑。盛老四又说津海关道官阶高过“太常寺正卿”，更是不知所谓！太常寺卿是京官，其矜贵远非道员所及的。

盛宣怀死后，他的子孙请人作了一篇“行述”，文长万言，内容大都根据死者做官时各项文件，按年月编撰的。《愚斋存稿》首先刊载神道碑、墓志铭，继之以行述。现在试检查行述所载，光绪十年（一八九〇年）至十九年间，并没有盛宣怀进呈“特效药”为西太后治疾的事，更没有光绪十九年十月西太后赐予钓鱼台的事。如果真有赐钓鱼台之事，行述中一定会大书特书的，因为这种“殊荣”为清代二百余年所未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它镇压太平天国，使清王朝转危为安，所得的封赏，不过是空头的侯、伯、子、男等爵位，连公都吝而不予，实官无非是大学士、总督等类而已。何以盛宣怀所进的“灵药”，能治疗她的风湿，她

就要把国家的土地轻赐一姓？就算她真有风湿之症，而盛的药果然能医治好她，也不过赏他高一级官职，或赐以珍物，增其荣宠而已，何至作此破天荒之举？我们试打开《愚斋存稿》刊载的，有"赏袍褂料、普洱茶谢恩摺"、"赏暑药谢恩摺"、"办赈蒙匾额谢恩摺"等文件，赏茶、赏衣料、赏暑药、赏匾额，在"天家"的赏赐中，是件芝麻绿豆的小事，中外臣工，有不少可以得到这种普通恩典的。盛宣怀拜领这种普通恩典，都要感激流涕，谢恩一番，反而"钓鱼台三岛之赐"，有类裂土而封，赏逾例外，盛宣怀何以辜恩至此，简直没有一摺恭谢天恩，真是有负皇太后的一片心意了！

当徐逸女士在台北"展览"她的"管业权证件"时，台湾的钱复，在某宴会中报告钓鱼台事件经过，没有一句提到徐女士手上那块"王牌"。于是有个人忍不住问他，他说见是见过的，但认为靠不住。理由是：一、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已归政，如果她要赏盛宣怀小岛，应由皇帝下诏；二、根据"大清会典"，没有"太常寺正卿"这个名称。

那个人（听说是香港一个谈掌故的专家）不服钱君的说法，提出一些反证，说甚么西太后被这种"特效药"治愈风湿，高兴非常，便不理会办手续，直接下一道"慈谕"，有何不可？又说些什么"太常寺卿"笔误为"太常寺正卿"等话来支持他的论据。可惜钱某当时无法抽身去检查盛宣怀的"行述"和《德宗景皇帝实录》。如果一查，便可以查出盛宣怀授太常寺少卿，是光绪廿二年的事，当光绪十九年他"进药"时，官职不过是道员而已。（其实盛宣怀晋京秩，正如陈夔龙所撰的神道碑说的以少卿"清秩遥领，总揽四政"，仍在京外做他的道员去办洋务，从未在京师的太常寺堂官上办过一事。

那个质问钱复的某君，说西太后是个“不正常”的人，此君似乎未曾深入研究过西太后执政四十年的行事，他大概以为西太后是个权力欲很大的人，随时可以凭个人喜欢而破格赏赐。此说是可以分开来讲的，她的行事，略可分为公私两类，在私生活方面，她喜欢游乐，这可不谈(其实她也是人，应该有娱乐和假期的，何况她从来就未有过“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荒怠行为呢)。在政务方面，她颇有才干，对于封官赐爵，也很有分寸，不滥用国家名器。当时的人议论她吝于封赏的，例如曾国藩讨平太平天国，她不肯封曾为郡王(传说咸丰帝生前曾说过，谁能消灭洪秀全势力，就封为王爵)，还千斟万酌最后才封曾为一等侯，连公爵都靳而不予。

又在光绪二十年，有个富人愿报效巨款充军饷(其时中日交战)，捐个知府过过官瘾。军机处拟把此人派往广东，这种特旨知府，到后不必候补，带缺上任的。名单开上时，她便问这人从未做过官，忽然给他做起亲民的知府，一定不能胜任，你们小心察看他一下，如可造就成为国家人材，就减收报效，赏他一个道员罢(道员官四品，知府从四品，体制上比知府高一些，是监司大员)。以钱买官，本非好事，但她不肯以亲民之官落在一个毫无行政经验之人手上，宁可给一个体制略崇的道员予报效的人。使得当时不满意她的朝臣，也大为赞服。

我还可以举一个和她有病有关的例子，来证明封赏的手笔并不怎样阔绰。光绪六年她大病一场，到下一年六月才脱险境，再调理一年左右，才完全复原。光绪八年十二月，由皇帝下谕旨，赏赐各医官，谕云：

慈禧皇太后深宫侍养，朝夕起居，上年六月间已报大

安，犹未如常康复，年余以来，随时调摄，现在慈躬已臻全愈，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庆幸。道员薛福辰、知府汪守正，与太医院院判庄守和等……所拟方剂，敬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以示奖叙。薛福辰着赏加头品顶带，调补直隶通永道；汪守正着赏加二品顶戴，调补直隶天津府知府。……(见《光绪朝东华录》)

薛福辰是李鸿章等人保荐入宫治病的，他们辛苦了三年，才挽回西太后垂危的性命，但仍以道员、知府调补，只不过各加头品、二品顶带而已。(道员、知府是实职，顶带不过虚衔)她不会因为薛、汪二人医好了她就"不正常"起来，把个出产白术的于潜县赐给薛福辰，以报救命之恩。(西太后病时，曾命浙江巡抚刘秉璋搜购白术，经过大力寻访，也没有陈年硕大的，后来还是向胡庆余堂药店，分让一些出来，亦见《东华录》。但她也没有念胡雪岩之功，赐以产术著名的天台县。)

封建帝王生病吃药，内廷都有详细记录的，太医院就是皇室的医院和药房。皇帝有病，召那个太医切脉，服那个太医所开的方，都纪录在案的。当一个太医拟好一方，要整个太医院的太医开会研究，然后由王公大臣参加意见，才把药方呈览。决定用那个方子后，才交御药房配药。每一服药要配两剂，一同倒进药锅里煎。煎好后，还未能给皇帝服用，仍要经过一番手续，太医院要详细登记谁开的方子，谁经手配药、煎药，日子、时刻，一一纪录在案，经内务府大臣们过目，署名其上。之后，召集开药方的太医、配药的人齐集在一处，将煎好的药分倒两碗，一碗给病皇帝，另一碗由这几个人分尝，证明没有古怪。

皇帝到底是皇帝，不愧为人上人，连吃碗药都这样搞到鸡犬

不宁。试想他吃自己御医开的方子，自己药房配的药，尚且如此，有那个胆大包天的大臣肯冒万死一生之险，进贡特效药给万人之上的人去服食？药物不是随便可服的，万一发生副作用，这个责任谁负得起？休说盛宣怀是个"疏逖小臣"的道员，就是当时系人望的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国家重臣，即有良药也不敢轻于进呈(保荐医生，乃系应诏，责由医生全负，干系尚小)。现在假定盛宣怀在光绪十九年做着天津道时，进风湿特效药给西太后，依照制度，要经由他的上司李鸿章为他转奏，政府收到李的奏摺后，必定下诏命将特效药的配方进呈，交太医院会同王公大臣研究，如认为不妨一试，就叫几个患风湿的人来试服，然后又召盛宣怀亲自到内廷，当着一班大臣面前，试服他的特效药，经证明没有不良影响后，才定下日子召盛宣怀入宫，把他所进的特效药，盛吃一半，西太后吃一半。

风湿症是一种慢性病，到今日还未有特效药可以收治疗之效。"海芙蓉"到底是甚么东西，治风湿有效，恐怕葛丽丝·徐还不知其详。据制造笑话的这批人所说，西太后的病是钓鱼台所产的"灵药"医好，而使得她欢喜非常，把国家岛屿赏给盛宣怀。有这样的"灵药"，太医院必定登录入册，保存起来的。太医院的档案，我没法可以检查，但太医院收藏的配方却有一本，是旧日在清宫供职的段旭晨在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年)，请太医院书吏照原书抄录的。其中关于膏丹丸散部分，其底方藏在清宫的寿药房，是光绪五至三十二年十二月集成的，内容与《总管丸散膏丹底方》大致相同，同仁堂出品的底方也收在内。段旭晨在二十年前把这抄本送给河北省卫生厅。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校此书，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我翻遍此书，不见有甚么"海芙蓉"为风湿症特效药的记载，也许有人会说"漏抄"了，

当然也有可能，但未免太巧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四日重写

李滋然救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被通缉以前，也发生过一件小小的文字狱，几乎被革去举人．甚至有被斩之虞，这件事的经过颇为曲折，世人知者不多，而为康、梁年谱所忽略的。现在照我所知的详述于此。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三十七岁一条所载：

> 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为也。以电文"伯熙"二字误作"伯翙"，徐花农疑为褚伯约之误也。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粤城谤不可闻。

康有为自言如此．他说梁启超在北京奔走于沈曾植、盛昱等人之间，请其营救。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上册第二十二页说："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学伪经考为余晋珊、安维峻等参劾，那时候先生在京，多方奔走，结束只是奉两广总督谕令，自行焚毁。（其详见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及翼教丛编卷二。）"梁谱所说也很简略。康所说的陈景华贿褚成博奏劾，也不尽可信。

陈景华是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一八八八年）举人，是科正副主考为恽彦彬、褚成博（褚有曾孙某君，十五年前已来香港，今仍服务某报）。褚成博为人很有正义感，不是金钱所能动的。两广总督李瀚章（鸿章胞兄）谕令康祖诒毁去《新学伪经考》实出其本意，瀚章指派准补电白县李滋然查办此案，滋然呈覆，请"免予销毁"的，瀚章老于官场，认为对言官方面也要给点面子，免使他们生气又再兴风作浪，所以令康祖诒自行毁板，李滋然是有大恩于康有为的。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到广州省亲，隔壁住的是表兄陈殿臣（他是光绪廿九年举人，香港富商，又是太平绅士。一九三三年破产后，回到广州居住）。我们的两所房子兴建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当时殿臣只二十岁左右，在广州求学，两家的尊长派他就近督工。殿臣和我谈到李滋然保全康有为功名性命的经过，据他说先君对此事也尽了一些棉力。原来我家的大厦筑成入火之日，先君也请他的同年李滋然饮宴。（李是四川长寿县人，王湘绮尊经书院的高足，戊子中举人，下一年成进士，以即用知县派往广东，是为光绪十五年。是年秋间乡试，滋然奉派为房考官，梁启超、李家驹出其房，称李为房师。梁士诒亦以此科中式，出平远县知县陈绍棠房。到光绪十九年乡试，康有为中式，梁士诒之父知鉴亦中式，出李滋然房。二梁之考试故事有此因缘也。）客散后，先君独留李滋然夜谈。李谈及奉命查办康祖诒事。先君就对他说，闻说康的学问很好，是广东的有数读书人，请李滋然为广东留多一粒读书种子。李说他本有此意，今经老同年这样一说，他更应为康祖诒洗脱了。殿臣说，以上这一番话是戊戌后先君对他所说的，从未对他人说过。现在我把御史劾康祖诒一案的前前后后写出来。

光绪十九年秋康祖诒中了举人（康中举后，不肯认座师房师，

所以他的年谱中没有说房师为谁，梁谱也没有说李滋然是梁的房师），下一年甲午入京会试，因足疾临时回广东，到光绪廿一年乙未才中进士。如果他在光绪二十年被革去举人，也许就没有乙未公车上书一事，如果他被正法，也许更没有戊戌政变一事了。甲午七月，御史安维峻奏请毁禁康祖诒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有云："康祖诒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从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又说："六经训词深厚，道理完醇，刘歆之文章，具有汉书，非但不能窃取，而实无一语近似。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等诸梼杌浑敦之族。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过之无不及也。"末后谓："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安维峻原摺措语甚重，他不但要烧毁康有为的书，还要请光绪帝下令诛其人，若李瀚章不替他洗脱，火上加油，列举康祖诒种种离经畔道之实迹，大兴文字之狱，康必被革斥，即不正法，也许会永远坐牢的了。李瀚章复奏，文末谓："揆诸立言之体，未免乖违，原其好学之心，尚非离畔。其书于经义无所发明，学人弗尚，坊肆不鬻。即其自课生徒，亦皆专攻举业，并不以是相授受，虽刊不行，将自澌灭。似不至惑世诬民，伤坏士习。惟本非有用之书，既被参奏，奉旨饬查，自未便听其留存。臣已札行地方官，谕令自行销毁，以免物

议。至该举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责以非圣无法，拟请无庸置议。”一场大风波，被李瀚章轻描淡写平息了。军机处寄谕李氏的文中，本有“革办”字样，如果他兴风作浪，康有为殆矣！

瀚章奉到军机处的寄谕后，即派李滋然查办，其指令有“迅赴坊间调取康祖诒新学伪经考一书，有无离经畔道等情，详悉查核，分别签明禀覆，以凭革办。”这个“革办”字样，就是李氏根据北京的寄谕而来的。李滋然本是四川人，以外省人而来暗中查办此案，人地生疏，未必能详知实情。但这件案子有关学术问题，李滋然邃于经学，精骈体文，家学渊源，为光绪朝名进士，他著有《周礼古学考》十一卷（宣统元年排印本），《四书朱子集注古义笺》六卷（光绪年排印本），《群经纲纪考》十六卷（宣统年在日本铅字排印本），《四库全书书目表四卷，附未收书目表一卷》（北京京华印书局排印本）。他的父亲李曾白也是研究经学有素的，著有《尔雅旧注考证》二卷未成，由滋然补考，在光绪年间刻成。（曾白似系殉难职官，李滋然得到个云骑尉世职的。俟再考。）李瀚章派他“详悉查核”，自然胜任愉快的。滋然查后签覆略云：

遵即亲赴书坊，调取新学伪经考一书，详加查核。此书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诘刘歆增窜六经为主，自命为二千年未有之卓识，全书据援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人，洵可称坚苦卓绝。但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反诬为古人所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今就全书详加校阅，有不可据者十条，签帖原文，恭呈大鉴。其立论虽主诋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畔道，则全书并无实证。伏读圣朝功令，文人著书立说，其有诋毁程朱，显违御案者，则应亟行毁板，不可听其刊行，

如毛奇龄《四书改错》之类是也。若汉魏诸儒，门户是非，从古水火，今文古文，排击聚讼，自汉迄今，实难数指，国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尚书古微》，皆攻古文尚书之伪；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万斯大之《春秋随笔》，攻左传之伪者也；魏源之诗古微，攻毛诗之伪者也。诸书皆经儒臣先后奏请或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或采入正续《皇清经解》。虽提要所标详，不无疵议，而圣朝宽大，类皆纠其误而存其书。该举人"伪经考"不过就各家所说，折衷己意而推阐之，细考全篇罅漏甚多，虽自命甚高，而著论无坚朴不破之才，立说乏灏博周匝之笔，故刊板已行，而信之者少。若遽目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特该举人罪不至此，即取全书之词义以观，亦断不能到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之一境。即其书具存，亦不过一二门徒互相标榜而已。至谓其能煽惑后进，靡然向风，如是书之前后乖违，自相矛盾，尚未有此学力也。至该举人以长素为字，已自童年，因其行一，故为长，粤中士人久知之，盖取文选陶征士诔"长实素心"之语，非谓长于素王也。又遍查全书，录称门人姓字者不一，实无"超回""轶赐"等语，殆系外间诋毁哗笑之言。谨据见闻所及，详为述呈，可否免予销毁之处，恭候宪裁。

李瀚章的覆奏，就是根据李滋然这一签复增减而成的。疏上，康祖诒的一场文字风波就平息了。关于康有为门徒中有"超回""轶赐"这种名字，市井所传已久，故御史摭拾入诸章奏，即后来李伯元写《文明小史》说部，也有这些名字，以"超回"影射梁启超。（启超死于一九二九年，上海一个文人王均卿，雅善联语，作联

八首挽之，其第五云："铁赐超问，数遍康门人材，晚节克全终，草堂中尊此为弟子三千班首；变法蒙难，记否满廷后诏，淫威纵大肆，蓬岛外购不到我公十万生头。"王氏名文濡，吴兴人，南社名士也。）戊戌后，康有为不用长素为字，改字更生，以记念重生之意，到一九一七年复辟失败，又再改字更甡，则令人齿冷矣。

滋然久官广东，先后为电白、曲江、揭阳、顺德知县。光绪三十年任曲江知县，下车未久，即考试观风，其告示以骈文出之，友人刘君筱云，方在曲江授徒，尚记其中数语，日昨为余诵之云："铁马金戈，碧血痛先人之烈……嗣驱帝京之马，珥笔蓬山……"结句云："共勉前修，好树十年之木。特示。"可见他对于地方的文化很重视，但后来任顺德县，却被总督岑春煊劾他办学不力，奏参革职。（所谓"观风"，是旧日地方官到任后，欲知当地的文化水准如何，来一次考试之谓也。滋然曲江观风题，刘君尚记得有《曲江冈赋》(古体)，《九成台怀古》(七古)，《拟卢同月蚀诗》，《岭南新乐府三十章》，《明乐府三十章》等题。附记于此，以存地方文献及李君轶事云。）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十月，他的门生李家驹为驻日公使，用他为随员，不久获起用，赏县丞。宣统登位，皇帝要读书了，滋然进呈他所著的那几种书，得旨褒奖，赏主事衔，以学部小京官用。辛亥后，滋然不愿出仕，回到故乡，祝发自号采薇僧。以遗老自待，著有《采薇僧集》，民国初年刻于四川。滋然字命三，他的门人都称他为命三先生，死于何时我不大清楚，因为香港没有四川的老辈文人可以询问。

此案的经过情形大抵如此。假使李滋然是个风尘俗吏，不爱重读书人，自可在其查办后的覆呈中竭力说康有为的坏话，至少康也革去举人，大则失去生命，非梁启超等人在京营救所能为力

的。因为清廷查办外省案件，大都根据当地的大吏报告为准，案情重大的才派钦差前往查办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康有为的大弟子韩文举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为三十四岁，在广州长兴里开万木草堂，韩文举称弟子就在这一年。韩文举是番禺古坝乡人，字孔庵，号树园。少时有大志，他去拜见康有为之时，将他的旧作《主静立人极说》为贽，大谈他的治学方法。康有为读完他的大文之后，见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志气不可一世，便故意不肯收他做学生，将他挫折一下，经过数次会谈，对他了解得多了，康才答应他拜门。

康有为的大弟子中，自以梁启超(他早韩文举一年拜师的)的成就为最大，变化也最多，若以做学问的功夫来说，在精湛与深度方面，梁似乎还不及韩。韩文举专门治经，致力礼记，又研究庄子，皆有心得。据他晚年对人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大部分是出于门弟子编集之力，而出力最多的就是他。可惜韩文举经过戊戌政变一役之后，也因党祸逃往日本，从此便心灰意懒，不想做志士，而愿肥遁自甘做个隐士，一任梁启超飞黄腾达，在学术界出尽风头，他宁愿在广州、在香港教几个小孩子念书，世人竟然不知道社会中还有一个万木草堂的大弟子存在，他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死于香港，享年八十一岁，他在享寿这方面为康梁所不及。

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在湖南省城设时务学堂，聘梁启超担任总教习，康有为推

荐韩文举担任分教。据他的门人伍学韬所作的《韩树园先师事略》说：

> ……创时务学堂，复主讲席暨湘学报笔政，开湘省新学之风，一时俊杰如蔡锷、李炳寰(李号虎村，同唐烈士死庚子汉口之难)，范源濂辈皆出门下。戊戌政变，遭遇党锢，东渡日本，执教横滨大同学校，兼主清议报、新民丛报笔政。……光绪某年举应经济特科，不赴。旋与张学璟漫游南洋群岛，谋植实业，不果成，归粤任南强公学校长。辛亥国变，南强被民军霸占，员生散四方，师则走香港。迨袁世凯、黎元洪执政，迭使征聘，不顾也。中山大学亦曾两度聘任教授，均辞弗就，乃设馆羊城西觉是草堂三年，就馆三水麦氏(在羊城)，防城杨氏(在香港)者各数年。……师毕生致力宋明理学，先儒学案，恒不释手，尚名节，甘淡薄，笃于师友之谊，而能济人急……四十前著作甚丰，散见时务报……新民丛报，惜无可搜集。尝心仪王猛为人，以“扪虱谈虎客”笔名，著近世史若干卷，《舟车醒睡录》一卷，亦久经散佚(韬案：《舟车醒睡录》是述遗闻轶事，此两书在光绪末年上海广智书局曾印行，广智歇业后，韬迭询诸前辈及同门，均无有庋存者。)……四十后绝不为文。……

所述可略见其为人。他用笔名所写的那部“近世史”，其实就是“中国近代秘史”，后来似乎在中华书局重印，分平装与洋装二种，我都买有。此书述清代遗闻佚事，多道听途说之词，不足据为典要，大概他是拙于史学的。因为这部书殊无参考价值，我早已遗弃在上海，不常带在身边，但三十年前好谈秘闻掌故的文

人，却奉之如圣经，大加利用呢。

辛亥后，梁启超在政界上红极一时，他的心爱门生蔡锷又是革命伟人，韩文举对他们绝不有所干求，他的门生范源濂做教育总长，知道乃师淡于名利，也不敢请他出山，只请他到北京游玩。他欣然就道，到京后，住在任公家中，范氏执礼甚恭，请他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拒绝了。他为什么要拒绝，我不十分了解。他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南下回故乡了。后来蔡锷在云南起义，派人送信和路费请他入滇，他也拒绝，好像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一般。不知是否他冷眼见民国那班伟人都不是东西，以不参加政治为妙。到一九一七年康有为贸贸然跟着张勋搞复辟，他满以为这个大弟子必会跟着他去成此"大业"的了，但韩文举大事不胡涂，他对老师说："老师尝受德宗景皇帝知遇大恩，去参加大事，自然是义不容辞，若弟子久居江湖，无心魏阙，希望以后做个寻常百姓，以终天年就够了。"他早瞧出复辟把戏必不成功，但又不好扫老师的兴，只好说出这一番消极的话，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韩文举在广州教书时，与词人陈洵（字述叔，新会人，中山大学教授）比邻而居。述叔生平最憎厌康有为，认为这个"圣人"的言行大有问题，但对韩文举却极爱重，韩比陈大五岁（陈死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六日，年七十二岁，时任汪伪政府的广东大学教授），两人交谊极笃，述叔常在家中置酒邀他共饮，韩的酒量极大，陈往往对他大力抨击康有为种种不对之处，韩被酒笑曰："吾师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德，因此他的行事，不免有时不尽满人意。"述叔也笑道："无圣人之德，而有圣人之才，所谓盗跖耳，安可取！"韩文举无辞以对，一笑置之。据他的一个忘年之交的知友说，韩对康有为极不满意的，只因师生关系，不便表示，偶在酒后，常常露出此意。康死后，他有一联挽之，外间极少

见，今录之："以无究竟为究竟，易占未济；观不一身如一身，礼正大同。"

韩文举的太太早他二十多年死去，因此他对于治生便一筹莫展，家中有几亩薄田，租给本家耕种，田佃欺他是读书秀才，一向不理他，后来田佃因耕牛事和人家打起官司，上门求救，他才托朋友找官府说人情，把事情了结。当事急之时，他急到要死，想不出办法，还是一个三十未到的青年朋友替他拉官场路线才办妥的。他死后二年，有人收集他的遗诗，刊于香港，他虽不是诗人，但中多愤郁苍凉之音，时杂俚语，也说玄理，不求工也。但这一卷诗，就好过他所作的什么秘史那些不足观的书了。

熊润桐是韩文举的忘年交，韩死时，熊有联寄挽，在数十字中颇能括死者行迳，生者哀伤之意，录之以殿吾文。联云："大道叹犹龙，可用可藏，历历河山凭再造；豪怀想扪虱，孰成孰败，沉沉风雨有同悲。"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俞曲园轶事

新加坡某君致函连士升先生，托他写信来香港问我：俞曲园先生因何事革职，请我将这件事告知他。因为这件事非数言可了，我作书覆士升先生，把此事的经过大略说一下，并答应他另写一篇较详细的文字，以备某君及读者们参考。

俞曲园先生是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一八五〇年）进士，受知于曾国藩，得以留馆授职编修。咸丰五年简放河南学政。七年（一八五七年），御史曹登庸劾他出题割裂，革职。这是曲园先生被革去翰林院编修的原因。他因为出题割裂，以致蹭蹬终身，（若非如此，则他不致"拼命著书"了。因为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等皆有密切关系，如果不因此事，做一品大员似乎并不难。）我就得将他出题割裂的事说一下。

什么叫做"出题割裂"呢？原来自明朝以来，有些学政考试生童，生怕他们抄袭前人的文字，故意把题目割开，将上句最末一字或一句，与下句最先一字或一句连合起来成为一题目。例如《孟子》一书的《告子篇》有句云："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割裂时则为《十尺汤》。这样可以窘士子的文思。

相传曲园先生在河南所出的题目很有趣。《论语》邦君之妻一章，有"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之句。接着下一章是阳货章，有"阳货欲见孔子"之句。曲园先生出《君夫人阳货欲》为题。这是以上章末句割"君夫人"三字，下章首句割"阳货欲"三字成为一题。

这无异是说鲁国的权臣阳货欲君夫人，这未免太过荒谬，而且也有侮弄"圣人"之嫌，曲园先生学行醇洁，必不致如此。此题恐怕是人家附会他的。

又传他二题是割裂《孟子》的。齐人伐燕章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之句，曲园先生出《王速出令反》为题。又滕文公问四章有"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之句，他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为题，他割下句"我"字连上句成一题。这两题如果曲解之，可说是"国王出令叫人民造反"，及"虽然无君但有我在"。这也是荒谬绝伦的题目。据说曲园先生出这样的题目后，自行检举，才得到较轻的处分，若在雍正乾隆文网森严之世，至低限度，也得问斩的。

何以曲园先生出这样古怪的题目呢？据传他对人家说：河南学政衙门，向有狐仙，历任学政到任时，都要拜它。曲园先生不信，当然不去祭狐仙了。怎知仙人责他不敬，在他出题考试生童时，大施法术，使他神不守舍，出了这样的古怪题目。如果曲园先生真的这样说过，大概就是他的解嘲之词，诿过于狐仙了。后来他所作的笔记，有不少谈玄说怪的，尤其是那部《右台仙馆笔记》更多神怪之事。

曲园先生革职后十三年，又连累了一个浙江学政徐树铭，相传后来先生的曾孙俞陛云(即俞平伯先生之父)得点探花，又靠徐树铭之力，是则俞徐两家有这种关系，实为同光间两个学者有趣的事情。

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是道光廿七年翰林，早曲园先生一科，自入翰林后，飞黄腾达，后来却因曲园先生而迟滞了数十年。其事的经过颇可一述。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徐树铭在浙江学政任内，奏请将已

革编修俞樾赏还原衔，听候录用，谕旨斥以“俞樾前于咸丰年间在河南学政任内，因出题割裂，荒谬已极，奉旨革职之员，何得擅请录用？……徐树铭着交部严加议处！”是年十二月廿一日，部议降四级调用，不准抵销。

徐树铭以礼部左侍郎任学政，侍郎是正二品官，降四级调用就变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了，要升回去二品，也要相当时日的，到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后，他的门生翁同龢渐渐有了势力，照顾老师，他在光绪十五年才升工部右侍郎，廿五年再升工部尚书，不久即逝世。

曲园先生听说徐树铭因保举他而致降职，有函致其同年谢晋云：（谢晋字晋斋，号孟余，又号梦渔，江苏仪征人，庚戌探花，官至户科掌印给事中。）

> 顷阅邸抄，乃知有徐寿蘅侍郎之疏，虽承其拳拳之爱，然多事极矣！弟著书足以自娱……倘不知者谓寿翁此疏，实鄙人怂恿之，则冤矣冤矣！

光绪廿四年戊戌会试，徐树铭以左都御史（从一品官）充殿试读卷大臣。老辈相传，他的读卷大臣名次第三，照例他可以推荐探花的。恰值曲园先生之孙俞陛云应试，树铭便取陛云做探花，以消一下三十年前的冤气，亦所以报老友也。但这科的读卷大臣名次是：昆冈、绵文、阿克丹、徐树铭。徐树铭名次在第四。前三人皆满人，昆冈是同治元年的翰林，是树铭的后辈，绵文是光绪九年翰林。科场最重前辈，树铭立心要中俞陛云而向这两个后辈力争，没有不成功的。

光绪廿八年（一九〇二年），曲园先生以乡举重逢，清廷赏还

他的原官，准他赴鹿鸣筵宴，到后来他又光复旧物，已非徐树铭所及知了。西太后在三十年前不肯开复他的原官，还要加罪于人，但这时候，曲园先生已成为海内大儒，这个“人情”，她要做的。曲园先生死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年八十六岁，若活到九十岁，他就可以重宴恩荣，又再升官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是一个翰林，他晚年的遭遇很不好，给鲁迅先生的影响甚大。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一书，第三十一"介孚公"一段，对他的祖父有这样的写法（遐寿是周作人先生的化名）：

> 介孚公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这里还是散馆就外放，弄不大清楚，须得查家谱，但据平步青说，他考了就预备卷铺盖，说反正至少是个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翰林外放知县，在前清叫作老虎班，是顶靠硬的，得缺容易。……

介孚是周福清的号，他的字叫震生，（从前读书人的习惯往往一名一字，一号，甚至有外号。他字叫震生，是根据他考试时所填的履历的，是朱汝珍所辑的《词林辑略》一书）并不是光绪辛未翰林，而是同治辛未科的翰林。辛未是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光绪是没有辛未纪年的。

周福清于同治十三年四月散馆（即毕业试，此举关系极大，能留馆者，授职为编修，检讨，就是一个资格齐全的翰林；不能留馆者，以部曹、知县用，从此逐出翰林院，但庶吉士头衔仍

在，俗称半个翰林，也叫“散坏馆”。）以知县录用，并未授职编修，周遐寿先生记错了。近日曹聚仁先生写鲁迅年谱，引用《鲁迅的故家》这一段，但没有照周遐寿先生的原文，只摘取“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这几句，而把“这里还是散馆就外放，弄不大清楚”略去了。周先生有这最后一句，全文自然没有毛病，曹先先略去了这一句，就是点毛病了。因为凡是授职的翰林，没有外放知县的。翰林留馆，编修官七品，在院供职，为清华之选，大考后开坊，升学士，外放可为知府，道员，转眼间，可至监司，十余年间，官运亨通者，可至巡抚、总督，所以翰林出仕，大占便宜。同治十三年翰林散馆，浙江籍庶吉士十人，只有周福清改知县，金保泰（钱唐人，字燮瀚，官至太常寺少卿）改吏部主事。

翰林改官知县，俗称老虎班，正式名称是“即选知县”，应选县缺，等这班“老虎”选完后、剩下来的才归别班选，所以得缺最速。周福清选的荣昌县，嫌远不去，大概他没有向吏部“打点”所以才得到此缺，但此缺并不坏，只是远一点而已。到光绪元年正月，他选得江西金溪县了。《越缦堂日记》正月二十二日记云：

> 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言金溪刻书甚贱，可任剞劂之事。此人能为此言盖窥予所好也。予因属其购王氏谟所著书。

于此，我们可知周福清在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正二月出京赴任的，他何时被劾去职，俟考。但光绪五年二月廿六日《越缦堂日记》有云：

周福清来，以金溪令被劾入都引见者。

那末，他被劾去官，当是光绪四年的事，他大概先回乡一转才入北京的。李慈铭和周福清是同乡，李比周大九岁，周比李中进士早九年，但李慈铭的名气极大，周福清到北京是要去拜候他的。他们虽同是绍兴县城人，但从李氏日记中，看出他们两人是不十分投契的。

光绪五年以后，周福清一直在北京等候机会（中间有无回故乡，未可知），他很少和李慈铭来往，李氏和同乡征逐，也很少有他的份儿，大概周福清的家境很不好，不能和他们时常交际。到光绪十年以后，李氏的日记中常记与周福清来往，但不是“乡人周福清”，而是称他的号“介夫”“介甫”了（从不书介孚）。

周福清到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才补内阁中书的。是年四月初十日，《越缦堂日记》云：

下午诣周介夫，贺其中书补缺。（六月廿六日，又记云：“作书致周介夫，馈以西瓜十枚，林檎鱼干各一合”。以后两人的交情更洽，越缦时亦请他吃饭了。）

《鲁迅的故家》第八十三页说到周福清在北京于同乡中与吴介唐、鲍敦夫似还要好，王子献不大谈得来。遐寿先生说到他读王继香日记，光绪十六年那一册，七月十一日记云：“周介孚柬招十三日饮。”十三日记云：“久之，始至广和居，则周介夫（原文如此）果已与客饮。”周福清的号是可以给朋友随便写的（名则不可，否则是不敬了），因为“夫”“甫”同音也。这个王继香是会稽人，光绪十五年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开封知府。

关于周福清为几个亲友通关节而入狱事，《鲁迅的故家》第八十五页，写得很有趣。光绪十九年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副考官周锡恩是不错的（周遐寿先生仿佛记得副主考是郁昆云云，那是不会的，主考只有二人）。书中说周福清派跟班徐福送一万银子的期票到主考船上，恰值副主考也在坐，因此拆穿了西洋镜，周福清后来以此入狱。但我所知的可作补充，徐福送银子到船上时，苏州府知府王仁堪（光绪三年状元）也在坐，殷如璋知道不能瞒，又因为王仁堪为人正直，与其他官员不同，就连人与信交给苏州府办理。大概周福清事先与殷如璋有接头过的，只要自己亲自送银子去，就不致戳穿了。殷如璋本是鄙夫，李慈铭骂他不值一文，日记中称他为无赖殷如獐的。

殷如璋，周锡恩这次主持浙江乡试（是科为恩科，因为明年甲午，乃西太后六十寿辰，要开恩科，就得在上一年举行乡试），试毕，舆论哗然，有谑者集句嘲之云："殷鉴不远，周德既衰。"很是天然配合。又有人拿正副两主考姓名作拆字联嘲之，也很工整有趣，此联当日曾刊在上海的报纸上，小说家李伯元把它集起来，收入他的《南亭四话》（一九二五年大东书局排印）卷七里面，联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瞶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赚金钱。"可见他们两人实在是要通关节的，到事情掩不住，才打官话罢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再谈周福清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再读周遐寿的《鲁迅的故家》，一时高兴，写了一篇《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写成后，没有什么地方好发表，发泄了创作欲之后，便也不十分爱惜的搁在抽屉里，一直到十二月才寄去某报，在是年十二月廿四日刊登出来。

我当日写那篇文章，纯是读书后偶有所触，并不顾虑到手头的参考资料少，仅凭一点点可靠的材料就动笔了。那篇文发表后，我才后悔，为什么不找找《光绪朝东华录》参考一下呢，也许里面可以找到有关周福清的材料的。于是偷个空，到学海书楼找到了，花了半天功夫，得到四段资料，大喜过望，同时又怪自己偷懒，为什么不准备好一些才动笔。我把《东华录》那些记载读一遍后，因为文长数千言，实在没法抄回来，只好将来再说，同时又打算再写那篇文章的补篇时，才到学海书楼写，可以省许多抄录的功夫。

回家后，我又认为单是靠《东华录》还是不够的，最好能设法获得同治十年辛未会试同年齿录，那就可以知得更清楚些了。于是写信去上海托一位朋友买《东华录》，又知道友人瞿兑之（宣颖）先生的尊人瞿子玖（鸿禨）先生是这一科的翰林，兑之先生家中一定还存有这科的会试齿录的。写信给兑之先生请他找找那部书，如果有，就请他将周福清那一部分全替我抄出来。但瞿先生复信说，他家里没有这部书，年来想找来看都没有找到。不久后，收

到朋友来信说，《东华录》可遇不可求(我有一部藏在汕头，现在下落不明)，待找到了才替我买。我觉得《东华录》总有一日可以买到的，倒是那部《会试年齿录》不容易找，我就立下了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非找到它不可，直到一个月前，有一位朋友替我从海外一家图书馆抄了寄来，而四月二日，我在香港又买到了一部上海新印的《光绪朝东华录》。这些参考书到手后，我便再谈周福清一次。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写记

《同治辛未会试年齿录》所载，周福清中进士的名次是三甲第十五名。根据他自填的履历及三代脚色，我们对他的本人及其家世略知一二(自填的履历，除本人年岁外，类皆可靠)。他的履历说："谱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行八又行一。道光甲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方略馆誊录。"他自填的科举名次是这样的："甲子、丁卯乡试中式第八十六名。戊辰考取誊录。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这里要详细解说一下。甲子是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丁卯是同治六年。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凡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同治三年二月，清军才克复杭州，六月才攻入金陵，因此这一科的乡试就延期三年，和下一科丁卯合并举行。丁卯下一年是戊辰，有会试，周福清照例入京会试的。但这一科他没有考上，于是他去考方略馆的誊录，却考上了。(清朝惯例，每平定一次什么变乱，必开方略馆来编纂这一役的"战史"。此次的方略馆是开来编平定"粤匪"的。中了举人的人可以去考誊录，混个资格，若干年后"战史"编成，可以议

叙得官。)他在京供职于方略馆，但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年)有会试，他自然去尝试的，于是会试就中了第一百九十九名贡士。有了贡士这一资格，才可以去殿廷应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有些人中了贡士，遇到事故，或丁忧，或疾病，就不去殿试，呈请下一科去补试，蔡元培就是补行殿试而入翰林的。)殿试后，所有贡士个个都是进士了，于是分开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立即授翰林院修撰、编修之职，但过了几天，二鼎甲仍然要和那班新进士应朝考。朝考揭晓后，才选取那几个为庶吉士，被选的叫做“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就是翰林了。落选的以进士资格，立即外放知县，或在六部做京曹。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三年，经“散馆试”(即毕业试)后，成绩好的就留馆供职，授以编修、检讨之官(庶吉士不是官)，成绩差的，就不能在馆供职，以庶吉士散为知县或京曹了。周福清以三甲进士入翰林，散馆时如果成绩好，例授检讨(二甲例授编修)。以上这一段话，可以给读《鲁迅的故家》的人参考，凡写鲁迅年谱误引此书的也可以参考的，所以我以为说了这许多还不觉得是废话。

以上是关于周福清的科举考试故事，现在要谈到他替亲友及自己的儿子通关节的事了。这一件事是周福清一生最重大的事情，较他得点翰林尤甚，他是被光绪皇帝亲笔判以“斩监候”的罪犯(斩监候是定了死刑，待秋后处决，斩立决就是立即处死。斩监候还有一线希望，到时或者可以碰到机会不死，减轻了刑罚，或再留到下一个秋天才处决)，这当然是周家一件不很光荣的事情，在周作人兄弟自然是不忍提到的，鲁迅在生之日也绝不提起。《鲁迅的故家》第八十五页，说到周福清通关节出破后，有云：

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有七年，至辛丑(按：光绪廿七年，一九〇一年——引注)一月，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乃于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来的地方。

书中没有点明周福清已判了斩监候的罪名，我一向怀疑他的案件未结，何以有“监候”七年这一回事，今读《光绪朝东华录》才完全明白。《东华录》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十二月癸酉(廿五日)上谕云：

刑部奏：遵议革员周福清罪名一摺，据称：“革员周福清于考官中途遣递信函，求通关节，当即举发破案，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钦定”等语。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见《东华录》第三册总页三三〇三)

刑部根据法律，斟酌情形，拟周福清充军，算不轻了，这一判颇见公平，纯从客观态度出之，到“恭候钦定”之时，清德宗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乡试舞弊事件(一，陕西主考丁惟禔贿通内监，谋四川主考，过付人有编修饶士腾和二酉堂书店，为御史林绍年揭参，饶畏罪自杀，丁则案未结病死。北闱则揭晓后，有新科举人数人被言官纠劾，说有枪替，于是来一次覆试，文字相符，准一体会试者，只周学熙一人，其余停科及黜革有差。学熙乃周馥

之子，李慈铭的学生，入民国为袁世凯时代之财政总长，以善理财著名，闻其后人有隐居香港长洲者。三为周福清此案。），要振刷一番，所以周福清才不幸而被“钦点”死刑。从此他在杭州狱里，坐满了七年“花厅”，每年遇到秋决之时，就提心吊胆，也许曾经被绑赴刑场，作“陪绑”的“嘉宾”呢。（秋决，有些斩监候的犯人，临时不勾决，但政府却有一个虐待狂的嗜好，往往将这样的犯人“陪绑”一番，将他绑了一起押到刑场，吓到犯人失去三魂七魄。到刑场后，忽又不勾，将他带回，或宣布减刑，这种精神虐待，与电椅刑无大差异。）

周福清怎样通关节、其前后经过，《东华录》所载，较之《鲁迅的故家》及去年拙文所记者更详尽，现在摘录于此，以供读者参考。我得先说一下，此案发生于光绪十九年七月廿七日，地点在苏州。首先向皇帝报告的是御史褚成博。（字伯约，号孝通，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广东惠潮嘉道。光绪十四年戊子乡试，任广东副考官，先父就是中在他手上的。他与李慈铭为进士同年，又同乡。李氏常丑诋他不学。）《东华录》记此案的第一篇文字，就是褚的奏章。略云：

> 褚成博奏：“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此事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感怀愤叹。……相应请旨饬下浙江巡抚，速提此案认真究讯，是否实有主使，抑系冒名撞骗……”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

奏，原摺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第三册，总页三二四九。）

军机大臣根据上谕，寄字给浙江巡抚崧骏。但十二月崧骏对此案已有初步报告，他的报告到达北京时，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天了。（《东华录》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己酉朔。同日第二条记："浙江巡抚崧骏卒。"）十二月十二日《东华录》载：

崧骏奏："浙江会稽县在籍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在苏州遣仆陶阿顺（案：《鲁迅的故家》作徐福）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由苏臬司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前据臬司赵舒翘禀报，时奴才业已入闱（案：乡试时，巡抚例入闱监督），即饬臬司会同藩司，督饬杭州府讯取陶阿顺供词，并臬司抄呈原信，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字样。"（案："官卷"是考生之父做官，故名官卷），当查马姓官卷马家坛一名，暨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案《同治辛未会试同年齿录》周福清履历中，自填一子名凤仪，年幼在求学。凤仪后改名用吉，即鲁迅的父亲。可参看《鲁迅的故家》）一并扣考。其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无凭查扣。奴才出闱后，当经恭摺具奏，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一面饬司前往查拿，即据周福清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会稽县知县俞凤冈先后解省，发委杭州府讯办。旋据差弁赍回原摺后开，恭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嗣准军机大臣字寄……续准吏部咨……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查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请饬革职归案审讯等语……钦遵转行到浙，均经恭录转

饬拟去后，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讯据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主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胡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催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案：所谓"通关节"系与主考串通，考生在文中用"宸衷茂育"字样，主考就知道是自家人，将他取中)，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马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

这是浙江巡抚初步审讯周福清一案后向皇帝的报告，文末说并没有人托周福清去说关节，是他自告奋勇的，并且买卖也没有成功，周福清也畏罪自首，"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尚有

区别……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对此事并不知情，已经分别斥革了，陶阿顺亦不知情，应毋庸议，至于那孙陈五家毫不知情，似乎不必提查，以免株连。那张银票又系自写的虚赃，该革员周福清又供家计贫寒，拟应免著追入官。

崧骏所奏，有许多处都为周福清开脱，目的在减轻他的罪名，大概是周福清已托了人事。皇帝照例交刑部议奏。到十二月廿五日，刑部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给皇帝改为问斩，已见上述。但刑部所拟的，甚见公平，可见周福清的罪状并非不可以减轻的。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查例载(下系引律例，今省去)……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妥拟，庶无枉纵。此案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

刑部还请问皇帝，如准所拟，就要将周福清充军新疆，但结果是得斩监候。这一案不止是周福清一家由小康变为贫苦，使得鲁迅不得不寄食亲戚家中，受人白眼，影响到他后来对社会有改造之心。由此看来，这一案不止在清末考试史上为一大案，可为考试

史的史料，凡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对这件案似乎也要知得清楚呢。（此案发生后，杭州人有一联诮两主考与周福清云："年谊藉夤缘，稳计万金通手脚；皇仁空茂育，伤心一信送头颅。"下联"茂育"二字，周福清自拟的关节也。）

袁世凯求医记

民国四年乙卯（公元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搞帝制的时候，那批攀龙附凤的人，已暗中把袁克定当作太子看待了，后来袁世凯的皇帝做不成，而“太子”的诨号，还落在袁克定身上，很多人在背后提到他都叫他为“洪宪太子”，甚至也有人在“洪宪”之上加“跛脚”两字，以形容这个过气太子不良于行。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笺注》说颜世清于洪宪元旦入新华宫朝贺袁世凯后，即往“青宫”贺太子，颜世清微跛，跪拜后，克定还礼的趣事，注文云：

> 穀梁传，却克升堂，妇人笑于房，谓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故妇人笑于房也。克定左足病曳，颜世清右足不良于行。洪宪元旦，世清朝贺新华宫，礼成，世清退值，疾趋储宫贺太子。世清行拜跪礼，克定还礼如仪。克定左跛，杖而能起；世清右跛，亦案地良久，身乃成立。左右各留半膝，有如抵角对蹲之戏。克文克良大笑哄堂，克定盛怒，痛责诸弟，谓其儿戏朝仪。克良答曰：“汝真以储君威权凌辱群季耶？世界上岂有跛皇帝、聋皇后者？”并讥克定妇，吴清卿大澂长女，两耳实聋，充不闻声也。克定纵怒掷物，世清又跛跪以求息怒。吴江费树蔚为清卿次婿，故克定荐授肃政使。（江夏汪唠鸾记事）

刘先生是根据汪君记事的，但这件事并不可靠。记得五十年前读袁克文的《洹上私乘》，说他的大哥在河南故乡送他的母亲登程入京后，骑马回养寿园时坠马受伤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香港出版的《春秋》半月刊，载有薛观澜遗著《我所知道的袁大公子》，中有一段记克定在德国坠马事，有云：

> 一日，克定与德太子威廉并辔郊外，乘马受凉，绝尘而驰，克定踣地，被压马腹之下，右腿折断，克定晕去，差幸德医技术高明，生命得以挽救，出医院时，两足皆跛，回国见父，形容憔悴，项城见其呐呐不能出口，不禁声泪俱咽。……

薛观澜是袁世凯第二女之婿，也即是袁克定的妹夫，虽然他和袁家结亲时，世凯已经下世，但他和克定兄弟很熟的，何以所说与克文所记不符？可惜薛君已于一九六四年三月死了，不然的话，我很有机会问问他究竟的。

其实，医好袁克定的并不是甚么“技术高明”的德国大夫，而是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大夫。近日读萨培医生(Dr. William Sharpe)的自传，因为三十年来我的脑海中常记有袁克定这件事，故此拿来一看，试翻目录，则其中第八章叫《为中国一个贵族动手术》(Operation on Chinese Royalty)，我心中一动，难道这就是和袁世凯克定父子有关的那个大夫吗？连忙翻阅一两页，果然不错，大喜过望，详细一读，于是袁世凯怎样请到这个大夫，他怎样到洹上养寿园为“太子”治疾，我都清清楚楚了。这一可贵资料，的确是“洪宪”朝一掌故，必为读者所乐闻，遂参考此书，草

为此文，我只译其大意，但绝对保存作者原意的。

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四月下旬某日早晨，萨大夫正在苏州一所基督教教会的医院里，替一位西洋胖妇割除胆囊。以下便是萨大夫所记的事。

这一天的天气很温暖．江南的风景，在暮春时候是特别令人可爱的，我为病家施行的割胆手术已经很满意的完成了，只是在缝札伤口时还遇到一些小困难，但我的助手却能迅速地帮助我做完这项善后工作。正当此时，一位穿着长袍的中国人走到手术室，他把我拉向一个角落里，放低声音对我说："北京袁大总统有急事，要请您入京一行。"

他所说的袁大总统，我是知道的，袁大总统从前是清朝的大臣，一九一二年，他的内阁奉命和南方的革命军谈判，和平转易政权，结果满清的皇帝退位，袁世凯水到渠成，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我便问那人："袁大总统为甚么要叫我进京呢？"

那人说："没有甚么重大事情，我猜不过是一些医学技术问题要向您请教吧。请您放心，没有甚么麻烦的。江苏的督军已经为您安排好专车了。"

我坐上为我准备的专车回到上海。为了入京公干，我便向学校请假一个月（按：萨大夫在上海创办哈佛医学院，后来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成立才合并），当晚就乘坐一艘为我服务的专轮驶向黄海而去。

袁大总统不知有甚么重要的医学问题和我商量，我猜一定很是要紧的，否则就不会花这么多公家的钱，派专轮来接一个外国大夫了。

航行两天，我到了青岛，火车站上已备了花车，坐上火车，

到了济南府。我这次旅行，行李很是简单，只带一只小皮包和一个小皮箧。

在济南府停留一宵，第二天我又乘坐花车北驶，到达天津，转车向北京进发，车将到北京时，我还是不知道我此行的任务是甚么？把我叫到北京看谁人的病呢？如果不是袁大总统本人，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假定是他有病，生的又是甚么病，为甚么这样神神秘秘，陪我同行的人，一丝儿口风都不泄漏？

北京的火车站上，早已有几个人在迎候我了，我只识其中一人是蔡廷干，他现任总统府英文秘书长，留美学生，一向追随袁大总统，是亲信人物之一。他招呼我坐上马车，开到六国饭店，我们进入一间布置很华美的套房。

安顿下来后，房里只有我们两人，到此时，蔡廷干才告知我生病的人是谁，还再三叮嘱我保持秘密，不可向外泄漏。原来病人是袁大总统的长公子克定。大约两个月前，袁克定从马上摔了下来，自此即不省人事。等到救醒过来，他的左腿左臂已经麻木了。到今日已六十多天，还未能恢复原来状况。这位三十九岁的袁大公子，听说很有才干，能协助他的爸爸处理困难的问题。袁大总统出生于仕宦之家，野心极大，而领袖欲又很强，看他的行事，他很想牢牢抓紧总统宝座，传之子孙。在他心目中，只有这个跨灶儿才有资格继承他的“大宝”。现在大公子患上这个半身不遂之症，将来付托无人，岂不是眼光光把总统宝座让给别人。有此种原因，不得不保持高度秘密把大公子的病早日医好不可，如果给人知道，就发生坏影响了。

正在这时候，哈佛大学的校长伊利奥脱到北京游历，他偶然和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说到我从前在哈金斯大学曾接受古成博士指导，专门研究神经学，对于神经系统的解剖，尤为擅长。芮恩

施博士忙把这些话向外交总长陆征祥说了。原来我这次被召入京是出于我国公使芮恩施博士的推荐。袁大总统是中华民国的统治者，为了要救回他的儿子宝贵的性命，不惜重金礼聘名医，到现在为止，已有九个医生在袁大公子左右了，可是他们都束手无策，不能为总统分忧。袁大总统急得要命，知道我薄有技能，就把希望寄在我身上，希望我能够把他儿子的病医好。

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不免多少慌张起来，袁总统既然这样期望我，教我怎样才好呢？把他的公子医好了，当然再好不过，设使不幸出了事，我个人的名誉有损还不打紧，但怎样对得起袁总统呢？我正在沉思着，翻来覆去的研讨这件事情，而蔡廷干又再三叮咛，要我保持秘密，因为袁总统不想他的人民知道他的继承人得到这个病。（按：蔡廷干，字耀堂，广东香山人，清同治十二年官费派赴美留学的第二批幼童，时年十二岁。归国后，初在大沽炮台鱼雷艇服务。甲午中日战争，任威海卫鱼艇指挥，力战被俘，囚于日本大阪监狱，和议后释放归国。光绪三十一年，直督袁世凯奏请，留在北洋差遣，宣统三年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辛亥后，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民国十三年任税务处督办，民国十五年，杜锡珪以海军总长兼代内阁总理，以蔡廷干任外交总长，数月后即下台，下一年辞去税务督办，隐居大连。九·一八后回北京，一九三五年九月逝世，年七十五。萨培医生说他是总统府的英文秘书长，出于误会。不过袁世凯每与外国人谈话，或总统府发出的重要英文函件，都是他草拟，甚至亲笔书写。我曾见袁世凯聘莫理逊医生为公府顾问的信，就出于蔡的手笔。）

第二天上午，蔡廷干来陪我一同到中南海总统府谒见袁大总统。袁大总统年逾七十（按：袁世凯只活到五十八，未到六十，

此时正五十六也），是军人出身，个子矮胖，看来有些臃肿。

我们谈话时，由蔡廷干翻译。蔡告我，总统多多拜托，请我务必帮忙，尽心医治他的公子。待断定是甚么病症后，就决定怎样着手治疗，马上要向他报告。

当日我和蔡廷干又乘专车出发，下一天午后，我们到了彰德府的车站，已是黄昏时分。下了火车，乘坐一辆敞篷的车子，由四头满洲小马拉着走，走了不多久，便到达洹上村的养寿园了。

养寿园是一所颇大的花园，前几年，当袁总统还是清朝的大官时，摄政王硬说他的腿有病，迫令退休，赶他离开京师，他就在故乡筑这所园林为归隐之所。据说园子本是天津盐商何某的别业，前临洹水，右拥太行，风景幽胜。园的四周，绕以高达十英尺的围墙，地广约十六方里。园中的建筑很多，有台榭楼阁，还有湖沼。最使我觉得奇怪的是，园里不论甚么地方，都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巡逻，很像欧洲古代贵族的堡邸。这批武装军队日夜巡察，大概是用来保护袁总统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吧。（按：养寿园设有卫兵二百名左右，当辛亥革命及京津兵变时，彰德也有乱事发生，故袁世凯要保护他的家族。又，袁寒云写过一篇《养寿园志》，据言地方百亩，有堂、榭、亭、台二十余云。）

我住在湖滨一所中国式高一层楼的房子，共有厅房四间。那一晚，我和住在园里那九位大夫谈话，以便了解病人的情况。这九人中，七位是中国人，两个是外籍传教士，一个是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九位大夫中，有三位能讲纯正流利的英语。他们说：“袁克定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的，颈部受了伤。但除了左臂左腿完全麻木外，病者的精神和肉体和正常人没大差异。”（按：这七位中国大夫的名字，可惜萨医生没有记下来，其中不知有没有屈永秋大夫？屈大夫是番禺人，字桂庭，久任北洋医官，受知于袁世

凯，庆亲王推荐他为光绪帝医病。民国后，任总统府医官，一九四五年在北平逝世，年九十一。）

整个晚上我和他们谈话，希望得些资料来作参考，但我还不能确定他们的诊断是否正确，因为我还未见到病人，实在无法下一断语的。病人的母亲于氏夫人，是园子里最高的行政人，换句话说就是一家之主，她具有无上权威，在园里的人，没一个胆敢稍逆其意的。我和人们谈话中，知道袁大总统有八个太太，于氏是正室，袁克定是她的独生子。

第二天早上，袁夫人准我和病人见面了。这是第一次诊视。当我被领到病房时，前后左右围着看热闹的人可不少啦。有袁夫人，袁总统的儿子们，十来个仆役，还有几个卫士，当然也有那九位大夫。

置身在床上的病人神智清醒，和一般人没大差别，他讲得一口颇好的德语和英语，他说：除了头颅感觉到有些沉重，颈中有些僵硬外，并无任何痛苦，至于他的左臂和左腿是不能活动的。

我聚精会神，很小心的为病人检视一下病况，发觉他的左脸下的筋肉有些不能活动，又看出他的脸肌受到头部的压力，而右眼所受的压力，较左眼尤甚。他左边的身躯已完全麻木不仁了，就是拿手指轻轻按他一下，或用小针刺他一针，他也没有些儿反应。

我的同事们都一致认为袁克定的病，完全由于脊髓受伤所致。但我对他们的断语，不很同意。根据我的诊断，病人受伤之处是右脑，脊髓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当日下午，我又请求再诊一次。事后，我把诊断所得，对那九个同事说了，他们都认为很对。于是我们一同退出病房，到另外一个房间作下一步商讨。在过去两个月中，他们诊视病人后，

作出诊断报告，一致认为病人患的是“颈脊髓受伤”，他们屡次向北京报告都是这样。我现在诊断所得的结论，乃是右脑受影响，与前说毫无关系。这么一来，对那九位大夫多少有点丢他们的脸罢。因此，我们同事之间，就少不了有一场斗争了。

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和共事的人谈论到神经这个问题。一提到这问题，使我十二分惊讶的是那七位中国大夫简直不懂得甚么叫神经中枢组织。至于那两个外国大夫呢，也许他们客居中国太久了，很少见到西方医学报道的刊物，要不然，就是把以前学习的有关神经组织的课程忘个一干二净了。

我不惜开罪同事，给他们上了一课，拿粉笔写在黑板上给他们看看神经组织是甚么样子的，而脊髓又怎样不会受到损害。我详细地解说一番后，作出一个决定：应该马上把病人送入医院，接受头部开刀的治疗手术。

开刀施行手术的建议，立刻遇到强烈的反对。反对的人包括病人的母亲和那九位大夫。尤其是袁夫人，自从她的独子得此病后，她简直寸步不离病房，送往天津或上海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岂不是要她的命吗？后来我对他们再三譬解，说明非动手术不可，并说，袁总统再三嘱咐，一经检验出病源，就要立刻向他报告，以便决定下一个步骤。现在既然已知是甚么病，就应马上向袁总统请示如何办理了。

我们开会商量了后，结果一致同意，拟好一封电报给袁总统，略说：“我们这群大夫，经检视袁大公子之后，一致认为他的病，除右脑受伤出血外，脊髓也受影响。为彻底治疗起见，非从速把病人送往天津的医院接受开刀治疗，恐不能收效。”

电报由我们几位大夫共同署名，但七位中国大夫中，有两人不愿意签名在电稿上。他们有其理由的，认为既然袁夫人不肯让

她的儿子离开病房，又何必多此一举打电报去请示？我到彰德府不过两天，在此短期间内，便感觉到中国的封建家庭做母亲的人是具有这么大的权力。

远在北京的袁总统倒也很能合作，也深明事理，他吩咐蔡廷干复电，赞同我们的主张，还大张父权说，如果病人的母亲反对此举，不让儿子离开病房，那么就动用"军队"的力量去执行任务，至此，我又感觉到，中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权尤高于一切。

至于病人又有他的一套理论。他对我很诚恳的说："萨大夫，我很愿意听您的话，我知道，假如我不接受手术，从此我就成为废人，我又怎能统治中国呢？但是我的母亲又反对开刀的手术，我怎忍违背她的心愿？这真使我难做啊。"

电报发出后，在等待覆电期间，为了争取时间上的胜利，我先行一种预期的减轻治疗法，其法是：不给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与病人吃，每日饮泻盐清洁肠胃，用冰囊放在伤处，大力按摩，运动左面的手足，使血液流通。

那位中国首席大夫，虽然不敢公然反对我这种措施，但他却事事不愿和我合作，不过在我向病人使用泻盐后第二日，竟出我意外，他来个大转变，用很恳切的态度求我一件事，他说：假如我停止再用泻盐，他很乐意尽力帮助我。

这位忽然改变态度的大夫，何以忽有此举，在初时我的确有些莫名其妙，但这个谜不难解答，不久之后，我把事情弄清楚了，说起来倒也很有趣。

我从某人得到了解。原来中国的封建皇帝，他们处在深宫之中，凡事皆与寻常人不同，吃饭吃药都有一套把戏的。他们生怕有人陷害，在食物里暗中放毒，所以在进食时，指定一个太监当

面将各种佳肴尝一遍，看过没有出乱子了，才放心大嚼。至于生病要吃药，则“消毒”的方法又略有不同了。太医院的医生为皇帝切脉开方，方单给皇帝看过后，又给内廷大臣过目，内务府官员把它登记起来，然后发下御药房，照方撮药。一共要配两份，但两份药却又放在同一药炉里煮。煮好后，分作两碗倒下来，一碗由那个处方的御医和撮药的太监分尝，没有甚么毛病了，才将另一碗送做皇帝去喝。袁总统在清朝做了十多年大官，对于这些宫廷制度是习知的，一旦贵为中华民国元首，无异为昔日“九五之尊”，当然在起居饮食方面都要摹仿前代的帝王排场了。

袁克定的母亲就是恐怕有人在药里下毒，陷害“太子”，故此凡是病人喝进胃里的药，她也要照清宫之例，药配二份，一份给那位首席大夫先尝，另一份给病人服食。那位首席大夫在此二日间吃过泻盐，也许曾把他泻个不停，实在吃不消了，才肯向我投降的。现在细想起来，真是令人可笑呢。

这一个步骤完成后，第二个又要展开了，我要说服袁夫人，使她不要反对开刀的手术。首先我做一项轻松而有趣的试验，使见到的人对我所做出的甚么事都有信心，有安全感。我的小提包里有一个干电池，又有一具试验神经肌肉的电极器，想不到小小的这一副机器居然能创造奇迹。

我拿出这些“道具”后，做些把戏给大家看，我的手指头放在电极器上面，扭开电掣，手指头马上就震动起来。我以身作则，显示这个玩意于人无害，然后请在场众大夫轮流试一试。袁夫人亲眼看见那些大夫试过后，一些儿都没有损害，她似乎有些信心了。我立即抓紧机会，对她说，不妨请病人试一下，包管没有害。她听了大为震惊，忙问：“大夫，僵硬的手指头，用这个方法可以使它活动吗？”我说一定可以的。但她还是不大相信，认为这

样的西洋医病法，未免太过儿戏。

这么一来，我几乎要束手无策了，但仍不放弃希望，耐心地去设法说服她。我花去两天多的时间，请住在园里的大夫、管家、仆役、卫兵来试验一下，在一百多个人中，并没有一个受到电气的伤害。此时，袁夫人才觉得放心，答应不妨让病人试试。于是她拿起病人的手臂，战战兢兢地把它吊在电极器的上面，然后轻轻地将手臂放下。

在试验的时候，病房里挤满了人，当我把电极器缚在袁克定的手臂上之时，人们都沉着气，不敢使呼吸有声，好像要等候有甚么奇迹出现把病人拯救的。我把电掣开动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听到了“呀”的一声，病人的手指头有点活动起来了。于是我又再掀一下电掣，使机器继续工作不停。

袁夫人见到这些电气并没有使病人丝毫损害，似乎又惊又喜。至于病人呢，他看见做母亲的没有惊骇之意，也显出又惊又喜的神态。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后，她问病人道：“儿啊，你觉得怎么样?”病人说：“妈，很好过，您放心好了。”

初步试验的反应很好，我便把电极器绑到病人的左腿上，如法炮制。掀动电掣后，不一会，病人的大脚趾能够活动了。旁观的人见到这情形，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狂起来，而病人和他的母亲更是欢喜得笑作一团。自此以后，袁夫人对我有信心了。我在想，这次我可以成功了吧?

然而事情却不这样简单的，一个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尤其是女人，很不容易说服的，所以一提到开刀手术这一问题，袁夫人就强烈反对了。

袁夫人很顽固地不许把病人移往有 X 光设备和附有手术室的医院治疗。医院的手术室是消过毒的，在里面进行开刀的手

术，包管没有危险。但她不信这些话，只是死硬地反对到底。我无法可施，几乎要放弃开刀这个念头了，但还是作最后一次的努力，希望能把她说服。

我对她说："既然反对在医院开刀，那么，就把这个病房改为手术室吧，我打算用局部麻醉法，在病人的头部奏刀。"于是我把医学上的理论全搬出来，慢慢地向她解释非开刀不可之念。我说，除了用这个方法外，已没有别的好法了可以阻止袁大公子变成废人。

她听后，没有甚么表示，但似乎有些活动之意了。我便赶紧把握时机对她说："我要用一张小小的利锯向病人头部的左边锯开，这样便可以减轻大脑向脊髓的压力，甚而还可以减轻脑子本身的浮肿。"

结果袁夫人同意开刀之举了。我很高兴，立刻准备一切，进行工作。我先从小皮包拿出应用的工具，用开水煮了三十分钟来作消毒，然后用肥皂把手掌、手指、指甲洗涤干净，然后又把手指浸在白兰地酒内约五六分钟之久，这一切做妥当后，才把病人移近窗前。

首先，我在病人面部右边太阳穴上的颅顶骨注射一些局部麻醉剂，然后割开一个约二寸大小的伤口，在伤口的两旁各安上一个牵引器，那位德国大夫用手轻轻地拉着牵引器的一端，另一端则由那位法国大夫拉着。这样，我就可以清晰地看见病人头颅内部的一部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块凝结着的紫黑色淤血，约有两茶匙之多。

我轻轻地把那些淤血移去后，见到头颅的弧形骨头有断折的形迹，广约八分之一寸。从这裂开之处再仔细搜寻一下，就发现有些半凝结的块状物出现，当然，这也是淤血了。我小心翼翼地

拿钳子把淤血拿出。但拿去一些后，接连着又有一些冒出来。不消说，这是头颅里边的自然压力，使淤血涌出来的。我认为只要把这些有害的淤血尽行清除，便可以平安无事了。我有了这个信心，就轻松得很，于是耐心地继续工作。

一到我移去的淤血约有四茶匙的分量后，过了一会，忽然又有大量淤血涌出，约有两安士左右。把淤血全部除清后，功德圆满，病人的脑不致再受到毒害，我也不必进一步向深层的地方开刀来探求究竟了。我只用两个小橡胶的吸干器放在裂口的两边，然后用丝线将伤口略略缝缀。这两个吸干器孜孜不倦地工作了整整三天，把伤口里的淤血全部吸清。这时候，我才把吸干器拿开。到施手术后的第四天，病人左脚的脚趾，渐渐能活动了，下午的时候，左手的手指头也能活动了。

到了第八天，袁克定已能够移动他的左臂、左脚。第十二天，病况大有进步，病人居然能用一根拐杖来帮助，下了病床，就在床前走了几步。众人见了无不眉飞色舞，欢喜非常。

这个"奇迹"出现后，打从袁夫人起以至各位中国大夫，都把我当作活神仙看待。照他们的理论和观察，一个大夫能在病人的头颅剖开一小洞，把头里的淤血全拿出来，而病人不会因此丧命，那不是"奇迹"是甚么？假使依法炮制，不论甚么病人，只要这个大夫在病者的头上开个洞，那还不是具有"起死回生"之妙？其实那有甚么"奇迹"可言呢？一切都是科学，没有甚么"神"在其中主宰的。

做完这件大工作后，我如释重负。直到今日，我还认为我那一次的尝试成功，完全要归功于我的少年气盛的一股傻劲和愚妄得可以。我以为一个人有经验便可以为所欲为了。岂知在养寿园里那个病房来开刀，真是危险万分呢！然而我竟然没有闯祸，可

说幸运之至。试看看，"手术室"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又没有消毒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助手、护士，而且灯光又不够亮。种种不合做手术室的条件皆备，而我这个大夫竟然胆大妄为，冒险一试，如果稍有差池，不知将发生了甚么局面，我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寒而栗。那并不是我事后多虑，当我做完这个手术后，那位中国首席大夫静悄悄地对我恭贺，他说，假如你的手术失败，病人不幸丢了生命，哼！那时候，他的母亲就要为了复仇，立刻命令卫士把你抓去枪毙来偿袁克定一命的。

我听后觉得好笑，世界上那有这样野蛮的事呢，他未免危言耸听跟我开玩笑了。后来在北京，美国驻华公使对我证实此说之可能性，才把我吓个魂不附体，深幸没有闯大祸。

我曾问过那位中国首席大夫，袁克定的母亲为甚么要我偿命呢？他说，如果袁克定开刀后忽然死了，她的身份就自自然然降低。因为长子既死，次子袁克文就可以当上中国总统的继位人，生下次子的那位朝鲜籍姨太太，母凭子贵，到了此时，袁夫人岂不是要让这个姨太太三分吗？袁夫人在一家之中，便失去主妇的地位了。（按：封建家庭的制度，嫡庶之分甚严，袁世凯的正室于夫人，即使她所生之子克定死去，她的主妇地位并不会因此而动摇的。除非袁世凯不恤人言，宠妾灭妻，那又是另外一件事。至于所谓袁克文在其长兄死后，有资格继承总统之位，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相传在当日袁世凯也颇有此意，因有此传说，所以外国人摭拾入文中也。）

手术之后，袁克定休养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左边的手和脚不但能够活动如常，就是身体的其它部分也灵活了。袁总统一家人，打从袁太太起，由上至下，无一不感激我，竭力款待我。东方人有一种美德，他们受过人家一些好处，就会终身不忘，一有

机会，便要尽其所能使得那个施恩的人欢喜。袁家因为我治疗好了他们的少主人，欢天喜地，对我特别客气，一到晚上，主人就差遣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到我房里供我"差遣"，主人的"雅意"何在，并不难明白，他们显然是以为我在客中寂寞罢了。

这个可怜的少女一踏进我的房间，就一屁股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垫子上。我们语言不通，没有甚么话可谈。我就在此时细细的观看她一下，只见她的脸涂了一层厚厚的白粉，又再涂一遍腥红色的胭脂，她的纤纤十指，一律留长指甲，涂上了凤仙花汁，鲜红如血。她的头上结了一个长约一寸的髻子，髻子的前后都有黄澄澄的钗环等饰物支持着，使它不会堕下。过分打扮，满头满身都是金银珠宝，也许是东方女人的一种习惯吧？她往往坐到半夜以后，看看没有甚么差遣，她静悄悄地又溜出去了。

有一天袁总统的第三子克良问我，是否我不喜欢中国女子，每晚派到我房里的女子，是不是她伺候不周到？他这一问使我觉得很为难，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我生性怪癖，喜欢清静，但又用尽方法为那个可怜的少女着想，不要使她受到主人怪责，怪她开罪了贵宾。

在我住院期间，也曾到园外骑马驰骋为乐。初到的日子，我在园外的大路上来往跑马，有时遇见一些当地人，他们一见到我，大有"生人勿近"之概，好像遇到瘟神一般，避之则吉。曾经有过一次，在路上见到一个做妈妈的妇人，她一看见我，赶快一手把在路上玩耍的孩子拖回家中，口里喃喃地说了一大堆我不懂的话，但只懂得"洋鬼子啊！洋鬼子啊"那两句。后来我的开刀手术完成了，我在大路上跑马，当地的人不再拿我作瘟神看待，反而把我看作活神仙了。先前那个见到我一把拖她的孩子回家的妇人，现在碰到我，一反从前所为，居然抱着孩子的头朝着我，口

中喃喃有词，好像要我把甚么灵符或灵魂放进孩子的脑袋那样。

养寿园外的情形如此，园里头的又怎样呢？我居住在这所像王宫一样豪华奢丽的地方，可说是享尽人间富贵，冷眼静观一下那班公子哥儿的生活，不禁为中国一小撮“人上人”可悲。袁总统的“龙子龙孙”过的是甚么生活，大概园外的老百姓完全未知的吧。这批“王孙”，在红日当空时，正拥着如花美眷呼呼熟睡，像躺在棺材里毫无知觉一般。一到太阳下山，华灯初上，他们一个个都活过来，精神奕奕了。他们群集在一起呼卢喝雉，饮酒猜拳，丝竹杂陈，哗声震瓦。饮宴的时间往往从晚间九点多钟开始，吃的东西千奇百怪，有很多是我生平所未见的。这一顿酒菜整整吃三四个钟头才完。我坐在筵前觉得这是一件大苦事，但那班公子哥儿却乐此不疲，好像开家庭会议一般，叔侄兄弟全部到齐，兴高采烈地一边谈话，一边吃酒。酒罢余兴上场，就是赌钱，赌到甚么时候才收场，我因为睡去也不管这些闲事了。

这班公子哥儿耽于逸乐，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他们看来年龄不过二十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青少年，但身体却非常羸弱，一旦有甚么疾病向他们侵袭，他们的娇弱身躯是抵抗不住的。我从未见过他们作户外活动，有之，就只是当太阳将下山时，他们起床后，各捧着一笼心爱的鸟儿，在池边漫步，逗鸟儿唱歌，不时放些小蚱蜢入笼中，看小鸟啄食为乐。这就是他们的户外活动了。不过，他们在户内的运动多一些，他们高兴时，晚晚做“新郎”，请个把女子入园中做侍妾是闲事。

我的工作完成后，要回北京覆命了。动身前一天，袁家的主妇在一所寺庙里举行酬神大礼，答谢神恩。神庙和一所寺院相对，围观行礼的人拥到水泄不通。行礼之时，作法事的大和尚朝着我说了一大堆话，蔡廷干译给我听了。他说，今日的法事是特

别为我而设的，所以神坛上摆设的东西，我喜欢那一样都可以随便要，这样绝对不会对神明有渎的。我见他们一番盛意，不便辜负，只得指着两座小神像说："就这两个吧。"一个是佛，一个是孔子。一个和尚听后，连忙将神像拿下来，用红绫垫子盛着，送到大和尚跟前，大和尚鞠躬如也的接了过来，在神像的额头，指手划脚的念念有词，说的是甚么，大概是念咒吧？蔡廷干也没法翻译出来，我更不消说了，我根本就不懂。

在我动身回北京那天，我给袁克定作一次最后的全身检验，事后，又嘱咐照料他的那几位大夫，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按时用劲为他按摩手脚。我对袁克定说，不久后他就会复原，行动一如常人了。我们握手道别。他说，他的病是我医好的，很感谢我，但抱歉的是不能亲往车站送行。

火车站上送行的人多如蚁群，密密麻麻的挤满整个月台。除了蔡廷干和我之外，同往北京的还有袁总统的第三子克良和五十名卫兵。袁克良又携同他今早才娶进门的第四房姨太太。

当我们的专车开往北京时，沿途就有人传说我把已死的袁世凯总统的大公子医活了，竟然轰动了每个市镇乡村，不少人特地跑到各个车站等候，希望能一见"活神仙"之面。每逢专车停留一个车站，月台上就满满地堆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呼呼嚷嚷，好不热闹。袁克良和蔡廷干竭力劝我步上月台，让好奇的人们饱饱眼福，我只得照办。

我们到北京后第二天，蔡廷干来通知我，袁总统约我到中南海的总统府相见。这一天的情景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我踏进袁总统的办公室时，他一看见我，就挣扎一下站起身来欢迎我，他坐在一张大椅上，在他的面前是一张很大的黄褐木办公桌。在他的身后，两旁分站着两个武装侍卫。袁总统请我坐下，喝过了

茶，抽着纸烟，然后我才把动手术的经过和善后的方法，逐一向他详细叙述。最后，我对他说，袁克定的健康不久便可恢复，行动和一般人毫无分别。袁总统听后很高兴。这时候，刚好一个侍应员捧着一只大木桶，桶中堆满着雪块，埋着几瓶香槟酒。我们先为袁克定的健康干杯，然后为袁总统干杯。

干杯后，我们坐下来，一面啜着香槟，一面谈天。蔡廷干对我说，袁总统叫他问我，他很想我留在北京做他的私人医生，他很愿意给我极可观的待遇，比我在任何地方服务的薪水高出十倍，只要我答应，甚么都好办。

袁世凯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总统，他统治着四五亿人口，有无上权威，名为公仆，实乃皇帝，他以为我能在人的头颅上开刀，治好了群医束手的顽症，如果做了他的“御医”，早晚照料他的健康，这对于身体很好的七十老翁总可以延年益寿，做他的总统到死为止吧？（按：作者见袁世凯须眉皆白，便以为他是个古稀的人，其实这时候他不过五十多岁，只能算是中年人罢了。五年后袁世凯即“仙去”，未满六十，更难望七十了。）

这一请求真出我意外，我不得不老实对他说。首先我谦逊了一下，说开刀成功，只不过是侥幸而已，这是客气话。然后又对袁总统说，我的手术，完全是从科学训练得来，其中并没有甚么神秘之处，任何一个在医学校受严格训练的学生都可以学得到的。我又说，现在上海的哈佛医学院也有这种训练设备，正在训练第一批学生。那家医学院也很需要我，所以我不便舍一群莘莘学子而去。

袁总统听后频频点头，连忙叫人拿一幅上海地图放在桌上。他看了一会，就指点给我看，他很乐意划出某地区的一幅十五英亩的地皮，用中国政府名义，赠予上海哈佛医学院，指定为建筑

新医院的课堂、实验室之用。我很感动的多谢袁总统的盛意。

末了，袁总统问我这次的出诊手术费一共多少钱，请我开个数目，以便致送。这个问题倒令我有点难以回答了。我踌躇了一会才说，这个问题颇不易答覆，但袁总统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我同样乐于接受的。

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蔡廷干从外面再进来，他递给我一个信封，彼此心照，我们互相点首为礼，默默无言。我随手把信封塞进口袋里，继续喝酒。我们的酒喝到何时停止，我不知道，只记得下一天我一觉醒来，才知我在总统府过了一夜。

我起床后不久，蔡廷干来陪我回去六国饭店，稍作休息，他对我说，前清宗室有一个公主病得很厉害，中外名医都请遍了，但他们一致认为没法可以挽救她的生命，她的母亲听说我在养寿园表演过“起死回生”的本领，想请我去诊视。我答应了，便约定下午前往，蔡廷干说就三点钟吧，届时将有三位大夫来和我一起去。

客人辞出后，我记起口袋中那个信封，就伸手到口袋里掏出来，打开一看，是一张面额十万两银子的支票，约值美金七万余元，自从我执业以来，这是我所收最大的一笔手术费了。

下午，我到了某王府，有人领我走过了好多重门户，才到达公主的病房，但看不见病人，我正在疑讶之间，有人对我说，公主的母亲要“垂丝诊脉”。我不懂是甚么把戏，经解释后，才知是甚么一回事。据说古代中国贵族女子，不轻易被陌生人所见，但有起病来，不能不给医生摸她的手，摸她的额，为避免彼此“授受不亲”，发明了一种用丝线按在病人的关寸上，引出帘外，大夫隔帘，按着丝线，便可探出病源是甚么了。这样的切脉法是可笑的，我生平未做过，也不信这样做会有效，当然拒绝了。我说

非见病人，无从得知患的是甚么病，否则我只有敬谢不敏了。结果病人的母亲不再坚持，让我亲手摸摸病人。当我的手触及病人的手时，只觉得它冷冰冰地僵硬的一点生气都没有，至少死亡已两三天了。她的母亲为甚么要请我医治，大概以为我是“活神仙”，能起死回生呢？（按：这个“公主”不知是哪个满洲贵族的女儿，书中没说明，大抵是王公、贝勒的后人吧，外国人对于王族的女儿一律称以“公主”，其实此时清室中除了溥心畬那个姑母大公主外，咸丰、同治、光绪都没有女儿，何来公主呢？）

萨大夫在北京的故事，至此为止。现在略介绍他的生平。他出生于一八八二年，家境不很好。他们一家人先后曾在芝加哥、费城、匹兹堡等大城市的贫民区居住，所以他最憎恨那些歧视黑人的美国人。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四年毕业后，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巴尔的摩的哈金斯医院为非驻院助理医生，在著名脑病专家以开脑著名的顾申医生(Dr. Havey H. Cushing)手下工作，因此获得很多经验，学业日进，顾医生倚之如左右手，在顾医生指导下工作两年期满，转往纽约罗斯福医院工作。

某日，萨大夫接到他的母校校长伊理略(Charles William Eliot)一封信，说哈佛大学决定在上海办一所医学院，他记得当一九〇六年暑假时，萨大夫曾在大学里为一班中国留学生补习功课，和他们的感情很好，所以聘请他做这所学院的外科主任教授，任期自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开始。

一九一二年的元旦，萨大夫到了上海，知道哈佛学院已开课了，校址在租界里是一所旧式办公厅的建筑，圣约翰大学的课室和图书馆，可以借用，附近一间医院也可供学生实习。他为袁克定治病后仍回上海继续教学，一年期满，他回美国了，医学院当局希望他在例假之年再来上海教学一次，但没有实现。后来洛克

斐尔基金委员会在北京设立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哈佛学院归并该校了。（按：光绪三十二年，即一九〇六年，学部已批准协和医学堂立案，何时始为煤油大王出资办理，尚待查考。）

王湘绮劝进的内幕

王湘绮到清光绪末年，在国中已享盛名。到民国成立，在儒林中他的年龄最高，士林仰之如泰山北斗，袁世凯一做了总统，就在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年底，任命他为国史馆馆长，目的虽在网罗遗老，但国史馆也是一国的重要机构，无论那一朝代都要有的，我们不能说袁世凯不对。(袁亦于一九一三年设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赵于一九一四年入京就职。湘绮的国史馆成立后，他在职不到一年就回故乡，一直由副馆长杨度代理。袁世凯死后数日，北京的报纸就喧传国史馆并入清史馆，后来不见成为事实。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廿六日，国史馆才并入北京大学文科，此举之不合理，无待赘言，亦可见黎元洪之流不如袁世凯远甚。自此之后，国史馆并没有搞出甚么成绩，倒是赵尔巽的清史馆，于一九二八年搞成一部《清史稿》，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基础大定，政局稍安，湘绮遂于四月带领家人入京就职，财政部送去五千元为国史馆开办费，馆长就委派了许多馆员，以曾重伯(曾国藩之孙，亦名翰林也)为秘书长。开办费收到后，史馆有饭可开，众人有饭可吃，五月十九日《湘绮楼日记》云："曾秘书已吃开办饭矣！"以幽默语句调侃之，此老玩世不恭，盖天性也。湘绮到京之后，袁世凯订期接见，为优礼耆贤，特地定一名词曰"延觐"，不曰"觐见"，以示尊崇之意。其实延觐与觐见，名异而实同，不过

用“延”字，在字面上较为好看而已，虽然咬文嚼字，亦见老袁笼络的手段。

湘绮回乡后，杨度搞的筹安会渐趋成熟，他自然要捧老师出来劝进，以收人望。但湘绮年已八十有四，平素嬉笑怒骂，不容易拉他落水的，不得已，只好“偷奸”老师一次，假名发出“删电”（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的，“删”是代表十五日），报纸纷纷登刊，人们以为湘绮真的劝进了。电文云：

>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演”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识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委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硁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任何人劝进的电报，袁世凯一概不覆，独有湘绮此电，特别回覆，说了一堆“匡予不逮”的客气话，时人甚以为异。此二电《湘绮楼日记》皆不载，但十二月廿六日（阴历）日记云：“又遣孙婿探删电，云陈仲驯为我作符命，证成莽大夫也，幸不遇朱紫阳，不至争稻桶耳。然妖诗已验矣。无名白头帖云：‘此去真成莽大夫’，四年前识也。”到此时湘绮已知被人“强奸”一次，但他年纪已老，早晚就木，也不计较，只说四年前入京就职时，有无名氏的诗“此去真成莽大夫”到今验了。他的日记载有致袁世凯一函，写在十一月初七日之后，十一月初七是阳历十二月十三日，此函亦出

以玩世不恭的语气，他说老袁要做皇帝就爽爽快快的做，不必假什么民意劝进，其中有"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之语。这是他的"政治哲学"。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吉青纳贪索中国瓷器轶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于北海的那个英国陆军大臣吉青纳元帅，是一个颇有趣的人物，他晚年来游中国，在盛京故宫弄出一件小小的笑话，二十年前金梁先生曾对我大略谈过，后来金先生还把这件事记在他的《光宣小记》中。

吉青纳的功名，可说是建筑在非洲人身上，他的"顶子"之红，是从战功染成的，非洲人流了几多血，而苏丹今日才能独立。一九四四年名记者张慧剑在重庆的《新民报》，有一段随笔评吉青纳曰："其后之南阿战争，亦吉青纳为参谋长，故检视吉氏一生之成功史，大半系以非洲人之血所书成者。"这一说法，我颇同意。两年前，苏丹人已将有关纪念吉青纳或戈登的碑像等物移去了。近日香港的西书店有一部《吉青纳勋爵传记》，旁边一小题目"一个帝国主义者"。书是英国人著的，伦敦《太晤士报》的《文学副刊》曾加以评介，读后久已忘记，似乎也说到评以"帝国主义者"并未失言。过了不久，《文学副刊》又有介绍 Donald Maccormick 所著的 The Mystery of Lord Kitchener's Death（"吉青纳爵勋神秘之死"。这两本书我都没有买，只从书评中稍知其大概，作者说他死得很神秘，似乎"事出有因"。前几年《英国文摘》转载《小人国月刊》里察·兰士一篇《害杀吉青纳的阴谋》，就说过谣传将这个老家伙置诸死地的是劳合乔治（当时的首相），阿葵士夫人（前任首相的太太）和北岩爵士。但这一说没有充分的证

据。一九一六年吉青纳应俄皇之邀，前往俄国开会，六月五日，他从史加巴佛罗乘军舰“咸北夏”号出发，就在英国的瓦维克一里半外触雷沉没，一般人都说是德国潜艇的杰作。“咸北夏”沉下时，生还者只十二人，其中一人尝听见人说：“让开给吉青纳爵勋走过。”这一句话就大有文章了，因此人们相信吉青纳并没有死，他被潜艇救起，做了俘虏，现隐居某岛上。另一说则是他简直没有趁“咸北夏”出发往俄国，他从间道往东方另辟一秘密的阵线了。他死难的消息到达伦敦后，战时内阁的同事，长太息者占百分之二十，松一口气的占百分之八十。那时候他的后辈丘吉尔正要进午餐，他们是不大和洽的，闻此噩耗后，丘翁情见乎辞地说：“他这样的死法是很快乐的……”

原来在苏丹战役中，吉青纳不赞成那个年轻的丘吉尔去参加，所以他有点不愉快。

欧战发生后，英法联合对德作战，欧陆的统帅权握在霞飞元帅手上，英国陆军大臣吉青纳不想受霞飞节制，因此拒绝前往欧陆策划，此举深为内阁同僚不满。后来他往俄国开会，也是迫于舆论才成行的。他一出国门就受到敌人袭击丧生，于是有人怀疑德国间谍何以消息灵通至此，其中必有缘故，说他死的神秘，即此也。

假如当日吉青纳不死，到欧陆受霞飞元帅节制，他们能否和衷共济，还大成问题。法国人是不大喜欢吉青纳的，苏丹战役中，英法人争夺埃及苏丹这个地区，吉青纳曾以一军入法国营，拔其旗，迫成所谓“法所达事件”，法国历史家称此举为“吉青纳的挑衅”。自此英法之间便有矛盾存在着，幸遇欧战，彼此为了生存才努力合作。

吉青纳这个人非常固执，但玩到中国古瓷之时，又非常有

趣，好像小孩子贪多一般，金梁先生（字息侯，满洲人，早岁在盛京故宫服官，一度为溥仪的“内务府大臣”，今年已八十三岁，现居北京）常对朋友谈及吉青纳和他别扭的一件事，后来他记在《光宣小记》书中（一九三四年天津出版）。金先生虽身历其事，但其中也有些错误之处，大概对内幕还未知得详细。不过他的记事也可给我们参考，现在尽录于此。

希吉纳（案：这是金先生的译音，其实自第一次欧战以来，中国的标准音译是吉青纳。希吉纳的音译是相差很远的），英国名将也，曾任埃及元帅，老而鳏，爱瓷成癖，自言视兵如子，而以瓷为妻。来游中华，入觐监国（载澧时为监国摄政王——引注），闻盛京故宫多藏佳瓷，请赐游览，特旨允准，并谕选赠二件。余得电，颇为难，故宫瓷器数万件，宋元明清均有，以康雍乾为多，余方建楼陈列，外宾参观，传播海国，遂为希吉纳所垂涎，讵可任其自择，取大器重宝以行？乃先检巨且精者百十器，移贮别库，始导之入。希一览无余，即问尚有佳者藏何处？余答以无，则竟出照片指问，凡所移贮者多在，不识何时何人所摄也。余仍答以不知。希怏怏，选小瓶，小尊，小盒各二件，皆精瓷，苹果绿又称雨过天青者也。尚欲别选佳者，余亟止之，谓谕赐二件，何多取耶？希则以盒加瓶上，谓此一件也，复指尊口曰：“此尚缺顶。”余正色曰：“此宫禁也，幸勿失礼，余亦考古者，奈何谩语！”希赧然不能答，惟必欲强携大器以出，其状如稚子得美食，爱之不能释手，可笑甚矣。时邓孝先（邦述）为交涉使（邓字正庵，江宁人，光绪廿四年翰林，授职编修，官至吉林民政使。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藏书极富，死

后，遗书为中央研究院斥资四万买得——引注），亦陪观，乃调停其间。已见希以二尊纳衣囊，而手各握一小瓶，小盒不能容矣，辄请偕见督帅定去取。锡“文诚”（锡良死于民国六年，溥仪谥之“文诚”）时为总督，适梁燕孙（士诒）在坐，余等偕入见，告以故。锡向梁决可否。梁曰，既有电旨，即多取，亦祗得许之，不可以细故失其意。锡始对客笑允。希大喜过望，亦欢然矣。余乃戏问之曰：“闻君以瓷为妻，西俗皆一夫一妻，君何以多多益善耶？”希喜甚，无他语，惟再三谢，挟以行，始终器不离手也。闻归国后，为其政府所知，竟以此罢官，而希尚引以为幸。余亦幸藏其巨且精者，否则如康熙窑大花缸，高数尺，上绘“万里江山一统图”，倘竟任之流海外，岂不为人笑哉！

所述吉青纳贪鄙之状，颇有趣。他说主张吉青纳予取予携者，是梁士诒，如果此说属实，则梁燕孙的“洋务”可谓办得甚为到家者矣！一面之辞，有时是不尽可信的，于是查一下梁士诒年谱。《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也有记这件事，但并无说梁主张“予取予携”，金先生似乎记不清，否则就是造谣。梁谱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八月条下，记事云：

前英国驻印度陆军统帅吉青纳来华，访先生于京师。先生与吉固旧交也，因留之作十日饮，且陪其遍游京师附近名胜。是月中旬，吉欲回英，拟由大连至日本，再附航西行。时先生亦以关外铁路事，与南满路有磋商之件；且闻日本公爵伊藤博文有不日到连之讯，拟与会晤。因偕吉同至大连，并伴吉游奉天省城。会外务部电传上谕，饬东三省总督锡

良，于奉天内库取古瓷两件赏赐吉青纳。因吉氏酷好中国古瓷，太后以此示睦邻之意也。锡良取江豆红花瓶一对送吉。吉曰“中国习惯，以一对为一件，今奉旨赏两件，是应得两对；今数不合，谨辞。”锡良大窘，商之先生。曰：“此旨由外务部传达，公曷不电外务部代奏请旨，以为从违！”锡即照办，旋得旨准赐吉氏两对。吉喜甚。

梁谱出诸凤冈门弟子所编，也许未经士诒在生前见过的，但材料必有根据，且经叶恭绰先生总阅一过，梁叶交情，非同恒泛，梁必定曾对叶谈过此事的。所以梁谱所记，较近事实。梁士诒在宣统元年，并非一个了不起的大臣，他怎敢自作主张，任吉青纳随意取古磁一如金梁所说。在专制时代，休说梁士诒这样小官不敢作此主张，就是东三省总督，或京里的军机大臣也不敢擅自主张大内珍宝任外国人予取予携的。梁士诒有几个头颅敢说“即多取，亦祗得许之”呢。金先生此说似乎近于无中生有。并且宫廷赐给赏件，也没有任人自由选择之例。金氏又说他在盛京故宫“建楼陈列，外宾参观，传播海国”云云，似乎也不尽可信（这位金老先生的文字，时常夸大）。锡良于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八月奏请在盛京故宫里面设博物馆，任人纵观，摄政王批以：“所有尊藏器物，准其陈列齐整，敬谨瞻仰，毋庸另设博物馆名目。钦此！”（宣统二年八月廿八日朱批）是在宣统二年八月以前，故宫所藏器物，并无陈列任人参观之事，金梁说他“建楼陈列”，全是骗人之辞。我游盛京故宫，也未见有新建之楼来陈列古物。

金梁的《光宣小记》及梁谱都说是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以磁器赐给吉青纳，大有“恩出自上”之意，好像他们深知吉青纳爱好磁器，便赐给他几件，以示睦邻，联络感情似的。但根据《锡良

遗稿》所载，则是这个深爱古磁的英国将军向中国请求的。宣统元年九月初八日，锡良的奏摺中附片《盛京大内恭存磁器提赠英将片》云：

再，前准外务部电开："英将克奇纳(案：即吉青纳的另一译音)过奉游览，从优接待"等因。臣等遵即派委员司沿途接待。并据该英将以久闻盛京大内恭存磁器为世界之宝，吁请恩赏，藉邀荣宠。当经据情电奏，奉旨允准。仰见朝廷怀柔远宾，破格优待之至意。钦佩莫名。该英将旋即到奉，当由臣等恭在大内磁器库内提出康熙年制小花瓶，小花尊二对，宣示廷旨，亲自赠给。该英将感谢恩施，敬谨领讫。兹据内务府呈请奏咨立案前来，臣等覆核无异，除咨报内务府注册备案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元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

从这个附片看来，是吉青纳久闻盛京磁器之名，告知通译，示意清廷赠他一两件的，并非"恩出自上"之意。金梁先生所说的，似乎过于渲染，清廷断不会因外国一个将军来华游历，知道他心爱古磁就赠以大内古磁的。至于锡良因吉青纳初时不肯接受赐件，梁士诒教他请示一节，《锡良遗稿》中没有说及，那是因为"遗稿"这一部分尽是"奏稿"，另有"电稿"尚未付印，将来的"电稿"部分印行，其中也许载有此电稿，那时候我们对吉青纳怎样拒绝赐件就可以得知一二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齐白石早年人物画

朋友从外国寄来齐白石画的人像照片，信上说，这幅画是三十年前从家乡长沙带到外国的。画上有七八个人题字，他只知齐白石是著名画家，但题词的是甚么人他就不知道了。

这幅人像画题名《无爱居士填词图》，是齐白石未享大名以前的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齐白石画人像。人像画在中国画中另有一科，会画山水人物的画家，不是就会画人像的。前代著名的画坛大师写的甚么填词图或行乐图之类的人像画，未必就能描写主人的真容，往往要请写人像画的画师着笔。齐白石本来以画花果草虫鱼虾蟹出名，万想不到他写的人像画有这样高超本领。画坛大师的尊号送给他可说受之无愧。

画中人无爱居士，谭姓，名恩闿，字祖庚，是前清光绪末年两广总督谭钟麟第四子，也即是故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之弟，书法家谭泽闿之兄。钟麟死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年）三月，刚好是谭延闿中会元后一年。谭钟麟有子五人，长宝箴，次宝符，因为早死，没有多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独有延闿、泽闿以文学书法享盛名为人所知，恩闿死得很早，只有三十岁，若非有白石山翁为绘填词图，我还不知有其人呢。

恩闿工倚声，年少好学，以肺病死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八月十六日。其弟泽闿题此图云：

宣统庚戌十月，湘潭齐濒生馆余家，余兄弟倩其摹先文勤遗像，并写先四兄朝服真及此填词图，今三十年矣。俯仰家国，殆如隔世，南望松楸，心目凄断！仲辉奉此图来，展拜恍如长沙夜读对几联吟时，医记数语，不胜潸然！己卯立夏弟泽闿。

庚戌是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过多一年清帝逊位，清朝结束，到民国二十八年己卯，恰为三十年。这时候是抗日战争在进行中，所以有“俯仰家国”和“南望松楸”等语，因为谭泽闿时居上海卖字为活，关山阻隔，不能岁时回乡省墓，所以见像兴感。谭钟麟字文卿，湖南茶陵县人，咸丰六年丙辰登翁同龢进士榜，选庶吉士，授编修，谥文勤。死后，清廷荫其子孙，恩闿得一品荫生，后来加捐员外郎，齐白石为他写朝服遗像，也许便是六品的章服，而填词图穿的就是便服。

谭恩闿有一子二女，子谭光，字仲辉，我只知他曾任中央银行秘书长，解放后，也曾下放劳改，后来释放，安排在苏州文史馆做馆员，一九七七年逝世。长女谭端，嫁上海名医唐约翰之子腴庐。腴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机要秘书，出入与俱。民国二十年六月，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客，腴庐中乱枪身死。这时候我刚进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服务，银行界谣言满天飞，传说宋子文和唐腴庐身材差不多，宋子文在夏天多戴巴拿马草帽，是日不戴，而唐腴庐戴，二人下车，刺客即向戴草帽者放枪，宋子文急避柱后，唐遂为替死鬼矣。腴庐死后，谭端另婚华商卢某，今居纽约，年在八旬以外。腴庐有妹唐瑛，二十年代为上海交际名媛，与陆小曼并称，嫁富商李云书之子祖法，后来因事离异，另婚工舞术之湖南人熊某。

填词图的引首篆书《无爱居士填词图》七字，是黎丞福题的，款云："祖庚妹夫遗像，齐璜绘。游兆摄提格冬十有一月，仲辉甥属题，湘潭黎丞福。"

游兆摄提格是干支丙寅，为民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其时谭延闿为国民革命军军长，提师北伐，已克武汉矣。黎丞福既是祖庚的内兄，图中题词的黎丞礼和他是同胞兄弟抑系从兄弟，未能查考。填词图的布局很简单，图右长松参天，松后有假山石，中间安置书案，无爱居士便服坐案前，案上有纸笔砚台茗碗之属。齐白石题款在山石上，文云："以照片追画谭四爷小像，庚戌冬，濒生。"（下盖白文"白石翁"三字印）

称谓甚恭，可见白石翁为贵介公子写像题款时不敢称恩闿之字，也不敢称其号，不知是不是有自卑感在作怪，亦可见当日的显宦人家，待授子弟读书的西席尊为宾师，至于画喜神的画家，不过是画匠，未足以居宾师之位，齐白石也了解此中大有分别，故在称谓上不便不大加尊敬。如果齐白石在三十年代画这幅填词图，我猜他题的上款必定称"祖庚先生"或"无爱居士"的。因为这个时候白石山翁已名满天下，不是湘潭一个无藉藉名的"画工"，声音也壮大了。

《无爱居士填词图》题咏的名上共八人，题诗者陈三立，题词者陈锐、汪诒书、袁思亮、林肯安、黎丞礼、曾广钧。除陈三立外，都是湖南人。八人中以陈三立在文坛中名气最大，他的老师陈宝琛赠他八十生日诗有"馀事诗文世所宗"，便是说他的诗文在文坛上被人尊为祭酒。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光绪八年举人，十五年成进士，官吏部主事。他的父亲陈宝箴光绪二十三年任湖南巡抚，响应光绪帝行新政最力，三立虽是户部主事，但不在京师做

官，专心在湖南协助父亲改革政教，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戊戌政变，三立得革职永不录用处分。他题的七绝一首云："叔宝神清天所忌，育长影好语争传。按歌松下尊孤恨，不数楞严十种仙。丙寅腊日，散原老人陈三立。"

陈锐填的是《倒犯》一阕："梦影共秋花半零，夜窗如雨，湘鸿叫侣，弦诗地、顿成凄楚。云笺量研，留写相思缠绵语。认画里，翩翩玉貌无尘土。弄瑶华、按金缕。　　秦柳声名，弱岁推衿，词场相尔汝。矫首睎四极，素商疾、长飚阻，竟断绝、垂天羽。念衰沉、人尘悲久旅，料醉墨孤吟、不寄重泉路，片魂归且住。　　庚员外既逝之次年，始获题其填词图，言哀已叹，聊当招魂之赋。调寄倒犯。辛亥八月，陈锐。"

陈锐字伯弢，湖南武陵人，光绪十九年癸巳举人，王湘绮高足，诗词皆工，和陈三立、谭恩闿最称莫逆。遗著有《抱碧斋遗集》，陈三立序之，读之可略见其为人。

光绪初，余居长沙，即获交武陵少年陈君伯弢，其时伯弢方选为校经堂高才生，才锋隽出，歌吟烂漫压湖外。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而好深湛之思，奇芳洁旨，抗古探微，渐已出入湘绮翁自名其体矣。顾伯弢性坦率中褊，善感易怒，既擅文艺自熹，复奔驰求食，颇与世凿枘，世亦指目之曰名士名士云。后就令江南，侘傺忧伤，独盛为词，见推朱、郑，而所遭益困。盖伯弢虽若轻肆志，寄其意于讥诃谑浪，然爱气类，笃故旧，与余相保数十年，即所操持颇持异同，未尝不互怜微尚终始厚情感于冥漠也。大乱兴，伯弢归死故里，久之，谭无畏、瓶斋兄弟，为收拾丛残，督夏叮庵编订诗词若干卷授印成，属余匡庐隐居，缀言弁其端。呜

呼，少壮之俊游垂尽矣，埋照孤诣如伯弢，固应天壤间落落有此人，余方以衰老朽钝，逢迎万劫，遁迹穷山空荒泬中，出伯弢生平所遗诵之，恍惚故人魂魄来下，而哀音苦调，复与岭猿叫啸，山鬼夜吟，邈绵嬗续于终古也。

章士钊先生《论近代诗家绝句》咏陈锐云："长沙才子武陵人，家近桃源懒避秦。诗染江南亡国恨，不辞变雅损天真。""成就词名抱碧居，闲沤老鹤喜相于。却云流落人间稿，怕有生前未削书。"

自注：闲沤、朱彊村，老鹤、郑叔问。君在吴与两君最密。君词云："怕他年人间流落，有相如稿。"

陈三立文中所谓"就令江南……见推朱郑"，指陈锐试令江南，与朱祖谋(彊村)郑文焯(叔问)交往最密。

汪诒书题词云：

荡吟魂，记杏衫笼马，碧浪倒金尊。松径谁招，藜床独据，楚兰一卷空存。问浮世埋忧何地，似春红晓梦在无痕。瘦沈愁潘，镕姜范史，影事微云。　　顾我寒樽衰社、仕花消酒、被寂寞江滨。故国山川，新亭涕泪，老来无计逃秦。最堪叹、啼鸠夜月，对萧萧柟竹总伤神。为念武陵人远，畸和清真。　　君与武陵陈伯弢最善，今亦墓木拱矣。丁卯夏日，汪诒书题记。

汪诒书字颂年，湖南善化县人，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山西提学使。入民国历任长沙税关监督兼交涉员。

袁思亮题词云：

蠹纸魂痕、楚兰一掬伤心泪。故家乔木莽风烟，忍唾行吟地。付与迴肠荡气。尽消磨、偷声减字、莺天雁夜，蝶外蛩边，清愁自理。　　影倩花扶，翩翩玉貌佳公子。山阳笛语，剩凄清梦冷湘波逝。我亦能歌变徵、有斜阳危栏怕倚。荒原草白，尘海桑红，人间何世。

调寄烛影摇红，奉题无爱姻丈题词图。丙寅长至日，侄袁思亮。

思亮字伯夔，湖南湘潭人，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举人，以道员历官农工商部郎中。民国成立，历任工商部秘书，印铸局局长。

林肯安不知何人，他所题的《浣溪沙》已是抗日战争后第二年（即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年也），是此图最后题字的人了。词云：

长吉人间不许留，松荫词笔写闲愁。记曾年少荷青眸。
珠玉尽收灵镜里，羽毛飞上凤池头，几多前辈惜风流。
追和无爱四丈浣溪沙词。丙戌重九，侄林肯安。

黎承礼题《暗香》一阕云：

秋阴盈几，喜带萝萦线、针松垂叶。点拍低哦人瘦，书维剡溪纸。壮志平生几许。知侘傺、蛰雷虫豸。空写恨，转似无言独坐石阑里。　　弹指卅年耳，惊蓟雪陇云，岭烟湘水。隙驹如驶。明月美人各千里。留得金荃残句，待按入青

奴弦子。有几辈、银烛外，泪珠偷泣。

瓶园示我无爱居士填词图，白石草衣笔也。距无爱之亡，又九阅月矣，为谱暗香一阕，以寄幽愫，且以塞君家兄弟鸰原之痛尔。

宣统辛亥四月，丞礼。

黎丞礼字薇生，号鲸庵，光绪二十年进士，以庶吉士改四川崇宁县知县(他的父亲黎培敬，咸丰十年翰林，历官贵州、江苏巡抚，谥文肃)，工诗文篆刻，和齐白石为金石文字交。齐白石刻印的启蒙师就是他。据齐白石的女婿易恕孜所作《白石老人生平略记》说，白石中年时代，想跟黎丞礼学刻印，丞礼故意为难他，看看他有没有诚意，要齐白石把水烟袋那又臭又辣的水喝下为条件。齐白石果然一口喝了。丞礼感其诚意，不仅尽心指点，还把珍藏的丁敬身、黄小松、赵撝叔的印谱送给他。

丞礼辞官回乡后，出任湖南麓山高等学堂监督(即后来的校长)，在山中筑听叶庵，常邀一班名士雅集，诗词倡和，齐白石也有份参加的。丞礼的诗文集似乎并无印行，其稿即名《听叶庵集》，文革时被抄去，恐已不在人间了。

曾广钧题词云：

诉芳心坼、桐花烂熳、飞絮舞楼阴。刻篆擘，裁琼界恨，有人寄托遥深。弹不尽闲愁万种，算一齐分付与知音。白石商声、紫霞越调，同叹飘零。　　旧恨绣阡埋玉，剩鸾肠碧唾，骏骨黄金。吴带曹衣，风亭水榭，能传凄断幽襟。念当日梅妻鹤子，捧楹书，珍重到而今。词苑真灵，画图添个青琴。　　调寄一萼红，奉题无爱先生填词图　　戊辰夏

至，伋庵

曾广钧字重伯，号伋庵，曾国藩孙，光绪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工诗词，有《寰天室诗集》行世。

余肇康题二诗云：

松下清斋沁可人，脩然襟度出风尘。开图欲问丹元子，几费传神太白真。

律细能从绮岁精，先公断句剧分明。休文赢得身多病，县帽姜椒谱四声。（先公论词八绝句中语。）

丙寅小除次日，客申江题无爱居士填词图　倦知老人余肇康时年七十有三。

肇康字尧衢，号敏斋，长沙人，光绪十二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官至法部左参议。

张大千兄弟与曾鲁南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某日，偶然和徐伯郊兄吃午饭闲谈，他说过几天就要去台湾，问我有甚么想买的。我一时想不起，但立即有一件事涌上心头，因为有一位已故又未曾见过面的亲戚和张善子大千兄弟是多年老友，现在台北的大千先生不知能记得此人生前一些轶事？我就托伯郊便中问张先生一下，得些材料，因为我曾见大千写赠那位亲戚的一幅画（今藏天津，我只从照片中得见），知他们交情非同泛泛，一定能给我可贵的帮助。

我的那位亲戚名叫曾鲁南，福建闽侯人，是侄儿高承志的岳父，他们翁婿并未见过面，承志和他的娇女结婚时（一九四六年五月），距鲁南翁之逝已十年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在湖南遇难）。他们在重庆行婚礼，我恰到上海，王辛笛忙通知我，我们就联名拍了一封贺电，过了两年，才知这位侄媳名曾岷生，我马上联想到一定是一九三四年在北平读书的畿生、洛生的妹妹了，果然是她们的胞妹（畿生夫妇一九五〇年后从美国回上海，从事医务工作，洛生今在夏威夷经商）。一九四九年冬，岷生带着她的长子积奇从汕头来香港，候船前往天津与夫婿相聚，我们才见面，但也没有谈到鲁南翁的事。

七八个月前，承志来信说他的丈人名鲁南，年轻时和杨令茀女士是好朋友，杨女士曾给他写过一幅《汾溪偕隐图》，民国廿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年），张大千又为绘《汾溪偕隐第二图》。杨绘的

"第一图"今在美国岷生之兄安生处，杨令茀见图伤情，后题诗其上云云。我问承志，鲁南一定是字，他知不知曾翁的名叫甚么，他也不知道。后来岷生从美国来信说，他的父亲"又名国麟，到底那个是字，那个是号，这个概念我很不清楚。父亲的那辈是排国字，我只记得我的二叔叫国奇。"那么，国麟是名，鲁南是字了。因为我见大千先生所写的"第二图"上款称"鲁南兄"，便知鲁南是字，旧日友朋交际，没有人直称人之名的。先前我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刚好菁窗兄将往台湾，我托他便中问大千先生曾鲁南名叫甚么，尚未得复，而岷生之函已至。（岷生去年夏间往美国进修医科，她本是天津的医务人员，她的哥哥姐姐助她到美国研究二年，住在妹子曾西丽家，妹夫滕健耀是山东人，美国著名脑科专家，喜文事，时时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笔调甚健。）

隔了两月左右，伯郊和我又同午饭，他很高兴的说"不负所托"，张大千和曾鲁南是六十年前相识的，张大千还记得他廿二岁时和善子合写一画给他，并题诗其上。大千还记得诗句，朗诵出来。伯郊对他说："我怎能记得诗句？不如请你写出来吧。"大千随便抓起片纸，写道：

美人名马俱难得，画与南丰喜可知。

此是吾家兄弟笔，留来别后慰相思。

与先仲兄善子合写美人名马图赠曾鲁南兄，时在川北乐至县，鲁南与先兄俱为盐官，予年方二十有二也。

庚申嘉平月，爰（下盖印二）。

鲁南先生是做盐官的，他出身京师大学堂，民国初年考入财政部所属的盐务署，大千兄弟合写《美人名马图》赠他，其时大千

廿二岁，鲁南三十四岁，以此推之，鲁南在乐至县时，为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庚申。一九八〇年的庚申，大千八十有二，他仍能不遑思索，信笔写出六十年前所作的诗，可见他的记忆力惊人。根据岷生的信说，她十二三岁时，在家中时时见到张大千，叫他张伯伯，她说："一九四七年，我偶在家中发见《汾溪偕隐第二图》，和张大千画的一把摺扇(时用竹骨装的，甚清雅)，我都珍贵地宝藏起来，随我南北数千里。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泽恩把此扇交红卫兵，后就遗失了。"(作者按：承志乳名泽恩，我大他三岁，我们小时候是游侣。)

《汾溪偕隐第二图》是张大千先生在民国廿二年癸酉为鲁南先生写的，今藏岷生手上，悬在天津寓所，鲁南时年四十六，大千三十四，俱在壮年，不图此画成后四年，鲁南先生即在湖南之零陵县以交通失事遇难，年正五十。大千先生绘"第二图"题诗二绝句：

> 溪水新添绿有痕，草堂春暖笑言温，
> 图中一角容消受，不羡庞公旧鹿门。
> 小小园林巾带宽，蓬莱清浅话团阑，
> 杨娃笔妙吾能说，荒墨庚庚替写难！
>
> 锡山杨令茀女士曾写第一图，今吾鲁南兄行将五十，复命予为此，画毕戏拈二绝博笑，时癸酉三月十六日，客长沙将归于吴中，倚装并记，弟爰。

画作于长沙，大概此时鲁南先生在湖南做盐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死难，岷生从美国来信略述其父死事经过，摘录如次：

（父亲）自民国初年入盐务署以后，一直在那里工作，足迹遍大江南北，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因公由湖南衡阳到桂林途中，汽车不慎，堕入湖南零陵县内的一条湘江。当时过河，都是汽车开到摆渡船上，由筏工用竹竿撑到对岸的。那日正值中午，筏工都去吃中饭了，汽车开上船过速，以致冲入江心。这是盐务局的汽车，司机与我家很熟的，他也就是我父亲的司机，但是他自己先跳出车厢逃生了（据说当时还喊了一声）。同车只我的父母和一个妹妹。妹妹以后被救活（现居美国洛杉矶。按：即滕健耀大夫的太太），双亲却不幸遭难逝世了。我们当时均甚年幼，哥哥们均在国外，以后待二哥知道由美国赶回，已是第二年（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事了。时值抗战，忙于逃难，这事就不了了之，只是使我们抱恨终天而已。（父亲终年五十岁，母亲五十四岁）先母陈夫人讳孟班，字敏昭，生平酷爱文艺，工诗词，著有《五十自传》一篇，当时我们已初中毕业，暑假回家，读后留下深刻印象。可惜尚未论及出版，就遇到抗日战争，谁知后来连原稿都失掉了，很是可惜。母亲因为是北京协和医院毕业的医生，所以她的英文也非常好的。……

读过这段信札后，鲁南先生伉俪罹难的经过，我才知其梗概，已经使我这个未曾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人泫然欲涕了，何况六十年前的大千居士和他们已有深厚的交谊，在鲁南先生谢世后四十余年，倘使读到他的后人所描述的这段文字，我想老先生在台北一定会老泪纵横，掩卷悼惜不能自已的。

大千先生所绘的《汾溪偕隐第二图》，题字中说第一图是已故杨令茀写的，去年十一月承志的信说，“第一图”今在美国曾安生

手上，尝倩杨女士题句云云。今得岷生来信，更正承志此说，“第一图”早已不知下落，所误作“第一图”者，实乃林琴南所绘的“西溪揽胜图”，是送给他的一位学生名少岱的，后来图为鲁南所得，一九二七年丁卯，请杨令茀题诗。令茀女士与鲁南先生同是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年）出生的。（杨女士生年，根据其兄味云先生自订年谱所说，称她为八妹，乃庶母马宜人所出）岷生为澄清此事，寄我此图照片，并钞录原图题字，现在将全部文字录出，以便参考：

记得西溪揽胜时，橹声轧轧入芦漪，

不知涡水南僧壁，曾否留吾数首诗？

杭州一别，心恋西溪，冬日京寓无俚，作此遣兴，即奉少岱贤弟雅赏，友生林纾。

无复坫坛问字时，画中残墨迎芦漪，

西溪烟水年年在，僧舍谁寻绝壁诗。

女弟子杨令茀题。鲁南学长尊崇师道，得畏庐师遗墨，什袭装池，嘱令茀为之题跋，是真可以警末俗，因题二十八字。时丁卯七月，令茀又记。

杨令茀于丁卯（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题林画，当时她和鲁南都是四十岁，又过十年，岁在丁丑（民国廿六年），鲁南逝世，此画即流出市面，为吾友李孤帆先生所得，一九四二年，曾安生兄弟托人与李君商量，用其他画件易回，请杨令茀题字，去上题已四十五年了，杨为题记云：

一九二八年，曾鲁南学长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示林畏

庐师所画西溪揽胜图嘱题，时经四十四年，哲嗣曾安生博士回北京，此图数经丧乱，得归后裔珍藏，携来西海之滨，为序五十年世谊，诚艺林不可多得之事也。

一九七二年九月，杨令茀，时年九十一笔，退居康美尔。

二年后，杨令茀又题一诗云：

涡水重题倍惘然，吟近仙峰化云烟。

惟余一片西溪水，并入湘江吊逝川。

三度重题此图，时年九十三笔，杨令茀。

令茀是一九七九年谢世的，苇窗兄从台北回来证实这个消息，说死时是九十一岁。她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为公元一八八七年(其胞兄味云先生自订年谱所记，味云也是我的老友)，到一九七九年正九十一岁，何以她在七二年题画时自署九十一，七四年署九十三，真不可解，是不是和齐白石那样瞒天过海“报大数”以求吉利？

一九七八年，苇窗兄给我看一部台湾出版的新书，名叫《翠薇嶂》，杨令茀著，翟国瑾译的(英文名：Romance With Virtue)，大概是回忆录之类，令茀的艺术造诣本不高，我对她没有甚么兴趣，倒是她的长兄味云先生(寿枬。是个理财家，曾任财次，后为工业家，诗文均有极高造诣，抗战胜利不久谢世)和我很熟。苇窗兄叫我写一文谈谈这部书，我在车中随便翻翻，原来是一部向洋人介绍中华文化的自传，书中有一段说住在故宫里的那个过时“太妃”，时时请她入宫居住，任她随便观摩所藏字画云云。向洋人搬出封建宫廷的一鳞半爪，是很可以吸引他们的。杨

女士著书给洋人看，以出入故宫，纵观内府珍藏来自高声价，是可以理解的。(溥心畬先生曾言，人家以为他是王孙，可以见到内府书画，其实“逊位”——民国成立之代名词，溥先生不忍说大清灭亡也——以后，宫禁仍如前森严，一切制度和规矩皆如旧，他就从未自行入宫，索观书画，所藏的东西，还是后来在故宫博物院见到的，溥先生所说的是实在情形。“太妃”当日还搭皇帝架子，杨女士和她既不是如唐石霞那样有亲戚关系，哪会请她在故宫居住，自由出入之理？金城(拱北)则以有内务府人员和他有交情，得溥仪许可，让他入宫临摹一些古画，又为溥仪刻过一些牙章，其中一方还是“宣统御赏”的。至于杨女士得“太妃”许可云云，欺人之词也。)

我把《翠薇嶂》略翻一过之后，发觉所说的多不可信，所以就不想写“杨令茀其人其事”一文了。今年三月，岷生从加州来信，略谈到杨令茀事，其中有云：

> 我知道杨令茀八姑的时候，那还是很小时，那时只有五岁。我没有见过她，对她的一生和她的事都不清楚。叫她八姑，因为她行八。她到美国后，与安生夫妇很熟，因她独居康美尔，年事已高，所以安生夫妇常去看她。她也常来信叫他们去看她。去看她时，带些大白菜之类(因那个小山上买青菜不容易)，她则准备些鱼虾等候他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很重视这位老画家诗人，曾为她出了一本很考究的《三渡太平洋杨令茀教授诗画集》。一九七二年安生回国时，曾携杨著的诗集《山远水长诗文集》送给章士钊等；此地有位洋人(我忘了名字)给她写了本传记，索价十三万美元(要求在她的遗产中扣出)，康乃尔法庭要求安生出庭表示意见(这是此

地风俗，因为八姑的遗嘱中也有安生的名字，作为她的遗产承继人，遗嘱中的承继人多了，有近廿人）。待我们去时，已判给那洋人八千元。安生宣布不接受她的财产，如真有的话，这些钱应该给国家。其实杨的财产不很多，现仍被看管着。……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游无锡回来后，不久即闻杨女士的死讯，我想多知她生平一些事情，就写信往上海请教郑逸梅先生，他回信说所知不多，已托无锡朋友查问。七月十六日他有来信了，所得的材料甚为正确，可资参考，摘录如次：

谈到杨令茀，为无锡杨宗济之幼女（宗济曾任清溧阳县学教谕），亦即杨寿枏之同父异母妹，光绪丁亥生，曾在上海读英文，为冯绪承之得意女弟子。又从吴观岱学画山水花卉人物，但不卖钱，到南通受张季直招待，又至北京拜访樊增祥、陈宝琛等，著有《莪慕室吟》一册。诗如弔朝鲜故宫"□枯塞北千重雪，篱菊山枫岛国秋。凭弔殷墟旧宫阙，含情重忆凤皇楼。"诗两见"重"字，但一作平，一作仄，无妨也。

杨寿枏居天津，令茀曾住居其兄处，后住廉南湖吴芝瑛夫妇寄居之翊教寺。

令茀抱独身主义，但为父母所逼，嫁与常州人李氏，当天拜堂后，新娘在新房中坐一整夜，天明脱去新装，服带来之旧衣溜还无锡。且与新郎讲明，任他娶妾，费用归她负担，本人永不再来常州。

令茀有一侄杨通谊，荣德生之婿，留学美国，家富有，

为章行严门生。喜涉讼，闻与其岳父亦打过官司。

令蕙做过大观园及颐和园模型，又临有中国历代帝后像。先后在上海、南通、北京、朝鲜、日本开展览会，最后到美国，定居费城。展览会及鬻画收入甚丰。

弟藏有其画一帧，曾见过一面，但所知不详，兹询诸锡友，即以奉告。……

《味云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年），三十八岁栏内，记云：

八妹令蕙出阁，妹婿为同邑李涤云、福康。

逸梅信说"嫁与常州人李氏"，味云说"同邑"，以无锡县旧属常州府也。《年谱》中当然没有添上她婚后的事情，无锡人说她"抱独身主义"，旧日男女婚事，皆凭媒妁之言，女子如认为对方有不合己意之处，而又无力反抗，只有出于抱独身主义为消极的抵制，但亦未必能有效。假使无锡人所传的属实，杨女士拜堂后能脱去嫁衣，还我初服，溜之大吉，已属少见了。

代曾安生兄妹求李孤帆易回《西溪揽胜图》的于去疾，岷生函中没有说他是甚么人，只称他为"于去疾老伯"，我想打电话问孤帆先生，又因为他年老，讲话困难，又怕他一时记不起四十年前的事，所以不便去打扰他。岷生钞来的于去疾题字，可知此画失而复得的经过，录之如下：

此画之两侧为于去疾老伯题字：

此吾师闽候林琴南先生所作画也，卅一年，偶见之于吾友李孤帆之客室，视其款识，则赫然为同学曾鲁南故物，归为其哲嗣景贤、畿生等言之，时鲁南夫妇已殁五年矣。景贤

兄弟颇知珍惜先世手泽，亟谋光复，幸孤帆慨然允诺，余因以旧藏张寒杉红梅一幅易之，并题四绝，以付景贤，俾知此一段文字因缘，非寻常失画得画比也。画中有诗一首，无锡杨令茀女士题，亦琴师门下弟子，故并及之。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江都于去疾并识于金刚坡之十万苍松一草庐。

于去疾题的四首诗，抄录如后：

记得宣南问字时，猘儿终竟负明师。琴师批余文有猘儿未易当也之语。
何期卅载干戈后，尺幅犹留画里诗。
卅年友爱如昆季，风雨湘江哭阿摩，
此日还君一幅画，梦魂可许再相亲。
杨家有女擅奇才，共向程门立雪来，
留得数行遗墨在，辽天双鹤漫相催。
助来佳话谢青莲，得失都应有夙缘，
付与贤郎自珍惜，南丰世泽好绵延。

手上有一九〇六年丙午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影印本（藏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为江亢虎捐赠之物，江曾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不见有曾国麟、于去疾的名字，教习中亦不见有林纾（琴南）之名，大概他们是宣统纪元之后才入学的。曾鲁南的事迹已得知七八，但他的三十年老友于去疾，我在这里不能对他略作介绍，是极端遗憾的事。最近两月，我设尽方法寻找有关于去疾翁的材料，都没法得到一鳞半爪。六月九日，忽然记起他既是江都人，又会作诗，为甚么不找找江都杜召棠的《惜余春轶事》呢？也许有些帮助。幸而一找就找到这本小书，在第五十二页中，赫然有于去疾的名字，大喜过望，亟录之如次：

于去疾，具天才，性狂放，早年参加同盟会，随总理事笔墨，以孤傲不得志于时。总理奉安之日，党国元老均趋陵前敬悼，有声随泪下者。去疾礼毕后，仰天作狂笑，群诧之，去疾曰：“孙子荆弔王武子作驴鸣，所以报知己也。总理革命未成，今军阀扫除，南北统一，总理有知，当含笑于地下，吾今大笑，亦所以报知己也。”众韪之。（此书一九五九年一月在台湾出版，作者杜君，时年已七十余。）

《美人名马图》和《汾溪偕隐图》或许尚在人间，倘有一日能归曾氏后人所得，则延津之合，将传为艺坛轶事了。

曾习经与夏孙桐

月前朋友文江忠先生打电话问我，有曾习经写的一个扇面，值不值得买？我答："刚甫先生写过的扇面很多，有些是草草酬应之作，买不买无关紧要，如果是写自己的诗，又是送给知己朋友，而此人更是诗人文士的，就要见一件买一件了。你看看扇面的上款写的是什么？"他说"闰之同年出守吴兴。丁未三月，习经。"我心想一定是送给夏闰枝先生的了，夏先生于光绪丁未，以翰林外放湖州知府的。我问江先生："闰之两字怎样写的？"他说："闰馀成岁的闰字，之乎者也的之字。"我说："是词人夏孙桐先生了，应该买来收藏。"

江先生买后拿来给我看，不错，是写赠夏孙桐先生的。《蛰庵诗存》（曾先生死后，根据诗稿手迹影印的）题作《送夏闰之守湖州》。夏先生字闰枝，也有人写作"之"的，字与号，可以同音相假，名就不可以，因为要尊重人家的大名，如果把夏孙桐写作荪童，就有点不敬了。

曾先生手稿那首送夏闰之诗，和写在扇面送出的诗，末句稍有不同，而项联也有一字不同，可见集中此诗还是未定稿，今见此扇页，可作校订资料：故交从宦起差池，又见湖州杜牧之。四十专城非畹晚，万人如海见心期。过江历数吴兴守，作郡偏怜罗友辞。惆怅金绒春系马，别情唯有柳丝丝。"

我说曾刚甫先生应酬写的扇面不少，是也有根据的，旧日京

朝风气，无论做官的人或书画家，都以写个扇面送人联络感情，亦有人向达官贵人或书画家求个扇面。我初识曾习经的名字，远在六十九年前，就是见到有人在北京求得曾先生一个扇面送给我的大侄高伯昂。这一年是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年)，这年暑假，张淑岱从北京回汕头，他是北京法政大学学生，他的哥哥淑楷，由先父提携，资助他在汕头开设嘉陵银庄，从此发家，把他三个胞弟都安置在汕头自设的商号。淑岱是他的最小弟弟，金山中学卒业后，淑楷要培植人才，不想把他放在生意场中，才派他到北京习法政。(一九三五年后，淑岱以哥哥的生意全部失败，才在汕头做律师，土改时逝世。)

张淑岱求得曾习经写给大侄的扇面，是一首七绝，似系苏诗，三四十年前我还能成诵，现在只能记得第一二两句了，那是："断雁声边小雨来，菊花强半卧苍苔。"上款书"钰恩仁兄正"，下款"曾习经"三字(钰恩是伯昂的乳名，一般人称他为钰少的，到二十岁后，他在汕头商场活动，才取字伯昂)。这个扇面写得很好，但不知曾习经为何人，直到民国十一年寒假我到汕头，张淑岱也从北京回来度岁，问起来才知是进士，揭阳人，现时住在北京，是前清官吏。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仰慕他的学问品德，好几次请他出任财政部要职，他都不肯。早年我所知的仅此而已。

昔年潮州人在北京有时望而为后进景仰者，大抵有两人，一为曾先生，另一个是吴贯因先生。吴先生是澄海人，曾先生在前清做四品官，清帝下诏退位前一日就辞职，洁身自退，以遗民终。吴先生则是民国成立后才出任内政部司长的，但时间极短，此后便在北京各大学和沈阳东北大学教书。潮籍学生到北京求学，如果这人留心文艺又能有仰慕前辈先生心态的，没有不上门求见，尽后辈之礼的。张淑岱既是学生，当然想时时亲炙名人，

故此常到曾公馆走动，求个扇面带回来给东家的大少爷，也是常情。（吴贯因先生留日早稻田习政治经济，在东京时与梁启超为友，后亦为进步党的重要干部。孙家哲在北京大学时，也时时走动吴公馆，后来还行拜师之礼。九·一八事变后，吴贯因与章士钊离开沈阳，回到北平，这时候，他的门生孙家哲在陈济棠手下红极一时，竭力向南天王推荐乃师为教育厅长，亲往北平迎吴先生南下，和南天王见面几次，吴先生觉得此人未足有为，叶公之流耳，就不肯留下来做事，要回北方；但也愿为南天王在天津办一个杂志，与南天王的明德社、学海书院遥相呼应。于是主编一个月刊，定名《正风》。一年后，吴先生以劳瘁编务，得病不起，但南天王亦倒台了。我初到北平时，杜国庠先生写信介绍我往见吴先生，杜先生往日本留学，是吴先生带往的，情谊在师友之间，杜先生回国，任北大教授，便是由吴先生推荐，但两人论学的观点不同，吴主正统派经济学说，杜主马克思学说，一九二九年后且为共产党。）

曾习经先生辞官后，没有回故乡隐居，他爱恋克华和旧时同官的朋友，把十年积存的微薄官俸，不足五千元，买北京附近的杨漕良田百亩，又盖造瓦屋数间，搬往居住，要学陶渊明亲自耕田，过隐士诗人的悠闲生活。但民国时代和一千年前的东晋究竟不同，他又不懂得耕种，只能靠有经验的农夫来主持种植，遇上水旱失败，不仅入息全无，还要应付苛捐杂税，两年之间，曾先生吃尽苦头，只好放弃作田园诗人之想，搬回北京居住。晚年景况，我们从梁启超先生为《蛰庵诗存》所作的序文，可觇一二。文中不止透露了曾先生罢官后的生活，还介绍他的为人和诗的作风，摘录如次：

刚父之诗凡三变，早年近体宗玉溪，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时作幽咽凄断之声，使读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经宛陵，摩垒后山，斵雕为朴，能皱能折，能瘦能涩；然而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异乎貌袭江西以狞态向人者矣。及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生平于诗不苟作，作必备极锤炼，炼辞之功什二三，炼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犹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故为诗数十年，而手自写定者仅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善读刚父诗者，盖可以想其为人，抑得其为人，然后其所以为诗者，乃益可见也。刚父与物无竞，而律己最严，自出处大节，乃至一话一言之细，靡不以先民为之法程，从不肯藉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于事有所不为也，于其所当为者及所可为者，则为之不厌，且常精力弥满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不屑不洁，其天性也。……其择友至严峻，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其所亲者，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见。当其盛年，数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贰，历二纪馀，综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办。盖在清之季，谙悉食货掌故，能究极其利病癥结者，舍刚父无第二人。及清鼎潜移，则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仕而去，盖稍一濡滞，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烛光机以自洁，如彼其明决也。……刚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难，故去官则无复馀财以自活。刚父泊然，斥卖其所藏图籍书画、陶瓦之属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饱，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歌不畔者十五年。呜呼，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

为诗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洁，其称物芳，蝉蜕于浊秽以游尘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读刚父之诗矣。刚父长余六岁，其举乡试于余为同年。余计偕京师，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余亡命十馀年而归，归后屡值世难，不数数相见，刚父虽谢客，顾以余为未汩于世俗也，视之日益亲。去岁六月，刚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则出一卷相属曰："手所写诗，子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疗于海滨，将以归后卒读，而有所论列，归则刚父病已深，不复能相谈笑矣。刚父既没，余与叶玉虎暨二三故旧襄治其丧。玉虎曰："此一卷者，刚父精神寓焉，且手泽也，宜影印以传后，子宜为序，乃序如右。刚父讳习经，亦号蛰庵居士，潮之揭阳人，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时年六十，其卒后一年，岁在丁卯，三月之望，新会梁启超序。

刚父先生病逝后，梁任公先生有信通知乡举同年的张菊生（元济）先生，梁先生的信说的甚么，未见，但张覆梁的信，收录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一九五七年七月，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五年前，北京又根据丁稿，编印出版，改称《梁启超年谱》）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栏下十月三十日，有《张元济致任公吾兄同年书》，略云：

得手示，惊悉刚父同年遽尔怛化，其病中景况如此，闻之惨恻。子女共有几人？成立者有几？时局俶扰，南北分裂，灵榇未必能返潮州，其夫人是否仍居京师，均甚欲一闻

知也。兹先寄去奠敬一百元，谨祈转致曾年嫂，并代致唁。已成挽联一副，稍迟当速寄潮州馆也。

曾先生无子，我曾听人说，他死前以侄曾靖圣为嗣，未知确否？至于他的灵榇却没有运回故乡安葬，一九五三年，叶恭绰先生有诗二首：

今春北京市府迁城中旅殡，余因改葬曾刚父于西山幻住园

幻住同归似夙缘，依然歌啸旧琴尊。
幽冥纵隔谁宾主；樵牧无侵即子孙。（刚父已无后）
历劫幸留诗卷在，一坯倘藉梦华存。
他年燕市探名胜，合认桃花访墓门。
几许朋簪各返真，伤怀吾亦属陈人。
愁多讵羡生前酒；事往都成陌上尘。
死后卜邻如有约，归欤同穴似相因。
春来伫见花如锦，剩抚孤松各怆神。

幻住园是二十年代叶先生所筑的墓园，以葬其爱姬的地方，当时曾与齐白石相约，将来结邻于此（齐白石绘有幻住园图），后来罗瘿公逝世，也在此安葬。稍后，又与梅兰芳相约，但中共认为他们两人皆有功文化，准葬八宝山，幻住结邻，只成空话，即叶先生本人死后，也未能归葬园中也。（“四人帮”倒台后，叶公获平反，似乎准入革命公墓，尚须查考。）

梁任公先生对于曾刚父先生可说极尽友道，曾先生身后事，他和叶恭绰先生尽力帮助，更为曾先生的后人打算，设法把曾氏遗书出卖，使死者家属得多一点现钱，维持一时生活。他写信给

江翊云(庸)先生，托他向东方文化会介绍收购。是年十二月三日，致函江先生云：

> 亡友曾刚父身后萧条，同人为谋遗族抚养(原注：弟与叶玉虎实负全责)，不得已处分其藏书。书虽不多，率皆初印精本也。环顾力能任此者，舍东方文化会外无它望，其书目已由玉虎交与爱理，开评议会决定时，盼公力予主持。会中人除书衡、沅叔已函托外，尚未能一二疏通，公有为力之处，乞不吝吹嘘，感且不朽。刚父诗集新印成，谨呈一册，并希詧存。(按：书衡、沅叔为王式通、傅增湘字。)

任公先生为曾先生诗集作序，对其人立身行事及诗文的艺术成就，予以高度的评价外，又亲撰《曾习经进士像赞》云："卓荦之才，而视物以无竞；婣直之性，而与人以可亲。其施于政事者，文理默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伟；其发为文词者，幽怨悱恻，而愈显其怀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挽天下之溺，则归洁其身而节以贞，六十而返其真。呜呼！此揭阳曾刚父左丞，为清代第一完人！"

刚父先生择交至严，如任公先生所说"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故此他生前所期许者如任公、玉虎、蒨生诸公都能竭尽友道，至于所亲的三五知友，未见于任公诸公简端者，则有清史馆总纂夏闰枝(孙桐)先生，刚父任事户部时，夏先生在翰林院供职，与王乃徵、秦树声、朱祖谋皆为词友，在京曹中踪迹至密者。朱彊村晚年编《沧海遗音集》，收录当代词人集十一家，曾刚父《蛰庵词》一卷、夏闰枝《悔盦词》一卷并列。(与夏先生同于光绪辛丑广东乡试正考官的裴维侒，有《香草亭词》一卷，亦收录，

他们可谓有文字因缘)。

夏闰枝先生一字悔生，晚号壬庵，江苏江阴人，光绪八年壬午科第一百十七名举人，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曾刚父先生是光绪十五年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但到十八年壬辰才补行殿试，故与夏先生为进士同年。

三十年前，陈叔通先生抄给我一份他所作的《江阴夏先生墓志铭》(另一份托我转交唐天如先生，他们都是清史馆纂修，讲究古文的)，叙夏先生宦历，有云：

> 光绪壬午监生举江南乡试，纳资捐主事，分刑部。壬辰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戊戌、癸卯两充会试同考官，庚子简四川乡试副考官。义和团事变起停试(按："考官"之下，"停试"之上，有浓墨涂去二字，叔通先生亲笔改添"义和团事变起"六字。盖文成于一九四九年之前，而寄我则在一九五六，大概原文是"拳乱"或"匪祸"字样。甚触时忌，邮寄时改之也)，折赴行在，辛丑简广东乡试副考官。京察记名以道应用。……丁未简浙江湖州府知府，先署宁波府知府，护宁绍台道。

以上叙夏先生以资深翰林得试差，在广东得士甚盛(此科中举的人，后来皆有名于时者，如在香港澳门的翰林岑光樾、区大原、李翘燊、黎湛枝；在交通界的关赓麟，词人杨玉衔，版本学者伦明，革命的胡汉民等十馀人)，于是经过政府考绩，交军机处登记他的名字，外派为知府、道员。到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湖州府出缺，就派他去做知府，带缺上任，无须候补。

夏先生到浙江报到时，恰遇宁波府出缺。宁波是重要地方，

知府由北京简派，但一时未有人可以即时补上，故此浙江巡抚一面派夏先生署宁波府，一面奏明朝廷，待派到的人来后，夏先生才回到自己的本任。墓志文叙他在宁波、湖州及护宁绍台道各任上的治绩甚详，巡抚冯汝騤上奏朝廷，密荐其治行，朝廷即交军机处存记，以待简用，后来调杭州府知府，因改革弊政，大违巡抚意，仍调回湖州，不久即升用道员，尚未到职，辛亥革命，遂归隐乡里。

民国二年，政府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尔巽以夏先生在史职久，习掌故，聘他入馆任事，后来升为总纂。尔巽死后，柯劭忞继任馆长，其时北伐军已到华中，北京易帜将在旦夕，金梁乘机改窜增减已成的传记文字，匆匆付印。清史馆解散，夏先生就隐居北平，以著作自娱。志文续云：

> 平生精力，太半殚于著述，矜慎不苟，言必以诚。……自定《观所尚斋文存》七卷，《诗存》二卷。中岁即工倚声，与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相倡和，有《悔盦词》一卷。……辛巳（按：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是年日寇攻取香港）重宴鹿鸣，犹赋诗徵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疾终旅第，遗命不赴，春秋八十有五。……

我客居北平的时候，总想往拜候夏先生，因为他到广东主持乡试时，先兄绳之先生曾应试，未中，下一科癸卯才获隽。一九三六年和杨千里先生同寓北辰宫公寓，他才带我去见夏先生。他知道我跟心畬先生习艺事，索我画山水一幅。卢沟桥事变后，我移居香港，夏先生写扇面托陈叔通先生寄给我。

女词人吕碧城

今人龙榆生所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一九五六年出版)，从明末的陈卧子起，到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陈曾寿死为止，而以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死于香港的女词人吕碧城殿后。此书一共收词家六十七人，女子的作品只收顺治年间的徐灿(字湘苹，陈之遴妻，即苏州拙政园的主妇，著有《拙政园诗馀》)四首，民国年间的吕碧城五首，选择不可谓不严了。(我觉得很奇怪，道光年间的女词人顾太清也是一作家，何以落选。)龙榆生以吕碧城为殿，未必是以此人来结那一个时代的词局，但他偏偏抬出一位六十年间罕见的才女来殿后，倒也是很有趣的。这位女词人与以往的谨守深闺的女词人大不相同，她不仅懂得外国文字，而且久居欧洲，晚年客死香港的，所以值得介绍一下。她中年时候尝游邓尉，很喜欢香雪海的风景，大有死后埋骨于此之意，因作诗为券，有："青山埋骨他年愿，好共杨花万祀馨"之句(见《翠楼吟》词自注)。可惜她不能如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她从瑞士取道美洲到了香港，初时住在山光道。后来移居东莲觉苑，日寇侵略香港后，她闭门念佛，为世界人类祈祷和平，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四日，以疾逝世，年六十岁。临死时，神志清明，只占七绝一首，与世告别。诗云："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将尸体火化，骨灰和面搓成丸子，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她大概也

愤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能力驱逐倭寇，不作邓尉之想了。

吕碧城是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的，字遁天，号圣因，晚年因学佛之故，法号宝莲，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岐（字瑞田）是光绪三年丁丑科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放过山西省学政（下一科他们吕家又出多一个翰林吕佩芬，不知是吕碧城的什么人），所以她就是翰苑之家的一位小姐。她的文学天才极高，从小就精诗词书画，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称。那是指她的长姐惠如，次姐美荪和她而言（她还有一妹名坤秀，虽工诗文，然不如诸姐。时贤多言碧城为吕提学季女，误。）林庚白自视甚高，轻易不许人的，但他的《孑楼随笔》有一则曰：“余欲刊近三月以来所作诗词及语体诗都为一集，而苦无以名之，偶见旌德吕碧城女士诗，有“早知弱水为天堑”之句，几失此佳名。乃思以弱水名吾集。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岁己酉（案：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余年甫十三，读书天津之客籍学堂，尝私往窥伺，时碧城裁二十许，主女子公立学校，为时流所重，其诗颇有神似玉溪处。余尤喜天风及崇效寺看牡丹两律……皆置诸义山集中，几乱楮叶，而天风一首，竟似为余三年来写照，读之使人迴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从这段记事，可见她的诗才一斑。（庚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到香港，日寇占九龙后，庚白一日出门，为寇枪击毙命，他到香港只有八天就遇到战争，似乎没有和吕碧城相见。他作随笔时，乃一九三三年也。）

吕凤岐逝世是光绪二十年甲午，那一年吕碧城才十二岁，她在天津依娘舅读书，十五六岁时，她的诗词文字就为老辈所推重，樊樊山是吕凤岐的同年进士，吕碧城叫他做年伯的、樊山入北京时，拜读她的作品，赞不绝口。过了几年，傅增湘创设北洋

女子公学，聘她做总教习，未几升任监督(即校长)。光绪三十四年，严复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到天津，是年七月吕碧城请他教授名学，据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是年条下注云："有女学生旌德吕氏(案名碧城)，谆求授以名学，因取英人耶芳斯名学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这个时候，吕碧城的英文粗有根柢了，经严复的指导，译成《名学浅识》这是她译书的第一部。她先后所著的书有《吕碧城集》，《信芳集》，《鸿雪因缘》，《晓珠词》，《欧美之光》，《文史纲要》，《香光小录》，《雪绘词》，《观经释论》等。

辛亥以后，吕碧城主持的那家女校停办了，她奉母亲住在上海，专心研究英文，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这一段时期，她真是闭门下苦功，因此中西文都有极大进步。一九二〇年七月，她自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为旁听生，研究文学，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后来又转去欧洲，漫游英、法、意、瑞等国，写有游记，名《鸿雪因缘》，首先刊于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自一九二六年，她就卜居瑞士，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曾以英金二十镑资助英人福华德出版其所著护生之书。碧城早年才华艳发，二十以后迭经家难，两个哥哥，一姐一妹先后死去，又和二姐美荪因家产涉讼，种种不如意事，使她精神上大受打击。有一年她寓居伦敦，偶然读到印光和尚嘉言录，她得到启示，自此即潜心佛典，用英文来阐释佛经精义，宣扬佛教，这时候她家散人亡，孑然一身了(她自视极高，一向未易求偶，以独身终)，她的浣溪纱词云："莪蓼终天痛不胜，秋风萁豆死荒塍，孤零身世净于僧。　　老去兰成非落寞，重来苏季被趋承，不闻詈詈更相凌。(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卅载者，其人一切行为，余概不预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读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所

指“情死义绝”之人，似系吕美荪，姊妹之间，因何事而致此不共戴天，真不可解，若说因家产之事，恐不如此简单也。郑逸梅先生所作的《味镫漫笔》（此书刊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只印二百本分贻亲友，非卖品也），有“吕碧城刚愎性成”一则云：“……其姐美荪，亦有诗才，惟不多见，或谓工力在碧城上。姊妹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友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则曰：“不到黄泉毋相见也。”时碧城已耽禅悦，空中悬观音大士像，即反身向观音礼拜，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戚友知无效，遂罢。其执性刚愎有如此。”上面所引两段文字，一是她的自记，一是别人所记，可见姊妹交恶之深，且有“不及黄泉”之誓，则其失和非因细故矣。

关于吕碧城的词，我也要详说一下的。她的词集《信芳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她又将近作与《信芳集》厘定为四卷，名《晓珠词》，卷末附“惠如长短句”（惠如遗稿散失，只得廿五首，所以不能印专集，附印于后）。题《信芳集》者共三人，计：陈飞公（完），徐姜盦（沅），樊云门（增祥）。陈完沁园春前小序云：“昨与寒云公子夜话，泛及当代词流，公子甚赞旌德吕碧城女士……因以女士自刊信芳集见示。不慧寻览一过，奇情窈思，俊语骚音，不意水脂花气间及吾世而见此苍雄冷慧之才，北宋南唐，未容傲睨，今代词家，斯当第一矣。……”樊樊山除题金缕曲一首外，几于每首皆有评语。浪淘沙一首，评以：“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原词云：“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又前调一首，樊山评以“此词居然北宋。”词云：“百二莽秦关，丽堞迴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何处著，如此山川。　花月自娟

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处住，如此华年。”评清平乐一首云：“南唐二主之遗。”齐天乐一首云：“此等起句，非绝顶聪明人不能道。仙心禅理。”念奴娇一首云：“松于梅溪，细于龙洲。”祝英台近一首评云：“稼轩宝钗分，桃叶渡一阕，不得专美于前。”其他好评不胜枚举，吕碧城可当之无愧的。我们从这些评语来看，可知她词学造诣之深与天分之高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

长安印丐寿石工

印匄（即丐字）是故友寿石工的别号，本来风雅人士，不大喜欢取这些不好的字来做名的，但石工满不在乎。原来一九一五年，陈师曾和他同在北京，赠他的诗有"人海长安称印匄"之句，他那时候已在北京卖篆刻，所以索性就用印丐这个别名，给人刻印所署的边款，大都刻"印匄"两字。

石工是一九五〇年逝世的，到今年已是十周年，我想趁他的十周年祭，介绍一位有趣的北京印人给南方的读者。他刻印写字在北京很著名，称为北京印人，谁都不会反对的罢。不过他的印名不出北方五省，仍然是地方性的一位印人，不像吴昌硕、齐白石那样驰名全国。

寿石工单名一个玺字，字石工，一字珏盦，别号印匄、冷君，又有许多外号如：破荷亭长、辟支尊者、南方墨者等等，细数下来，不下二十多个。他除了别号多之外，还有五多，那就是刻印多，写字多，填词多，藏古墨多，藏时人扇面多（约有二千馀页），是个以多为贵的人，但他并不以财多，他刻印写字取值极廉，也和我一样，只求稿写得多，卖得快，不计稿费多少。他是浙江山阴人，常称"山阴寿玺"，山阴自清亡后已改为绍兴，但他从不称绍兴人的，他的父亲在北方做幕友，曾跟过山西巡抚俞廉三，石工后来似乎也在山西和东北当过幕友，到一九一二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定居下来，以卖艺及教人作词为活。

故友杨千里（天骥）工篆刻，工力韵味，皆在石工之上，他曾对我说，一九一四年他和石工同住北京一屋，石工时时将所刻的印拿来向他请教，千里教他尽去明人戏鸿堂印谱那一类的恶俗之态，专摹汉印，旁学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必能尽去俗气。石工果然将旧作尽行磨去，重新来过。

石工刻印极快，因为他刻得很熟，熟自然能快。和他同时的印人如乔大壮、陈师曾、杨千里、王福庵等，都要在印石上先写好了字才奏刀的，乔、陈、王三人，甚至写得很工整，还要照镜，看字形正不正，配搭好不好，杨千里寿石工就不照镜了，约略在印石上写个字形就算（李茗柯、邓尔雅皆如此）。人称齐白石刻印不必写，下刀就成字形，这不一定可靠，简单的字还可以（例如白石二字，我刻起来也不必写呢），笔画多，字数多的，就难了。其实印之好丑，不在写不写，谁能在刻成后分别出来呢？

填词之多，也是石工一特色。曹经沅题石工的“珏盦填词图”卷子诗云：“三绝名高辇下驰，垂垂肘印当家资。词人强半城西住（兼谓倬盦、联园、大壮诸子），几度驱车访辟支。”“坫坛藉甚说同光，绝代彊村诗半塘。低首觉翁君最久，好从坠绪辨微茫。”从这两首诗中，可约略窥见石工之为人，“三绝名高”，指他的印、字、词，这三绝他在北京驰名是不错的。石工致力宋词极深，自称“佞宋”，对于梦窗和稼轩，尤有心得，朱祖谋赠他的词有“火传四明”之语（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人。石工尝取“火传四明”入印，也请杨千里刻过此印）。所以他对于朱祖谋有知己之感，朱翁逝世，石工有鹧鸪天二阕，用朱翁自挽韵挽之。今录于此，使读者欣赏一下他的词。词云：

臆碎匆匆泣羽分，江南遗恨削寒温，名山剩有千秋业，

虫简翻期一字恩。　　花月夜，薜萝身，东风如海了词人，泪痕点点成孤忆，鹭老苹愁渺圣因。

笛里呼杯见往因，短笺传句愧闻人，黄垆宛宛长安市，白发萧萧德裕身。　　空雪涕，枉书恩，兰依熏夕玉流温，劫灰轻换宜春字，海上阴晴惨不分。

石工藏墨极富，多明朝精品，其中四笏，死后为清华大学教授张子高所得（子高名准，湖北枝江县人，今年七十三岁，久任清华化学系主任，藏墨极富，名其斋曰石顽墨艳之室）。石工藏墨之室曰玄尚精庐，著有论墨之书曰《重玄琐记》（稿本）。

北京文人互相交换扇面，成为风气，石工居北京四十年，和当代书画家、名人交换的扇面不下二千页，死后不久，已陆续流入北京冷肆，去年沪友见市上有石工夫妇给我写的扇面一，问我要不要收回，我赶快写信叫买，但已为人捷足先登了。因此我手上并没有他只字（本来有他几个扇面，二十年前在上海、马尼拉失去），真是可惜。石工的原配，于一九二三年死于北京，继室宋君方女士，湖州人，今在北京以写画为活。

石工矮而肥，行路时的态度极令人可笑，有一次我同他逛市场，古董店的小伙计一路赶着捉弄他，拿个纸乌龟贴在他的背后，他也不以为忤，文人中脾气好和不立崖岸，无如石工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六日

薛剑公的画

明末遗民薛始亨不以画名，但他的遗作如《独石图》及为独漉子所作兰竹十二幅，已成为广东珍贵的文物。从绘画艺术上说，薛始亨的画造诣不算高，后人因为他是个不肯臣服满清的遗老，所以就把他的手泽珍重起来。

薛始亨是广东顺德人，字刚生，号剑公，又号剑道人。据说他在五岁时尚未入学读书，已经识字了。到十三岁，通五经，补弟子生员，在名公钜卿间有大名。他的父亲死时，他才十四岁，于是致力于诗古文词。明思宗殉国后，天下大乱，二年后是为丙戌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广东也受到满清的爪牙汉奸进攻，他避居广州。到兵事平息后才回故乡，闭门读书。在此后二十年间，他潜心研究学问，从医卜星算，甚至对青鸟之术都肯下苦功学习，晚年喜欢佛学，在宗宝和尚座下受记。他的外号叫剑道人，据说有个“异人”将一口宝剑赠给他，又将剑经传授，所以有此号。朱竹垞到广州时，深慕剑公之名，他也久闻朱名，遂出山相见一月。以后再请他出山，他不肯了。死时年七十。遗著有《蒯缑馆十一草》文集，《南枝堂》诗集。

薛剑公写给陈恭尹的十二幅兰竹，一度为番禺汪兆镛所藏，后来归马氏媚秋堂，现在不知又归谁人所有（闻马氏后来又以之赠一显者）。汪氏题此册云：

顺德薛剑公始亨，明诸生，少从陈邦彦学，独漉严事之。著南枝堂诗一卷，蒯缑馆文一卷。明亡，遁迹西樵罗浮，蓄一古剑，因自号剑道人。……不以画名，余偶得其画册十二叶，第一叶石，第二叶兰石，第三叶拳石杂卉，第四叶兰，第五叶竹，第六叶石，第七叶兰，第八叶竹石，第九叶灵芝，第十叶丛石兰竹，第十一叶枯竹雪石，第十二叶双钩兰。首叶自题行书《剑道人为独漉子作计十二幅"，凡十二字。每叶有"始亨"朱文方印，或"剑公"朱文长方印。皆著墨不多，高秀奇逸。册首横列行书"幽贞"二字，下款"甘蔗生今释"，钤朱文"澹归"方印。册尾独漉隶书跋云："右剑道人画册寄到日，适澹公过予，披视之，石竹芝兰，宛如对真风介节，公欣然弁其首，余谨识其后，亟付装潢，用垂不朽。"下署"恭尹"二字，"小"作"心"，钤"元孝"朱文小印。三贤手迹如新，洵希世之宝，其乡人某坚欲乞还，遂付之以为枌榆雅谭。归安朱古谋侍郎见此册，为题减字木兰花，词云："人间何世，老去丹青馀涕泪。肝肺槎枒，不写诸天称意花。

孤芳直节，长恨补天身手拙。坐抚吴钩，高馆何时访蒯缑。真高唱也。余续得剑公写赠屈介子独石一帧，盖有感于明末弃独石口而作，余为作长歌纪之。（见汪氏所著《椶窗杂记》。）

我未见过这册画，只见影印本，朱古谋所题减字木兰花，署款是"武仲二兄属题薛剑公画。孝臧"十二字。汪氏文中没有提及，大概是此画归马氏后才请朱氏题的。原藏汪氏时，并未请名人题过只字。林宰平（志钧，福建人，一九六〇年死于北京，享年八十多岁）题诗云：

剑公笔如剑，入画弥可喜，石气清胜人，兰叶劲刺纸。罗浮何幽幽，避世讵得已。伤哉家国怀，惘默乃逾纪。濬归与独漉，孤往得三子，尽收一卷中，是足以豪矣，眼中媚秋堂，相过路万里。（款署"武仲先生属题，戊辰九月林志钧。"）

戊辰是一九二八年，是年三月，黄晦闻（节）在广东，也为乌氏题一诗云：

闲来竹石写幽襟，不独工诗意可寻。投分自然孤孽好；去藏何止往回深。寄题北信经三载；客倦南归始一吟，欲过龙山怀二老，春江群盗阻乡心。（款题：戊辰三月，过武仲二兄媚秋堂，获观邑贤薛剑公为陈独漉作竹石芝兰画册，敬题一律。黄节并记。）

黄晦闻题这首诗不久后即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大约做了一年便卸职，重到北京大学教书，从此没有再回故乡，一九三五年死在北京了。如皋冒鹤亭（广生），也题有减字木兰花一阕，今录下：

河东老凤，岁晚南枝谁与共（南枝堂，刚公集名），画出荒寒，曾惹遗黎忍泪看。　　平生恻恻，磨剑无灵磨到墨，墨有乾时，心事千年圣得知！（款题：武仲二兄出示薛刚生先生画册，敬题小词。如皋冒广生。）

薛剑公的遗著两集，汪兆镛有钞本，这两部书幸未为清廷列

入禁书之内，也未有被部分抽毁。汪兆镛的笔记中说他还藏有薛剑公画的《独石图》，这幅画也值得一说的。此图现已不属汪家，而为友人何君曼庵灵璧山房所藏之物了。图是立轴，一九五九年八月曾在香港广东历代名家画展中陈列过，有不少香港人享到眼福。薛剑公在画左上角题字云：

> 予少好观关塞之书，感慨关乎弃置之事，每梦未尝忘独石。然予所写者石也，所深念者关也，人生岂可以笔墨自了生平，偶然为介子道兄戏写此而复识之。始亨。

此画是民国初年汪兆镛在广州市上一家骨董店买到的，代价白银六十圆，买来时，"介子"之款是添补的，画是真笔，上款则非出剑公之手，大概在清朝文网严密之时，收藏者怕上款的名字有碍禁忌，将它挖去，因此没有上款者若干年。后来长寿路一家骨董店的主人李某(其名有一云字，其父李衡石，能伪作字画，亦能写画，其子亦得其学)加个"介子"两字的上款。此事汪氏的公子曾对我说过多次。现在拿这幅画背光一照，便看出挖补之迹了。

何君又藏有薛剑公的都梁琴一具，与《独石图》为双绝，同是有关乡邦的重要文物。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张忆娘簪花图题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香港举行的溥心畬画展，看见有一幅纨扇，用墨笔写一个古妆美女，高髻博袖，斜立簪花，为全场最佳之作。溥先生的作品，无一不有画稿，不论山水、人物、花卉、鸟兽、翎毛，都是临摹古人之作，自运机杼者我从未见过。这幅纨扇美人，初时以为简简单单一个人物，必是溥君创造的作品，后来记起，这个美人的形态容貌，很像杨子鹤所写的张忆娘。溥君大概是临杨氏原作的吧。（我不敢说一定是，因为事隔二十多年了。）

张忆娘是清康熙中叶苏州的名妓。我见杨晋写的张忆娘簪花图是在一九三五年某星期日，地点是北京东城礼士胡同陈伏庐先生家中。伏庐老人每星期日必有雅集。那天到会的人有邵伯絅、马夷初、俞阶青、王羽仪等人。王羽仪不知为了什么忽然抨击溥心畬，伏庐老人一向是不喜欢溥心畬的作品的，说他的画没有气韵。见仁见智，这也不必细论。正在此时，有人拿杨晋写的《张忆娘簪花图》来，似乎是想找邵章、马叙伦二先生题词，他们是几乎雅集必到的人客。我也趁此机会细细欣赏了这幅张忆娘簪花图。廿六年后在海外见到溥君此画，一时记起，趁高兴谈谈杨晋此图。

袁子才《随园诗话》卷六第一一一则（根据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有谈到张忆娘，文云：

康熙间，苏州名妓张忆娘，色艺冠时。蒋绣谷先生为写簪花图小照。乾隆庚午(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余在苏州，绣谷之孙漪园，以图索题。见忆娘戴乌纱髻，着天青罗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为当时杨子鹤笔也。题者皆国初名士。莱阳姜垓云："十年前遇倾城色，犹是云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问姓，尊前愁煞白头人。"苏州尤侗云："当场一曲浣溪沙，可是陈宫张丽华？恰胜状元新及第，琼林宴里去簪花。"沈归愚云："曾遇当年冰雪姿，轻尘短梦怅何之。卷中此日重相见，犹认春风舞柘枝。""绣谷留春春可怜，倾城名士总寒烟。老夫莫怪襟怀恶，触拨闲情五十年。"余题数绝，有"国初诸老钟情甚，袖角裙边半姓名"之句。人皆莞然。按莱阳两姜先生，以孤忠直节，名震海内，而诗之风情如此。闻忆娘与先生本旧相识，一别十年，尊前问姓，故诗中不觉情深一往云。

按图作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一六九九年)，三十九年后袁枚才题诗五首，去忆娘之死已数十年了。蒋绣谷名深，字树存，号绣谷，又号苏斋，江苏长洲人(死于乾隆二年，年七十)，能书画，以纂修《佩文斋书画谱》得叙官朔州知州。著有《绣谷诗钞》。张忆娘簪花图就是在绣谷园中所写的。我所见的一卷，恐非原物，大概是摹本，或是后来的好事者所制的赝本。当时我对此图不大感兴趣，近日见溥君之画，才想起它来，便找出江建霞《灵鹣阁丛书》所刊的"张忆娘簪花图卷题咏"来参考。此书对张忆娘的生平事迹没有记述，只记图中题词。书的第一页第二行是江建霞所记的，文云：

图藏丰润张氏，借观数月，细审画幅似临本，题咏半是真迹，半系摹写，殊不可解。然流转有自，无二本也。江标记。

建霞是苏州元和县人，此卷是苏州著名文物，所以江标就把卷中的题咏全部录下。原卷在何处，我不大清楚，而江氏借自丰润张氏一卷，是否廿年前我在北京所见那一卷，现在已记不起了。

作图的杨晋题七绝二首云："交翠堂前绝点埃，熏风披拂绣帘开，麝兰香细花枝袅，争说天仙降下来。""髻挽乌云袖拂霞，才簪茉莉又兰花。妆成金屋藏何处，只在东山谢氏家。"款署"虞山杨晋写照并题"。杨为王石谷入室弟子，画自不恶。

蒋深自题七绝五首，款署"康熙已卯闰七夕前一日，蒋深题于绣谷"。《随园诗话》所说的莱阳两姜先生，其中一姜题有诗文，甚风趣，袁枚只引他一首，今从卷中尽录之。诗前有四六短文，亦甚可诵。文云：

吾今老矣，久梦觉于青楼，彼美人兮，乍欢迎于绣谷。爱他蒋诩，竟邀佳客传觞；羡尔杨华，闲拂生绡写照。能无欲别，更抚卷而情移；忽漫狂来，竟含毫而句就。爰偕诸子，共赋新词。"红烛烧残听唱歌，几番恋别费吟哦。莫嗤酒醉还深酌，奈此图中小妓何！""自拣幽兰插鬓枝，多情庭际步迟迟。落花垂柳娇无力，知是歌慵舞困时。"是日即席又赠一首……（按此首已见《随园诗话》，不录）莱阳姜实节。

姜实节即姜埰，字如须，崇祯间进士。兄姜垓，字如农，亦进士，以直言下狱，埰尽力营救。阮大铖在南京执政时要杀害他，如须即变姓名走避宁波。后来还居苏州而死，门人私谥贞文先生。如农在明亡后削发为僧，门人私谥贞毅先生。子才说两姜先生"孤忠直节"即指此事，今读其诗，正如随园所云"风情如此"，真能令人低徊不已。

子才所说国初名士皆有题词，果然不诬。蒋深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集郡中诸名宿在绣谷园作送春会，座中年岁最大的是尤侗，张大受、惠士奇当时还是秀才，沈德潜年才廿七岁，居末座。画师有王石谷、杨晋，方外有目存上人。到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己卯，蒋深之子仙根，又作后己卯送春会，则六十年前居末座的二十七岁少年沈归愚（德潜），已以八十七高龄居首座了（他死于乾隆三十四年，年九十七）。此卷不见有记后己卯送春会雅集之事，亦不见沈归愚于是年题诗，但乾隆十五年庚午归愚有诗三首，今录第一首于下，二三两首已见《随园诗话》。

> 簪花风格旧曾闻，久矣云英化彩云，不种小桃花一树，何人知是薛涛坟。（第三首有小注云："庚辰岁遇忆娘于歌筵，今五十余年矣。"）款署："后庚午初冬归愚沈德潜题，时年七十有八。"

据钱泳的《履园丛话》所说，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的送春会，座中以朱竹垞、尤西堂的年龄最高，沈归愚最少，但此卷无竹垞诗，有尤西堂一绝，已见《随园诗话》。沈归愚虽年少，但也是能诗的人，何以不见有诗，而在庚午有三首，且小注中所说，似乎他没有与于康熙己卯的雅集。今检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不见有

诗，不知是钱泳误记，抑系“全集”漏收。

方外目存上人题诗云：

笑摘秾香压鬓鸦，懒将时势斗年华。他年得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款署“蒲室睿道人题”。下盖白文“目存睿”、朱文“童心和尚”、朱文“蒲室”三印。）

从卷中诸名士题词，约略可知张忆娘当日在苏州是个“叱咤风云”的名妓，达官贵人名士都乐于伺候妆台，她甚至和北京派来的学政相狎，岁试之时，替士子讲人情，有些秀才居然入彀了。（见陈廷旸诗“荐衡佳话岂情钟，侠骨能追薛五踪。红袖若教持玉尺，怜才应不减昭容”。）

毕秋帆（沅）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年）题七绝四首云：

“背人独立黯销魂，小摘花滋九畹痕。一洗世间凡艳尽，生来香草本同根。”“香销骨冷怅如何，拂拭零缣读艳歌。莫怪君家勤护惜，三吴耆旧此中多。”“乌云入手爱三盘，碧玉钗尖写影寒。总使丽人生并世，空花也作画中看。（简斋先生题句有生不同时之感，诗以解之。）”“绣谷花残怨落红，遗闻曾记立春风。今宵一掬西州泪，并入闲情绮语中。（余昔侍归愚师于教忠堂，每于酒阑吟罢，常说忆娘遗事。今读先生卷中题句，益增惘然。）”

沈德潜题诗时是乾隆十五年庚午，时年七十八，题后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以九十七高龄逝世，他的学生毕秋帆虽也在卷中

题词，从未见过张忆娘一面，但诗中提到老师谈忆娘遗事。（据题诗的蒋业鼎诗中小注有："忆娘晚年思入道"之语。实在忆娘想嫁蒋深，但蒋的姬妾众多，不暇留意。忆娘改嫁徽州陈通判，蒋反面无情，诬告陈奸拐，忆娘削发为尼，后来穷困自缢而死。）

蒋仙根未作后己卯送春雅集之前，卷曾一度失去，后来又以名人墨迹易回，卷中有他的记事云：

此卷藏弆箧中，为谁何窃去，甲子（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冬检点旧物，始知失之，懊恨不已。丙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秋，武林黄君松石过访，偶谈及，云曾见之维扬一士友家，越二年戊辰秋七月，君竟携以来，盖已为程君劲堂所得，而黄道余意，许以余所存汪退谷何义门两先生笔迹易归者。余亟如约。楚之弓不图复为赵璧，因题数语，以识其异。乾隆十三年后七月廿有二日，蟠漪蒋仙根书于交翠堂。

图再归蒋家绣谷园后，有蒋恭棐（字迪甫，号西原，长洲人，康熙六十年辛丑进士，授编修，著有《西原草堂集》）题词卷中，甚有意。文云：

卷中题咏，推姜文学在再赠一绝擅场，老颠风景，今可想见。余年六七岁时，张曾过宿余家，晨起抱余著膝上为挽髻，忽忽五十余年。图归自海陵，蟠猗复携示余，重读姜诗，俯仰慨然，亦题绝句于后："绣谷欢场五十秋，当年姜老妒偏愁。荷衣总角妆台见，零落如今也白头。"

西原翁题此诗很有情致，他六七岁时曾被张忆娘抱在膝头上替他梳辫髻，到六十多岁后重见图中小影，怎能令人无感慨？所以他这首诗不是空发一段闲情，而是言之有物的。他死于乾隆十九年，年六十五，大约白头题此诗后五年即谢世。

顾诒禄所题的诗也很有情致。诗云：

簪花盛事委波流，名士佳人土一丘。零落玉钗怜薜杜；销沉金管感曹刘。风清应集芙蓉饭；月冷长空燕子楼。展卷几增华屋痛，羊昙今亦雪盈头。（中有先外祖匠门先生题句。）（按匠门即张大受，嘉定人，康熙四十八年翰林，与于己卯送春雅集者。）

卷末最后题词的人是潘奕隽（时为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王梦铨（时为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程风举。潘生于乾隆五年，到道光十年才死，享年九十一岁，亦题词中之享高年者。最后是程凤举一词，则此卷已非蒋家之物，又为程家所有，不过此程非彼程，新主人乃程笙华。凤举题的是调寄疏影一阕。词云：

天然峭蒨，向风前丰度柔婉，玉指纤纤，簪得名花秋波流转。美人芳草谐幽契，问绣谷何来仙眷。展画图依也魂销，漫说那时亲见。　　多少诗坛酒社，钟情惆怅甚（谓姜莱阳、惠红豆、沈归愚诸老宿），佳句题徧。懊恼东风，解妒娥眉，冷落容消香乱。何时觅得崖微影，忆梦里尚深留恋。喜这番重到吾家，细把卷中人看。（此卷蒋家遗失，落于邗江程劲堂之手，蒋蟠猗乃以名人笔迹易还，今为吾笙华

长兄所得，此物终归于吾姓，异哉！道光壬午孟春中澣，小樵程凤举题词）。

蒋氏重得此卷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不知何时又为另一程姓所有，至程凤举题词之道光壬午二年（一八二二年），已八十馀年了，中间自然有很大变迁，绣谷已非蒋家的园林了。末了，我且抄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绣谷”一则作为本文的结束：

绣谷在阊门内后板厂，国初，朔州刺史蒋深筑。初，刺史之祖垓成进士，后隐居读书，偶课园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绣谷二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颇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手笔也。……嘉庆中为叶河帅观潮所得，道光初，又归南康谢椒石观察，作板舆之奉，今又为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蒋氏欲将是宅出售他姓，犹豫未决，为问乩仙。仙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则上句应矣。后叶氏转售于谢，谢又售于王，则下句应矣。异哉！

绣谷园今日不知尚存在否，如尚存，也不过是一座二百多年的园林，但有张忆娘点缀其间，就使知道她的后人低徊不已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听松庵竹垆及其名画

无锡的惠山第二泉上，有个竹垆山房，在明朝初年是听松庵（惠山有唐李阳冰篆“听松”二字，故庵以为名）。这是江南一个名胜和著名的文物。因为听松庵有一幅名画和一个竹垆，名胜与文物相得益彰，游无锡的人没有不去竹垆山房一行的。

明洪武年间，画家王绂（字孟端，号九龙山人，因为他的故乡惠山有九峰，取其意为名。孟端工山水，人品高洁，为世人敬仰）为性海上人绘竹垆图。后来履斋写第二图，吴珵写第三图。第四图是乾隆年间张宗苍奉敕所写的。这个竹垆图一共四个手卷，由洪武至乾隆间四百年，海内名流，题咏殆遍。这是竹垆图咏卷的来源。

至于竹垆之制，据邵文庄序《竹垆遗事》说：洪武末年，王孟端因眼病，寓居听松庵。病愈后，在庵中的秋涛轩壁上，写了一幅庐山图。他的朋友潘克诚去看他的画，恰好有竹工从湖州来，庵主性海上人和王孟端、潘克诚教竹工用竹造了一个火垆，用来烹茶。这便是竹垆的来历。

王孟端题竹垆诗云：“僧馆高闲事事幽，竹编茶具瀹清流。气蒸阳羡三春雨；声带湘江两岸秋。玉臼夜敲苍雪冷；翠瓯晴引碧云稠。禅翁记此重开社，若个知心是赵州。”赓而和者多人，都是一时胜流。到明朝中叶，竹垆忽然遗失，不知去向。成化十二年（公元一四七六年），武昌知府邑人秦廷韶访得于城中杨氏，因作

《听松庵复竹茶垆记》，现在摘录如下：

> 垆以竹为之，崇俭素也，于山房为宜。合垆之具，其数有六：为瓶之似弥明石鼎者一；为茗碗者四；皆陶器也，方而为茶格者一；截斑竹管为之，乃洪武间惠山听松庵真公旧物。垆之制，圆上而方下，织竹为郭，筑土为质。土甚坚密，爪之铿然作金石声，而其中歉然以虚，类谦有德者。镕铁为栅，横截上下，以节宣气候，制度绝巧；传以为真公手迹，余独疑此非良工师不能为。乡先达中书舍人王公(指孟端)尝有诗咏之……。永乐中，真公示寂，垆亦沦落人间，独诸公翰墨粲然尚存，落落与松云萝月为伍。成化丙申(一四七六年)冬，余归自鄂渚，暇宿庵中，真公嗣孙曰戒宏考出以示余，因诵王舍人所作(诗已见前，不再引)，叹其佳绝，且惜其空言无徵，图欲复之，乃因释氏教述疏语一通，畀戒宏使徧访焉。已而果得于城中右族，垆尚无恙，特茗碗失去不存……垆之亡，不知其的于何年，姑记其概。收垆者，故诗人杨孟贤，复而归之者，其仲孟敬云。是岁嘉平月望日，邑人秦夔识。

以上是竹垆在明朝的故事。本来竹垆、茶具，只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物，就是失去了，另外买过新的，不就算了吗？但听松庵的竹垆与别不同，它是出于诗僧性海和画家王绂之手，且经过那么多名士题咏，已成海内一件珍贵的文物，所以就值得重视了。

后来不知怎样，竹垆又再度遗失，据清初朱竹垞、王渔洋所说，竹垆为词人纳兰性德所有，康熙廿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顾贞观住在纳兰性德家中，性德以竹垆赠给他，贞观又携回惠

山。性德死后，贞观与朱竹垞、周青士为竹炉联句。又一说，贞观携归的竹炉是仿制的，同时，盛冰壑、宋漫堂都曾仿制。至于真的竹炉，则在乾隆年间为灵源松泉和尚于北门张氏访得之，他以秦廷韶所记的规制一校，一一相合，因请姚伯南为赋《再复竹炉诗》。松泉和尚是性海的裔孙，善属文，临摹竹炉诗卷王孟端以下诸名迹。又有鄒文庄的温砚炉，扬州方士康在市上买得，藏了三十年，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士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因为邵文庄也题过竹炉，他的遗物应该归之听松庵，与竹炉并存，于是请扬州知府行文无锡，致此炉于惠山，王涵斋作歌记之，一时名流和者甚众。以上是康熙初年至乾隆末年竹炉的故事。

王孟端所写的竹炉图卷，在康熙年间，无锡人顾贞观得之于纳兰性德家，与竹炉同归听松庵。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高宗南巡，驻跸惠山，汲第二泉水，用此竹炉煮茗，高兴起来，因和明人题咏之韵，把他的诗写在卷上，后来三次南巡都有留题。到了乾隆四十四年，无锡知县丘涟，打算重新装裱这四卷画，因取入官署，不幸署西民房失火，画尽被焚毁。江苏巡抚杨魁、布政使吴坛自请处罚，并劾丘涟，命罚银二百两给寺僧。清高宗以四卷皆毁，深为惋惜，因自己写第一图(即王孟端所作那一幅)，命皇六子永瑢写第二图，贝勒弘旿写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御笔诗章，冠于卷首，于每卷图后补录明人序、疏、诗什、依其原次，以还旧观。又出内府所藏王孟端的《溪山渔隐》长卷，赐给听松庵主僧，以留王孟端胜迹，并为诗记之。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无锡，竹炉、画卷全部散失。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秦缃业在上海买到清高宗所画的竹炉图卷，过了几年，秦恩延又得王孟端的《溪山渔隐》卷于

洞庭山人家，恰遇黄埠墩僧舍落成，因并付主持僧华翼纶收藏。

这是无锡惠山的一段文物小掌故。游无锡的人必往惠山，可以见到一九五五年新修复的竹垆山房，但知道这段故事的人恐怕不多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

赵子昂夫妇画像

元朝赵子昂夫妇，一门风雅，他们的儿子赵雍善书画文辞，而子昂夫人管道昇，尤其有林下风，画笔高雅超逸，几欲夺松雪道人之席。但赵子昂的名气太大了，世人大都只知有一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对于他的夫人管道昇则较为陌生。喜欢诗词的人大概总知道管夫人曾手捏泥人两个，一个象征赵子昂，一个象征她自己那一个故事，她捏好后，又把泥人打碎，搓匀，重新再捏过一对，并作词一首，略说两个泥人的身上有了你的灵魂肉体，也有我的灵魂肉体。这首词是表示他俩夫妇相爱不渝的，因此传为千古佳话。管道昇所捏的那两个泥人，不知像不像他俩夫妇，如果捏得很像，这也可见她的艺术天才，因为她会写人像，有写像的本领，自然也会捏人像了。

管道昇自写像，我从前在上海见过一卷，是谁所藏，久已忘记。近日偶读清人《听雨轩笔记》，有一段记作者所见的管夫人自写像颇详，现在摘录如下：

> 赵文敏公之配管夫人，有自写小像手卷，长可五尺，高一尺五六寸。系画杜少陵日暮倚修竹诗意。卷首作修竹数十竿，间以奇石。夫人面方目细，身长短停匀，手拨竹本，作伫立翘首凝眸望远状。自题卷末云："秋深风肃，闺阁生寒，良人出使未归，爰图少陵诗句以寄意。皇庆癸丑九月，道昇写。"

印章二，白文曰“天水赵管”，朱文曰“道昇字仲姬”。盖元仁宗初元之二年(引案：癸丑为仁宗皇庆二年，公元一三一三年，下一年即改元延祐)所作，笔法娟秀，衣褶古雅，真墨宝也。此卷向为吾邑前明给谏沈公方平旧物，沈作记叙画所由来，冠诸卷首。……(《听雨轩笔记》作者署清凉道人，未详其姓氏，乾隆间人，曾游幕两广。据俞曲园先生说，道人名徐承烈，浙江德清人。)

此画后来不知归谁人收藏，近年似乎很少见有人提到，也许已不在人间了。

子昂也会写人像，而且写得很工。他俩夫妇晚年都耽于禅悦，拜天目山高僧中峰和尚为师，子昂曾为中峰和尚画一小像，并题赞语。(子昂写给中峰和尚的信札数通，真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五年印为“赵氏一门书法”行世，其中包括有管夫人、赵雍的字。原件为清高宗所藏，签条“赵氏一门书法”也是他写的。)

乾隆年间有一位赏鉴名家毕泷(字涧飞，毕沅之弟，工画山水竹石，豪于资)，藏有赵子昂自画像一帧，钱梅溪亲眼所见，曾记之于《履园丛话》，今录之：

庚戌(按：乾隆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三月，余往娄东，在毕涧飞员外家，见魏公自绘小像纸本，长尺许，阔七寸，作一镜像，居其中，仅画半身，头戴一笠，身著月白氅衣，面圆而俊伟，丰神奕奕，微须，真元世祖所称“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按：赵雍之字)书赞两行。又在友人处见一像，有自题七律云：“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

头。老子难同韩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后题“大德二年（公元一二九八年，是为子昂被召入京授官后的第十三年）八月，赵孟頫自题。”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装。”观魏公此诗，其出山服官，非素所愿，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钱泳所记子昂戴笠画像及引元世祖所说“神仙中人”之语，使我记起子昂一个有趣的故事。戴笠像当然看不见子昂之头，而钱氏所见的另一画像自然也是戴有帽子的。如果没有戴，就可以知道子昂是否尖头的了。记得明朝人戴章甫（冠）的《濯缨亭笔记》有一段说，子昂被徵召入京，元世祖久闻其名，召见时，见他丰神俊逸，光彩照人，遂有“神仙中人”之叹，元世祖生怕子昂有异志，就想替他看看相，教他将帽子摘去，看看他的头颅。子昂照办，元世祖见他的头是尖的，大为放心，认为他的相破了，必无异志，命他题大殿上联语。子昂题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题寝殿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世祖大喜，一时高兴，拿出宋太祖画像，教子昂题诗。子昂踧踖者良久，题云：“玉带绯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伤神。江南江北新疆土，曾属当年旧主人！”世祖称善，就更为放心了。（戴冠正德间人，籍江苏长洲。此书今不在手中，所引诗句，容有一二字错误。）

管道昇有姊名道杲，嫁姚氏，居于南浔。道杲亦能文事。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四月，道昇往南浔访其姊，坐君子轩中，道昇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立命人研墨，即在轩中写竹一帧。道杲在画后题一诗一跋，字体亦与其妹相近（道昇字学子昂，几能乱真）。按管夫人卒于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年）五月

十日，至大二年，年约五十左右，是她晚年的笔墨。子昂后死夫人三年，他是至治二年六月死的，年六十九岁。赵雍题他的遗像说是“至治二年八月拜装”，则在子昂死去百日之内也。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

硕果仅存的铁券

旧小说中常见有“丹书铁券”这个名词，《水浒传》柴进失陷高唐州，就是因为身边没有“铁券”带着，才吃了大亏。这种“契约”，大抵是古代封建帝皇为了拉拢功臣，在铁器上刻了文字，凭券可以得到优待，功臣本人犯罪免死，子孙犯罪亦可以免罚。《汉书》祭遵传就首先见有“丹书铁券”字样，高帝纪则作“丹书铁契”，亦有作“金书铁券”的。据程大昌的《演繁露》所说，铁券的样子是一半形的，状如小木甑，上面有四个孔，以为穿索之用，凸面之处刻字，填以黄金。券的一半藏在官府，一半交给功臣收藏。凌扬藻（番禺人，字药洲，乾隆时诸生）的《蠡酌编》说得很简要，现在录之如下：

> 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

据《水浒传》所载，柴进是柴世宗子孙，他所藏的丹书铁券形状如何，小说中没有描写，柴世宗是五代人，他的铁券大约是宋太祖所赐，较柴世宗早六十馀年的钱镠，曾经唐昭宗赐与铁券，为中国今日仅存的实物，现藏杭州浙江博物馆，为吴越著名文物之一，极可宝贵。

武肃王钱镠的铁券，是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赐给的，因为当时董昌作乱，昭宗命钱镠去讨平他，乾宁三年董昌伏诛，以钱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铁券的用处，就是免死牌，钱镠本身免死九次，子孙三次。

铁券的形状颇像瓦，铁质，长五二厘米，宽二九·八厘米，厚〇·四厘米，重一三二两。这是今日所记录的重量，乾隆道光间一个文士钱泳所记的则是高一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券面镂金字三百三十三个(百年前为三百四十二个，蚀了九个)，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券文云：

> 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此处钱镠的官衔共长八十五字，今略去)……钱镠……顷者董昌僭伪……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江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荣宠，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钱镠的谢表，出自大诗人罗隐之手，是年十月，为撰《谢赐铁券表》，草稿真迹，前藏叶恭绰先生手上，一九三六年曾在浙江文物展览会陈列过。谢表文辞典雅，今摘录之：

> 恩主赐臣金书铁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孙三死者，出于睿眷，形此纶言，录臣以丝发之劳；赐臣以山河之誓，镌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动神祇，飞扬肝胆。伏念臣爰从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动若持盈，

惟恍福过祸生，敢忘慎初护末？岂期此志，上感宸聪。……虽君亲嘱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为心，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贾祸。……

谢辞虽然很恭顺，克尽臣节，但钱镠从此瞧穿了李唐的江山，已濒七零八落的境地，就趁此机会割据称雄，自封为吴越国王，所居住的地方称殿，属官对他一律称臣了。

叶恭绰先生写有《唐罗隐代钱镠谢铁券表稿墨迹卷跋》，载《矩园馀墨序跋第二辑》，录之以备读者参考。文云：

此罗江东手迹，余三十年前得之景朴孙，以其为孤传之本，秘惜甚至，避兵香港，亦携在行箧。嗣倭寇攻港，余拟航空入内地……旋分散藏物，此卷以归根侄，渠属装池者接裱，误将刘青田跋列于表稿之前，非其旧矣。良工难得，不能重揭致损，故记其原委，以释观者之疑。原纸年久中断，故罗书刘跋，均似四行为一纸，实则当时为卷轴，刘跋乃书于纸尾耳。此卷明代由道观归姚云东，又入钱屿沙手，均属浙西，不知何时为景朴孙所得，惜当时未详询朴孙也。

钱镠的四世孙弘俶降宋，太宗淳化元年（九九○年），杭州守臣以铁券及竹册、玉册、诰诏等进呈，诏赐忠懿王钱弘俶嗣子惟濬藏于汴京赐第。宋仁宗登极，曾向钱晦索取观看，看后仍赐还，藏在昭化坊赐第。神宗元丰四年（一○八一年），特令钱氏后人朝奉大夫钱藻进呈，看后仍付还，永传后裔，并没有藏诸内府之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号的《文物参考资料》说钱氏后人降宋后，

铁券没入内府云云，不知根据何种文献)。到钱景臻选为驸马，铁券就随着属于他，后来金人入寇，钦宗令驸马之子荣国公钱忱奉母出居江南，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迁居台州，宋高宗即于台州崇和门内赐公主第宅，铁券就藏在美德坊赐第之内。端宗景炎元年(一二七六年)元兵破台州，驸马府有家人偷了铁券逃走，死于难，从此铁券就不知下落。这是唐昭宗赐券钱氏，以至失券的一段小史，期间共三百六十九年。

到元文宗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浙江黄岩县渔人在泽库深水内，偶然网得钱氏的铁券。渔人以为是宝物，试用斧头斫它，才知是一块废铁，也就不十分爱惜，把它随便放在一处。渔人的邻居是一个村学究，他曾听过有铁券之事，就用废铁的价值向渔人买了。但他们都不知道券面的字是金的。后来有人向钱氏后人钱世珪报告，世珪以谷十斛向学究赎回。元朝末年，世珪之弟钱赟(字叔琛)与陶宗仪交厚，曾出示所藏铁券，宗仪据以记入《辍耕录》。从此铁券又藏在台州，如是者又五百馀年。

清人钱泳，是武肃王后人，他一生中见过铁券两次，一次在绍兴县，因修郡志，地方官特地派人到台州拿铁券来作参考。另一次是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他本人到台州谒墓见到的。据他所作的《履园丛话》卷二所记：

> 券藏东门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庄，皆钱姓也。地名里外钱，其守券者曰钱永兴，兄弟三人皆务农，轮流值管，有小楼三间，专为藏券而造，……

据钱泳所说，由宋朝到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这个铁券曾经七个皇帝御览过，清高宗到杭州时，武肃王裔孙，前刑部尚书钱陈

群，率台州族孙武进士钱选等，进呈铁券，清高宗虽然嗜古性成，但并没有把铁券据为己有，收入内府，只御制七古一首，众大臣(其中有不少是诗人)恭和一番而已。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份的《文物参考资料》载黄涌泉、王士伦合写的《五代吴越文物——铁券与投龙简》一文，略说铁券在过去数百年间都藏在嵊县长乐镇的钱氏祠堂内，向不示人，一九五一年由地方政府移交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保管，现藏于浙江博物馆云云。查嵊县旧属绍兴府，而台州府为今日的临海县，黄岩、天台属之(陶宗仪是天台人，因与钱叔琛为同乡)。何以铁券在近数百年藏在嵊县，与钱泳所说者大异，两君所记必有一误。

[附记]

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香港报纸刊出。一九五九年四月，《文物》(《文物参考资料》改称)第四期出版，发表了黄天钟先生的《关于钱镠铁券流传问题的补充》，详引《履园丛话》所记，并说明了钱泳所记的可靠性。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伯雨附记。

李宗颢与灵璧石砚山

香港灵璧山房主人何君曼庵，藏有米元章的灵璧石砚山，原系清光绪间广东收藏家李宗颢珍藏之物，李死后，辗转入李尚铭之手，李既被囚，藏品劫掠一空，此石归香港收藏家冯已千君，最后为友人何君所得，故颜其所居曰灵璧山房。

李宗颢是近代广东一位颇有名的收藏家，关于他的事略，冼玉清女士《广东之鉴藏家》一文（刊《广东文物》卷十）略有说及，今尽录于此。文云：

李宗颢字煮石，南海人。喜治金石目录之学。随父（案：冼女士此文自言采自《岭南画徵略》、《采访册》。前一书系汪兆镛所作，《采访册》则未见说明。汪氏原文"随父"下有"应鸿"二字，冼女士文中删去）宦游陕西，汉唐故都，石墨至富，毡蜡之馀，辄辇石以归。嵌置家祠壁间，终日摩挲以自适。以孙星衍、赵之谦《寰宇访碑记》讹误尚多，为《萧庵读碑记》二卷，多所匡正。居京师，游李文田之门，与江阴缪荃孙讨研古籍版本，就所知见，以蝇头细书识于四库简明目录书眉，丹黄灿然，所论有出于邵懿辰，莫友芝之外者。画不多作，间一点染，亦骎骎入古。（案：汪氏原文至此止，注明系引自《留庵随笔》。）黄任恒藏《萧庵印存》一书，皆其自镌之印，其中有曰邵斋，曰愤石斋，曰琴石山斋，曰木连理

斋，曰两不损焉斋，曰煮石簃，曰榕连理馆，曰灵璧山馆，曰三十二夫容山馆，曰米庵，曰带山亭，曰思亮庐，曰廿三石堂，曰蕅庐，以上十三印皆其所居名也。(岭南画徵略采访册)宗颢尝得宋米芾灵璧石砚山，珍逾拱璧，因于其家筑砚山亭藏之。(采访册)

李宗颢的事略大抵如此，现在谨就我所知的补充一下。清光绪末年，他在湖南衡州府任经历(经历系官名，正八品，掌文移出纳)，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北碑字体，知府有一次请他入衙门写字，他答应了，到时他衣冠坐轿上府尊衙门，但府衙没有开大门迎接，遂废然而返。有人问他何以不进去写字，他说知府是上司，我因公入衙谒见上司，不开中门迎接，礼也，但我这次是以客人身份入府衙，府尊没有以宾礼待我，所以不写。热中于做官的人骂他不懂得巴结上司，注定永远做经历，不会升官，但他并不计较，可见他赋性孤洁一斑。他晚年回到广州，在归德门内孚通街开设虹月簃骨董店，并以卖字为活。字甚浑厚，写的是北碑，大抵受李文田影响甚深。他的死很是悲惨，宣统末年他曾在故乡办民团，大力剿匪，因此匪徒恨之刺骨。民国初年，有一次他回故乡，匪徒已探知他的行踪，预先埋伏在稻田间，见他行近，开枪将他杀死了。宗颢留有一部大胡子，仪容甚伟，所以匪徒一击便中。

关于灵璧石砚山的历史和它的形状，李宗颢写有《宝晋斋三十二芙蓉砚山记》一文，叙说颇详，文云：

光绪丙申(案：光绪廿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五月，余自闽海赴燕，纡道入吴，为金焦虎丘之游，偶翔步玄妙观，获见

此石置摊货中，土蚀漫漶，迷离眴目，高仅三寸，广不盈尺，而峰峦叠秀，池壑毕具，不假雕琢，殆有百仞一拳，千里一脐之妙，询所值，以千四百钱对，如数与之，喜形于色，携归濯之清泉，剔其泥垢，缋彩奋发，石黝如墨，质坚如金，有乳白细文，击之声汤扬彻远，真灵碧佳品也。其底平如砥，上方有篆铭曰：“产泗滨，名灵碧，金其声，玉其质，龙之渊，虎之窟，从吾好，永不失。”末署檇李项元汴题，下方又有“墨林真赏”四分书，及“玉蕴山辉，松雪斋宝”八篆书。峰间亦镌有题字曰×（疑是萝字）峡，曰灵崖，曰莲花峰。峰下悬崖壁立，有池曰笔卅，其池浑然天成，滴水经旬不耗。笔卅之左有峰，锐上分立，若俯若仰，飞瀑测湍，注壑流响，故曰玉洞鸣琴。又左曰巘谷，其上连山插汉，远望嵺峪，灵异秀阻，天台同状，故曰仙都。又左则高峰桀起，颓抱群岫，中有石脉，自巅下垂，皓如霜雪，望同悬瀑，尤为殊观，故又曰瑶光烛汉。其下曰长啸崖，崖侧曰潭（上一字泐）。山之阴复有仁乐、神苑、孤云岫诸名，或分或篆，精妙无匹，虽洞庭涌云，鸥波沁雪不能尚也。谛审灵岩下，又有正书“×晋斋三十二芙蓉芾”九字，首一字缺。按明一统志，宝晋斋在江苏无为州治，宋守米芾建，有晋人法书函壁间，因名云云。则泐去是宝字，乃米海岳宝晋斋故物，转入赵松雪，后乃归于项元汴也。呜呼，米海岳殁至于今七百八十有馀岁矣，宝晋遗迹，散亡殆尽，独此拳石，历数浩劫而岿然犹存，若有神物占护之者，岂海岳一生精气所感注有不可泯灭耶？抑天怜余爱山成癖，故留奇供以慰寂寞欤？不然，何不先不后，适归于余也。余住姑胥十日，随挟之至京师，作供几砚旁，昕夕晤对，千虑尽释，新知故雅，闻声

造访，有好事者欲以千金相易，余以生平所得第一神品，不忍弃也。年终，吾乡新宁黄茂才削函约游缅甸，归里省母，濒行，拟载之与俱。叔兄曰，巧偷豪夺，古人所慨，湖口九峰，终之归乌有，涟州之妙，竟攫其最，其留之。乃相与谋于村北连理榕树下，构亭藏之，插槿为墉，编篷为户，缭以土垣，度可二亩，杂树连阴，修竹映翠，荔支龙目，萝衍交加，它日归来，增辟园圃，种桑千株，莳蔬两畦，奉母栖隐，闭门养拙，亦一佳憩也。仿东坡雪浪斋故事，榜曰三十二芙蓉山馆，亭曰芾山，自号曰芾山亭生。伯叔弟累，携酒来贺，累日嬉娱，握手道别。顾结习未尽，恋嫪弗已，乃伸纸泼墨，辄为图写石之高广，峰之低昂悉肖之。画毕，并椎拓底铭于后，漫记始末，置行匣以自随，俾暇居日开卷怡神，聊以自喜云尔。又按明林仁甫石谱云：涠滨涟水，地接灵璧，蓄石甚富，锡以美名。据此，则石为襄阳守涟水所得，而诸品题亦其笔迹也。丁酉（光绪廿三年）十一月上澣，南海李宗颢记。

李宗颢所绘的图，据闻装为一册，遍请名人题咏，今为广州卢子枢画师所藏，未能与石同归灵璧山房。（按此石于清光绪廿二年为广东人所有，携归广州，至今已六十六年，李宗颢死后归陶剑秋，后售与李尚铭，再归香港大鉴藏家冯己千，冯君死后售与吾友何曼庵。六十年中五易其主，亦可谓沧桑历尽矣。）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广雅书局及其板片

广州市文德路有一所广东省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广雅书局，而广雅书局的前身又是南园。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见南园遗址颓废，大部分变为民居，命人搜剔旧址，稍复原来面目。又修葺抗风轩，题一联云："诗如大历十才子；园似将军第五桥。"因为广雅书院在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兴工建筑，张之洞也在南园之旁建广雅书局，校刊经籍，嘉惠士林。

当时的广雅书局规模极大，地方甚广，有东西南北前后六个校书堂。现在的省立图书馆不过占该局当日的一部分而已。之洞延访名流校雠书籍，这班学者都住在校书堂里，楼台临水，两岸垂杨，颇有秦淮风景。安徽人黄穆甫（士陵），以篆刻书画著名，也在书局中任校勘，清末民初以写北魏著名的书法家浙江人陶濬宣也曾在局中任事。

广雅书局于光绪十四年成立，所刻的书极多，计为经、史、子、集及其他丛书，它的注解和注疏，在当时的读书人心目中是有名的，所校的史书，尤为学林所推许。凡校勘一书，卷末一定署有谁是初校，谁是覆校，谁当总校的名字。一书之成，要经过三次校对，所以错误之处比较少，在以往的刻书界中，算是好的了。

辛亥革命后，广雅书局停办，木板片存在局内，没有什么大损失。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当局忽然又恢复印书，将广雅书局

改名为广雅板片印行所，利用原有的板片，选择其中尺寸相同的，刊为“广雅书局丛书”，由徐信符(绍棨)汇编，销行极广。

两广军阀盘踞广州时，曾因为广雅书局的板片闹过官司。原来广雅书局也是广雅书院的一部分，书院之设，本来是为了两广士子研究学问的，宿舍分为东斋巷、西斋巷，各有斋十所，东斋为广东士子住宿；西斋为广西士子宿舍。民国初年广西军阀莫荣新盘踞广东，他说广雅书局雕板时，广西人也出过不少钱，所以他就把广雅书局遗存的一部分板片搬回南宁。一九二一年广东军阀陈炯明打胜广西军阀，于七月十五日攻入南宁赶走陆荣廷，又将板片搬回广东。当时有人作竹枝词咏板片事云：“广雅楼头警劫灾，顿教字里起惊雷。图书也感流离苦，才去南宁又复回。”同时，陈炯明部将洪兆麟又将陆荣廷一部家乐搬回广州，不久，洪为潮梅镇守使，也将这一女班桂剧“咏霓社”搬到汕头。此事距今恰恰四十年了。

广雅书局后来改为广东省图书馆，木板片一向由馆长徐绍棨(光绪戊戌秀才，与叶恭绰先生为同案)负责保管，藏在原址的藏板楼中。日军攻陷广州前，已先运往乡间保存，因此没有散失，徐氏之功甚伟。近十年这批二十万块的木板片已由当地文化机关妥为贮藏了。七十年来，广雅书局的变动很大，木板片也历尽沧桑，黄穆甫的印谱于一九三五年出版，其子少牧请黄晦闻(节)题词，晦闻题七绝云：“沧海遗尘一叹伤，南园休问校书堂。低徊尚似承平事，正是先生客五羊。”诗人之叹，就含有愤恨新旧军阀连一所小小的广雅书局都不能保存，有愧为黄帝子孙了。(黄士陵印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西泠印社出版，分上下集，共四册。)

陶濬宣有题广雅书局图书馆柱联云：“地接南园，看苍翠成

林，疑身到六桥三竺；天开东壁，聚丹黄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又题校书堂柱联云：“校经爱学顾千里；佞宋遥分黄一廛。”又云：“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此联有原跋云：“祁文端公书澄怀园句，斯地之胜，堪以移赠。”）读这些联语，可见当日广雅书局的风景一斑。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

近十七年，香港有一部传为欧阳询所撰写的隋碑《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字大七八分，拓本极精，以往一般鉴藏家都定为宋拓本。这个拓本，在一九一七至一九四四年间，藏在我家的玉笥山楼，一九二三年曾交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六年前为友人何曼庵先生所得。今年夏夜，我在何先生家中再见此碑，已经是暌隔二十三年了。摩挲先人手泽，不免感慨系之。

这个拓本第一行"隋江夏县"四字已泐去，"缘"字亦泐上截。第二行写"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撰并书"十一字。每页六行，行十九字，是襞衣裱的。明人都玄敬(穆，与唐寅同时)的《金薤琳琅》(据学古斋本)卷八，第十四页有纪录全文，惟不著撰书人姓名，文后附都穆跋语云：

> 右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无书撰人氏名，记中载舍利应瑞之事不一，此非我之所知。但隋碑之传世者绝少，以余嗜好之笃，集录之勤，三十年间所得隋碑，惟皇甫君、龙藏寺、姚辨墓志及此而已。

清初叶奕苞的《金石录补》卷九，著录此碑云：

> 右碑题隋江夏县缘果道场七层砖塔下舍利记，无书撰人姓

当时的官衔，而作十五六年后唐太宗所授的太子率更令？这一书撰人姓名，显然是出土后，后人因其字酷似率更，于是摹仿其字体刻上石，以增重其价值。（要不然就是有人摹欧阳询款，另刻石上，墨拓后裱入，因此系袭衣裱也。）

我所见的此碑有二，一为此本，一为三十年前上海文明书局影印的《续晋唐小楷三十种》所收的一本。我家旧藏本，为张天涯旧藏，文明影印本为袁尊尼旧藏。文明本“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十四字，完整无阙，笔画稍肥，不如此本之瘦劲，即拓工亦大逊。但文明本有很多字还完整，此本则已残泐，大概文明本比此本拓得稍早。文明本还有一缺点，就是装裱时误将文字先后倒置，不能卒读。（袁尊尼字鲁望，长洲人，嘉靖进士，工诗文书法，有《鲁望集》。）

此本最初的收藏人已不可知，但第二页有朱文“徵仲父印”一印，或曾为文徵明所藏。清顺治初年，为张天涯所得。天涯名远，字超然，又号无闷道人，福建侯官人，避耿精忠乱，卜居常熟。康熙间中举人，工书法，有《超然诗集》（康熙年间有二张远，一为萧山人，字迩可，以贡生官教谕，工诗，有《张迩可集》）。现在录其所跋文字，以见此碑源流。文云：

余收醴泉之宋拓凡四本，而凑补者居其二，皆浓墨拓也。虞恭、皇甫皆得宋拓，独化度只得见王弇州所藏一本耳。此本丁酉（顺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年）岁为徐庶常从华氏借出，余从庶常案间得一观之。前有邵氏谋之二十年不可得，今其迁任岭表五年，而此帖始有可谋之机，余亦费三载心力，多方托友转求，始得归余秘笈。此帖竟若有神人阴授，岂非神物真有微数耶？庚申（康熙十九年，公元一六八〇年）

上元，侯官张远书其原装帖末之古楮，有愧有愧！

后来此拓又归宋芝山、法梧门，题跋者有张船山、曹倦圃、张石谷、沈凤、傅文彬、王芑孙等人，题观款者有吴兰雪、叶东卿、莫子偲、鲍东方等人。末后一跋为先八叔父隐岑公得此本后所题，据罗原觉先生说，文字与书写皆出崔百越之手。今细按书法，实不类隐岑公所作，先叔字体学率更二王，秀逸天成，从不作北魏之体。今录于下：

此记前人少著录，始见于《金薤琳琅》，而无撰书人名，岂其偶尔忘失耶？惟录文完具，此则尚有数字磨泐，不知都氏所据同是此本否，此为海内孤本，不容有二，疑莫能明也。曹倦圃称其能尽笔势，信然，而婉润在欧书尤难得。大体取法乐毅，精劲是其本能，乃合成异采，殊令人爱玩不已。戊午八月十一日，隐岑记于游沪之前一日。

戊午是一九一八年，八叔是年游上海，本拟入北京，后来因为生孙男，赶回香港，办了喜事后，又再去上海，入北京，住了差不多八个月才南旋。他将此碑交给商务印书馆影印不知是在此时否，但影印本后，商务“预白”中说是：“民国十二年五月初版，每册定价上海通用银币一圆五角。……如有翻印，远近必究。上海商务印书馆预白。”则此本或在民国十年至十一年（一九二一、二二年）之间交去影印的。同时影印者尚有游相藏兰亭序三种，分三册，由吴昌硕题签，署年干为庚申（一九二〇年）。影印行世之时，我年岁尚稚，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八叔回乡扫墓，他对我的侄子伯昂说此本已出版，因为得回的印本不多，没

有带来，可寄上海购买。伯昂写了碑名给我，由我写信去上海托朋友姚鹤巢买了，寄到之时，已是下一年的二月了。

此本流入广东不知何时，据罗原觉先生说，他所知者为五十年前的顺德人卢少芸(或“云”，已记不清了。此人亦一富户，好收藏，曾斥卖田地数万元，尽以买书画碑帖)，一九一七年间，由卢家卖给香港上环骨董店至宝公司，至宝公司卖给我的八叔，价六百元，同时又卖与圭峰碑，价八百元。这是此碑入我家之始。在香港时，藏于巴丙顿道玉笥山楼，一九二七年三月，八叔在汕头弃养，三月以后，此碑由秉湜堂兄取回汕头，一直藏在他手上又十七年。我小时学书，先从皇甫、九成入手，后得此碑影本，也下过一番临摹功夫，小时候临小楷也悬腕，至今将入老年，仍能悬腕作草书，这是此碑给我打好的底子。(一九四四年我寻访此影本不得，因与熊润同先生买了一批书，他恰藏有此影本，慨然惠赠，所以现在我还有一本。)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回汕头小住数月，知道此碑尚在秉湜兄手中，我就向他借来临摹，这是我初次见到此碑的拓本，以前见的只是影本而已。我问秉湜兄可否以二百元割让给我，他要四百，因此没有成交，但仍放在我案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将回北京时才交还他。

我回到北方不久，抗日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东奔西走忙于衣食，风雅之事便不敢妄想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广州遇见罗原觉先生，谈起此碑，他说近日风传此碑已到广州。我闻言不免吃了一惊，心想秉湜兄在此时绝不因等钱用而将它出卖的，这时候米谷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他有田数百亩，单是收谷一年，已够五六年的食用了，何至将先人手泽换那些一文不值的中储券。但罗先生说那是千真万确的。我就托他为我留意，如有法可想，我要买它回来，楚弓楚得，也算一快事。过了不久，有个姓林的亲

戚从汕头来广州，谈到家乡新闻，他说数月前日本人到秉湜兄家中，要买碑帖，结果买了一个，付出代价是中储券五万元。我听他这样说，立即就知道必定是此碑了，不免惋惜一番，日本人果然如愿以偿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月，罗先生对我说，此碑到广州后，已被马老二(即媚秋堂主人，人皆以此称之)买了。我听了虽不高兴，但也心安，到底它不落在日本人手上，还算好。只是马君富收藏，精鉴赏(他只好书画瓷器，对于“黑老虎”不十分究心)，尤物一入侯门，恐怕不复有放出的希望了。我与马君素不相识，即欲造门拜求一见，也不可能。但天下事仍有出人意外者，马君因有些生意经要我帮忙，先托王永载来致意，要请我吃饭，再三邀请，我才到晚闻堂赴他的盛宴，我因为和马君不大熟，筵前不便问及此事。过后虽也见了三四次面，都是忙于谈生意经，铜臭书香，不可合面为一，也就没有提及。后来我回去澳门，不久马君也迁居澳门，但彼此仍忙于生意，见面时不知怎的竟然忘记问他，接着日本投降，我于一九四六年往上海，一住经年，深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惧，连忙回来香港，正想找马君商量割爱，但我在国内所经营的生意，忽然一败涂地，不得不拿起笔杆暂做稿匠，以维生活，一千八百买一碑帖，在此时看来已是豪举，绝不敢作癞虾蟆之想了。一九五五年在路上与马君谈及此碑，他说已卖给朱用和了，如果我要，他可介绍。但我那时候一百元都不易拿出，何况整千?只是一番惆怅而已。一九五九年某夕与何曼庵先生同席，连袂而坐，他说出此碑为他所买得，代价只六百元，我深庆此物投得贤主人，为浮一大白。(抗日战争前六七年，罗原觉先生游日本，有些日本收藏家拿出商务影印的欧书舍利塔记，请他设法代为购买。罗君一笑置之。后来他对我说，如果他想赚

钱，不难一口答应，去汕头找着秉湜便可到手。罗君不为此者，以交情为重也。日前与罗君重谈此事，他也深幸此物仍为国人所有。）

现在计算一下此碑的"流年"，它自一九一七年流入香港，一九二七年复回国中，一九四五年再来香港，到今已十七年，其在香港前后二十七年，在我家亦二十七年，这是很奇怪的巧合。它虽然不一定是宋拓，虽然不是欧阳询所写(但也许是他所写而不署名)，但仍然是一件可宝贵的隋碑，还有，原石久已不知下落，这一拓本更为可贵，以拓工来说，纸墨精良，称为海内孤本，也无愧色。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

朝鲜的《神行禅师碑》

古代的朝鲜有三块著名的唐碑，立于唐朝早期，一是《平百济碑》，二是《刘仁愿纪功碑》，都是中国人撰文书写的。碑在今日忠清道的扶馀(是百济的古都)。但是朝鲜人自己撰文，自己书写的，要算这第三块《神行禅师碑》为最著名了。

在唐朝，朝鲜人能写得一手好汉字而享盛名的，有崔致远、金生和写《神行禅师碑》的灵业和尚。

此碑全名《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现藏友人罗先生敦复书室中。碑作行书，装裱成册，半页六行，每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字径公尺三分。封面朝鲜人旧题字云："晋阳断俗寺神行碑，灵业书。罗帖。"首页朝鲜人旧题字半页，行书四行云："碑在晋阳断俗寺，灵业者，新罗国王之子，书法与金生埒云。柔兆摄提格，白露节，延晖堂书。"引首盖有"暮云春树"白文印，文末盖白文红印二方，一"泗水"，一"辉垣"。

碑文太长，不具录。碑文首页结衔题："皇唐卫尉卿、国相兵部令，兼修城府令，伊干金献贞撰，东溪沙门灵业书。"

刘喜海《海东金石苑》题此碑为"唐新罗神行禅师碑，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九月"，其跋语云：

> 石高五尺六寸，广二尺五寸，二十九行，行六十三字，行书，在朝鲜庆尚道，晋州智异山。唐元和八年九月，金献贞

撰，沙门灵业书。献贞事实未详，灵业书名与金生、崔孤云相伯仲。按《东国通鉴》，新罗景德王金宪英二十二年，当唐广德二年(伯雨案：似应作元年，新罗景德王二十二年，为公元七六三年，即唐代宗之广德元年)，大奈麻李纯，有宠于王。一日，弃官为僧，累徵不出，创断俗寺居之。《朝鲜志》：智异山山势高大，雄据数千里，女贞白头山之脉，迤逦至此，其东南晋州之东，有断俗寺，即此寺也。碑首结衔称："皇唐卫尉卿"，是献贞曾仕于唐，而归国后授官者，惜史无可考耳。文中有云："往钦哉"，"哉"作"才"。……(刘喜海题跋有云："断俗神行，灵业擅倚天之笔。"原注："灵业书名与崔致远、金生相伯仲。金生唐贞元间人，自幼能书，年逾八十，犹操笔不休。行草皆入神品。崔致远入唐，至光启元年归国。")

前人有关金石诸书，只见清朝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有载此碑，仅录碑文，说是从《海东金石苑》抄出的，刘承干于一九一二年校刻的《海东金石苑》有一跋，略云："此碑拓本已佚，借友人藏本校勘，正讹字六。"今查刘喜海题词称："朝鲜友人赵云石寅永、金秋史正喜、金山鼎命喜等所赠其国拓本，因以编纂海东金石苑。"那么刘喜海所得的拓本，当系清朝嘉道年间之物，故其所撰《海东金石存考》时，此碑尚存。日本大正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朝鲜总督府编印的《朝鲜金石总览》，以朝鲜现存的石刻为本录，此石已不知所在，只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的旧拓本编入附录。三十年前，日本平凡社编印的《书道全集》，收集朝鲜书迹颇多，也不见有此碑的拓本。该书有工藤文哉的《朝鲜书道史》一文云："碑早失去，即旧拓本亦难得一见。"二次世界大战后，平凡社

再编《书道全集》，关于朝鲜部分，也不见收有此碑拓本，可知此碑失后，传世的拓本已很少见了。《海东金石苑》及《朝鲜金石总览》都是根据旧拓本编入，只是铭词末句"上从有×"有字下缺一字，与此拓本相同，不知后来的拓本是否有更多的损阙。

写此碑的灵业和尚，也得详说一下。此册首页朝鲜人旧跋云："灵业新罗国王之子，书法与金生埒。"朝鲜人吴其昌所纂的《槿域书画徵》，汇录其国记载，于灵业事迹颇详，但没有说他是新罗国王之子，现得此跋，可补其缺失。

朝鲜的书法家，以金生、崔致远、灵业为最著。金生的字，深得右军三昧。据《三国史记》金生本传，说他生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寿逾八十岁。那末，他当是死于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以后的了。灵业以后辈负书名，他写此碑时，是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上距贞元七年，不过二十二年，他的书法，必然很受到金生的影响，也许他曾以后辈之礼，去请教过金生呢。崔致远入仕于唐，到僖宗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才回国，距金生之死，将近一百年了，崔致远的时代，远不如灵业的接近他。金生的书迹，仅有"白莲社"一额，早已失去，灵业所书，止此一碑，近亦不存，崔致远数刻，到今日不知尚能存在否。灵业此碑，遒劲流丽，极有右军法度（唐太宗伐高丽后，中国文化影响高丽更大。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高丽文人也从而好之，不少人模仿右军的法则了），视唐朝的《隆阐法师碑》开朗过之。中国唐代的行书碑刻，能有如此高妙者，实不多见。其拓墨尚有中国宋朝毡蜡遗意，褾式也似我国蝴蝶装旧书式，薄页相粘连，以黄色高丽笺糊厚作面页，四边反接，比原册边缘大一线，以黄色丝织通罗一条，扪缀于侧，以作缝连，似沿中国宋装碑帖册式，约当中国明前装法。全册托背用其国旧公牍

人名书册故纸，所存墨书，未知有关考证否(以旧公牍裱书画，装书籍，中国唐时已然，此又朝鲜人受中国的影响之一也)，恐怕有损碑拓，不敢全部揭出，看其究竟。惜前数页略有虫蛀，但也无碍。单从装潢上言之，此本已历数百年了。

关于碑主神行禅师和创立断俗寺的人，据《朝鲜史略》(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明万历刻本)说，新罗的景德王(唐玄宗至肃宗年间在位，即由公元七四二年至七六四年)时，大奈麻李纯，弃官为僧，景德王屡次徵召，李纯不肯出山。他在山中创立断俗寺为修行之所。后来他听说国王喜欢行乐，特到王宫劝谏，国王为之停止作乐，引他到正室，论说数日。可见李纯虽然出家为僧，但仍然关心故国，宫门劝谏，颇有古大臣之风。

断俗寺在晋州，处朝鲜南部，据朝鲜研究会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印行的《增补文献备考》(朝鲜弘文馆纂校)山川类说：

> 晋州智异山居国之极南，南方诸山之最大者，据庆南、全罗二道之交，南临大海，有十二洞天，其上曰天王，登临则二道诸山、南海诸岛，皆在眼底，世称东海三神山，此即方丈也。

又有李纯谏国王之事，皆为断俗寺的掌故，可补《海东金石苑》之阙。

断俗寺创于景德王二十二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癸卯，神行禅师七十六岁时殁于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己未，仅后其十七年，那么，断俗寺创建之时，神行禅师年方六十岁。据此看来，他和李纯是同时代的人，而他到中国求法，得大照禅师弟子志空和尚授记，“还到鸡林，倡导群蒙”(本

碑文），居于此寺，当为李纯所知见，何以碑文中没有一字提到李纯，这是不可理解的。

关于封面朝鲜人的题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册内两题，字体皆极古朴，很像中国宋元人的书法。其言灵业为新罗国王之子，此说未见记载，当系遗说，而未为后人所知者。其曰“新罗国”，曰“罗帖”，当是新罗朝已经易祚，而为高丽时代以后的人所书。而作书人又不标写姓名，只写“延晖堂书”。盖的印只是有“辉垣”之名而无姓，这种作风，似为其国王族作书往往不署姓的惯例(中国的王族作书，极少用名章，多盖用斋名闲章，或盖衔名章。朝鲜书家此种作风，盖亦学自中国也)。按《增补文献备考》朝鲜朝载：文宗名晌，字辉之，此名辉垣，不知是否王族中“辉”字的行辈。该书又载朝鲜宫室有“丽晖堂”、“延庆堂”等名迹，但不见有延晖堂之名。该书纂辑于兵燹之后，也许有阙误，漏去延晖堂亦未可知。

“泗水”一印，似系以名川来标榜族望，或其先系及藩封之所在。按《增补文献备考》全罗道山川一条所称，泗水俗称回渊，在全罗道东北三十里。《芝峰类说》(朝鲜李晬光编，万历四十二年纂印，大正十五年朝鲜研究会再排印)国都类载：百济始都慰礼城，后移熊津，又移泗沘，此“泗沘”也许是泗水，但在没有得到更多材料之前，还不能确定。

这本墨拓，因为碑主神行禅师曾来中国受法，归传海东，撰碑文的金献贞，也在唐朝做过官，现在他的碑记旧拓罕见本(又是旧装旧题)复传回中国，为国人宝藏，这是值得令人欣喜的事。

此碑有关两国文化史迹甚大，因备证其故实于此。

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

《四家藏墨图录》记略

《四家藏墨图录》是近年出版一部有关古墨的书（书为非卖品）。四家者是湖北张子高、浙江张䌹伯、广东叶遐庵、北京尹润生。全书共八十二页，线装包角，封面是浅蓝色的花纹笺，文字说明，分由这四位收藏家亲笔书写，尤为可贵。

张子高单名一个准字，湖北枝城县人，留美学生，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兼教授，著有《科学发展史略》。他今年已七十三岁，虽已退休，但对文化还很努力。张䌹伯是宁波人，今年七十五岁，上海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毕业，上海明华银行总经理、浙江大学教授，今住北京。遐庵先生人所共知，不必我介绍了。只有尹润生不知何人，他的生平我也不大知道。

我有两位朋友都以藏墨著名，一位是廿年前逝世的袁励准（光绪戊戌翰林），一位是一九五〇年逝世的寿石工。他们久居京华，收藏明墨精品甚富。袁氏藏墨，死后已陆续流出市面，被寿石工、张子高等收罗不少（袁死后，传闻日本人曾出价五万元收买其墨，他的家人索至十二万，幸未成事实）。袁氏著有《中舟藏墨录》（袁字珏生，号中舟，写得一手很好的米字）。寿石工是绍兴人，单名一个玺字，著有谈墨专书《重玄琐记》抄本，未出版。玄者黑也，墨以黑为贵，故书名如此。石工藏墨之室曰玄尚精庐，又自号南方墨者。石工死后不过三年，他的藏墨也陆续出卖了。现在这部《图录》中就有一些是寿氏的藏品。现代人大都不用

毛笔，用墨也不大讲究了，到底旧墨有何好处呢？且看遐庵先生本书篇首的序文。他说：

墨为吾国特产，且关于文化日用者甚钜。自五代宋元明以来，良工辈出，各以品质体制相竞，高者至等黄金。其制作之精，又于美术工艺中独树一帜。且非但此也，同好中张子高先生有言："我国旧墨之所以驰名世界，今犹争相求取，实缘墨质中胶烟各料制造时，内涵成分既力求轻清细腻，益以捶捣之工，动云万杵，故能融合无间，浓淡咸宜。用于纸绢，纸绢虽敝而光采犹腾；试于砚石，砚石纵坚而刚柔相济。其间确合现代科学之处，可一一说明，非世之粗制滥造苟求充用，而实不能致用者可比也。"子高为科学专家，授课清华大学数十年，从不妄言轻许。固知旧法制墨之精善，盖为千馀年研进之结晶，正以表先民创继之精神，亦以示民族优良之传统。……

张子高藏墨的斋名叫石顽墨艳之室，他刊出的藏品共十九笏，都是精品。第一笏汪春元绣佛斋写经墨，是寿石工之物；他的《重玄琐记》记此墨云：

春元墨曾见著录，而意园、中舟旧藏皆无之。余以重值得之英古斋关子光，晋南刘氏物也。

文中的意园，是指满洲达官名士盛昱（字伯羲，号意园，光绪朝名翰林，收藏书画古籍甚富。英古斋的关子光也卖过不少旧墨给我，不过我买的只是清朝中叶的出品，以实用为主，不是收

藏)。汪春元是明万历年间人，工制墨。

第二笏是程君房寥天一墨。子高记云：

通体漆衣，棱角处皆破觚为圜，有玉润珠圆之妙。下端微磨，光采焕发，尤觉湛湛如小儿睛也。郁华阁(伯雨按：盛伯羲斋名)旧藏一笏，见《中舟藏墨录》卷上页十八，与此墨大相类似，特形制差小，图案有别耳。

第三笏是方于鲁文采双鸳鸯墨。全墨有彩色，边界和五字铭文皆涂金，铭文界阑间则填石绿，图案更施金碧朱蓝绛诸色。子高记云：

程氏墨苑有套色版，固为方氏墨谱所无，而于鲁髹彩墨，又为君房作品所未具。……惟方氏此类真迹世不多见，《中舟藏墨录》三卷共载于鲁墨九丸，而傅彩者仅文犀照水一丸耳。此外则学古斋之皇图九锡，天津文物局之妙灯宝轮，同好知见所及，寥寥此四丸而已。

第四笏是明末孙瑞卿(字玉泉)的寥天一墨，也是寿石工旧藏。子高记之云：

此亦石公旧藏，其述《知白斋墨谱》跋尾有云："郭氏此书，近印与初印不同。曩见底本有孙玉泉寥天一一笏，通体蛇皮纹，古泽可鉴。近印者则取一吴鸿渐玄虬脂代之，故此笏重见。玉泉墨已于戊寅归余斋，欢喜志之。"……瑞卿时代大抵与程方相近而稍后。……又此墨标题与汪氏铭文概本于鲁，

方氏所制见《漫堂续墨品》，特形制较小，而署年乙未则为时差早。由斯可见程方作品风靡一世，而云蒸霞蔚，接踵而起者更有人在也。

此墨是寿石工在一九三八年所得，其所记之郭氏，系潍县郭麓屏。

张子高藏品中有一笏很有趣而又可贵的，那就是吴去尘的不可磨墨。墨高二英寸，宽一英寸，正面镌阴文隶书“不可磨”三字，款字作篆书“延陵吴去尘□”（下一字不明），下一阳文篆印“吴拭”。背后镌阳文“震旦大明崇祯年造”。这也是寿石工旧物，子高记云：

此石工所藏明墨精品之一，《重玄琐记》纪其事云：“半年不收墨矣，此墨朴质纯茂，非惟启祯墨中无可骖靳，曩见去尘墨逾十笏，亦皆逊此精坚也。节衣缩食得之。”时在丁丑（一九三七年）长至后一日，盖抗日战争初期也。去尘墨在明清之际，与程方并称，万年少著墨表，取程方吴三家别为一卷，可证。然去尘实非墨工，与程方有别。……又去尘行谊为其墨名所掩，后世甚有误称其名者，如《古今画史》称其名隐，《享金簿》称其名璘，《砚山斋墨谱》称其名望，皆非是。惟朱竹垞《明诗综》，钱牧斋《列朝诗集》得其实，并著其文采风流焉。叶遐庵先生告余，近人王培孙校注《南来堂诗集》，引许楚《青岩集》舟梦吴去尘诗序，有“友人吴拭死国六年矣，辛卯二月廿日，予雨宿兰陵舟中梦拭”之语。培孙按：“辛卯为顺治八年，则吴去尘死当在顺治二年。既云死国，则当时或参预吴阳起义，而乱离间事迹以讳言而莫考矣。”余按钱牧斋

《列朝诗集小传》称去尘"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并于所为隐湖毛君墓志中特书其事，似去尘之殉国殆属事实，牧斋盖隐痛之而未敢明言之耳。

这是吴去尘制墨的故事。至吴闻礼所制的上牧翁老师真赏墨一笏，也是子高所藏。墨的正面刻楷书"门人吴闻礼上"（阳文）"牧翁老师真赏"（阴文）十二字，背刻阴文篆书"为天下"三字。此墨也与历史有关。子高引道光徽州府志忠义传云：

吴闻礼，字去非，休宁商山人，钱塘籍。崇祯癸未进士。……乙酉两京失守，与金声同时起兵。十月徽郡破，闻礼敛兵去。再授兵科给事中，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上游，与詹兆恒同守仙霞关。丙戌大兵入闽，闻礼为叛者所杀，师遂溃，家人刻木为头而敛焉。闽人祀名宦，钱塘祀于六君子祠。（张子高按语有："牧翁有愧门人多矣。又麻三衡墨志蓄藏篇：吾友陆文虎为余言，天都吴去非藏墨不啻数十百家。然则闻礼亦明季蓄墨者也。"）

四川人向仲坚以词名，今仍居上海，他也喜欢收藏旧墨，又与寿石工相善，一九三〇、三一年间，著有《玄晏室知见墨录》，未成书，稿本今藏尹润生处。向氏所藏吴元养赤水珠墨，后归张雨楼（丰润人），又归尹润生，最后归张子高。

此书第二位藏墨家是叶遐庵。在遐庵藏墨目录下盖朱文"遐庵"，白文"叶恭绰"二印，皆故友杨千里所刻（叶君最喜用千里此作白文三字印，实为千里精品，可传不朽者）。叶先生藏品计二十一笏，第一笏是宣德龙香御墨，叶先生记云："右图之墨与袁中

舟所藏二丸大小略同，惟彼题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此题宣德元年制五字，为不同耳。”宣德是明宣宗年号，元年为公元一四二七年，至今已五百三十三年，在四家藏墨中为最古的一笏。第二笏龙青烟瑞墨，是程君房的精品，圆形，纵横五英寸。叶先生记之云：

> 据盛伯羲《藏墨簿》已入藏续，又去之，不知何故。实则伯羲欲以墨名为对偶，事属玩艺，非以定墨品之高下也。此墨计重二百六十克。伯羲曾用金泥题曰：“故人赠金，辞之再四，客卿翩来，遂移初志，呜呼先生，是为墨吏！己卯小除，王莲生兄以六十金馈岁，峻却不受。适贾人以此墨来，心好之，而卒岁方无馀资，竟以此金得此墨焉。因铭以自讼。”此段题字，都中传为佳话。伯羲逝后，袁珏生争购未得，引以为恨。……

这段记事很有趣。赠金盛氏的王莲生，名懿荣，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师时，他投井自杀。王氏为光绪六年翰林，三为祭酒，盛氏光绪三年翰林，官至祭酒。两人皆好收藏文物，时时互相取去而不分彼此。

第三位藏墨家是张絅伯，标题千笏居藏墨目录。张氏藏品共十九笏，精品有方于鲁天符国瑞墨、青麟髓墨、叶玄卿兰亭后序图墨。叶玄卿万历年间人，黄石斋说他制的墨在程君房之上。这一笏原系冯文蔚（光绪二年探花，浙江乌程人）旧藏，有“脩庵珍藏”四字款。冯与盛伯羲、周芸生等同为藏墨家。（清人避康熙讳，将玄卿改为元卿。）

第四位藏墨家尹润生，标题忆竹簃藏墨目录，藏品共廿五

笏。其精品有吴申伯溪提金汁胜兴墨，重五百五十克，两面镌绘神仙故事。申伯万历时人，尹氏记之云：

> 抗战胜利后，永誉斋在大连从日本人手中购回，余得之狂喜累日。申伯传品不多，记载不见，偶在日人河三亥著《米庵墨谈》中见吴申伯之名，与程君房齐列。得此墨知吴申伯别署梧竹居，万历时墨人。……

尹氏的精品中有吴去尘国宝墨一笏，一面镌绘一龙，中有阴文篆书“国宝”二字，一面双凤对舞，中间阳文篆书“吴去尘墨”四字。尹氏记云：

> 案吴拭，字去尘，别署浴研斋，安徽休宁人，工书画，诗才清隽，精琴理，兼喜制墨，为文人自怡者流。所制之墨，深得唐宋遗意，岿然为晚明墨家翘楚。传世之品，赝胜于真，盖声望既隆，自多赝鼎。此墨下端磨迹，澄若秋水，夫墨尚玄，此则受采，洵令人别有会心。其镌范亦迥异俗手，具见巧思。此笏虽经磨用，似为美玉之瑕，较之以赝为真者，奚若抱残守阙之为善也。

汪春元大国香墨，也是尹氏所藏精品，他记云：

> 原为夏孙桐翰林殿试，恃为善事利器之资，平生颇珍视此墨。案汪春元安徽休宁人……春元制墨，传品至鲜，丘至山《百十家墨录》藏春元喻麋墨一笏，并述其展转始末，十年之内，五易其主。麻三衡《墨志》载春元墨两品，一为墨林妙

品，一为麒麟墨，见记载者仅此而已。此外明清藏墨家均未之觏。石頑墨艳室主人所藏“绣佛斋写经墨”亦漆衣，且有原装，与大国香有异曲同工之妙，惜下端用磨，致成残璧，殊以为憾。然宋漫堂尝以半笏郃格之墨，辑入墨品之冠，具见古人藏墨，务以精确为宗，不徒斤斤于残断与否。漫堂此举，余颇韪之。

这笏墨是长方形，一面镌绘仙鹤飞翔水上，一面镌阳文篆书“当朝一品”四字，左侧下楷书“汪春元制”四字，但“制”字下半的“衣”字已被磨去。墨顶楷书“大国香”三字。此墨原是词人夏孙桐所藏，他是江阴人，做过湖州知府。入民国，在清史馆任职，《清史稿》的道咸同光四朝臣工列传及循吏、艺术两传，皆出其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逝世，年八十五。漫堂是宋荦的号，清初著名的风雅大官也。

这四家的藏墨，除张子高外，皆已赠予文化机关，公开陈列，供人欣赏，闻子高以年老，亦预立遗嘱，死后即捐出，不以遗留子孙云。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王昭君及其遗迹

杜甫咏怀古迹诗，有一首说到王昭君的故乡，开头四句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原来昭君是南郡人，这一区的地方甚广，包括湖北荆州、汉阳一带，《一统志》说昭君村在湖北宜昌府兴山县之南，《后汉书》说是秭归，即今日湖北秭归县。杜诗这四句就是说明她的故乡所在，和昭君生长名邦，而殁身塞外，不能归葬中国，徒留一青冢在外邦而已。但是近三百馀年，昭君墓地，亦属中国，即今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北郊二十里外的黑河附近，著名的青冢就在这里。据归绥的志乘所说，塞外的昭君墓共有三处，一在凉城县境，一在河西达拉得旗，而以黑河附近的最有历史可稽。现在从公路上骑自行车，行一小时可达。过了两座桥，转个弯儿，进入一个柳树的长廊，长廊尽头，便显现出昭君墓的轮廓，高高的坟影，透出一派青青的颜色。游人看见青色，觉得"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句诗之有情意，古人呼此为青冢，实在恰到好处。

昭君坟是个方圆占地二十亩的土丘，高约二十米，用黄土筑成，周围有淡蓝色的木篱笆，篱笆外树立八面碑碣，有些刻着"汉明妃昭君之墓"、"昭君青冢"等。到底这个坟是否真的为昭君埋骨之所，我不敢说，因为昭君死了已经二千年，塞外的变化很大，小小一坟，未必能留存到今。不过数百年来，人们都说这是

青冢所在，人们也就当作是昭君墓看待了。

青冢虽不尽可靠，但明妃村却是可信的。今日湖北秭归县城东面二十多里的江南岸，川江西陵峡第一险滩的兵书峡附近，就是王昭君的故乡明妃村，其地又名香溪，全村几百户，皆以务农为业。村的一面临江，有群山环绕，构成一幅天然美丽的图画。现在村里所能见到昭君的故迹并不多，除刻着"汉明妃王嫱故里"一面碑石外，就只有山后一座明妃祠了。祠内虽有塑像，但已残旧，这当然是后人设立的。千年前杜甫也许曾到过这个村，也许曾见过昭君的画像，所以他在诗中才说"生长明妃尚有村"和"画图省识春风面"。

王昭君的故事，正史上说得极简单，我们只知她是西汉元帝时人（元帝在位十六年，由公元前四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共改四个年号），据《汉书》说，昭君是她的名，字嫱，元帝时，以良家女选入掖庭。匈奴在北方恃强入寇中国，为患数百年，汉武帝曾派大兵往征伐，没有法子将它消灭，以后各帝皆忙于在北方设军备，以防匈奴侵入。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是年五月，元帝逝世）正月，匈奴王呼韩邪来朝，自言愿与中国通婚，做汉朝女婿，元帝即以宫女五人赐之，匈奴王甚喜，立誓不再侵犯中国，还可以代中国看守北边门户，不让其它夷狄入寇，从此中国可罢北边军备，省却许多人力财力。昭君入宫数年，未得亲近元帝，心中悲郁不平。元帝下令问谁人肯嫁匈奴王，昭君自称愿意。元帝以为是个宫女罢了，怎有空闲时间叫她来问问。到匈奴王来辞行，元帝开酒会饯别，当面点交五个美女，叫番王"笑纳"。昭君出现之时，美艳动人，一班人都为之神魂飘荡。元帝见了也大惊失色，便想留下不与。但既已答应在先，不便在点交时又说这个不是，只好硬着心肠，令美人和番而已。过了不久，

元帝去世，不知是否受此打击。

昭君到了匈奴，不过两年多，匈奴王便死了，幸喜她养有二子（此从《后汉书》所说，《汉书》只说生一子），还不落寞，继王位的王子，是呼韩邪正室所生的，依照番邦风俗，新王可以继承前王所有，要纳昭君为妻。昭君生在名邦，未见过这等子娶父妾的事情，也为中国名教所不许，因此上书汉成帝，请求准她回国。成帝教她入乡随俗，敬事新君可也，于是昭君又和新王养下两女。这个新王名叫雕陶莫皋，二女长者名须卜居次，次者名当于居次（居次犹汉语公主也。须卜、当于皆为匈奴大族之名）。后三十年，汉平帝即位，年幼，王莽掌政权，他想巴结皇太后，表示自他执政后中国势力足以慑服远方的人，就示意匈奴王令昭君长女须卜居次入侍太后。匈奴王当然奉命唯谨。须卜居次到中国后，皇太后高兴非常，赏赐甚厚。这是平帝元始二年，也即是公元二年的事。昭君于元帝竟宁元年出国，至元始二年恰三十五年，她的女儿始于此时回国。王莽夺汉天下，改元建国，建国五年（公元十三年），匈奴国王死，当权的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就是王昭君长女的丈夫，他时常欲与中国和亲修好。王莽天凤五年（公元十八年）他带了儿子奢（即昭君的外孙，单名一个奢字）到中国朝觐，王莽大喜，便将他的庶出之女嫁与奢为妻，将女婿封为后安公。于是中国和匈奴亲善起来，关系又再拉深一层了。

王莽又进一步，想立他的亲家翁须卜当做匈奴王，未实行而须卜当逝世，王莽只好改变计划，拟派大兵拥后安公回国做国王，可惜王莽失败，而后安公也短命死了，没有成为事实。

自昭君和番后，汉朝的边疆有一百多年太平无事，她在匈奴享福数十年，子女满膝下，子为右日逐王，婿为秉政大臣，外孙又是中国的公爵。至于她的外家，也凭她和番而显贵，她的哥哥

之子王歙，封和亲侯，王飒封展德侯，在此三十五年间，他们都成为对匈奴外交的能手，有一次匈奴新王即位，王莽派王歙、王飒去匈奴代表中国致贺呢。昭君一家人，女和番，男为对匈奴外交家，他们折冲尊俎之功颇伟，世人知者不多，所以我特别将这件事写出来。

至于昭君的功劳更大了，她自愿和番，使汉家节省了许多财力，清朝的绥远城将军彦德，题青冢诗有句云："一身归沙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霍卫同。"将她的功与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等量齐观，可谓颇有见识。（彦德满洲人，道光十二年至十七年任绥远城将军。）

世俗所传昭君故事，大都不甚可信，至于说毛延寿要昭君给予外快，才将她的容貌写得美如天仙，这更是小说家言。此说本出于《西京杂记》一书。此书托名刘歆所作，但唐书则说是东晋时人葛洪的作品，似可信。《西京杂记》有很多荒唐的记载，自然不及前后汉书之可靠。后世文人（尤其是诗人）对昭君误解很深，元曲《汉宫秋》甚至说昭君行至黑龙江投江而死。俞曲园说这是"良由惜其沦落，故创此说，为美人一洒之，事虽失真，不必辨也。"其实曲园老人也说不着昭君的心事。昭君年少貌美，入宫数年，未得亲近皇帝，心理上自然起了反感，有和番的机会，她就自愿嫁给胡人，至少匈奴王的妃嫔没有汉家天子那么多，匈奴王因昭君是天朝的宫女，又长得美丽，对她自然宠眷有加，总比在汉宫独宿好得多了。王荆公诗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就有点道着昭君的心事了。旧日文人总有一种"礼教"思想在作怪，诗人更是要"温柔敦厚"才算得是"正统"，于是白居易的诗就有"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他竟然说昭君绝无怨言，还希望汉帝赎她

回来。

谈昭君故事，自然以出塞一幕为最精采，她没有和番，她的大名断不会这样耸动后人的。她不止是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描写的对象。因此她的故事又被人写成小说戏曲，播之于管弦，歌之于舞台了。甚且世俗又将一些与她毫无关系的事情也扯到她身上，例如“马上琵琶”一事，久已积非成是，居然成为典故，凡提到琵琶就联想到王昭君，谈到王昭君，就必定提到琵琶。戏台上的昭君和番，未出国门就已手抱琵琶了。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辨此事有云：

> 至马上琵琶实非昭君事。《文选》有石季伦王明君词一首，其序曰：“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然则琵琶作乐，乃因乌孙公主而推之昭君，想当然耳，而至今流布丹青，传之乐府，杜少陵亦有“千载琵琶”之句矣。《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年十七献元帝。”此可补汉书所未及。《琴操》又云：“昭君吞药而死”……非事实也。

所说颇有可观。公主嫁乌孙，和番也，昭君后公主和番，出塞时，自然也有琵琶随之奏乐，所以昭君也与琵琶有关系，不过马上琵琶非昭君专有，典亦不属于她，只是她的名气大过公主，便为她独占了。《琴操》一书，托名蔡邕所作，当然不可靠，这部书恐怕比《西京杂记》还后出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日

岳 阳 楼

湖南的岳阳楼在海内享盛名千年，完全是靠范仲淹那篇记才窜红起来的，其情形正如滕王阁靠王子安那篇序文一样。小时候读古文《岳阳楼记》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沈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读到此也为之心旷神怡，掩卷沉思，怎的将来有日游游岳阳楼才偿我的心愿。年纪稍大，读黄山谷诗有"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又使得我神魂飞越，想立即到岳阳楼上，对正君山，吊一下古时那个贤妃子。过了八年，一九二七年春假，我居然得偿此愿，坐在岳阳楼上，凭栏细啜君山茶，欣赏洞庭湖的风景．"一碧万顷"的波光里，可以隐隐约约的望见君山。（君山以产茶著名，年产不过数十斤，王湘绮是湖南人，他致函岳州办厘金的张文心云："君山新茶，真者可为致一二两，假者亦致一二斤，以慰渴思"。在八十年前本地人都这样难得真品，可见其名贵一斑。）

岳阳楼在岳阳县城西的城楼上，一跨进题有"南极潇湘"或"北通巫峡"的山门，就看见坪上那些青翠的树木，一座高楼矗立在跟前。楼身是木结构，平面宽深各三间，三层三檐。中层四面环以明廊，供人远眺。

楼的历史是相当长远的，据传三国时代吴将鲁肃曾在城楼上

筑阅兵楼，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宋人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说："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但张说的诗题只有"南楼"之称，那是因为此楼在郡署之南，所以就随便叫它做南楼，可知其时还未有岳阳楼之称，后此二三十年，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的篇什中才见岳阳楼之名，从此以后才固定的用岳阳楼这一名了。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年）滕子京（名宗谅，河南人）谪守巴陵，重修岳阳楼，以后历元明清各代都有修建，最后一次大修，是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又再大修，修筑情形大抵是依照旧有的予以整理，没有变更结构原式。楼前的两边有三醉亭和仙梅亭。三醉亭旧名望仙亭，现在才改名三醉，相传神仙吕洞宾过岳阳楼必要买醉，所以有望仙亭之筑。楼中还有吕洞宾的石刻画像，碑高五六尺，上题"孚佑帝君像"数字，不知出谁人之手，年久也忘记了。坪上放着一个大铁鼎，高八九尺，是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二年）一班善男信女献给"孚佑帝君"的，祷拜的人烧纸钱元宝，就用这个鼎做炉子。鼎旁分置二铁桶，名叫铁梢，上有铭文铸"宋淳祐五年（一二四五年）十二月吉日，孟府十位铸到铁梢，一样二只，各重一千斤。"据说这两铁梢本置君山的崇胜寺的，几时移在楼前已不可考。楼的中层和底层，各有木刻字屏六幅，刻的是清朝张照所写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写时的年月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张照字得天，江苏娄江人，康熙四十八年翰林，官至刑部尚书，以书名满天下，但他的字柔媚多姿，风格不高，因为当日的皇帝都喜欢这一类的字，他浪得虚名而已。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信请范仲淹作记，信中有说："岳阳楼不知俶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

咏，与洞庭君山相率表里。”范仲淹写记时，便将四周景物，早晚晴雨各种不同的感触都作了极细致动人的描写，而对楼的历史却一点都不提及。范记中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止成为千古名言，也是我国旧日士人的伟大政治目标。相传范仲淹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了，得到他替滕子京写此记，就借此发挥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哲学。直到今日，一般人都喜欢引用范文正这两句名言。俞曲园先生说到范仲淹这两句名言，有他的一个说法，现在录出来，给读古文的人参考。《茶香室丛钞》卷八云：

> 范文正《岳阳楼记》先忧后乐之语，千古称之。然余谓此自文正素志，何忽发于此？意则诚美矣，以作楼记而言，则似不甚切也。及读宋范公称《过庭录》云：“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求作岳阳楼记，故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乃知文正有为言之，非横逞议论也。

曲园先生引宋人范公称所说的，很有趣，可为今日校中读古文的学生参考。我们从此也可知范仲淹不是在做秀才之时说这两句话的。原来滕子京有满腹牢骚，范仲淹以此规劝他。（俞先生又引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说滕子京修岳阳楼成，有人称赞他，他答道：“有甚可喜，落成后，只待凭栏痛哭几场罢了。”以证滕子京有满腹心事。）

范文正这两句名言，不只后人喜欢引用，就是在北宋之时，官方居然也引用它，苏东坡做翰林学士时，还引此二语来批答章

奏。据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说，范仲淹之次子纯仁(字尧夫，父死方出仕，累官中书侍郎，观文殿学士，谥忠宣。)辞官，东坡代批答云："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到范纯仁在徽宗登位后，徵他为观文殿学士，他因为眼病，不想出仕，死后上遗摺，也说："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也。"两句名言，在宋朝的政府中就用了几十年。

旧日岳阳楼的匾额，是清初汪涛所写的，大径六七尺，据说当时没有这样大的毛笔，汪就用破布蘸墨写成，苍劲飞舞，格外得神。(汪涛字山来，号梦龙，安徽休宁人，多膂力，人呼之为"梦龙将军"。精各家书法，尤善大书。)楼下屏门的《岳阳楼记》，乃乾隆间商思敬所书，我往游时，不见商书，大概他所写的已经被毁，现在的人，只知张照一书，而商思敬的反为没有人提及了。滕子京修岳阳楼后，本楼为一绝，范仲淹作记，苏舜钦书文，邵竦篆额，合之称四绝。邵竦之名，也和商思敬一样，不为人所知。

但邵竦也是北宋一个精于篆书的大家，他是江苏丹阳人，素有节行，范仲淹极钦敬他。王琪守润州，荐于朝廷，赐号冲虚处士。范仲淹作"严子陵祠堂记"后，写信给冲虚处士，请他书丹上石。信中有这几句：

> (拙文)非托之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先生篆高出四海，诚能枉神笔于片石，则子陵之风，后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

可见冲虚处士的人品书法如何，其为范文正推重，必有缘故的，

可惜他的字极少见，在后世也没有大名。

一九六〇年四月三日

桃花源

约在一千五百年前，陶渊明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发抒他的感情，寄其超然高举之志，纯是寓言文字，不必真有其事的，一到了后世，好事之徒便替他演为实事，于是千年来，国中的桃源便出现了好些处，而正宗的桃源，则设在今日湖南桃源县。近日读书，见有述及桃源者颇多，而感于此间有些文士，动不动就有“桃源思想”，发于诗文，因此我就搬一些有关此事的材料，藉备参考。

先说那些冒牌的“桃源”吧。这些桃源，并不是以桃花源为名，但他们的“精神”与桃源是无二致的。是什么“精神”呢？略言之，就是有些人不愿见异族统治中国，他们率家人避入深山，如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所载《邵得鲁事略》，说他在明朝亡后，削发为僧，一日入山迷道，不久后，行到一处有鸡鸣狗吠的地方，见有古衣冠的人出来迎客，原来彼此都是遗民，“因相顾而叹曰：此真桃源矣！”

又与全祖望同时的刘继庄，他的《广阳杂记》说，广东韶州乳源县，有个地方叫梅花，与外隔绝，居民百数十家，有张邓二老人为之主，众人都听他们指挥。二老是明末秀才，不肯降清朝，据险自守，官军不敢进去追讨租赋，只在外边大声说明总共多少，上面就如数缒下来，不欠分毫。二老死后，失去领导人，众人才归附清朝，即于此地设花县。这个“桃源”虽然为期甚暂，但

他们的精神极可佩。

黄梨洲所记的《两异人传》(见《南雷馀集》)，说的也是满洲统治者下令薙发，有徐姓的人，抗不受命，约同宗族数十人，入雁荡山，自辟桃源。入山后数十年，亲友不知他们的消息。

此外友人瞿兑之先生所记的河北老人村，也颇类桃源，其地在满城、涿县之间，居民大都是旧日避异族而迁入的中原遗民。(瞿君有《会勘三坡纪略》一文，载《河北月刊》)同治年间王湘绮日记记湘潭有“桃源”，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今世之桃花源》一条，也是记同治年间所见的“桃源”。凡此所述，都可说是有些人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讨生活，而追寻他们幻想中的仙境，因此创造了一个桃源，这都是受了陶渊明的影响的。

至于“正宗”的桃花源，则附会得很有趣，它位于桃源县城西南十五公里之处，一出县城，便可望见“桃源八景”之一的那个“菉萝晴画”(菉萝山名)，而八景中的“桃川仙隐”，就是古桃花源了。

前些时读报，见有桃花源已修葺为游览胜地的消息，还说所传诗人刘禹锡所写的“桃源佳致”四字，也重新树起来了。这是一个颇有趣的事情。桃源古迹，在民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因为湘省军阀互相厮杀，已将这个古迹破坏无馀，十年前见某报所记的，拿以较五十年前华学澜所见的，又大不相同了。某报所载的文字，说到桃花源有水源亭，亭后有桃花潭，为桃花溪发源处，古人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云云，可见附会得应有尽有，甚至把李白汪伦的事都从安徽搬到湖南，很是好笑呢。

关于唐诗人刘禹锡所写“桃源佳致”石刻的发见与失去，华学澜的《辛丑日记》及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都有提到。《辛丑日记》还详记桃源情形，最可供参考，现在分别摘录于此。(《辛丑日

记》是光绪廿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年，华氏为贵州乡试副考官时写的。麟庆一记，是道光年间的。)《辛丑日记》云：

七月初一日……巳初一刻至桃源洞行馆茶尖。行馆在山麓，门额曰古桃花源，堂额曰延致馆。阶较门高十余级，旧为山寺奉关帝处，前桃源令余良栋即其地改为之。初到，有道士数辈迎于阶前。少歇，令差纪呼一道士来导游。道士姓熊，名宗武，导余等由小门入。初经一六角亭，其一面门之上方墨书曰："此中人语"，不知作何解。亭内外碑甚多，皆剥蚀不可辨识。(案：此处名叫"碑林"，十年前只剩唐宋碑十余方而已。)……过桥数百步，至水源亭止焉。亭亦六角，构木为之。清泉汩汩，自亭后山头下注。……泉流之旁有横石二，一刻"秦人古洞"，一刻"古桃花潭"。询洞所在，道士向亭后左偏指曰，即在此池水之下，从前人所能到，惟洞中地甚狭隘，前令余良栋欲穷所至，穿而深之，至丈许，而获此亭中之石几石柱等；已而水泉涌水，取之不竭，遂成此池，而洞门为水所浸，不能再问津矣。询山后何有，则曰乱山杂树，无可观……由神祠出，对面室三楹，后壁绘山之全图，入室则四壁皆嵌石刻，吴清卿前辈篆书陶记(案：吴大澂于光绪二十年曾为湖南巡抚)，行书自撰之记两石存焉……至集贤堂，堂中奉陶靖节，王摩诘(维)，苏长公(东坡)三木主。……所至之处，对联甚多，所有匾额，皆前令余良栋所题，其字非篆非隶，极为别致。道士云，令为四川人，癸巳年(案光绪十九年也)经营此山，缺者建之，残者新之，各题额焉。……筱苏闻之李子香(案：吕筱苏为正考官珮芬之字，李子香则该县的巡检)云，桃源洞旧有刘梦得所题"桃

源佳致”四字石碑，字已漫漶，余令磨去，易己名重书而刻之，可谓大煞风景。……

所记的是五十年前的桃花源，可见自唐末就有人把陶渊明的寓言演为实事了。刘禹锡所写的“桃源佳致”四字石刻，早在六十六年前给那个附庸风雅的桃源县令余良栋磨去，他老先生自己写过重刻了。可惜日记中没有说明余良栋是模仿刘字重书而刻，仍用刘名，抑直用己名书写而记其事。无论怎样写法，余良栋将古刻磨去，实在是一个不懂事的风尘俗吏呢。

余良栋重修桃花源，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公元一八九三年），而距癸巳六十年，则是发见刘禹锡石刻之时，恰恰是头尾足六十年，亦见巧合。麟庆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年）三月游桃花源，记云：

过萝萝山，午泊缆船洲，即古桃花源渔郎舍舟处也……爰登山谒靖节先生祠，有道士来迎，问以刘禹锡碑，均茫然不能对。……乃寻径下，见路旁有碑隐丛草中，爰命拔而观之，正禹锡所书“桃源佳致”四字。喜而指示，道士亦欣然曰：“今而后可告游人矣。”余大笑……

刘禹锡的石刻，不知何时没丛草中，发见后六十年又为妄人磨去，则麟庆之发见它，似乎又是多事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

麟庆的半亩园

旧日北京城内有半亩园，是《鸿雪因缘图记》作者麟庆的产业。在抗日战争前数年，为一黄姓富商所得，我曾往游览一过，园以石著名，李笠翁手叠的石山，主人也不十分爱惜，将石头单独地出卖了。

麟庆是满洲人，即出使俄国偾事的崇厚之父。《鸿雪因缘图记》有“半亩营园”一节，自述此园梗概，今摘录之：

> 半亩园在京都紫禁城外东北隅弓弦胡同内延禧观对过，园本贾胶侯中丞（名汉复，汉军人）宅，李笠翁（名渔，浙江布衣）客贾幕时，为葺斯园，叠石成山，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易主后渐就荒落。乾隆初，杨静庵员外（山西生员）重为修整，顾子若孙专务持筹，遂改为屯积所，旋归春馥园观察（名庆，满洲人），又改歌舞场，均园林之一变也。

这是麟庆述该园最初的历史。麟庆字见亭，嘉庆十四年（公元一八〇九年）己巳科进士，以治河著名，但也以治河致富（他所著的治河工具书，二十年前收入商务的《万有文库》）。他在书中说到此园归他的经过及园中胜概云：

> 道光辛丑（廿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始归于余，命大儿崇

实倩良工修复，绘图荡漾，邮寄江南，因定正堂名曰云荫，其旁轩曰拜石廊，曰曝画阁，曰近光斋，曰退思亭，曰赏春室，曰凝香。此外有嫏嬛妙景，海棠吟社、玲珑池馆、潇湘小影，云容石态，罨秀山房诸额，均请师友书之，随自撰云荫堂楹帖曰："源溯白山，幸相承七叶金貂，那敢问清风明月；居邻紫禁，好位置廿年琴鹤，常依舜日尧天。"又在扬购得棕竹楹帖，系梁阶平（名国治，浙江状元）相国书曰："文酒聚三楹，畴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笏，卧游边水水山山。"句奇而与园景合，因同悬之。忆昔嘉庆辛未（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余曾小饮南城芥子园（在韩家潭）中，园主章翁言，石为笠翁点缀，当国初鼎盛时，王侯邸第连云，竞侈缔造，争延翁为座上客，以叠石名于时。内城有半亩园，皆出翁手。余闻而神往，计自辛未至辛丑，凡三十年，园归于余，以少年企慕所不可必得者，而竟得之，且机兆于三十年前，事成于三十年后，而修复工作，竣于癸卯四月，余到以五月，因缘天成，何其幸也。

半亩园的历史大抵如此。麟庆买得之后，曾花了不少心血经营，他所作的《鸿雪因缘图记》，就有四章专述半亩园的景物，如"拜石拜石"、"嫏嬛藏书"，"园居成趣"等，皆极可读。园既以石著名，现在摘录他的"拜石拜石"，以见其趣：

半亩园以石胜，缘出李笠翁手，故名。顾西山石青质薄多片，其礓砢黄而有致者，出永宁山，今封禁。园中所存，尚康熙间物。余命崇实添觅佳石，购得一虎双笋，颇具形似，终鲜绉瘦透之品。乃集旧存灵璧、英德、太湖、锦州诸盆

玩，并滇黔朱砂水银铜铅各矿石，罗列一轩，而嵌窗几以文石，架叠石经石刻，壁悬石笛石箫。轩前后凡六楹，后三楹，一贮砚，一贮图章，一镌米元章洞天一品石论于版壁。前三楹，一木假石，高九尺，质系泡素，洞窍玲珑。一星石，围四尺，上勒晋卞忠贞公壶诗，成哲亲王诒晋斋跋，色黑而黝，古光可鉴。一大理石屏，高七尺，九峰嶙峋，旁镌阮芸台先生点苍山作屏，即先生所赠也。又插牌一，天然云山，云中一月，影圆而白，山头有亭，四柱分明，承以檀座，座镌吴鲍庵、姜西溟跋，谓为山高月小，然是矣，而未尽亭之妙，盖因缘在我，故画仙特绘见亭耳，因名曰"见亭石照"，袍笏拜之，遂颜轩曰拜石，并题楹帖云："湖上笠翁，端推妙手；江头米老，应是知音。"会张诗舲方伯(名祥河，江苏进士，时由河南入觐）来，入园小坐，赋赠二律……时余辑"半亩园帖"，老友钱梅溪(年八十有六)寄跋识来，故云。寻张春岚(名振，直隶职员)来游，为绘二十四景册，诗舲又各志赞焉。

这是园主自述园中各种石头之胜(故友黄秋岳一九二九年游半亩园，有五古一首，题云："晚游半亩园，遇敬宜、守白、释戡，睹一奇石，亦标值求售，感赋此诗"，这一奇石，不知是否也经麟庆在文中提及的。李释戡其时也卜居半亩园附近。这位老诗人已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以心脏病死于上海，年七十三岁)。文中的崇实是此园的少主，与其弟崇厚都是同光间著名人物。实字子华，号朴山，道光三十年庚戌进士，入翰林，授职编修，官至刑部尚书，盛京将军，光绪二年死，谥文勤。厚字地山，道光廿九年举人，直隶总督，光绪五年因使俄偾事革职，光绪十九年

死。麟庆本是书香世家，他本人是进士，后来钦赐翰林，一子翰林，一子举人，其后崇实之子嵩申又是同治七年翰林（字伯屏，号犊山），官至刑部尚书，光绪十七年死，谥文恪。自麟庆以后，可谓一门显贵，皆从读书中来，所以麟庆在园中也大量藏书。其"娜嬛藏书"一章有云：

半亩园最后垒石为山，顶建小亭，其南横板作桥，下通人行，西仿娜嬛山势，开石洞二，后轩三楹颇爽垲，颜之曰娜嬛妙境，倩汤都督（名贻芬，江苏世职，官总兵）篆而自集句为楹帖曰："万卷藏书宜子弟（黄山谷诗）；一家终日在楼台（元微之诗）。"癸卯闰七月，烦暑既除，乃率两儿理青箱，启行箧检书，列架其中。……统计八万五千余卷，盖萃六七世之收藏，数十年所贻赠而后得此，亦云富有。……

道光廿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年），麟庆在南河总督任上因决堤被革职，遂回北京闲居，到廿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年）病死，年五十六岁。他享有此园六年，园居不过四年。嵩申死后，园仍为其后人所有，到何时始归异姓，我就不大清楚了。嵩申的一个门生陈恒庆（山东潍县人），在其所著之《归里清谭》，记嵩申身后事，颇可一述，今摘录于下：

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吾师嵩文恪故后，子尚幼，数年后渐患贫，冯梦华偕诸同年为之清查，勒令门政献出帐簿，一一稽核，计存二十万金之产，不令门政管理，存案于顺天府，交帐簿与如师母，按月由某当

店某票庄支用，母子赖以存活，至今府第及半亩园（鸿雪因缘所载）犹岿然存也。

冯煦与恒庆是光绪十二年丙戌同年进士，冯为是科探花，他们都是嵩申的门生，因是科会试正总裁为锡珍，副总裁祁世长、嵩申也。嵩申死后被门政（即门房）所吞剥者不知多少，但仍能稽查出二十万，则其富可见一斑。

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

［附记］

友人瞿兑之先生，为光绪末年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哲嗣，其北京故居在半亩园旁。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九日得瞿君来书，略说前年冬间曾往故居眺望，此屋已归公家，弓弦胡同也改建新屋，无此胡同了。紧贴半亩园有麟庆后人别宅，面临亮果厂，仍为衡永（字亮生）居住，虽院宇凋疏，而家中犹是六十年前陈设，诚不可多得云云。麟庆后人如是。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伯雨附记

醇王府的丁香花

北京宣武门内西南隅，有太平湖与太平街，街上有清朝的旧醇王府。醇亲王行七，名奕譞，是光绪帝的本生父，因此人们叫这所王府做七爷府。

这所王府之动人遐思，令人可爱，不在它是醇王府，而在它是百年前我国一个女词人顾太清曾住居过的。更有趣的是人家传说顾太清和龚定庵在此恋爱，后来定庵被太清的丈夫贝勒奕绘毒死。

龚定庵的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有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后来的好事文人便从这首诗闭门造车，制出定庵与太清恋爱的故事，曾孟朴在《孽海花》说部更绘声绘影，说得若有其事一般。

顾太清是满洲人，嫁贝勒奕绘为侧室。奕绘与奕譞是兄弟行，乾隆帝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永琪是皇五子，封荣亲王。永琪子绵亿降袭郡王，是为荣郡王，郡王之子奕绘，袭封贝勒。奕绘自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著有《明善堂集》，内分诗为《流水编》，词为《南谷樵唱》。太清单名一个春字，字子春，号太清，世人称她为太清春，她也常举自己的族望为西林，自署名曰："太清西林春"。这里的"西林"，不知与雍正乾隆间的鄂尔泰的西林同一地否。一说太清是顾八代之后，八代是满洲镶黄旗

人，姓伊尔根觉罗氏，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端。

太清的诗集叫《天游阁集》，词名《东海渔歌》。绘贝勒词名《南谷樵唱》。东海渔歌与南谷樵唱，就是太清配太素之意（孟心史先生这样说的），而南谷又是奕绘自营的生圹之名。太清的词，为清代一作家，王鹏运常说，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只此二人而已。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癸丑，况蕙风序《东海渔歌》有云：

> 曩阅某词话，谓铁岭词人顾太清，与纳兰容若齐名，窃疑称美之或过，今以两家词互校，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长，若以格调论，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词，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当于全体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阕为论定，一声一字为工拙。此等词无人能知，无人能爱。夫以绝代佳人，而能填无人能爱之词，是亦奇矣……

推崇之高，可谓至矣。我现在草此短文，不是批评介绍太清的词，而是说明她与龚定庵并无恋爱之事（这一点不必我考证，远在四十年前，孟心史先生已证明无稽了。又记得苏雪林女士于一九三〇年的《妇女杂志》刊有《清代女词人顾太清》一文，同年十月又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写有《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不知苏女士怎样说法，二十年前曾读过，今已忘个一干二净了），并说一下那个醇王府。

绘贝勒死于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戊戌，到今年戊戌为一百二十年，死时正四十岁，与太清同庚。龚定庵出都，著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事在道光十九年己亥，太素死已一年了。定庵在道光廿一年死于丹阳县署，人家传说是中毒，冒鹤亭罗瘿公

一班人相信他是被绘贝勒遣人去加害的。这一点当然不能成为事实，他死了一年，怎能在一年后，还派人去毒死他的"情敌"呢？况蕙风序《东海渔歌》有一段说：

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内，宇内几无完人，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云之滓，变乱黑白，流为丹青，虽在方闻骚雅之士，或亦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亦有援据事实，钩考岁月作为论说之申辩者。余则谓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又决定太清之为人，无庸断断置辨也。……

这是暗中不满意于冒鹤亭、罗瘿公、曾孟朴诸名士的说法，我是极端同意于况蕙风这样说的。

关于荣王府——即后来的醇王府，现在可一说。永琪于乾隆三十年封荣亲王，三十一年死，谥曰纯。乾隆三十年是公元一七六五年，今假定这所王府是建于乾隆中叶，则荣王后人有此府差不多一百年，后来才转为醇王府，为奕譞所有。几时为醇王府，现在手头没有材料可以参考，按奕绘之孙溥楣，在咸丰七年袭封镇国公，同治五年因事革退，荣王府也许在此时没收入官，由西太后赐给奕譞居住的。光绪帝后来在此处诞生，到光绪十四年，醇亲王上疏问西太后应否将此屋依照潜邸之例恭缴。是年九月一日降谕云：

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奏，现居赐邸为皇帝发祥之所，敬稽成宪，应否恭缴，请旨遵行等语。醇亲王府第，为皇帝潜邸，应恪遵雍正二年成宪，及乾隆五十九年谕旨，升为宫殿，准其恭缴。贝子毓棣府第，赏给醇亲王居住，并赏

银十万两由王自行修理，俟修竣后，再行移居。西直门内半壁街空闲府第一所，著赏给毓棣居住，并赏银一万两修理。所赏银两，均由户部发给。

于是醇亲王就由太平街迁居什刹海的新醇王府，旧醇王府变成宫殿，封闭起来了。到民国初年，一切"天家"的排场都廓清了，"潜邸"也拿来出租，于是进步党便租下这所"潜邸"来做本部。孟心史先生尝到进步党本部看那班议员政客开会，回来后有感于美人名士之可贵，他说："顾太平湖一宅，独以昔日至可宝贵之遗址，居今日至不可向迩之人，尤为奇厄。"于是他有诗二首咏其事，第一首云："太平湖水明如镜，可有丁香尚着花；一自淮南轻拔宅，空令鸡犬住仙家。"把这班党人议员政客骂为鸡犬，很是有趣。

旧醇王府(醇亲王迁居什刹海新第后，人家就叫太平湖的旧第做旧醇王府，或七爷府，太平湖第，而叫什刹海者亦曰西府)的丁香花最著名，邸后废园，还有百多株。民国四五年间，党人王赓(后改名揖唐)办中华大学于北京虎坊桥侧，后来因为颇有发展，便搬到太平湖的七爷府。一九一八年春，王赓已将园址略加修葺，丁香盛开时，他邀请北京名流数百人为赏丁香之会，诗人樊樊山、陈徵宇、郭蛰云、易哭庵等皆有诗。樊山七古一首，尤关丁香花故事，今录之以结吾文。题为："戊午春暮，湖邸丁香盛开，王会长约为茶会，为赋长歌纪之。"诗云：

太平湖上醇王邸，甲观画堂诞龙子。穆宗登遐岁甲戌，帝御紫宸王北徙(德宗承统后，醇邸移居什刹海)。储祥宫观锁秋烟，金扉一闭四十年。(案：醇亲王奏缴府第，事在光

绪十四年，至民国元年不过廿三年，就算湖邸在民国七年出租，也不过三十年罢了。樊山从光绪元年起计，故有四十年之语，大概他不知道是光绪十四年才恭缴的。)年年潜邸花开日，禁地无人啼杜鹃。啼鹃唤醒江山梦，天统遂巡嬗人统。飞帘桂馆千门开，五柞长杨万民共。为惜贤王第宅闲，两斋子弟安弦诵。往日惊飞兴献隆，祇今任引承天凤。竹花不实凤凰饥，化为劳燕东西飞(学堂以无款停)，剩有丁香百余树，风飘香雪沾人衣。学堂主人淹中客，房杜程仇俱注籍，即今暂辍鹅湖讲，狱嶽龙门罗俊及。公余小作看花会，招客西园拥鹤盖，夷陵七十老侯羸，何意信陵亲执辔。来游朱阁惺芳华，黯淡纹窗换旧纱，两世亲王天子贵，十三冲圣让皇家。银屏珠箔开芳苑，扣砌铜铺启前殿，千步廊廻迤逦通，九华石峭参差见。葳蕤紫白万花垂，蓋蓄詹唐诸品贱，压倒城南白纸坊，佛香那及天家酿。乌巾白袷入画图(是日群聚摄影)，清簟疏帘置笔砚。主人风雅催赋诗，嚼花一喷云锦烂。白头重过旧朱门，愁对名花数紫痕，门下赐樱臣甫泪，后园补橘璩章魂。兴亡莫向花枝诉，两王摄政关天数，君不见，壁间尚挂金桃弓，坟上已摧银杏树。(案：末句指西太后因“风水”关系，生怕醇王再生天子，故把他陵园的一株银杏树斫去，光绪帝救援无及。这件事，清末各家笔记都有记述，说得比较详细而确实者，还是王小航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因文长不具引。)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夕照寺壁画与陈松

一九五四年，我曾在星洲的《南洋商报》写过一篇《北京夕照寺的壁画》(后来收在《听雨楼杂笔》一书中，一九五六年由创垦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未知道写这壁画的陈松是何处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只说他是"北人"，但后来我查出他是安徽省天长县人，是江南人也。李慈铭此说是根据夕照寺和尚所说的，和尚又说陈松画时年已八十，则与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所记不符。礼亲王认得陈松，又和他有来往，他说陈死时未满五十岁。

夕照寺的壁画，到现在尚存，不过已残破不堪了，但北京的艺术界研究壁画的问题，还不断地去夕照寺作参考。

关于陈松的事迹，我所见的画史所记极简，《中国画家辞典》只说他是天长人，善画松。近日读俞蛟(字青源，浙江山阴人，生在乾隆末年，曾到广州、潮州当过小差事)所作的《梦庵杂著》卷七，有《陈寿山传》，可为参考，得到这一段资料，与《啸亭杂录》、《越缦堂日记》所记的合看，便约略可窥见这个画家的身世了。俞记云：

京师万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或谓即燕京八景"金台夕照"之遗址也。大兴王安昆书《高松赋》于殿之左壁，右壁松树五株，为陈寿山笔。寿山名崧(案：礼亲王及李慈铭皆说名松，画人名《大辞典》作崧)，天长人，游楚不

遇，入都卖画作生涯，笔多匠气，观之令人胸次作恶，故其画恒为市廛商贩及胥椽家所宝，骚坛艺苑之士，莫有持缣素乞其挥洒者。独夕照五松，离奇夭矫，苍翠浓郁，恍闻谡谡涛声起檐际，而置身千岩万壑间。余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为余言，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睥睨久之，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斫，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犹在高春也。殆古人所谓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者乎？盖画无论山水人物花木，不难于小，而难于大，譬诸写字，以纤毫凭几，于尺幅中作小楷，极整齐结构，及纵笔作擘窠书，往往散漫而失绳墨者有矣。殿壁纵横各二丈有奇，松本围径尺而有参天之势，枝干屈曲，针叶疏密，均得乎法，画松之能事毕矣。王安昆书，素亦自负，与画对峙，似为减色，足徵笔墨有一日之短长，而寿山涂抹半生，得壁画而传，可谓厚幸矣。

俞氏此记极可贵，《中国画史人名大辞典》关于陈松小传，即引自俞氏此文，编者注明"引《读画闲评》"，查《读画闲评》是《梦庵杂著》卷七的全部分。礼亲王说他"少游楚，不遇"，与俞说同（礼亲王与俞蛟是同时人，《啸亭杂录》刻于光绪六年，俞未及见的）。

夕照寺和尚对李慈铭说陈寿山画时，是乾隆四十年丁未（公元一七七五年），我认为此说似乎尚有问题，这一幅壁画恐怕成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以后的。怎见得是呢？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旁证来说明。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有个朝鲜人朴趾源，跟随他的族兄朴明源来中国。朴明源是朝鲜派来恭祝清高宗七旬大寿的正使，他们先到热河祝寿，再入北京游览。朴趾源是彼邦名

儒，学问深湛，到中国后，即一一荒村野寺的文物他都留意到，把所见的记入他的《热河日记》中（此书乃朝鲜传钞本五年前影印行世的）。该书卷二十五有《夕照寺》一条，今录之如下：

> 访俞世琦于夕照寺。寺不甚宏杰，而精洒幽夐，真乃一尘不动，禅林中净界，此为初见也。无一僧，去住皆闽粤中落第秀才，无资不能归，多留此中，相与著书刻板以资生。时居者共三十一人，为人赁书，朝出晚还，寂无一人，而所居皆洁净，位置整齐，使人徘徊相咏不能去。《析津日记》云：燕京八景有“金台夕照”，此寺之所由名也。俞君本闽人，为陕西兵备道陈庭学娣婿，今年二月丧妻，无子男，有四岁乳女置妇家，身独与小僮栖息此寺中。

乾隆中叶的夕照寺是这样的。朴趾源最重视中华文物，而夕照寺又以壁画出名，他既然亲到夕照寺，没有见不到壁画的，如果他见到，必记入日记中无疑。然而他的书中并没有提到夕照寺有壁画，这可证明夕照寺的壁画，必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后才有的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常熟两名园

今年的干支在庚子，上一庚子，是六十年前的光绪廿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到今已一周甲，当日八国的“文明军”曾攻入北京，相信名妓赛金花在此时期很活跃于“国际坛坫”，于是曾孟朴才有《孽海花》说部，而后来张鸿也有《续孽海花》之作。这两部小说写得都不错，尤其是前者写得更好。（张鸿的《续孽海花》三十回，于一九四〇年由瞿兑之先生介绍刊于北京出版之《中和月刊》，于二卷一期始，期登一回。未刊完张氏即逝世，后来全书出单本，似乎是由上海古今出版社印行，后来有盗印本。三月廿四日某报的《说部丛谈》作者宁远先生言《续孽海花》共六十回，似误。）

曾朴与张鸿同是常熟人，早岁定交，亲如骨肉，曾是举人，张是进士；二人皆起家科第，久任京曹，而二人在常熟也各有名园。现在我要谈的不是他们的小说，而是他们在江南的花园。曾氏的花园名虚霩园，张氏的叫燕谷园，又名燕园。（“霩”字难排，以下称此园为石花林，从杨云史也。详下。）

常熟诗人杨云史（圻）是曾氏花园主人曾撰之（字君表，即曾朴之父，虚白之祖。君表起家乙榜，官刑部郎中，他与翁同龢有亲戚关系，在翁日记中常见其名）的外甥，云史早年借居是园，在诗文中凡提及此园都叫它做石花林。《江山万里楼诗钞》卷四，有《石花林杂咏并序》作于民国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年），诗与本文

无关，今录其序，因为这是园的史料也。文云：

> 辛亥冬，余奉母居曾氏之虚霩园，名曰石花林，是园为君表母舅别业，半城半野，半山半水，方圆二十亩，台榭十余处，水木清华，为吴郡名园之一。今稍修葺，有梅花田、杨柳天、松下房栊、凤潭、鹿岩、笑滩、鹤涧、风篁馆、锦绣谷、幽兰榭、莱柴(引案：此二字恐有误，似为"荼䕷"也)诸景。春秋佳日，妇子奉母，步陟成趣，以博慈欢，怡怡然不复知有治乱衰壮之感矣。忆舅氏营此园，余方七岁，游此不出，舅觅余久不得，则扫雪酣卧梅花下矣。乃戏谓"儿清异，异日当以园赐尔。"余今得居是园，岂偶然哉！得园中诗一束，仿辋川杂咏存之。

从这篇序文看来，我们知道曾氏园创建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不见于序文中者，尚有寿而康室、桃花坞、草堂、天心楼、渡口诸胜，而锦绣谷又为杨云史夫妇的卧室也。今观《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七、卷八两幅照片，一题"石花林消夏之影"，诗人坐在荷池上的走廊纳凉。一题"石花林偕隐行乐园"，诗人和夫人同在池边，徐霞客夫人坐石上垂钓，稍远是石桥花棚，树木荫翳，风景绝佳，可见此园的胜概一斑。此园今日已为常熟县立师范学校宿舍。

杨云史写此序诗，年三十七岁，已从新加坡副领事之任辞职归国，立下决心要做"遗老"了。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的军阀更进一步欺凌中国，当时杨云史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开窗说亮话》，力促国中新旧军阀各党派息争，一致枪口对外。到七七事变后，日寇强占北平，搜查杨云史住宅，幸得他已将此书全部烧

毁，不致吃眼前亏，但常熟的日寇却在花石林搜出《开窗说亮话》一部分，一时兽性大发，恼起来把花石林一些建筑捣毁泄愤，这就是曾氏园残破的一个原因。

花石林在九万墟之西，是明朝钱秀峰(岱)小辋川花园的一部分遗址。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钱梅溪尝往常熟一游，在他的《履园丛话》中提及燕园，但没有提到小辋川，可知其园久已荒废(五十八年后，曾君表方筑花石林)。花石林的地方虽然只有二十亩，因有池塘，所以有曲折之致，而陆与水的面积相近，空间也较辽阔，比较上多些变化。入门水榭三间，其前池水逶迤，过九曲桥后就到了荷花厅，在厅中可以望见远处的虞山，设计颇巧。厅的后面，有小院一方，植茶花数本，东边又有一院，皆曲折有度，为此园今日最完整之处。东面的残留假山废墟，其中的亭台廊屋，现在都没有了。西边是曾氏的住宅，系洋楼三间，二十年前长满了藤萝，一片青翠，今日也不见了，但红豆一株，犹为园中珍木，则不能不惹起人的相思了。

张鸿写《续孽海花》是用燕谷老人笔名发表的，鸿字隐南，号燕谷，他取号燕谷，就是因为占有燕谷园。《履园丛话》卷二十有《燕谷》一条云：

> 燕谷在常熟北门内令公殿右，前台湾知府蒋元枢所筑，后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购得之，请晋陵戈裕良叠石一堆，名曰燕谷园。甚小，而曲折得宜，结构有法，余每入城，亦时寓焉。

常熟的小园林很多，燕谷园为今日保存得最好的一个。(常熟名园尚完整者有：壶隐园、赵园、澄碧山庄、顾氏小园、东皋草

堂、之园、庞氏小园。其中大部分是明朝的园林，到清朝再经营的）现在此园已变成市公安局的办公处了。

张隐南在光绪末年买得此园，他花了很多心血才使此园成为吴郡一名胜。园的平面狭长，可分为东西北三部，游人若从冷僻的辛峰衔上一个小石库门入园，便见门屋五间北向，其西长廊直向北。再进又有东西向的廊横贯左右，将这一区画分为二，循廊到东部是一小池，旁有假山，山南有小斋四间，极饶幽趣。池水沿山绕到书斋之旁，曲折循山势如环抱状，上架三曲石桥，桥复有廊。山间立峰，其形多类猿猴。山下水口曲折，势若天成，实为佳构。山巅白皮松一本，高达数丈，虬枝映水，玉树临风，想见承平岁月，园主必定曾在此处抚松而盘桓也。池北西向有一高楼，可望虞山。楼旁为花厅三间，是前后二区间极好的过渡。花厅旁有一阁，今已不存，阁下假山二区，上贯石梁，山下有洞，曲折可通，洞内有水流入。此园的假山，相传即出诸戈裕良之手，戈氏以叠假山著名，苏州的环秀山庄的假山，就是他的杰作。

山后为内厅三间，庭前古树成荫，是张隐南在世时居住之室。其旁西向，本来有旱船一，现在只存遗址在树石下供后人凭吊了。厅西有一道长廊直通园门。布置此园的人，将这个狭长的地形画分为三区，入门为一区，利用直横二廊以及其后的石山，使人入园具有深邃不可测之感。东折小园一方，山石峋嶙，又别有天地。更可取的是从小桥导入山后的书斋，尤具曲折之胜。后部内屋又以假山中隔，外区为主人读书待客之所，与内屋主人居住之处截然相隔。

园主张隐南别署蛮公，因在园中所居颜曰蛮巢。抗日战争时，燕谷老人曾避地桂林，后来因日寇轰炸得太厉害，复于一九

三八年取道香港回到上海，家人劝他回故乡，他说日寇一日不退，他一日不回去。到一九四一年冬天病死上海，年七十五岁。隐南工画，能写梅花。他离开燕谷园时，诗文稿全部放存园中，没有携出，后来他的好友徐某派人回常熟取东西，顺便到园中替他取出诗词稿，所以他才能在死前一年编成《蛮巢诗词稿》付印，后附《怀琼词》，盖纪念其亡妻之作也。这部书我未见过，也许其中有不少关于燕谷园的历史资料的。

《孽海花》的正续集在撰写时，曾张二公也许都曾在花石林与燕谷园埋头埋脑绞心血过的，那么，常熟这两个小园就值得我们珍视，尤其在庚子年值得在此一提了。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绍兴东湖与陶濬宣

今日的绍兴市即是清朝的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同为其属。山阴山水之美，驰名国中，晋人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语。绍兴有个东湖，与杭州的西湖遥遥相对，但东湖与西湖不同，西湖是天然为基础而加以人工点缀，东湖则全靠人工，积年累月，开凿而成。

东湖的烟波不大，而清奇出众，它是靠人工凿成的，所以湖上看见那些山崖，斧凿的痕迹，几乎一一可数。初到东湖的游客，一眼就望见一座不很高但极陡峭的青石山矗立在湖水之旁，这个山叫做乌鸣山。在这一带，约一二千年以前，已经有人开过不少金属矿了。东湖则是个采凿的石荡，上劈山腹，下穿地肺，就泛成了更幽峭的一泓清水，积年既久，岩骨起了变化，天然的景趣，掩没了斧凿痕，而某些地方，还因出于人工，越显出一丘一壑的尽如人意，这是东湖可爱之处。

游东湖当然也和游西湖一样，要依靠小舟。坐在小船上望东湖的乌鸣山，只见那些千奇百怪的悬崖，兀立着，张开着，雄赳赳地，活像武士的胸膛。有勇气的人，不妨缘崖攀登，有鸟道可通绝顶，势同插翼，亦称“鸟门”。但游人一到山腰的茅亭，多不愿再上去了。因此游东湖的人，大都只是游湖，少游山。

湖上有个陶公洞，不知是否因陶濬宣对东湖尽过一些力量，才有这个名称。洞是人工开凿的，小船进去后，抬头一望，原来

已经到达一口巨大的石井底上了。人从井底望天，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小。这是一奇景。出了陶公洞，小船又可以绕往一游仙桃洞。仙桃洞是在山壁之间被石斧开伐出来的一堵墙，就在这石墙上开了一个桃形的门，便叫做仙桃洞。洞门横额石刻“仙桃洞”三大字，两边有石刻对联一，句云：“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洞中的石壁，还有很多石刻，陶濬宣写的就不少。他晚年隐居故乡，经营东湖，在东湖上筑了一道几百尺的长堤，把湖隔开，另成一个范围，才有现在的形状。

东湖的北岸，建有楼房数楹，其中有假山，有紫藤棚，小巧玲珑，与隔水的山崖大刀阔斧相映成趣。楼的主人就是陶濬宣。楼中收藏金石书画颇多，当他在生时，曾私下将东湖一大部分划为个人的别墅，到他死后，才将他的“霸业”取消。

陶濬宣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会稽县人。李慈铭是个目高于顶的人，不随便称赞人的，尤其是对于同乡的文人，多不许可，但对于这个后辈陶濬宣却颇推重，说他的诗“清老有风力”（《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一月）。翁同龢赞他写的字，说他所作的北魏书，有“英雄不依人”之语（见《翁文恭日记》光绪十六年五月），他的艺术是很为老辈所称许的。

陶濬宣的字，以专写北魏著名，我小时候学写字，当时正是清道人、曾农髯一派书法盛行之时，我见到陶所写的字，也很醉心，但过了一个时候，书学稍有进步，便发觉他的字板滞而带俗气，好像垂绅端坐的土偶一般。去年十月廿四日周作人先生给我的信，谈及陶心云的字，有云：“陶心云在绍人心目中，只是乡绅而已，其八分书虽有名于时，唯人多嫌其呆板，因此谣传闭门写字，不让人看见，谓其字系‘描’出来的。”心云的乡人对其印象如此。不过他到底是会写字的人，虽不及赵之谦，但比其他诸人稍

高一筹。他写的小字颇有可观，写到一尺以上的就写不开了。张季直评他的书法，说他喜用卷笔，不合古法，可谓知言。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同时又创广雅书局，刊行书籍，聘请有学问的文士在书局校书，金石篆刻家黄穆甫，书法家陶心云皆在其中。心云在广州的时间颇久，与粤省人士多有往还。他于光绪十五年游顺德县，写有顺德杂诗二十五首，刻在四块石上，嵌于顺德东庵壁间，述顺德历史风物，极清新可喜。(其中一首云："冰鳞七寸泼嘉鱼，甘竹滩头举网初。新试南烹风味好，莼鲈千里总忘渠。"甘竹为顺德村名，有滩，风景甚美。甘竹滩分上下滩，亦以产鲥鱼名，以上滩者佳，下滩者不及。昔年学海堂课士，曾出诗题鲥鱼，有一卷中云："上滩甘竹水；凉雨苦瓜时"，盖煮鲥鱼必用苦瓜。)

广雅书局的图书馆柱联，是陶心云撰写的。文云："地接南园，看苍翠成林，疑身到六桥三竺；天开东壁，聚丹黄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又题校书堂柱联云："校经爱学顾千里；佞宋遥分黄一廛。"又云："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有跋云："祁文端公书澄怀园句，斯地之胜，堪以移赠。"读此可见广雅书局风景及心云的文才一斑。(案：祁文端为祁寯藻，咸丰时大学士也，澄怀园近圆明园，为当日入值大臣寄寓之所。)

梁启超发奋学写字，也是受到陶心云的影响。《饮冰室文集》卷七十五，有《稷山论书序》一文，记其崇拜陶心云的艺术，甚有趣，今摘录如次：

癸亥(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长夏，独居翠微山之秘魔岩……一日，蒋百里挟一写本小册至，且曰：三十年夙负今坐索矣。视之，则会稽陶心云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原稿，有俞曲

园、谭复堂、李莼客、袁爽秋、沈乙庵诸序跋，皆手写也，而不佞一短札亦傫然虱其间，文笔书势皆稚弱如乳臭儿，视之羞欲死，盖十七八岁初游京师作也。札中答心老诿诿作序云："三月内必有以报命"，迄今为三月者殆百有五十，而心老墓木久拱矣。计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堂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眩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京师识心老，盖在夏穗卿座中，心老即席见赠一帖，文曰："学问文章过吾党；东南淮海惟扬州。"且曰：粤地在禹贡固扬分也。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亡命后，帖久烬，然神理深镂吾心目，今犹可仿佛也。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固道咸以来定谳。……

陶心云在光绪末年再到广州一次，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逝世，一九六二年九月我给周作人先生函中询及他，周先生于九月廿五日复函云：

陶心云的隶书在绍兴甚多，几于看了生厌了。乡人说它是描出来的，故不甚见重。其人盖一劣绅(未至土豪的地步？)，我于甲辰年(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在东湖的通艺学堂教过两个月英文，却未见过一面，只跟了介绍人(本家孝廉公，可能是陶心云的同年)到他家里(就在东湖)，他因抽大烟未起，所以就算了。学堂只有两门功课(英、算)，三个学生，其中有他的承继孙子和他的一个本家，和我却一直有往来，现在都已故去了。(心云)晚年情况不详，大概一直在当绅士吧。北京还有他的本家在，时常到这里来闲谈……他曾收得覆刻苏写陶集板，为绍兴章硕卿所刻，曾传印行而颇少见，陶心云乃据为己有，说是自己所刻，且请人题记(其中有李

越缦），即此可以推见其品格之一班。东湖亦用公款修成，一时亦有霸占之意，此虽是乡里流言，亦可知其无甚好评也。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日

铁琴铜剑楼藏书

清朝末年，国内藏书，以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常熟铁琴铜剑楼、归安（今并入吴兴县）皕宋楼为第一，有四大藏书之称。海源阁的书，在一九二七——三一年间被兵匪所毁，散失斥卖殆尽，阁亦破坏到不成形了。皕宋楼的书，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全部给日本人出十万日圆买了去，皕宋楼"人去楼空"，楼也不在了。现今只有天一阁岿然独存，藏书四百多年，损失者才百分之三十，而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虽则建筑尚存，书已散失不少。它虽然比不上天一阁保存得那么齐全，但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私人藏书楼，到今日还尚在，已经不容易了（因为中国人破坏文物的本领特别强）。

铁琴铜剑楼的主人姓瞿，始创此楼藏书者是瞿镛，他的父亲绍基，在嘉庆末年已开始藏书，当时的藏书地方叫恬裕斋。楼在常熟十一公里外的罟里村，瞿氏的住宅早已不存了，但铁琴铜剑楼还无恙。

瞿氏住宅所占的地方多少，我不大清楚，只知家宅前的风景是很优美的。现在所存的遗址，住宅的第一二进已全毁，第三四进是藏书的地方。藏书楼向南，面阔三间，楼前有一个院子，老树数株，还有假山。楼的西面原本有一廊，现在不存了。楼后有一小天井，又有一楼，也是面阔三间的。

现在瞿氏的藏书，还保存极少部分在楼内，但绝大部分已归

公家所有了。

关于瞿家藏书的历史，可以一述。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卷六，就有记瞿氏父子的事，他说：

> 同治《苏州府志》：瞿镛，字子雍，岁贡生，居菰里村，父绍基，好藏书，收藏多宋元善本。镛继承先志，益肆力搜讨。常邑自绛云、汲古以至爱日、稽瑞，二百余年间，储藏家代不乏人，镛所著《铁琴铜剑楼书目》，既博且精，足为后劲。

这是说瞿绍基之子瞿镛，克振家业，将先人的藏书更增多了。（今人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他引《中国新书月报》觉迷所作的《谈铁琴铜剑楼》一文，有云："高宗数次南巡，曾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之富，一度临幸。而编纂四库全书时……盖以瞿氏铁琴铜剑楼，甬上范氏天一阁为最多。……盖瞿氏藏书，历有数代"云云。这完全不是事实。陈君编著此书，引用该文时对此毫无纠正，连这一些目录学的常识都没有，可见他此书的价值一斑了。陈君去年出版《国史旧闻》，对于二十年前他那部书有不满之意，具见陈君学问精进。）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传闻瞿氏的书有步陆氏后尘，卖给日本人之举，当时端方做两江总督，曾电江浙绅士设法阻止，必要时由公家出资购藏，幸喜只是谣传而已，叶昌炽的日记说："瞿氏有此佳子弟，贤于陆纯伯（案：即卖书给日本人那个陆树藩）远矣。"到一九三〇年，常熟人有控告瞿启甲将书卖给外国人的事情，后经蔡元培、张元济等人证实没有此事，瞿氏子还是佳子弟也。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嘉业堂主人及其藏书

七八年前，香港思豪酒店的画廊，时见有刘氏嘉业堂的藏书、刻书出售，甚至还有主人刘翰怡寄来的《清史稿》关内本与关外本，当时的售价，每部不过五六百元，还可以打个折扣。转瞬之间，思豪已拆，刘翰怡那时不过六十多岁，今年已是七十八岁了。他现在还隐居上海，善本书已卖给政府，普通的书也陆续出卖，不愁生计。近年来他生活闲暇，不必为他的事业担心了。(他经营的商业，早在二十年前失败，田园地产，已卖去十之七八，上海的地皮更已卖光了。)

刘氏嘉业堂藏书是海内有名的，它的名头虽不及海源阁、皕宋楼、铁琴铜剑楼之著，但它却是后起之秀，海源阁、皕宋楼早已停止收书(陈氏且将书卖给日本人，而杨氏之书也遭兵匪破坏，且在光绪年间已不买书，只维持原状)，而嘉业堂却不惜重价，见有好书就买，花五六百两或一二千两银子买一部书，当作家常便饭，无怪叶昌炽说翰怡"淫于书，书估踵门者如市，旧刻旧钞，日为评骘，昨日持示两书单尚未寓目也。"(见《缘督庐日记钞》民国五年八月初十日)他又先后聘请杨钟羲、黄孝纾、叶昌炽等人在上海替他校书刻书，厚送束脩，例如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年尾，他送叶昌炽五百元，叶辞谢不受，到第二年端午节，主人加送到一千元，昌炽因为校勘四史未完，未有成绩，虽然主人托朋友先对他说这次一定要收，但叶还是坚持，只肯收一半。

像这样的大富翁，在现代都市中却是很难得的。

翰怡名承幹，字翰仪，后来因宣统皇帝登位，凡是官绅人家都要避这个“仪”字，所以他才改作“怡”(唐绍仪也改绍怡，到民国后才恢复原状，翰怡则愿为遗少，始终没有改)。他的父亲刘锦藻(字澄如)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进士，官工部郎中、内阁侍读学士，一九三二年“满洲国”成立，锦藻以七一高龄往长春叩贺他的“旧君”，得赏“头品顶戴”，过了两年死去，年七十三岁。

刘家是吴兴南浔的大地主，以丝业起家，富甲一郡，发家的人是锦藻的父亲贯经，有人传他是铜匠出身，后来在丝庄做小伙计，勤俭诚笃，为老板所重，二十年间就发了大财。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名紫回，次名锦藻，第三名叫梯青，第四叫涵湖。锦藻有子十一人，翰怡居长，过继给大房紫回为子。他是乌程县附贡生，分部郎中，溥仪又“赏”给他“三品卿衔”、“候补内务府卿”，所以人家也尊称他为“刘京卿”了。一九一七年，翰怡撰“纶旅金鉴》进给溥仪，得赐“抗心希古”四字匾额(翰怡此书是“回锅菜”的，他以清初遗老苏州人徐树丕的《中兴纲目》来借尸还魂)。他们父子因著书进呈而邀“异宠”是有例的。后来锦藻也得到一方“殚见洽闻”的匾额之赐。那是他所著的《皇朝续文献通考》告成，翰怡进呈一部所得的“恩典”。锦藻的《谢恩摺》写得很有趣，不妨钞给读者欣赏，因为伪满的文献多不获保存，今人秦翰才于复员后飞往东北公干，藏有一部分，现从秦君的《满宫残照记》将此文录出。摺云：

头品顶戴，前内阁侍读学士臣刘锦藻跪奏，为叩谢天恩，恭摺仰祈圣鉴事：十二月二十日，猥以臣子承幹奏进臣所纂《皇朝续文献通考》，由前学部郎中臣王季烈寄到蒙恩赏

给“殚见洽闻”匾额一方。臣锦藻当即恭设香案，东望叩头，谢恩祗领。伏念臣草茅弱质，蒲柳衰姿，循崦嵫而顾影，老学无成；昧委宛之秘藏，晚闻滋愧。研几恣古，识限区陬；勤志服知，目穷𬨎录。惟是徵文考献，稍酬炳烛之微明；扬烈觐光，窃比引喤之初意。乃蒙恩慈曲被，宸翰遥颁，拜嘉有曜，瞻奎璧而分晖；循分逾涯，戴泰山而知重。庶几传诸州部，兴多士稽古之风；昭示昆仍，作累世教忠之范。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谢。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刘翰怡也有一个“请安”摺子，文曰：“头品顶戴，候补内务府卿，臣刘承幹跪请皇上圣安。”年月未详。大概也是“宣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与谢摺一齐寄去的问安摺。(清朝的问安摺最重要，不能稍有错误。平时的奏摺如有错字或不合格式，不过罚俸而已，每月一次的问安摺则绝不许有误，否则视为大不敬，有不测之祸，李鸿章初任直督时，曾屡受恭亲王警告)这个摺子很奇怪，清亡已二十二年，还有“宣统廿五年”，岂非怪事！更妙的是这一年已是伪满的“大同二年”了，刘锦藻不用“大同”的年号，还是用“宣统”，大概他是不承认“满洲国”而是承认“大清”的。真有趣之至！

嘉业堂之名也与溥仪的“皇朝”有关的。原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清德宗安葬崇陵，锦藻捐助钜款为种树之用，溥仪“御笔”赐以“钦若嘉业”，所以他们为“纪恩”起见，取嘉业名堂。嘉业堂筑在吴兴，藏书十余万册，民国初年，刘氏父子因乡间地方不靖，将贵重的书籍完全搬到上海租界，现在南浔镇上的嘉业堂的遗址，已变成田园一片，不是藏书的地方了。今人徐中的《宋

会要研究》卷三，附有《嘉业堂藏书楼游记》一文，是三十年前该堂盛时的一个写照，现摘录如下：

> 吴兴刘翰怡先生，世席丰华，雅嗜儒素，搜罗书籍约六十万卷，于南浔镇之鹧鸪溪上，建嘉业藏书楼，占地二十亩，与第宅小莲庄毗连，四周有水，环之如带。面南向池，池中及四围，叠石为小山，有亭台花木之胜。由池而上，有楼七楹，中一楹为大门，东三楹为四史斋，以置宋椠四史。西三楹曰诗萃斋，以置翰怡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斋室均北向，斋楼多旧钞精钞各本，室楼皆宋元椠本。再进亦有楼七楹，左右绕以两庑，庑各六楹，楼下为厅事，三楹分列甲乙两部，上为希古楼，庋殿本官印，而内府秘籍，亦在其中。楼东西上下，各两楹，杂置书五百七十余箱。左右两庑贮各省郡县志，庑楼均为丛书，缥缃满架，美不胜收。……书楼所蓄之物，多为旧家故物。如甬东卢氏之抱经楼，独山莫氏之影山草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丰顺丁氏之持静斋，太仓缪氏之东仓书库，其积世珍录之帐秘，皆为此楼所归聚。

刘氏父子除刻《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及许多单本书外，也有些著述。锦藻所著的《皇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那是刘氏以一人之力来续乾隆二十六年敕修的《皇朝文献通考》的，叙事一直到宣统三年止。这部书虽成于一人之力，有很多疏漏错误之处，但以一个有钱人能瘁心学问，孜孜不倦，成此伟绩，对学术界的贡献很大（此书于二十年前商务有影印本，且附索引）。清亡到今已五十年，在此若干年月中，在海外未闻有什么富人有这样笨以书

破家，而且对学术有贡献的，我们对刘氏父子倒要表示敬意呢。

一九六〇年一月九日

大房山石经

离北京约一百五十里的西南郊区，有大房山（原属房山县，现属北京市辖周口店区），离此不远又有个石经山，以藏佛教石经著名于世。

石经山原名白带山，也叫小西天，因藏石经，所以又叫石经山。山中有著名的云居寺，占全山风景最胜之处，自隋唐以来，云居寺就是河北佛教的胜地，据文献的记载，寺创于隋朝僧人静琬。历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重修过，到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中国，云居寺有很多建筑被日寇炮火摧毁，地面上的文物损失净尽，幸喜埋藏在山洞和地下的石经还不受影响。

中国的儒家，在汉朝刻有石经，以供读书人钞录，以为定本，汉石经所存之石，到今日已如凤毛麟角了，独有释教的石经，因为收藏得法，到现在还有数千块之多，真是我国可宝贵的文物！

据说静琬法师，就是接受了北周武帝毁佛灭法（事在公元五七四年）的教训，想把一些写在绢纸或木简上的各种佛经，雕刻在石上，封藏山洞里，不使受到毁火。他选择了石经山这个地方，从隋朝大业年间（炀帝年号，共十二年，由公元六〇五年起至六一六年止）开始刻经，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他死之时，二十年间所刻的经已装满七室。以后他的五代门人都相继刻经，一共装满了九个房间。自唐明皇以后，就有很多

善男信女出钱帮助刻经，为父母或本身祈福。辽代的圣宗、兴宗、道宗也都赐钱刻经，于是在辽天庆七年(公元一一一七年)，就有辽代所刻的石经四千多片埋在云居寺西南角。以后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刻过石经。

这些石经，除了一部分埋藏地下外，其他完全藏在云居寺东峰石经山的九个洞内。藏经洞在石经山山腰，上下凿两层石窟，上层七窟，下层二窟。下层的第一二两窟内共有石刻经一千九百七十八片，其中有少数是大业年间刻的，其余都是辽刻。洞口用直棂窗门锢封。九个窟中，以上层的第五窟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丰富。这个窟名叫雷音洞，平面近方形，洞内有四个不等边的八角石柱，柱上刻有一千八百零六个佛像。洞四壁镶着石经：左壁两层共有三十六片，全部刻《法华经》；右壁三层也是三十六片，主要是《无量义经》；《金刚般若经》，《胜鬘经》(元代补)，《弥勒上生经》(元代高丽僧达牧补书)等。这些石经，除了一部是元代补刻以外，其他都是静琬法师最早所刻的。从一九五六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对这些石经已开始拓印了。

第三洞是唐代刻的。第四洞很小，只能藏石经百余块。第六七八九洞，均在第五洞东边，洞内满藏隋至辽代的刊经。特别是第九洞，收藏的大部分是经头，而且多数都有线雕画像。是研究雕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朱竹坨的《日下旧闻》所载，关于这些经碑，据辽代赵遵仁碑略载："辽太平七年，涿州牧韩绍芳验名对数，总共二千八百五十六块。"但经这次捶拓经文时所计算，则共计有四千多块。比过去的文献所记载的多出了近一倍。

埋在塔下的石经，是辽代通理大师，游上方山，因见石经未完成，于大安九年(公元一〇九三年)在云居寺传戒，和门人刻经

四千八百块，因当时九个洞已藏满，以后他的门人就把这些石经埋在地下，上面筑了一个压胜塔，把全部经的目录刻在塔上。压胜塔早已毁坏了，但塔下的石经无恙，一九五七年进行清理发掘，发见有石经八千多块，比原来的记载又多了一倍。

现在已经没有人企图灭法了，石经也不必永久埋藏在地下不见天日，拿出来以供文化界研究，正有此必要。以前怕散失，没有人敢主张发掘这些石经，现在印刷术日新月异，将石经拓印下来印刷成书，以广流传，真是功德无量。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有《房山县石经》一则，他是不主张开发所藏的石经的，今录其文以为读者参考。文云：

> 大房山在京师房山县境内，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业间，僧静琬募金钱凿石为板，刻藏经传后。至唐贞观仅完大涅槃一部。其后法嗣继其功，直至完颜时始成，贮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门，镇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视，衍即少师姚广孝也。留咏而归。历代扃闭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来谋于余，欲发其藏简，其未刻者续成全藏。余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夹书册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闭之石？静琬当时虑末法象教毁坏，故閟此为迷津宝筏，今辇下凋弊，不似往年，宫掖贵貂，亦未闻有大檀施，若一启则不可复钥，必至散轶而后已。自南唯唯，亦未以为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从与否。

石经山明朝所刻的石经，不知有没有是自南所刻的，我现在未有材料可以说明，俟考。在明末之时，天下凋弊，暂时不开发石经，或不失为智举，但这批石经，有很多是现今失传的经典，就

应该早日发掘，以广流传了。

一九二四年，云居寺石经遇一小劫，幸不尽遭毒手，当日曹锟贿选的帮凶京兆尹刘梦庚，要巴结总统曹锟，下令房山县知事沈严，督同军队将云居寺石经堂嵌壁的石经凿卸二十余片，损毁二片，拣选了十八片最完好的运入京师送给曹锟。叶恭绰先生闻知，忙联合文化界补救，由议员刘彦向国务院提出质问，刘梦庚临时诿为本拟交古物陈列所，以供众人观览。曹锟对文物绝无兴趣，便叫人将原石送回石经山。刘梦庚在上一年大力帮曹锟贿选，曹失败后，一九二五年吴佩孚与孙传芳合作对奉系作战，组织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设处长若干人，刘任机要处处长。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

诸葛亮和关羽的爵号

清人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卷二，有辨正诸葛亮武侯之称，他说：

> 相传河南南阳府城楼，旧有楹联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对仗浑成，允称杰构。或疑诸葛亮应称忠武侯，但曰武侯，恐未尽善。然古人二字三字谥，后人称其一字者甚多，如卫之睿圣武公，只称武公；贞惠文子，只称公叔文子；楚之顷襄王，只称襄王，秦之昭襄王只称昭王；诸葛之称武侯，亦其例耳。

梁氏这样说法似乎很通，但加以研究之后，还可以辩一下的。诸葛亮封的是武乡侯，谥忠武，梁氏说他"应称忠武侯"，就不大对了。假如他说诸葛亮封武乡侯，而后人沿袭唐李德裕之封卫国公，宋王安石之封荆国公之例，将"国"字省去，简称之为"卫公"、"荆公"，那就无可非议。本来国公是爵名，后人这样的简称王安石，已有卫公之先例在，本不足疑，实在不必就忠武之谥而引经据典一番的。二字谥只称一字，虽有前例，但究有未妥，如曾国藩死谥文正，后人称他为"文公"还是"正公"？抑将其毅勇侯封号拆开称为"文毅公"？梁氏对于史学的功夫甚浅，故有此种似是而非的议论。（案：章钜字茝林，福州人，梁鸿志祖父，

清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颇有著作，微闻稍涉学术者多出他人之手，他所举南阳府城楼一联，并无说明作者是谁，这本来是康熙间人宋聚业诗首二句。全诗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水自奔腾趋汉口；山犹重叠枕城头。时来一夕收铜马；事去经年运木牛。太息兴亡千载上，荒村野庙总悠悠。"诗中一句咏汉光武[字文叔]，一句咏诸葛亮，首联对仗浑成，洵是佳构。聚业江苏长洲人，字嘉升，康熙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性刚直，以忤年羹尧死。著有《南园诗稿》。)

武侯之称，可说是源远流长的了，宋聚业的联以武侯对文叔，字面极为相称，梁章钜说他"恐未尽善"，本来诗词中有此"特权"，可以将人名爵号割裂以就对仗、音韵的。堂堂正正的书都可以将《诸葛武乡侯集诫》、《诸葛武乡侯诫》尽去"乡"字，成为"诸葛武侯集诫》、《诸葛武侯诫》(两书皆见《隋书经籍志》)，则在诗中更可以称武侯了。

诸葛亮的部将中有关羽者，曹操假天子命封他为汉寿亭侯，也往往给人割裂，称为寿亭侯，这件事颇有趣，大可一述。许观的《东斋纪事》(《说郛》本)说，宋绍兴年间，洞庭湖一渔人网得一金印，方仅二寸，以为金也，因与人相争，打起官司来。官吏看印文是"寿亭侯印"四字，官厅就把此印送给荆门玉泉寺关羽祠庙尊藏。

这方金印是否关羽之物，颇有问题，官吏将它送去关庙珍藏，会不会搅错呢？但古今不少人误会关羽封为"寿亭侯"，而以"汉"字属于国号。康熙年间一个风雅的大官宋牧仲，他的《筠廊偶笔》就说大内有"寿亭侯印"一方，其形制与洞庭渔人所得者相同，不知是否为一物，但从这一点可见世人久已将"汉寿亭侯"讹为"寿亭侯"了。(《聊斋》有《寿亭侯之归汉》之语，世俗之人见《聊

斋》都这样说，还会错吗？）

其实汉寿是地方名，亭侯是爵名。古时的汉寿共有二处，一是后汉顺帝时，以索县改为汉寿县，属武陵郡。这个汉寿县就是曹操奏封关羽为汉寿亭侯的汉寿，一部分在今日湖南常德县。清朝有龙阳县，民国恢复汉寿原名。另一汉寿县在四川，刘备将葭萌县改为汉寿县，在今日昭化县南部。

关于地是地，爵是爵的辨明，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卷一，就有一段论及，可供参考，今录如下：

> 太常寺卿黄芳奏："南京钦天山十庙内，汉前将军寿亭侯之神，姓关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詹事程敏政言：汉寿县名，在犍为（案：此地在四川），史称费祎遇害于汉寿。唐诗亦曰：'汉寿城边野草春'，是汉寿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去汉而以寿亭为封邑，误矣。嘉靖十八年八月，家大夫在礼部覆议云：按汉书建安四年，先主刘备使司马关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东伐，擒关羽归，袁绍遣其将颜良攻东郡，羽独刺良于万众之中，操表羽为汉寿亭侯。三国纪功进表，汉寿亭侯关羽，新亭侯张飞，此则亭侯为封爵之通称，而汉寿为封邑无疑，盖汉寿在犍为郡，即今之叙州府也。后世讹以汉为国号，而以寿亭侯为封邑，会典未之厘正也。"余按禹贡潜水注，水出岷山之西，东流过汉寿南流，有高山，上合下开，水经其中，曰沫水，又复水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县入穴中，山海经可考，而一统志皆失载。

田艺蘅这一段记事大抵说得无误，可证关羽封的是汉寿亭侯

而不是寿亭侯。虽然严方的《后汉书年表》异姓侯内有"寿亭侯关羽"之称，但这是传写时脱漏了一个"汉"字之误。因为表中的下一格有注明"武陵"二字，当然是武陵郡的汉寿这个地方了。

写完后，偶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程敏政谥法议曰："关将军羽，仕汉封寿亭侯。"与田氏所引黄芳说"前少詹事程敏政言"相矛盾。不知是顾氏引用时误记，抑或传写时有误，姑记于此，以俟再考。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曹操关羽同好色

清初的学者刘献廷说，关羽是最行运的神，那是很可信的。满洲的统治者未入关以前，就把《三国演义》译为满文，清太宗还学周瑜用反间计来杀袁崇焕。到满人入关之后，他们更把关羽抬到三十三天，以收民心，将他列入祀典，一直到北洋政府垮台后，国家才没有祭关庙的典礼。经过满洲统治者这样抬举之后，关羽简直变作比天子还要尊贵的神，甚至有些颇有学问的人在文字上都不敢直书其名，称他为"关圣"或"关神武"，或称"关某"，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比死去的帝皇还要过之。而一般平民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都敬重他重义气，不好色。不好色就是英雄，于是有小说中的《送二妃》及杂剧的《月下斩貂婵》(不久前，此间有粤语片《关公月下斩貂婵》)，极力渲染他不好色。英雄是否就不好色，暂且不谈，不过食色性也，人不好色，此人必反常，好色而不及于乱，人各悦其配偶，正是人的好处。到底关羽是不是不好色呢？我看未必尽然。《三国演义》将曹操极力打扮成奸臣，说他好酒色，要打东吴取二乔放在铜雀台娱晚景，被人骂到今日。其实关羽也和曹操一样好色，不过小说中不敢写他这一件"韵事"罢了。《三国志》关羽本传的注语就记他一件趣事，今录如下：

《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

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这一段记事真有趣。我们可知关羽不止好色，而且好之甚，他早已将敌人内部的虚实打听得一清二楚，甚至敌人里面有什么漂亮的姑娘，他都心中有数，先向曹公乞取敌人之妻，到城将破时，他更着急，又怕那个好色之徒的曹操见了美色而食言，所以三番四次对他一说再说，大有警告曹公不可"说过就算"之意。怎知弄巧反拙，竟因此惹起曹公的疑心，派人将敌人之妻拿来一看，果国色也。便留下受用，不以赐关羽了。这么一来，使关羽尴尬非常，自然也怀恨在心，后来关羽反曹，走回刘备帐下，也许怀有旧恨，如果曹公肯把那个"国色"赐给关羽，他自然死心塌地拥护曹公，日后也许称臣劝进，为魏国的开国元勋，而关羽的历史又当别有写法，他死后也没有"有井水处"皆有关庙了。

关羽所求取的那个"国色"是否貂婵呢？前人曾有论列过，不过不是说貂婵而是指吕布之妻，因《三国志》注语"乞娶其妻"这个"其"字，可指吕布，也可指秦宜禄。朴学大师俞曲园就说是吕布之妻。他的《小浮梅闲话》有云："据此，则吕布妻必美，且又牵涉关公，杂剧有关公月下斩貂婵事，即因此附会也。"这是曲园先生所说的关羽乞取吕布妻而有此附会。其实照《三国志》的注语来说，不一定是吕布之妻，作秦宜禄之妻亦可。"其妻"二字，当然是指吕布之妻，在行文上看来如此，亦合文法。不过说是秦宜禄之妻，也没有不妥，因此前人也有为此争论一番的。清初诗人王渔洋的《香祖笔记》就有驳胡应麟之说。他说：

胡应麟作《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以驳升庵，自负博辩，然舛讹复不自觉。如引三国志关某传注，谓羽欲娶布妻，启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禄妻，与布何涉？元瑞岂未一检陈书耶？（按：胡元瑞乃明代一学者，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包括有《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二篇，专驳斥杨升庵论学之说。）

胡元瑞是指吕布之妻的，王渔洋则主张是秦宜禄之妻，皆从"其妻"二字来做文章。因为这个代名词"其"字，指吕布秦宜禄皆无不可。如果要大打笔墨官司，是可以打得很热闹的。但他们都没有再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是吕布妻，还是秦宜禄妻。后来袁子才有一篇《读胡忠简公传》，中有"苏武娶胡妇，关忠武请秦宜禄妻"（按：袁枚称关羽为"忠武"，殊无根据）之语，袁枚也是主张为秦宜禄之妻的。与袁同时的一个学者洪亮吉，他的《北江诗话》卷二有一段云："关神武欲取秦宜禄妻，见蜀记，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之。近有一腐儒必欲为神武辩无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属平常，不足为神武讳也。"卷三又有一段云："英雄好色，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谓不修小节，如关长生之欲娶秦宜禄妻……"（按：《三国志》关羽传言羽本字长生，后改云长。）洪北江也说是秦宜禄之妻。他们之中，人主一说，也不过是从"其妻"二字去着想，未能举出旁证（虽然他们不是在开笔战），王渔洋既说"与布何涉"，何不在《三国志》找多一证据呢？《三国志》曹爽传，裴注引《魏略》曰：

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案：何晏之母也），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

读这一段文字，才知道那个“国色”有下文，“其妻”是指秦宜禄之妻，与吕布妻无涉。可知关羽乞娶及曹公所自留者，乃秦氏之妇也。秦氏妇归曹家，还带了一个“油瓶仔”阿苏同去。假如当日曹公以此妇归关羽，则关云长又多一义子关朗，与关平同为兄弟了。（洪北江“英雄好色，奸雄反可以不好色”之论，暗中以曹操列入英雄之内，而不敢明言，恐犯帝皇之威也。大抵自明以后，腐儒才普遍地骂曹操为奸雄，与杜工部称他为英雄不同了。到了清朝，《三国演义》之力大盛，更无人敢翻案了。）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

水烟袋与苏东坡

在科举时代，考试作弊是不能免的，有考试，就有人想通过考试而达到目的，作弊的事情就会跟着来了。前记周福清通关节而致身败名裂，就是因为他贪一点小财而致如此，使到八十年后我们读史不免为他可惜。其实在考试时代，通关节是常见的事，即贤者亦不免。苏东坡是一代才豪，他为了爱才，要取中一个朋友，就给朋友一个关节，东坡虽然爱的是才，并非爱财，但仍然是作弊，不足为训的。宋人笔记记东坡知贡举，欲取中李方叔，反而给章惇二子占了便宜，是否真有此事，留在下文再说，现在先将宋人所说的摘录于此。潘永因《宋稗类钞》说：

>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方琐院，坡缄封一简，令送方叔处，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二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竟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

宋人的笔记这样的说法，似乎应该可信的了，但李方叔（荐）向来有文名，以文字受知东坡，何至见了扬雄优于刘向论就阁笔不能一字，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我怀疑东坡卖关节给他一事不可靠，大概是因为宋人喜为朋党之论，见章惇二子一时高第，便制造谣言，说他们是以诡道得到的。（《宋史》章惇传说章惇大公无私，即在相位日，不以爵禄给私人，他的四个儿子都是经由考试出身，官也做得很小，并没一个是显宦。）

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记东坡此事，但没有说他私下致简方叔，只说他素知方叔的才学，东坡知贡举，方叔往试，坡得一卷，认为必是李方叔的，大喜，在卷上批数十字，还对黄山谷夸眼力，说一定是方叔无疑，后来拆弥封，竟是章惇之子，方叔终身不第。东坡山谷都有诗在集中说到这件事。方叔考后出场，对人说他的文字不在第三名后，自负正高，但居然考不上。他的乳母年七十，听到此事，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这个老太婆一时气急，自缢而死。

放翁所记如此，没有一句涉及关节，可知关节之事，不尽可靠。章惇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他附王安石行新政，见恶于正人君子，后来《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而造谣之士更说他两个儿子的科名是徼幸而得的，无非党同伐异耳。（章惇在宋史为奸臣，而在湖南《安化县志》则为名宦。王船山先生的《宋论》还说他在湖南有大功呢。）

清初周亮工《书影》卷六，对这件事有所议论，今录于下，以备参考。

《养痾漫笔》载东坡缄封与李方叔者为二章所窃事。末

云："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大可惜哉！"此论是矣。然使非小人如惇者，可谓坡无私无党乎？第中尚有疑窦：夫坡令叔党传与，可谓密矣；方叔即出，叔党不能俟其归乎？即不俟其归，宁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仆乎？方叔岂无斋室，仆岂不受叔党之教，面而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诗，毋有汝不成名之叹；而嫉二章并得魏科者，捏为此说，效二桃杀三士耳。今科第有无私者，而浪传为某友所私；有有私而无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断也。（案叔党乃东坡次子过之字，有小坡之称。）

周亮工这一段议论甚公允，但还嫌论得尚不透彻，章惇二子既能文，掇魏科自是意中事，李方叔又是能文之士，怎的就便见到题目不能下笔呢。所以我颇疑苏东坡简直没有漏题目给方叔一事，陆放翁所记是可靠的。

后东坡此事八百余年，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丙子，湖南乡试副考官陆润庠也做了一件通关节之事，与东坡方叔者颇相似，甚有趣也。

民国初年，老诗人樊樊山写有《水烟袋歌》，就是记述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状元陆润庠通关节的事。歌前有序云：

故太保陆凤石前辈，同治癸酉拔贡，春秋连捷，遂魁天下（案：陆润庠死于一九一五年，溥仪谥之为"文端"。他是同治九年庚午拔贡，而非十二年癸酉。癸酉是他中举之年，

下一年即中状元，见吴郁生所作的陆氏行状，樊山一时误记。)夙与湖南李拔贡同年相善，李试京兆不售，乙亥(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春将还湘，陆饯之于丰楼，酒次，意甚郁悒。陆曰："若我主湘闱者，子必获隽"。李请关节，陆方食烟，即曰："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可矣"。未几，擢湖南副考官，先以书抵李曰："颇忆水烟袋否?"李发函狂喜，置书屉中，雀跃而出。妻睨其旁，疑为外舍情书，苦不识字，持归母家，母览而戒之曰："慎勿泄也!"母有三女，所天皆诸生，乃使长次女各告其婿。是科诗题为"惟善为宝"，得"书"字。陆得三卷，皆如所授，乃皆取之，独一卷后至，置副车，及拆封，李副榜第一，正榜两卷，则其僚婿也。一人名次较高，闱墨刊其诗云："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案："水烟袋"三字，已分嵌在诗中了，这就是关节。)久之，其事颇泄，言官欲劾之，以陆为人和易而止。李竟不获售，以道员需次某省而卒。陆此事诚干例议，然爱才念旧，非纳贿作奸者比，无足深诛。

陆润庠此举是不对的，无论是否爱才或纳贿，都是作弊，考试人才而作弊，有碍寒酸进身，所以一向是悬为厉禁的，他这次卖出的关节已告成功，如果给言官参奏，陆润庠的罪名比周福清还要更大，至低限度也斩监候的。(二十年后，陆润庠得汪孔殷介绍，收广东人李某二万元点他为翰林，这个"文端"无乃不端乎!此事发生在光绪三十年甲辰，这二万元送去时，美其名为"刻书费"。某翰林已于一九六〇年死于海外。润庠前后卖关节皆与李姓有关，尤奇!一九六一年四月追记。)

樊山此歌写得非常谐畅，不愧名作，坊间所售樊山诗集未见

刊有，三十年前我从报上钞下的，序文全钞，歌则只钞了一部分，其中有佳句云："湘闱万口传佳话，关节三言水烟袋。元和殿撰秉文衡，光绪初年岁乙亥（案：乙亥应作丙子，樊山误记）。"歌又引东坡事为波澜云："君不见东坡欲得李方叔，潜送程文李他出，章惇二子怀之去，端明坐迷五色目。榜发乃隽援与持，天之所废人无术。以古拟今何差殊，两僚诡遇二章如，李生若比老方叔，弱女非男聊胜无。"（案：副榜俗称半个举人，旧日以妇女生产来喻应试的士子，中举人者曰弄璋，中副榜曰弄瓦，但已是正途出身了。故歌有"弱女"之语。）歌的结句云："徒留烟水苍茫感，谁复人才夹袋储。"不免感慨一番，有余音袅袅不尽之意，佳什也。

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

高帽子

俗语说喜欢受人巴结的，叫做爱戴高帽，巴结谄媚的人叫送高帽。所谓高帽子者，一经套在人家头上，被捧者就头昏眼花，言听计从，于是捧人者就偿其大欲了。考高帽子一语，自明朝以来就颇为流行。

明朝有个学者庄定山，他有两句诗云："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这是恶句，但当时的人相率仿效他这两句，一如十年前有些人仿胡适的"作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一样。（杨慎《升庵全集》卷五十五说：定山早有诗名，他的诗集刻于生前，浅学者相与效此二句，以为奇绝云云。按：定山名昶，字孔旸，江浦人。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进士。当其官检讨时，以不奉诏作鳌山诗，世颇称其气节。尝卜居定山二十年，学者称定山先生。卒后追谥文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的诗，有很中肯之语，如云："惟其癖于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精义，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然如病眼诗'残书楚汉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句，杨慎亦尝称之。"

所谓"颇为世所嗤点"之句，《提要》没有举例说明，大概就是那"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了。又所谓杨慎亦尝称其诗云云，现在从《升庵全集》卷五十五找出"庄定山诗"一条，他说的是：

然定山晚年诗入细，有可并唐人者……（升菴又举其诗之可笑者）“赠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本不是佳语。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诗云：“赠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匹好南京”，闻者捧腹。

定山诗中的高帽子，是有所为而发的，因为高帽子在官场中的作用，比什么都强，送高帽子给上司，较诸求大官员写封介绍信还有效。怎见得呢？比如一个人在京里求大官写封八行书，拿到外省求官，那官员碍于情面，势不能却，这封信好像从上而来的大帽子，戴在头上，无法摘下。但是八行书有大小之分，如我求得一省的巡抚、藩司的八行书，另有一人求得京中尚书、侍郎的八行书，这样一来，我的帽子小，而他的帽子大，我敌不过他了。如果我求得尚书、侍郎的信，他则求到军机大臣、宰相、王爷的信，那就我的帽子仍然小，他的大，敌不过他。求官的人，除了求帽子之外，又有做帽子一法，这一法最灵。求恃人，做恃己，所谓求人不如求己也。大官员没有一个不喜欢人家巴结的，求官的人，只要探出大官平时喜欢什么，就从这方面着手。例如张之洞喜读书，一个在潮州做知府的方功惠（字柳桥，湖南巴陵人）就买嘱张的左右，每日把大帅所读的书名，详详细细写信通知他。在广州及武昌的梁鼎芬也是如此。他们得接情报之后，也跟着读大帅所读的书。见面时，与大帅谈起学问，便能应付裕如，谈得头头是道，深为大帅所喜，就升官了。这种巴结法，委宛从容，泯去痕迹，受巴结者不知不觉入其心坎中，令人意悦而首肯。这是最高的帽子，上司戴得最舒服，因为求来的高帽子，是加之以势，而自做的高帽子，则浃之于心也。

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

果尔敏及其诗集《洗俗斋诗草》

《洗俗斋诗草》是友人费君浩叔(致濬。费君久任香港盐业银行经理，今已退休)的外祖父果尔敏所著的。果尔敏为满洲巨族，以八旗子弟，在咸丰初年任清宫侍卫，庚申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果尔敏随扈。同治初年，常奉派出使塞外，因此有劳绩，于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简授广州副都统。这是果尔敏正式出任实缺官职之始。

八旗子弟，一般都游手好闲，因为他们有口粮可领，不愁饿死；能留心文事，读书求上进的，占此中少数。果尔敏系出名门，聪慧好学，公余之暇，以吟咏为乐。他一生所作的诗约三百多首，名《洗俗斋诗草》，不分卷，其中有名的《洗俗斋破愁集》，以在广州时所作的居多，包括有《广州土俗竹枝词》九十首(自署“珠海狂吟客”)，描绘九十年前广州风俗，亦庄亦谐，这对广东人来说是最感兴趣的。三年前，费君出示此册，问我它的文学价值怎样？我绝不客气的说：以诗而论，未见有甚么突出之处，但果尔敏做过广州副都统，升任杭州将军，在这两个任所，他都留下不少篇什，尤其是在广州时所写的采风感时之作，最有价值，留为广东文献，正是绝好史料。我竭力怂恿费君照原稿付诸影印，以广其传。

这部诗集共四本，都是作者手写而未编定的，书前只有他的友好何廷谦在同治十二年所作的一篇跋，录如次：

承示大著数百首，浓淡清奇，无美不备，忽而铜琵琶铁板，忽而雅管风琴；忽而大海鲸鱼，忽而兰苕翡翠。竭数日之力披吟之，又竭旬余之力玩索之，其慷慨激昂似杜，汪洋浩瀚似苏，其清新丽媚又似玉溪、剑南，盖沉酣于此道者亦有年矣。昔王晋卿以朝廷戚里，出为利州防御，身虽贵胄而服礼义，左图右史，工画能诗，一洗豪华之习，与东坡都相契合。今君所造如此，得不为艺林所引重乎？况年未四十，好古多闻，由此而日近之，以入唐人之室，而追骚人之遗，不难矣。……同治癸酉十二月上浣，愚兄何廷谦拜跋。（按：廷谦字地山，安徽定远人，道光廿年编修，同治九年任广东学政，光绪五年，终于工部左侍郎，赐祭葬。）

这篇文字虽说脱不了捧场的俗套，但也约略可窥见果尔敏的诗的作风是怎样，所谓"慷慨激昂似杜"，说得还不错。例如《庚午因津门近事感赋》七律六首，《闻津门近事有感》五律二首，就是因天津教案而作的。此案曾国藩办理失当，为国人指摘，声誉大损。交涉的起因是同治九年庚午，天津时有迷拐小孩之事发生，据说主谋人是法国教堂的传教士。迷失的小孩后来被发现，尸体都被挖去心肝眼睛，人们就传说教士用幼童心肝眼睛制药。天津知府张光藻拿到了疑犯数名，其中一名武兰珍供出是法国教堂的王三把迷药给他行事的。于是天津的老百姓和教民时时发生争斗，交涉遂起。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到他的衙门和犯人对证。老百姓愤恨外国人在天津欺压良民，他们以为丰大业到通商衙门会晤崇厚，又施展他的帝国主义欺凌手段了，便麕集衙门外示威，丰大业以为"暴徒"将对他不利迁怒崇厚，说他布

下陷阱害他，于是掏出手枪，向崇厚作射击状，崇厚大惊，连忙走避，丰大业余怒未息，气忿忿地离开衙门，刚出大门，恰巧碰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见没有击中崇厚，便转而击刘杰，幸而洋人的枪法甚为"水皮"，只击中刘知县的家丁。人们见丰大业这样凶横无理，忿不可遏，一拥上前把丰大业活活打死。人们对教徒久已痛恨在心，这次有机可乘，就打铁趁热，放火烧教堂、杀洋人和吃教的华人。这次暴动，死者约数十人，清廷见得罪了洋人，那还了得，便叫直隶总督曾国藩谨慎办理此案。国藩一味迁就洋人，意欲把大事变小事，早日了结。果尔敏那几首《津门近事》，有"报国有怀空抚剑，安边无策愧垂绅"之句，便表示不惜与洋人兵戈周旋之意。

其实天津教堂教士，没有迷拐小孩剖心挖目制药的事，老百姓痛恨洋教，完全是因为一些不肖教士、教民恃势欺人，人们饱受凌虐，一听到谣言，就乘机发泄积恨，三十年后发生在北京的义和团大暴动，也是老百姓痛恨帝国主义的举动。津案发生后不久，马新贻在南京遇刺身死，清廷为了保全曾国藩的声誉，把他调任两江。就在此时，广州也受到天津的"迷拐"谣言影响，老百姓儿欲对洋人有所不利，果尔敏有《近事》二首，题下注云："广州忽传有妖人卖神仙粉以鸩人，两日间万口哄传，几成不测。"他的诗是劝人不可随便听信谣言，要留起义忿到适当时候才可发泄。官厅这些忠言，在老百姓们听起来是逆耳的，幸喜"神仙粉"谣言，不到一个月便沉寂了。

这部诗集有几点是我个人最欢喜的，那是有关广州的风俗和掌故。《广州土俗竹枝词》便有很好的描写，现在录几首给读者欣赏。

永巷长衢对面房，檐头搭板避骄阳。防虞最怕遭回禄。乱扯胡拉闹一场。(长巷)

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烧香)

[illegible]诞新逢大喜欢。观音山上大悲坛。屠儿此日真高兴。还愿烧猪准卖完。(烧猪供佛)

嫁女堂前小宴开，女儿啼泣女儿陪。太婆阿奶诸亲眷，同向兰房听哭来。(听哭)

有日于归兴致高，嫁衣初试咏夭桃。如何恋母伤心语。编作歌儿唱著号。(哭)

嫁女归来忍泪痕。半忧半喜自思忖。爹娘第一开心事。最是烧猪送进门。(送烧猪)

土人爱着薯莨绸。赤足街前汗漫游。脖上横缠粗辫子。手挥雅扇细潮州。(土人)

这七首所咏的有些已看不见了，但在香港还可以见到。《长巷》一首是三四十年前广州独有的特色。可惜作者没有描写内街在夏天所盖搭的凉棚。这种凉棚，的确是广州所独有。一些富户，往往在阴历四月初便在家中的天窗上搭"风兜"，其作用与烟囱相同，它把南风"兜"入天窗，输送入厅房，天然的薰风，远胜今日的冷气。富家屋里清凉，又要惠及门外行人和自己，于是纠合坊众，派钱搭棚，把整条街巷盖着，夏日骄阳晒不到地面，赤脚走过，也不会使脚底炙热。小孩子在门前游玩不致冒暑，门公(即北方的门房)和"后生"等人，也在棚下着棋纳凉。中秋过后，西风渐起，为了防火，搭棚佬又忙于拆凉棚、风兜了。

《烧香》所写的今日在香港还是随处都有，宝云道的顽石，香

火之盛，甲于半山，蔚为香港一奇景，粤人好鬼，自楚庭时已然，不足为怪了。

《听哭》、《哭》、《送烧猪》这风俗，是旧日嫁女之家所有，前两种今日香港已不流行，后一种则"新潮"之家还很重视，有些"坤宅"向"乾宅"开婚礼谈判，甚么都可商量，独有烧猪一项，非有不可。百年前王湘绮到广州，给太太的信，对粤人婚嫁偏重此物，谓为毫不知耻，真慨夫言之。关于《哭》这两种，广东省中，独有广州府盛行。出嫁的闺女，在出门前十多天，就邀请她的同性亲友同聚兰房，用柔和漫长的声调，唱出心中的忧郁，名叫"开叹情"，唱到悲哀之处，就纵声大哭。因为"做女"的时候，多少都受家庭规矩限制，或受尊长歧视虐待，受气已多，平时不敢以哭发泄，出嫁时，便趁此机会痛痛快快的，以比兴之体唱出来。"开叹情"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不专针对家长，而以感谢父母养育之恩，一旦远离不能长依膝下者为多。女孩子在未嫁前便要先练习，识字多的会唱木鱼书曲本七字一句，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她们就会凭此本领，随时"爆肚"，有骂媒人的，骂大家的，不一而足。

"开叹情"只限于行过大礼之后，双方已筹办喜事，过门日子也定了，男家已把衣服、首饰、箱箧等物送到女家，此后做新娘的便不能行动自由，关在卧室里不许下床，就是吃饭洗澡也在床上。这时候就"开叹情"了。张菊生(元济)早年久客广州，熟知当地人情风俗，他序《岭南诗存》，对"开叹情"十分欣赏，谓"粤人善歌"，缠绵悱恻，感人至深，是很好的篇什。

薯莨绸大约知者较多，但"潮州"是一种扇子的代名词，知道的人便少了。原来百年前潮州出产一种细骨的纸扇，状如倒转的琵琶，广州人称它为潮州扇，有时简称潮州就了事。(潮人称为

篷洲扇）

果尔敏在广州八年，这时候做广州将军的是长善（字乐初，为志锐、珍妃的伯父），长善喜与名士交游，提倡风雅，将军衙门里有壶园，一班名士如文廷式、于式枚等人都是座上客。果尔敏有“乐初将军，重修西爽园落成，敬呈四律”，是有关广州坊巷掌故的，如次：

乐初将军长善重修西爽园落成敬呈四律

鸠工几日剪荒榛。别墅重开百粤春。满树凉云添绿意。一庭疏雨静红尘。安排曲槛幽廊地。雅称轻裘缓带人。我为名园欣得主。从今不负艳阳辰。

雅度雍容世少同。从来儒将擅儒风。投壶不废韬铃事。筹笔原参造化工。且作楼台舒眼界。别饶邱壑在胸中。赏心岂为闲游眺。欲筑诗坛颂治隆。

移花叠石费经营。此日芳园喜落成。又拓南来新画本。重寻西爽旧诗盟。稳巢归鹤依篁密。高荫鸣鸠古木平。添得一湾流水活。潺潺清和雅歌声。

清秋幕府列瑶觞。小集西斋趁夕凉。初月影寒侵几席。晚荷香冷透衣裳。飞花酒政依金谷。制序才华拟玉堂。幸际承平戎事敛。公余酬酢乐徜徉。

同治中叶以至光绪初年，广东可说是承平无事，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不见兵戈，有安居乐业景象，作为镇粤将军者，在此时大兴土木，风雅一番，还不十分招致人们诮骂。这时候，文廷式的父亲星瑞，广西人倪鸿，也是壶园雅集中的客人，他们都和果尔敏唱和的。倪鸿的寓所在粤秀山麓，土名大鱼塘附近，自署

野水闲鸥馆(倪死后，其址改为随宦学堂，许地山、周自齐等都曾在此读书，光绪末年又改名旅粤学堂)，常集名士饮宴。倪鸿字云劬，临桂人，久客广州，咸丰年间曾任顺德县江村司巡检，曾任粤督毛鸿宾文案，后来捐了同知到浙江候补，不很得意，又回广州。倪鸿为人风雅，学问亦优，陈兰甫先生对他的印象很不错。他的诗集本名《曼陀罗龛诗集》，但果尔敏题作《野水闲鸥馆诗钞》，不知是否后来更改，或另有一集。

果尔敏的外祖父是贝勒奕纶，奕纶的祖父是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奕纶后来出继履亲王永珹为孙，封贝勒，道光十五年因事降为贝子，十六年卒，追封贝勒。奕纶死时，果尔敏才三岁，曾随其母居外家宜园中。若干年后，果尔敏有《重过宜园感赋》七章，记道光咸丰间北京贵族的名园，这是北京坊巷掌故的第一手材料。

果尔敏升杭州将军后，在任三年，到光绪五年召京，有《见意》一首云：

> 十年游宦此归来。(余于己巳秋外放，己卯春回京。)旧雨樽前笑口开。南海云霞供画本。西湖水月助诗才。葡萄酒美今须醉。苡薏珠明莫浪猜。故里春深花自好。托根况复近蓬莱。

回京不久，又奉派往内蒙，有《奉使科尔沁恭纪(通州作)》和《科尔沁道中吊忠勇亲王(王讳僧格林沁，督师数年，殁于曹州之战)》，《旧府感赋(旧府扎萨克王废邸)》，《二台五十家子(每台设兵五十名，携眷以居，俗呼五十家子)》、《七台》、《十一台晓发》等七八首，都和塞外掌故有关的，尤其《旧府感赋》二首，可供读

者一观。

山环水抱野人居。道是前王旧舍庐。（王佞佛，捨邸舍屋材为寺，遂成墟落。）欲使祇园兴梵刹。遂教邸舍作丘墟。来生有福谁曾见。半世无儿国已虚。一难方平一难起。（王无子。薨，族人争立，兴大狱。狱成，以格瓦占散为嗣。袭封六年，又死，族人复争之。）不知佛意竟何如。

六载承恩列土荣。夭殇顿使庶民惊。人心未必忘雍睦。家难偏教启忿争。佞佛贻谋应有憾。为尼末路已成行。（家难又作，妃不能堪，赴五台山祝发为尼去矣。）那堪大狱凋伤后。又敛金钱媚主盟。（三盟向设盟长一员。）

果尔敏《奉使科尔沁恭纪》注语："己卯闰三月十七日，奉旨派出臣果尔敏往赐奠科尔沁扎萨克亲王格瓦占散"，己卯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那么这个格瓦占散是同治十二年袭封的了，查《清史稿》藩部世表一，扎萨克郡王根敦占散是同治十二年袭封的，何时死，未见注明，但诗说"六载承恩列土荣"，而赐奠则为光绪五年，其死或在光绪五年初或四年末。但果尔敏诗中的扎萨克王格瓦占散，而藩部世表的则名根敦占散，不知是否为一人。根敦占散是达特巴扎木苏的嗣子，或即为注语所说的那个佞佛，死后无子、族人争益的王爷了。

果尔敏早年在北京与友人赠答的诗，最有趣的是《赠徐石甫受麐茂才》一首了。此诗大概是作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之间的。这个徐受麐秀才，就是为本集作序的饶宗颐教授所提到的徐荣的孙子。现在先把诗录出，再谈这趣事。

我爱徐石甫。诗成见兴性。忠臣真有后。狂士岂徒名。著作千秋想。驰驱万里程。壮怀何所寄。匣剑似龙鸣。

徐荣是广东驻防汉军，字铁孙，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进士，工诗画，在浙江久任州、府，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升福建汀漳龙道，恰巧太平军大攻安徽，他本应赴新任的，但他却"急于王事"，和太平军交锋，虽然打过几次胜仗，终以援军未集，在安徽渔亭阵亡，其子亦死。徐荣死后，他的子孙一派住北京，一派住安徽。受麐是北京一派的(另有一个名受谦，字计甫者，是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编修，不知是否同派，其为受麐之弟则无疑)，同治末年，忽然改名叫麟光，并且连姓也"不翼而飞"了，其中牵涉到兵部尚书读别字的笑话。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正月廿八日记云：

徐石甫郎中麟光，广东驻防汉军，故绍兴知府铁孙先生之孙，年五十余，诚笃有家法。本名受麐，同治中，户部奏留引见时，上指麐字，问带引见者尚书载龄，对曰读若米，盖误认为麋字也。既退，载谓之曰："上不识汝名，幸我言之。"对曰："此麟之本字，非音米也。"载愕然良久，曰："我已告上读米矣，汝亟改名受麋可乎?"对曰："兄弟有名受麋者，司官小名光，今改曰麟光。"载曰甚善。于是呈吏部文曰："徐受麐请改名麟光"。吏部遂去其姓矣。(此据金梁所辑《近世人物志》。按载龄于同治十二年由兵部调户部尚书，麟光为其下属，故称司官。)

十七八岁的小皇帝，平日已无心读书，不识彭玉麐的麐字，

本不足奇，可怪的是堂堂一个兵部尚书，连一个和太平军打仗多年的水师将领彭玉麐的麐字都不识，可说是咄咄怪事，满洲君臣都这样“乌龙”，很可笑。

我不懂诗词，对于这部由我选定的诗集不能发挥所见，于是请饶宗颐兄发挥之，现在把他的大文录后，给读者参考。

满洲八旗子弟，自崇德时皆习儒书。顺治八年，复令与汉人一体乡会试，濡染既深，人习篇章，宗潢之秀能以诗鸣者，类皆有集行世，其事肇于鄂貌图。流风所被，暨于末叶，文人艺士，且复兼工，几与汉人无异矣。杏岑果尔敏以贵胄警惠，博涉好文，屡出使塞外，发为篇翰，风鬟乌逝，陵雪犯沙，王元长谓诗史北流，非虚言已。同治八年，出任广州汉军副都统。光绪二年，擢杭州将军，调官乌兰峪总兵。行踪所至，流连山川。风土之思既深，雕藻之情泳涌。结纳名辈，酬唱益工。观何子贞于永州赠联有“万年老竹化为与可，大地春水尽是天随”，以丹渊、笠泽相期许，其胸怀倜傥野逸，可具见也。杏岑诗曰《洗俗斋被愁集》，检《八旗艺文编目》，未见著录，向仅有家抄本。比者其外孙费君致濬将以授梓，用广其传。高君伯雨以稿本见示，幸快先睹。余读其广州土俗竹枝词九十首，视文昭《紫幢轩诗》中之《京师踏镫竹枝词》，有过之无不及，均足以备掌故，令人倍忆往日升平。其菊部排律，梨园往事，赖以有徵，更为戏剧史无上资料，有不容忽视者。记同治之季，归安张应昌曾衰选清诗，可以道风俗、宣民隐者，辑为《诗铎》，网罗作者近千家，汉军广州驻防徐荣（铁孙）之什亦在焉。惜其书先成，于杏岑遂有遗珠之憾。然杏岑自署珠海征吟客，其粤中诸

作，述土宜，陈政教，衔春华而酌秋实，列之采风，与乐钧之《岭南乐府》、袁翼之《珠江乐府》，正堪比肩。异时之留心乡献者，必取资焉。高君欲予序其端，不辞固陋，略陈所见，以为读此诗者告。丁巳清和饶宗颐。

从《官场现形记》谈东乡屠杀案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有两回是描写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时，被债主所追，后来由他的属吏田秀粟解围的故事，同时又写这个足智多谋的田秀粟，为他设法销灭证据，洗脱罪名。这两件事，头一件与丁宝桢有关，第二件只能说有小部分有关，而实与前署川督的文格有关。因为小说中只描写丁宝桢，后来就有人把两事一古脑儿完全栽在丁身上。不知是否李伯元不知道事属两人，因丁宝桢名气大，就不如"一客不烦二主"，全写入丁宝桢帐上可也。

多年前，偶然在旧书摊买到一本六卷二期的《文史杂志》(一九四七年五月在苏州出版的，它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在重庆创刊，史学家顾颉刚主编)，有已故周贻白(卒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写的《官场现形记索隐》一文，曾把这一件案索隐出来，他考证的材料，只是根据《清朝野史大观》所引的某笔记。大概周先生对于这件案的来龙去脉不大清楚，而且又有些误会，所谓"索隐"便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我现在写此短文就是要澄清周先生的"索隐"，使读《官场现形记》的人，得到参考的便利。我先把周先生原文摘录出来，然后再谈此案的经过。

第四十八回……叙刁迈彭(掉卖朋)以候补知府，历任三大宪都喜欢他。及蒋中丞至，初颇以其兼差太多为嫌，刁乃

利用一仆妇王妈为内线，遇事先意承旨。因探知蒋中丞欠人七千多银子的债，不能偿付，乃假中丞名，私为偿去。蒋感其意，乃予以重用。尉以蒋命记名提督盖道运（该倒运）往皖北剿匪，误剿良民，清廷派员查办。盖道运以有中丞手札，命其迎头痛剿，不认过失。蒋商之于刁。刁与盖本为旧交，至是乃另作一札，藏之袖中，访盖索札阅看，乘其不备，以另札换去，改"迎头痛剿"为"相机剿办"。于是盖与另外二人，同被戍边，蒋中丞仅得一革职留任处分。

上文是周先生把这一回的大意写出来，我转引于此，以便未读过《官场现形记》的人，得到一个概念。接着便是周先生所引《清朝野史大观》所记的一件事，来作索隐的材料。周先生说：

此实田秀粟事。《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载：田秀粟，字子实，陕西人，初捐从九品，官于蜀，继捐升知县，令成都。丁文诚督川，闻其贪劣，将劾之。田惧，时制军苦督署之窄，田阴伺得其旨，审知督臣自山东来，山东抚署素华敞，乃修督署，尽规其制。田由是得督臣欢。又为屋二仆妇，田阴许岁私给数千金，使侦制军动静。……会又侦知制军债家某，使人蹑至川，索甚急，债凡三千金，制军窘，无可为偿。田乃白制军，能使之去。制军不得已，许之。田乃引债主归，出囊金偿之。制军于是不复能劾田。东乡案结，前督文公实有令提督李友衡督兵进剿之札，在李友衡处，文恐为所持，以属田。田素与李善，乃先为伪文书一通，置袖中，且先约一友随后往。田见李慰问毕，询所以自免之策。李曰："吾有文督札在此，若死则俱死耳。"田曰："文官多巧，其

中有趋避语，宜出示我，当为汝辨之。”李不疑有他，遂取出与观。正指点间，忽外传有客至，李出见客，田匆促以伪文书易之。李送客归，田即曰：“顷视文书，果如君言，当无他矣。”遂匆匆别去。李反视前札，则已易去“督兵”二字，已改为“相机”矣。始知为所卖，大悔恨。由是见钦使，无复可置词。文既得札，三叩首谢之。田他事诡谲多类此。后为泸州牧，忽见案牍犯人有李友衡名字，大惊，遽倒地死。或云田给李之家属，非面给李也。俟考。

以上是周先生引《清朝野史大观》的文字。李有恒不叫友衡，也许两字同音，可以通用，但官书上是有恒、笔记的作者写作友衡，已与事实不符，而周先生引用，未为纠正。其实这段笔记“俟考”之下，还有：四川有一灯谜曰：“田秀栗给文书”，打四书一句，是“难乎有恒矣”，即指此事。

末后这几句周先生删去，大概他不知“有恒”是甚么人，索性删去省事。其实有些文字不应删，他见“有恒”两字，还不懂得去研究一下，已经粗心大意，又误会笔记的作者称丁宝桢为“文督”，甚至连丁宝桢谥文诚都不知。他引用这段笔记后，加以按语云：《清朝野史大观》系中华书局出版，其材料皆集引各书而成。本篇似见之某笔记，一时无从检寻，姑录之。其称丁文诚为文督，及省称作“文”，疑皆有误。似当作“丁督”或“文诚”。待查。

其实笔记所称的“文督”、“文”一些都不误，误在周先生他搞不清。东乡屠杀案的主要人是前任川督文格，丁宝桢接任后，续查此案，田秀栗是替文格赚回文书，而非替丁宝桢．不过《官场现形记》把这事全栽在丁身上罢了。笔记中明明说田为丁偿还三千金，文因文书在李有恒手上，谋之于田，田乃为设计赚回。写

小说的人不妨把两事属于一人，但考证的人就绝不能这样不分了。笔记中的“文督”指的正是文格。文格字式岩，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廿四年进士，以部曹外用，累官至四川布政使。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川督吴棠（世人所传西太后的“恩人”）病免，文格以藩司护督，到李瀚章以湖广总督调任川督，光绪二年三月，文格以四川藩司升云南巡抚，他嫌路远，运动调往一个较好省份，于是在九月改调山东巡抚，接丁宝桢的遗缺（李瀚章在四川不过数月，光绪二年九月十一日调任湖广，同日发表鲁抚丁宝桢为川督）文格在山东几年后，才获革职处分，但到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十二月起复，署理金州副都统，十二年五月实授，十三年三月，调三姓副都统，十五年十一月开缺。文格的宦历大抵如此。

《官场现形记》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说田秀栗买通督署仆妇，刺探总督行动，此事似乎不属于丁宝桢。当年成都人士，都传有田秀栗买通督署仆妇的趣事。王湘绮在成都尊经书院做院长时，日记中有说：

> 田秀粟来，字子实，知泸州，所云送李鸿章妾，遣仆妇入督署钞文书，探消息，及花盆埋金者也，声名达九重，以为必属异人，及见乃庸庸无奇。……或云其能捕盗结案，熟视之，不似能健吏也。（光绪六年三月廿四日《湘绮楼日记》。按：所谓送李鸿章妾，或为瀚章笔误，鸿章未任四川总督也。）

读《湘绮楼日记》这一记事，略可见田秀粟的为人一斑，但王湘绮说的未必尽对，大抵田秀粟有能名，办事综核名实，故能获

得丁宝桢赏识，他的“声名达九重”，是指田秀粟被劾的事。光绪五年八月廿三日的邸钞，载上谕一段，即有关田秀粟，摘录如下：

> 丁宝桢奏：遵查道员劳文翿管理筹饷局务，并未私提银两，该员与前署华阳县知县、泸州知州田秀粟，亦无交结门丁黄瑞廷之事。……既据丁宝桢责成两司查明，该员入局以来经手收支各款，委无违例滥支情事，平日亦无别项声名，业经撤去筹局饷差使，即著无庸置议。知州田秀粟，虽据奏称并无庸劣声名，仍著留省随时察看。所有泸州知州一缺，著丁宝桢另行派员前往署理。门丁黄瑞廷已否驱逐出境，未据该署督声明，著懔遵前旨，即行驱逐出境，毋任逗留。

田秀粟的声名达于九重，不单是他屡次被劾，也因他在四川剿匪有成绩，光绪四年五月上谕有：“四川重庆、泸州一带枭匪肃清，予知州田秀粟等奖叙。”但一年后，田秀粟又被“软禁”在省城“察看”了。

四川东乡案，发生于光绪初年，光绪二年八月，有内阁中书萧宗瑀等，联名向都察院呈控带兵官冤杀奸掳，请旨办理。御史李廷箫也奏言四川重案覆奏疑窦甚多，请饬严讯。清廷因为案情重大，业经饬令四川总督把匪犯袁廷蛟解来北京，由刑部审讯，现又发回交新任总督李瀚章，叫他把李有恒有无搜杀无辜，和袁廷蛟有无滋事各节，秉公确查，据实具奏。因为袁廷蛟供称并无聚众滋事，也没有扑营抗拒官兵等情。这一案一查就两三年，到光绪四年七月，御史李廷箫为了这件案，又再上一奏疏，泛指地方官动不动就藉口“民变”，派兵弹压，他的疏中有：“近来各省州

县，往往因诛求百姓不遂所欲，辄诬指为抗拒，率请派兵弹压，武弁志在邀功，妄加剿洗。又有带兵武员，遇有迹涉可疑及仇隙者，即指为叛逆，擅用刑诛，流弊滋多，请饬严禁”等语。

清廷照例下一道上谕，饬令各省督抚，不得轻派营勇，并严禁武员不得滥刑无辜，倘不认真查察，即将该督抚惩处云云。这样的官样文章，已属常见，地方官员从来就不放在心上的。就是有人揭发，上头派员查办，结果还是官官相卫，查办大员回朝复命时，无不腰缠累累，人民遭殃。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盛宣怀的亲家孙宝琦（入民国后，官至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做山东巡抚，莱阳海阳两县官迫民变，孙宝琦派兵镇压，滥杀良民千余，山东京官连章抨击，请清廷查办，结果孙宝琦不但没有撤职查办，甚至连“革职留任”的处分都没有。

《官场现形记》没有正面写东乡屠杀的事，只在第四十八回中提到钦差童子良奉朝命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误剿良民”一案，补述一下。现在摘录一些给读者参阅：

> 此时做安徽巡抚的，姓蒋号愚斋，本贯四川人士。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由山东调安徽，乃是以繁调简，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实因其时皖北凤、亳一带土匪蠢动，朝廷因为这蒋中丞是军功出身，前年山东曹州一带，亦是土匪作乱，经蒋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所以朝廷特地调他过来。……蒋中丞接印之后，就派了一位营务处上的道台，姓黄名保信，一个副将姓胡名鸾仁，带了五营人马，前去剿办。禀辞的时候，蒋中丞原面谕他们相机行事，及至到得那里，他两个办不下来，就上了一个禀帖，说

土匪如何猖狂，如何厉害，请加派几营兵，以资策应。蒋中丞得禀后，就加派了一员记名总兵姓盖名道运，统率了新练的甚么"常备军"、"续备军"又是三四营，前去救应。此番蒋中丞因该匪等胆敢抗拒官军，异常凶悍，实属目无法纪，又加了一个札子给他三个，叫他们如遇土匪，迎头痛剿。毕竟土匪是乌合之众，那里禁得起大队人马，不下三个月，土匪也平了，那一带的村庄也没有了。问是怎样没有的，说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轰的没有了。于是得胜回朝，蒋中丞自有一番保奏，胡副将升总兵，盖总兵升提督，黄道台亦得了甚么"巴图鲁勇号"。正在高兴头上，不防被御史参上几本，说他们并不分别良莠，一律剿杀，又说蒋中丞滥保匪人，玩视民命，所以派了童子良查办的。

小说中的蒋愚斋显然是影射丁宝桢，说他是四川人，暗切他做四川总督，又说他做山东巡抚，由山东调任安徽，与丁宝桢由山东巡抚升四川总督暗合，与丁宝桢是军功出身亦合。丁字稚璜，贵州平远州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未散馆，以军功特授翰林院编修的。此案起因本与丁无关，小说影射过"隔壁"，本无可非议，索隐的人，再"索"错对象，就未免有些那个了。

《光绪朝东华录》有记录办理东乡案经过，虽然是官方文字，但也略可窥见此案的首尾一斑，现在分别摘录于后：

光绪二年七月甲戌（十六日）谕：前据文格、谭钟麟先后奏报，四川东乡县匪徒滋事，首犯袁廷蛟在逃未获。嗣据御史吴镇奏：知府易荫芝办理不善，提督李有恒妄杀无辜，当经谕令文格查明办究。兹据巡视北城御史奎光等奏，袁廷蛟

潜逃来京，现经拿获，讯据供称，上年内该县官绅苛敛，相推率众赴局算帐，该县遂以民变禀请剿办。李有恒杀戮无辜，掳掠妇女，恳请代诉等情。袁廷蛟著即交刑部审讯，暂行监禁。其所供各节，著李瀚章、文格一并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稍涉迴护。

四川总督李瀚章和前护督文格奉命确查具奏后，清廷又发上谕，公布办理此案：

光绪二年八月丙午(廿八日)谕：前据御史吴镇奏：四川东乡匪徒滋事，地方官办理不善，并请将支应局裁撤，当经谕令文格一并查奏。……兹据文格奏称：袁廷蛟在东乡聚众抢掠，提督李有恒出示晓谕，祇令捆献首恶，并未遽加攻剿。袁廷蛟辄敢率众抖逃，闭寨抗拒，竖旗鸣炮，甘为叛逆，并非有激而成。迨官军攻破寨峒，该匪逃逸，散布谣言，希冀撤兵幸免。既据查明李有恒实无奸掠妇女，纵勇报复及搜索寨民等情事，著无庸置议。绥定府知府易荫芝，于袁廷蛟上年围城未加惩办，意图解散了事，此次袁廷蛟要挟减粮，由县禀报，非该府通禀请剿，并无操切激变之处。惟才欠开展，办事颟顸，著降为通判，归部铨选。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因袁廷蛟勾匪入境，具禀请兵，系为慎重地方起见，并非因徵粮激变，尚无不合。该员是否任听局绅等把持浮派，仍着李瀚章、文格提案讯办。至各州县设立支应局，易滋弊窦，自应一例裁撤，着李瀚章、文格饬属查禁，不准阳奉阴违，致干咎戾。袁廷蛟一犯，现在刑部监禁，著该部录取供词，即将该犯解回四川，仍着李瀚章、文格凜遵七月

十六日谕旨，秉公审讯，以成信谳。

清廷办理此案，把绥定府知府易荫芝降级为通判，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则没有事，只是命李、文二人查他是否任由支应局那班绅士把持浮派。又饬令李瀚章裁撤各支应局，又把袁廷蛟解回四川，交李、文审讯。到九月，清廷又以京官多人吁请严查，遂于是月四日下上谕，命李瀚章不得迴护，秉公办理。

上谕：刑部奏，讯取四川匪犯袁廷蛟供词抄录呈览，都察院奏，中书萧宗瑀等联名呈控带兵官冤杀奸掳，请旨办理。御史李廷箫奏：四川重案覆奏，疑窦甚多，请饬严讯各一摺。……袁廷蛟聚众滋事一案，虽该犯所供并无扑营抗拒官兵情事，遽难凭信。惟该绅士呈控李有恒于乡民到营呈诉，即行斩杀，所杀确系良民，并无匪徒，且李有恒印示有"尖峰各寨，搜杀无数"之语，亦与原奏"并无搜杀寨民"语相矛盾，并据该御史所称，案情重大，原奏疑窦甚多，亟应从严覆讯，以成信谳。李瀚章甫经到任，无所用其迴护，此案著交李瀚章将李有恒有无搜杀无辜情事，及袁廷蛟滋事各节，秉公确查，据实具奏。袁廷蛟一犯，即著刑部仍遵前旨，解回该省，并原供一并咨交李瀚章查办。

此案正发还四川审讯间，大概袁廷蛟还未解抵四川，文格于十一月奏上清廷，自行检举，略说李有恒所带的虎威营勇丁，在东乡有斩伤赵姓等数人，和抱去庞姓小孩的事，尖峰寨一带房屋，焚毁多间，是否该营勇丁所为，传说不一。李有恒和分带该营的提督刘道宗，在途中带有妇女，据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家眷。

这批妇女的来历还未查明，他们所供的很难凭信。清廷以文格事后忽来此奏，自行检举，便责他前此覆奏时为甚么未将前情查出参办，亦属咎有应得，著交部议处。至于带兵官携眷随营，已属大干军律，如果李有恒等有纵容营勇之事，更是罪该万死。前已降旨交李瀚章讯办，现在李已调任湖广总督，此案就交新任川督丁宝桢继续办理。

光绪三年十月，清廷初步公布办理东乡案经过，这是根据文格、丁宝桢所奏的，摘录如下，藉明起因真相：

> ……兹据奏称：袁廷蛟原系革役，人素狡猾，藉口算粮，阴图敛费。当其纠众滋事之初，经前任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准照旧章征收，该犯仍逐日带领多人，沿乡滋扰。前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辄以县城危急，并于议派捐输，较前任增加，致袁廷蛟益肆煽惑。提督李有恒等奉派前往，初尚按兵不动，嗣孙定扬又在官渡设官募勇，议抽斗厘，致团局被抢。袁廷蛟遂率众扑营，当经营勇击败，乡民皆疑官兵为痛剿，相率守寨；官兵亦疑乡民为拒敌，用力围攻，杀戮遂至四百人之多。现查明滋事原委，分别定拟等语。……

四川当局把查讯案情奏上，并将所拟定罪办法，请清廷批准。这件案本来是官方和民众发生误会，才有四百多人被杀死的惨剧，情况和同治初年发生在山东黄崖山者相似。当时阎敬铭任山东巡抚，误听谍报，以为山上有人造反，就派兵往镇压。山上居民多数是山东及邻省一些富户，因避捻军骚扰，选择黄崖山为“桃源”，山中设防，以御土匪。官军以为人民抗拒，人民以为土匪来攻，遂致山上居民全部被杀，死者二千余人，为清季一大惨

案。在旧日封建时代，像这一类的案件，官官相护，很少有昭雪之日。（黄崖山惨案，到光绪三十四年，山东京官屡言其冤，清廷乃命直隶总督杨士骧重新调查，查出果然冤枉，居民在山中演戏酬神，官兵夷平山寨后，以所获戏服为造反证据。杨士骧以阎敬铭一代名臣，如按照实情覆奏，必致身后之谴，乃命幕客徐沅，为阎氏洗脱，含糊了事。阎敬铭死于光绪十八年，还有官员替他掩饰，可见官僚政治，为害之大。）

清廷随即准如所请，于十月十九日公布所议罪状和惩罚。上谕说：

> 此案袁廷蛟始则藉粮纠众围城，逼胁官长，继复勾匪烧抢，围困官兵，夺去军装马匹。嗣又率众执持器械旗帜，在官渡扑营接仗，实属凶狡昭著，着照所拟斩立决，以昭炯戒。前署东乡县、庆符县知县孙定扬，议派捐输银两，妄议增加，虽尚未征收，而办理不善，咎有难辞，嗣以县城危在旦夕，张皇请剿，以致派拨大兵。复以募勇抽收斗厘，致激匪众抢局扑营，酿成事端，尤为荒谬，著即行革职，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记名提督刘道棠、记名总兵雷玉春，率勇往攻尖峰寨等处，搜索匪首，因各寨峒擅行抗拒，以致杀伤甚多。惟纪律不严，所部勇丁有抢掠牲畜情事。刘道宗复携眷随营，尤干军律，著即革职，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雷玉春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乡县知县长康，于前任浮加钱粮，不能革除，迨袁廷蛟滋事，又不能立时拿办，实属疲软。记名提督李有恒，虽尚无纵容勇丁搜索奸掳，及携眷随营情事，惟身为统领，不能整饬营务，于所部刘道宗携眷随营，及管带之勇丁，毫无纪律，均无觉查，实属弱

> 职！长廉、李有恒，均著即行革职！前任绥定府知府易荫芝，于袁廷蛟聚众围城，未经解散，并不查实、亦不设法拿办，殊属颟顸！原任四川总督吴棠，于该县禀报时，不及详查、遽派重兵剿办，办理亦有未协。易荫芝业经降为通判，吴棠业经病故，均著免其置议！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办理此案尚无不合，惟于刘道宗携眷随营一节，先未查出，亦属疏忽，前已有旨交部议处，著毋庸再议！

屠杀东乡良民的是李有恒，祸首是孙定扬，而丁宝桢对他们所拟的罪名太过轻纵，于是引起议论，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清廷，略说如果丁宝桢没有轻纵罪犯，何致人言籍籍，请饬丁宝桢再将前案细心核覆，务使情真罪当，以雪民冤，如前奏稍有出入，即当具实奏明更正，不得意存迴护。到九月，清廷因四川都江堰工程和东乡惨案，认为重要，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左侍童华为正副钦差，前往四川查办。他们于十月十二日出都，一路上施展威风，勒索地方官，《官场现形记》里有钦差童子良，就是影射这两个钦差的。（恩承字露圃，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童华字薇研，浙江鄞县人，道光十八年翰林。）

钦差到了四川后，即展开工作，《官场现形记》说童子良这次到四川查案，大有所获，但是否属实，则无从知道。光绪五年二月十三日，上谕公布恩承的初步报告，据说：

> 前因丁宝桢、李宗羲先后覆奏四川东乡县案，情节不符，当派恩承、童华前往查办，兹据恩承等奏称，已革大员，供词狡展，请旨严讯，并请将玩误公事之知县议处一摺。已革提督李有恒等，经恩承等提讯，复强词狡辩，忽认

忽翻，亟应彻底根究。著恩承、童华严行审讯，务得确情，毋任展狡，倘仍坚不吐实，即著按照藩、臬两司并委员李传骏等详禀各节，秉公酌断，定拟具奏。至东乡县内应讯之粮绅李开邦等，经恩承等札令东乡县知县路朝霖解省候审，该员任意迁延，迄无一人解到，实属玩误，路朝霖著先行交部议处！

这件屠杀重案，搞了五年，到光绪五年审结，是年六月十一日，上谕公布此案办理经过，和各官员处分办法，录如下：

上谕：刑部奏，遵议四川东乡县案内罪名一折，此案袁廷蛟引贼劫掠罪犯，应斩。惟起衅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逆党。已革知县孙定扬诬袁廷蛟为叛逆，致兵勇查拿，妄杀寨民数百命，已革提督李有恒，奉札剿办，并不分别良莠，确查袁廷蛟所在，妄杀寨民，实与疑贼逞忿故杀无异。孙定扬、李有恒均着斩监候，秋后处决。知府张裕康、冉正杓，始则禀请加捐，继复怂恿请兵，败坏抚局，非寻常妄预官府事可比，均著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远不准释回。张裕康避不到案，著四川总督严饬缉获，按照办理。提督刘道宗、王照南、雷玉春，随同李有恒，会攻寨垌，纵军杀掠，草率冒功，均著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总兵刘楚华，随同攻剿，致任兵勇焚掠，亦难辞咎，著革职发往军台赎罪。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瀚，襄办此案，始终瞻徇，不行据实禀报，实属溺职，均著即行革职。监生李开邦、吴芳体，勒抽斗厘，酿成巨案；贡生向若幡，屡次索诈，扰累平人，该犯等均充团首，挟嫌怂恿发兵，实为酿事之由，均

著革去贡监，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永远不准释回，并毋庸查办奏留。游击方荣升搜捕袁廷蛟，将僧普集迭责受伤，致服毒毙命，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至办理此案之前护理总督文格，函札内有"痛加剿洗"一语，且既经总兵谢思友禀报查无叛逆情形，文格并不饬令会办，仍行檄调回省，实属办理粗率。总督丁宝桢拟罪轻纵，曾面谕两司，将原详内"李有恒轻视民命"等语删去，迨经覆查，又不悉心斟酌，实属始终偏执。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于雷公、凤头二寨系滓武营筹办情形，未能分晰叙明，亦属疏忽。文格、丁宝桢、李宗羲，均著交部分别议处。恩承等原议罪名不符，惟请饬部详核，未经定案，均著免其议处。……

此案被惨杀的良民达四百多人，审结之后，受处分的文武大员，由总督、提督、知府、知县以至贡生、监生、乡绅等十七人之多，可说是光绪初年一大案了。（前两江总督李宗羲是四川开县人，他已在同治十三年因病免职家居），世人所传田秀粟骗回文格给李有恒的札函，以"痛加剿洗"字样，改为"相机剿办"，可知不确，如果李有恒呈堂的札函是"相机剿办"，那末，上谕中怎会出现有"痛加剿洗"的话而定李有恒死罪呢。

吏部遵旨议东乡案内大员处分罪名后，清廷随于六月廿三日以上谕公布，文格、丁宝桢革职；李宗羲于饬查事件，未能分晰叙明，著降一级留任，不准抵销。但又因为丁宝桢到任后，能大力整顿四川庶政，已具成绩，革职后，又加恩赏给四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按：总督的官阶从一品，今以四品衔的官员，署总督，待有功后，始行实授）这是清廷爱惜人才之故，西太后并不怀恨他杀安德海也。

孙定扬、李有恒是光绪六年十月十三日处决的，十月十四日的《湘绮楼日记》说：

> 昨夜东乡令孙定扬、领兵官提督李有恒，斩于东市。此案翻覆五年，今始两败，恩童于此案得十六万金，犹愈于堰工、盐务之无聊耳。

查办东乡案的两个钦差，因被阎敬铭奏劾，得革职留任处分。五月廿七日，阎敬铭奏：

> 奉使大臣过境扰累殊甚，恩承、童华上年奉使四川，行至山西境内，每处酒食、门包及各项支应，一日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闻其行至陕西汉中，诸更加厉。复据华州人民呈诉，恩承等过该州时所用，视过晋境尤加。并闻恩承等家丁在华阴县有需索闹至县署之事。谨将恩承等经过山西安邑县，及陕西华州支应各项，开单呈览。

当时部议将恩、童二人降三级留任，但清廷认为所拟太轻，改为革职留任。钦差办案回京覆命，也受到处分，可为此案一个有趣的插曲。

廿载繁华梦与周老十

二十多年前读过一部小说叫《廿载繁华梦》，又名《粤东繁华梦》，是黄小配所作的。全书四十回，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连载于香港的《时事画报》，下一年上海、香港都有单本刊行。我读的是那些一折九扣书的上海翻印本，近二十年已经买不到了，但这部小说在五十年前很是风行一时，广州香港的读者很多，原因是书中的主人公周老十是个名流，而查抄周老十又不过是前数年的事。作者黄小配（世仲）是广东番禺人，是当日一个颇享盛名的小说家，不过这部小说写得并不十分好，说些什么，在此二十年中老早忘记了，就是现在我能找到一部，也未必有耐性读下去。

这部小说印行了五十年，不知怎的近人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枝谈》都没有著录，只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二〇六页有提到它。现在据录如下：

> 二十载繁华梦
>
> 未见
>
> 演周东生事。东生以一库书起家，为督臣岑春煊查沙。见《七载繁华梦》梁纪佩序及例言。

所记极简略，甚至作者也未见过此书。其实二十年前孙君作此书

时，这部小说是随处都买得到的，并非如今日之难得。孙君所说的"演周东生事"，这个周东生就是广州人所叫的周老十。周老十名荣曜，字东生，他在广州的"大屋"位于西关宝华正中约，门面十三间(广州人叫十三便过)，深约二十馀进，大厦里有花园亭台楼阁，还有一个戏台，地方颇大，可容观众数百人。查抄后，这所大厦已成官产，拨给粤汉铁路公司为办公处。辛亥革命后，一部分地皮出卖改建民房，一部分做了茶楼酒馆，而那个戏台则改为宝华戏院(似乎到一九二九年才没有的)。我小时在广州读书，先慈管教甚严，不许入戏院一步，到一九一八年嫡母要我们兄弟回潮州，与生母分别，先母才许我们大玩广州半个月，于是我才有机会在周老十的戏台看《梁天来告御状》。那时候周老十的"大屋"虽然分割得七零八落，但还稍有典型，我们小兄弟三人由女佣伴着，在大屋里玩了整个下午。现在闭目起来还可以仿佛想见其情形。

周老十在这所大屋里大概享过二十年繁华，到底好像做梦一般，流亡海外，托庇外人以逃刑罚，故此小说家才有《廿载繁华梦》之作。当周老十盛时，大屋里面自然是夜夜元宵，说不尽风流富贵。周老十本人穷奢极侈，固然不在话下，就是他的太太马氏也很会讲究享用，她自己就要拥有紫檀大床六七张，因为她有寝室七八间，春夏秋冬，因时而布置，就非有七八张不可。这种紫檀睡床，在六十年前一张约八百多两银子，今日的富豪花四五千港币买一张外国弹弓床，并不算怎样豪侈，若在六十年前那八百两，购买力之高，比四五千何止多十倍呢。即此一端，可见周老十之奢侈一斑了。

周老十之起家，诚如孙楷第所说"以一库书起家"的。原来他是粤海关一个师爷。粤海关是天下著名肥缺之一，做个师爷都可

以发财，管理海关的长官就更不必说了。周老十做了二十多年，只要顺理成章的弄点钱，已极可观，如果法外聚敛，那就发财数百万，也没有什么希奇的。据老辈传说，周老十此缺是他的娘舅傅秩西让给他的，大约傅老头年老，发了财，不想再在宦海波涛中耽惊险，便将师爷之位顶给外甥，“顶手费”多少，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查抄周老十家产，周老十是个精灵鬼，早已逃到香港，再进一步，转船到暹罗国游山玩水了，中国官厅其奈我何！岑春煊晚年在上海闲居时，著有《乐斋漫笔》(刊二十年前北京出版之《中和月刊》)，中有记此事的经过，今摘录如下：

> 荣曜侵蚀公币，积资数百万，与官绅往还，俨然世禄。当谭钟麟督粤时，王某倚势相结，得其重赂。荣曜亦恃有护符，隐其蠹国病商之罪，益自骄纵，遂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劻之援，简任出使比国大臣，尚未出洋，余发其奸罪，奏请革职查抄，凡积年赃款，达数百万元之多。以一簿书小吏，而拥资至此，并得滥窃名器，贻笑友邦，果谁尸其咎欤？其后余召见时，面劾庆亲王纳贿鬻官，即举此为证，太后为之嘿然有愧色，遂不能更言。然海关宿弊至此廓清矣。

这是岑春煊生平引为最快意的一件事。春煊有“官屠”的绰号，他所做的事，未必尽符人望，但不贪污，这一点最难得。春煊的好友胡思敬(清末名御史)所作的《国闻备乘》卷一，记春煊在粤之事，也提到周荣曜，现在摘一些于此，以供参阅。

……世凯……锋芒亦可畏矣，春煊气力更出其上。粤绅周荣曜者，初由关吏起家，积资数百万。春煊瞰其富，折简招至署中，责报效。荣曜不应，私挚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门，遂简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时。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狯如是！"即日参其私蚀关税，请削职监追。荣曜奔香港，尽籍其产入官。奕劻熟视，莫敢出一辞救也。……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胡思敬在当日也是"大肆纠弹"的一个御史，故与春煊为同调，其记此事或闻诸春煊也。不过周老十出使非以四品京卿，实在是以三品京卿简放的。清末外放钦使的人，大都以三品京卿居多，四品京卿是够不上资格的。周老十是否早已捐了一个候补道，今不可知，照例多金的人，多数捐个四品道台来过过瘾的，周老十必不例外。据我所知，周老十确是报效了一笔银两，弄到了一个候补四品京堂（京堂是不能捐的，只有向政府报效，由政府"赏给"，盖以京堂系京官，贵不可言也），到光绪三十年，周老十又向庆亲王进贡，托他谋个出使钦差大臣。庆亲王嫌他资格浅，教他先向练兵处报效一笔．是年五月，清廷果然赏他以三品京堂候补（见《光绪朝东华录》），到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八月初六日，即发表他为出使比利时国大臣，同日发表者尚有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出使意大利大臣黄诰。（黄字宣廷，光绪廿四年翰林，广东驻防汉军旗人，也是以三品京堂外放的。民国初年，他是广州一个大绅士。）以一海关师爷，二十年间居然做到钦差大臣，无怪为士大夫痛心疾首了。这也可见西太后、庆亲王这个贪污集团的胡为，岑春煊提出此一证据，西太后也无话可说。

写到这里，读今日(五月十三日)某报刊某君一文，提到《廿载繁华梦》，说那个粤海关库书名周庸祐，我才记得小说中的周老十名叫“庸祐”，因庸祐与荣曜音相近。书中说周庸祐要娶邓家小姐为妻，请一位姓刘的媒婆给他去说亲，这个刘婆便说出周庸祐起家及其贪污的故事。因为我手头上没有这部小说，现在只能摘钞某君所引的给读者参考一下。小说中所说的倒有大半以上是事实呢。

刘婆说:“此人……就是大坑村姓周唤做庸祐的便是。”邓家三娘听到，登时皱起蛾眉，睁开凤眼，骂一声道:“哎唷，妈妈那里说？这周庸祐我听说是个少年无赖，你如何瞒我?”刘婆道:“三娘又错了，俗语说，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他自从舅父抬举他到库书里办事，因张制台要拿他舅父查办，他舅父逃去，就把一个库书让过他，转眼三年，已自不同。娘子却把一篇书读到老来，岂不好笑?”三娘道:“原来这样，但不知这个库书有怎么好处?”刘婆道:“老身听人说，海关里有两个册房，填注出进的款项，一个是做真册的，一个是做假册的。真册的自然是海关大臣和库书知见；假册的就拿来虚报皇上。看来一个天字第一号优缺的海关，都要凭着库书舞弄。年中进项，准由库书经手，就是一二百万，任他拿来拿去，不是放人生息，即挪移经商买卖，海关大员却不敢多管。还有一宗要紧的，每年海关兑金进京，那库书就预早抬高金价，或串同几家大大的金铺子，瞒却价钱，加高一两换不等。因此这一缘故，那库书年中进项，不下二十万两银子。再上几年，怕王公还赛他不过。三娘试想，这个门户，可不是一头好亲事吗?”……(文中的张制台指张之洞。)

某君文中说："这虽是小说家言"，但确是事实，周老十做库书一年有二十万进项，二十年间弄个数百万，那是大有可能的。清末广东官场有谚语云："香山顺德睡十万，南海坐十万，番禺走十万。"此语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前后还是灵验的。睡十万，犹言县官不理事，睡觉过日，每年也有"天公地道"的入息十万元。坐十万，言坐而不动也有十万进款。走十万，那就苦了大老爷，要去奔走一下才能弄到手了。一个县已有这样的大好处，何况一个偌大的粤海关呢。

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内，严办南海知县裴景福也是一件大新闻。裴景福见事急，便溜去澳门，清廷交涉了三个多月，才将他引渡回国，充军到新疆。周老十实在比裴景福幸运得多，他不致以贪污罪名被引渡回国受刑，大概是远避到暹罗，隐姓埋名起来，没有人知道，过了六七年，清朝亡了，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回国以富翁姿态出现了。（裴景福在新疆充军的时期有六年之久，遇赦入关，算是幸事。一九一四年，他还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厅长，一九二六年才逝世，周老十也活到差不多八十岁才寿终正寝。一九三二年，香港有几个年老多金的人，组织一个"九老团"，要七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周老十时年七十七，也是团员之一。他何时逝世，俟考。）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

广和居诗话

广和居是三十年前北京一家著名有文艺气氛的南式馆子。它虽然是小馆子，但有大馆子的好处，请起客来二三十人也可以容纳，不过人们都因为它是小馆子才欢喜它。小馆子的好处是：第一、它不做整桌的酒席，但烹调起来火候特别到家，味道特别隽永；第二、小馆子有比较精雅的房间，宜于与三二知己促膝清谈；第三、小馆子点菜丰俭由人，随便要两三样菜都可以。北京的小馆子很多，但近百年享盛名直到今日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者，无如广和居了，诗人词客歌咏广和居的篇章也非常之多，可见在文人眼中广和居是很有点地位的。

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第四分第十一节《茶饭》中有说到广和居，他这样写道：

> 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菜）来。在胡同口外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碗实在是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

这是周先生笔下的广和居印象。广和居外卖的价廉菜色，自然用粗碗装着，即使打破了也不可惜。他说的李越缦等人和"潘

鱼”、“砂锅豆腐”等，也可以补充一些。李越缦就是周先生的乡先辈李慈铭，“等人”两字包含甚广，应该包括周先生的祖父福清（《鲁迅的故家》所称的介孚公）及王继香等人在内。“潘鱼”指潘炳年创造的烹鱼法（潘字耀如，福建长乐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四川夔州知府，与周福清为同年进士），人们就叫这种鱼为“潘鱼”。广和居的砂锅豆腐并不算是珍品，“江豆腐”才是名贵菜，大概周先生记错了。“江豆腐”是安徽人江澍畇（原籍江西弋阳，字韵涛，光绪三年丁丑翰林，官至山东武定府知府，死于任上。江亢虎是他的孙辈）所创造的烹制法。广和居烹调的南方菜固然是看家本领，但最难得的是许多名人都教他们烹某一种菜，做出之后，风行一时，别的馆子也模仿起来，于是广和居便成为一家南北共赏的馆子了。

说到广和居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它至少曾经和道、咸、同、光、宣五朝的人打过交道，一直到民国十九、二十年（公元一九三〇、三一年）之间才关门的。和它打交道的人，有不少是历史上的名人，例如何绍基、李慈铭、翁同龢、陈宝琛、徐世昌、汪荣宝等。李慈铭的日记，常常记每节付还广和居酒帐若干。北京的小馆子很放心赊帐给客人，因为清朝的制度，部曹与翰林官皆无薪俸，只有禄米，但他们不得不应酬，这种小馆子可以欠帐的，到过节才还，节还不出，到年底还也无不可。甚至不还也无所谓，因为这班老爷迟早总要外放的（部曹外放知县或知府，翰林放主考或知府），一声外放，断无不还债之理（外放自然有人放债给穷京官动身，借新债，还旧债，赚到钱后才清还）。而且越不索债，生意就越好，越推越广，生意得到宣传，获利就更多了。

广和居开设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这一带叫做“宣南”（宣

武门在南，故有此称），为北京二百年来人文荟萃之地，到一九二九年改北京为北平，市面繁荣，一落千丈，宣南顿形冷落，广和居大受影响，开设恰值百年，也不得不关门了。我到北京时，广和居已歇业数年，而广和居一个厨子在西长安街开设的广和饭庄正在营业鼎盛，到一九三四年忽然失败，老板欠帐太多，自缢身死。瞿兑之先生曾访问过广和居的掌柜郭君，郭君出示一张"倒字"（即招盘的文字）给他看，瞿先生记在《申报月刊》内，今录如下：

> 道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立倒字人盛连英，今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开设隆盛轩酒铺，门面平房二间一处，因无力成作，情愿倒与申广泰开设广和居生理，言明出备倒价京平足银四十六两正……

道光十一年是公元一八三一年，既然是十月初二日顶给申广泰，那末，广和居之开设也许就在这一年，最迟不会过一八三二年的。股东大多数是申姓，店中的佣工也按股分息。以厨子孙积岫一人为例，据载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起身股一成四厘五，若赚钱少，按一百五十千，不为长支，工资六千。到同治五年，分得二十三千四百零四文，六年分得三十千九百零五文。可见自孙厨入股后，生意日见兴盛。

广和居的名菜，皆以创造者的姓冠于其上，例如陶凫芗善制清蒸瑶柱肚块白菜，这一味就叫"陶菜"，这是道光末年的事了（张之洞《广雅堂诗集》有"食陶菜"诗云："都官留卿为嘉宾，作脍传方洗洛尘。今日街南询柳嫂，只缘曾识旧京人。"自注云："陶凫芗宗伯以西湖五柳居烹鱼法授酒家，名曰陶菜。"之洞原稿手迹，

“酒家”之下有“广和居”三字，后又涂抹去之，尚能清楚见其字形也。按：陶梁字宁求，号凫芗，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翰林，为道光朝风雅大官）。咸丰年间清廷设外交机关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广和居的客人发明一种猪肉与什菜煮为羹，名叫“总理”（若在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八年，则“大不敬”矣！）。韩树存发明的肘子叫“韩肘”，花样多至不可胜数。甜菜中有糖蒸山药一品，尤为脍炙人口，这道菜本是北京常见的甜品，几乎每一酒家都会烹制，但制时的火候与手法，就有高低之不同，制得好的，有令人百食不厌之感。广和居制这道菜，享名百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有此名菜，所以它的楹联中有这一联云：“十斗酒依金谷罚；一盘春煮玉延肥。”款署“楚生”二字，不知出谁人之手。这一联的下比就是称赞广和居的糖蒸山药。原来淮山就是山药，山陕两湖一带地方叫作玉延，陆放翁诗有“久缘多病炼云液；近为长斋进玉延”，即指山药。后来此联也不知去向了。

在过去百年间，北京文人都喜欢在广和居宴集，讨论诗文，批评朝政，宣统二年庆亲王奕劻及其子载振被御史所劾，广和居有人题诗二首，牵涉到陈夔龙，这两首诗做得极幽默有趣，传诵至今不衰。诗云：“居然满汉一家人，乾女乾儿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解得？劝君何必问前因。”“一堂二代作乾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一时哄传，几有洛阳纸贵之概。有人说这是冒鹤亭（已于一九五九年八月逝世）作的，一说是粤人罗瘿公（一九二四年九月逝世），不知孰是。这两首诗是有来历的，宣统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劾庆亲王父子，并涉及直隶总督陈夔龙、

安徽巡抚朱家宝(云南宁州人，字金田，光绪十八年壬辰庶吉士，安徽光复时，任民军都督)。江春霖的参奏说陈夔龙是奕劻的干女婿，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是载振的干儿。摄政王降旨问"何所见而云然"。覆奏云："陈夔龙继妻为前军机大臣许庚身庶妹，称四姑奶，曾拜奕劻福晋为义母。许宅寓苏州娄门内，王府致馈，皆用黄匣，苏人言之凿凿。夔龙赴川督任，妻畏道难，逗留汉口，旋调两湖，实奕劻力。朱纶拜载振为义父，系由袁世凯引进。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朱纶曾到其父吉抚(按：朱家宝在光绪三十三年以江苏布政使署理吉林巡抚，下一年实授，数月后即调安徽巡抚)署内，购备貂褂人参，珍珠补服等件送礼。朱家宝每于大庭广众中夸子之能，不以此事为讳，现犹不时往来邸第，难掩众人耳目。"旋于正月十六日奉旨，斥以"毫无确据，恣意牵扯，莠言乱政，任意诋诬"，"实不称言官之职"，命回原衙门行走(江春霖字仲默，号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甲午进士，授检讨，转江南道监察御史。命回原衙门行走，是将他降职，仍回到他原日的翰林院做检讨官)。江春霖此举博得很多人同情，他辞官归里时，饯别送行者数千人。诗中所谓"江令归来有旧衔"，即指此事。"本来云贵是乡亲"，朱家宝是云南人，陈夔龙贵州贵阳人也。

上面是广和居题壁谐诗的故事。至于写广和居历史故事的诗，就更多了，我现在只选录三两家于此。首先录夏孙桐(江阴人，字闰枝，号悔庵，工词，朱古微填词受他影响，一九四一年逝世，年八十六)的广和居感旧诗，诗中的括号内注语，是原文。诗云：

城南雅集忆承平，近局时时陋巷迎。酒肆未随朝市改，梦华

元老活东京。（近年酒楼歌场多非其旧，其不改旧风者仅一二家耳。）

听雨楼东萧寺北，蜗庐肇自道光年。公卿小巷常停辙，也作贞元轶事传。（其对宇为严氏东楼旧址，南与伏魔寺邻，原为隆盛轩酒铺，道光十一年始改今名，仅门屋一间，后屡充拓，僻在城西，市侩热客所不至，惟文人乐就之，朝贵耽风雅者亦时莅止。光绪中，松禅协揆每出城访书画，辄过饮，抱冰相国自武昌入觐，犹时携客谈艺。）

阅世青帘漾冷坊，名流几辈醉垆旁。东洲诗老留嘉话，酒债诸孙尚未偿。（道光以来，名士文酒之会，接迹于此。何子贞先生居巷南，直以为外庖，诗孙观察尝与论四世之交，言旧债上溯六七十年，亦不相计论矣。）

不将珍错竞肥甘，春韭秋菘味自醰。肉号东坡鱼宋嫂，食单掌故补宣南。（烹炙多传自南士，或标其姓氏……昔陶凫芗侍郎有清蒸白菜瑶柱肚块，号曰“陶菜”，不始于广和居，今独留遗制，他家皆绝响矣。又烹鱼法最多，皆佳。五柳鱼即宋嫂制法。）

画壁旗亭结习存，赵行秦草各专门。周髯竟欲移樽避，抹杀颜家屋漏痕。（壁上多赵尧生、秦宥横所书屏联，秦书尤多，周少朴前辈素与持论不合，每觅座必择室无秦书者，文人结习，亦可留一谈柄。）

四十年来万事非，闭关颂酒代餐薇。黄公垆下重经过，嵇阮徒悲旧侣稀。（余光绪丁亥始寓京，缪艺风柚岑、余寿平、徐芷帆养吾、刘式甫皆居相近，无三日不会于此。庚子后秦宥横、王病山、李亦元过从较密，沧桑之后，惟余与宥横复来，今宥横墓已宿草，王书衡、章曼仙、邵伯䌹诸君犹偶然

作夜谈，每话昔游，慨叹不已。）

诗注中的何诗孙，名维朴，工书画，晚年在上海白克路卖艺为活，一九二二年五月廿六日逝世，年八十一岁。赵尧生名熙，四川人，工书，以诗名，一九四八年逝世，年八十一。周树模字少朴，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五年已丑庶吉士，尝任黑龙江巡抚。秦树声字宥横，河南固始人，光绪十二年丙戌进士，工书，辛亥革命时，方任广东提学使。王病山、李亦元逝世已久，邵伯絅名章，杭州人，工吟咏，善章草，光绪廿九年癸卯翰林，一九五三年才死的。

此外还有两首诗可以一提的。郑沅（字叔进，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年甲午探花，入民国任总统府秘书）一首云：

历历清游似眼前，黄公垆下太凄然。高阳徒侣今何在，难忘坏斑碧血年。（往时京朝官多在城南，每有小集，辄至广和居，三十年来知旧零落，追思昔游，何可复得。小诗意指戊戌之杨叔峤、谭复生二君，及庚子之刘葆真前辈，皆曾与余同饮此肆者也。）

王式通（字书衡，号志盦，山西汾阳人，光绪廿四年戊戌进士，民国时代袁世凯的红员也）一诗云：

食单品格比新城，三世能知有定评。今日京华艰粥饭，霞川枉重酒家名。（会稽李越缦先生精食馔，曾见其与乡人短札，谓广和居菜如渔洋诗，非北人品格。）

辛亥以后，广和居生意还很兴旺，文人墨客都喜欢假此宴集，广和居三字见于诗人笔下者，尤不胜枚举。到歇业后，它的厨子在西长安街(是一条旺盛的大马路，比北半截胡同地点好得多)开设广和饭庄，但已经不能号召了。民国廿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年)，汪荣宝和曹经沅邀请陈宝琛往广和饭庄饮宴，宝琛不胜感慨，作七古一首。诗题是:《衮甫纕蘅正月十九日招集西长安街广和饭庄，广和居旧庖也。》诗云:

元宵既过庙市收，燕九空巷为郊游。诗人渊居念气类，广坐设食勤命俦。酒家逐时有代谢，风味依旧宣南留。潘鱼江豉虽晚出，例以陶菜美可羞。曩时何翁接衡宇，诸孙捧杖勤相睐。(予初居南半截胡同，与子愚先生斜对门，诗孙时为中书舍人。自后三徙，皆近广和居。)冷官遣闲但文酒，入林朋尽嵇阮流。再来孤星已向曙，垆下岁纪周复周，子遗樊(樊山)郭(匏庵)亦舍去，忍更扶路吟山丘。使君新归主风雅，喜挈曹邺传觥筹。陵迁谷变况细琐，一醉倘可忘千忧。诗肠瘦枯讵胜酒，幸君举白毋吾浮。

宝琛是溥仪的师傅，他写此诗时，溥仪已被日人劫出关外，快组织"满洲国"了。曹经沅是宝琛的诗弟子，汪荣宝于一九三一年卸驻日公使归国的，一九三三年七月死于北京。曹经沅于抗战结束后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也就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丧门九客歌》考

五十年前，广州一家报纸刊载无名氏所作的《丧门九客歌》，歌辞轻松滑稽，把当时广州一些富豪着实幽默了一下。这一首歌立即传诵五羊城，接着香港的报纸首先转载，北方以及南洋各报，也纷纷予以发表。今天七十岁以上的文化人，还有不少记得这个歌名，但歌辞就未必完全记得了。我久闻此歌，未知其详，老报人劳纬孟先生前曾对我谈及，他也只记得三四句。刘筱云先生也记得六七句，两位老人所记得的，合起来也不过十多句，仍然不全，但他们却将这首歌的故事对我说得很详细。（劳先生是广州、香港的报界前辈，一九五八年死于香港，年八十四。刘先生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香港谢世，享年八十。两君对于广州、香港的文化界关系极深。）

后来我偶然在旧书摊买到一部《艺苑丛话》，在卷七里面载有此歌，可惜歌辞及小注，有两处用框子来代替了，使人不知其详。这时候，劳先生已逝世，我就拿去请教刘先生，他的记忆力颇强，一读全文后，凡有空白的地方他都记起来了。我连忙记录在纸上。又经过再三查考，参以所知，对《丧门九客歌》的了解就比较全面了。（按《艺苑丛话》十六卷，是上海六艺书局于清宣统三年辛亥连史纸石印，分装四册，印刷极精。这家书局是杭州人陈立炎开设的，局址在交通路。一九一四、一五年间，因购入宁波天一阁被盗的书，为天一阁主人在上海控告于司法机关，赔偿

损失结案。在打官司期中停业。据此书编者陈佚君所说："其稿半属亡友南亭所贻》，所谓南亭，系指小说家南亭亭长李伯元。今查大东书局出版的《南亭四话》一书，也载有此歌，也有空框的地方，大概是当日李伯元掇拾各地报纸所载的有趣文字，刊于报上，他死后，书贾假托他的名义，印成这两部书的。）

现在我先将《丧门九客歌》全文及其原注录出，再将其本事加以说明。歌前有小序云：

某传胪新丧父，待吊客分三等，一等得食燕窝羹，二等啖饼饵，三等则枵腹从事矣。有为《丧门九客歌》以记之者，歌曰：

安定公子何堂堂，平揖公卿与侯王，风流文采群相望，素车莅止奠壶浆，屈之下座殊荒唐（梁姓）。

广文先生姓氏芳，观风八桂新宪纲，乃与而翁上下床，何以主者充官场，有目不识道台黄（黄姓）。

邓公开学兼恳荒，声名风动长沙张。城西富室中酒狂，京朝先达多雁行，胡为相将来趋跄，下侪僧等心转伤（邓姓、区姓）。

□□记者莫大郎，珍珠点缀两颊旁，整冠欲往还彷徨，险些落在水手房（莫姓。水手房则三等也）。

亦有恩洲观察梁，包揽接载三等舱，偶然仮顿经游廊，脚靴手版殊仓皇（梁姓）。易牙子期声价昂，集枯集菀两迴翔，倏辞下界登上方，际遇无乃非寻常（易姓、钟姓初二等，后知为翰林，倏转为一等）。

□□□□潘□裳，翎顶赫赫神飞扬，忽闻云板一声铛，自觉非绅亦非商，乃与华工相颉颃，抱头鼠窜态跄踉，急掣电铃

通讯忙，诸公慎勿往吊丧(番姓)。

第一个梁姓所谓“安定公子”，指番禺人梁庆桂。因为梁姓的郡望出安定。《路史》说：“平王子唐封南梁，安定梁氏出此。”旧日的士大夫对于郡望很有研究，例如一望“荥阳”二字，就知郑姓，“江夏”二字就知姓黄，“琅琊”二字是姓王。现在的人对此已不感兴趣，也没有人去考究了，所以要解释一下。庆桂字小山，以举人捐内阁侍读，他的父亲肇煌(字檀圃)是咸丰三年癸丑进士，入翰林，授职编修，官至江宁布政使。祖父同新，字应辰，道光十六年丙申进士，入翰林，授职编修，官至江宁布政使。祖父同新，字应辰，道光十六年丙申进士，入翰林，授职编修，官至顺天府府尹。庆桂之子广照，以贡生为小京官，晚年居香港，以教书为活，前后十馀年之久，一九四九年前后才逝世。梁家父祖皆为翰林，书香世代，可说是一门贵盛。

第二个弔客姓黄，所谓“道台黄”乃黄诏平，字小山。

第三个邓姓弔客名邓家让，字叔恭，光绪廿三年丁酉举人，是二十年前广东教育界名流金曾澄的妻弟，金氏在广东政教两界有元老之称，历任前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学生反对，未到任)、广东教育厅长等职。金氏在位时，邓家让也跟着得意。

第四个区姓弔客是区赞寿，字梦屋，也是光绪丁酉举人，歌中的“声名夙动长沙张”，言其以文才受知于广东学政张百熙尚书也。(张氏于光绪廿三四年任广东学政，以曾咨送康有为应经济特科获咎。)

第五个弔客“莫姓水手房”，歌中以“□□记者莫大郎”称之。这位莫大郎最有趣，他的真名叫莫任衡，字伯洢，东莞人，因为他有一脸麻皮，所以广州人替他起个绰号叫“豆皮莫”。他是东莞人，光绪廿三年丁酉科拔贡，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在广州创办

《羊城报》，他的从弟莫天一为广东近五十年间著名的藏书家，少年时也在《羊城报》当编辑。《羊城报》属于君主立宪派，常与民主派报纸笔战，黎湛枝也给《羊城报》写些文字，但不常到报社。

第六个弔客也是姓梁，名梁雨生，番禺人，曾做过京官，捐有道台衔。歌中《偶然伋顿经游廊”的“伋顿”，乃英文Captain（船长）的译音。用“伋顿”二字，以喻水手遇到船长仓皇失措，因为水手没有不怕船长的。

第七个易姓弔客名易学清，字兰池，鹤山人，以进士点主事，任广东咨议局正议长，羊城书院院长。

第八个钟姓弔客名锡璜，字彤阶，号仲珏，南海人，光绪廿四年戊戌补行殿试，入翰林，授职编修。他是广州富户，有“当铺大王”之称。歌中小注：“易姓、钟姓初二等，后知为翰林，倏转为一等。”这一注也应予以注释，易学清只是进士，不是翰林，但作者说他是翰林，则从俗例以进士点主事亦称“翰林”也。

第九个弔客姓潘，歌中的“□□□□”原文是“庸恶陋劣潘佩裳”，报上不著其名以框代之，大概是恐怕引起毁谤官司之故。说他“非绅非商”也是有根据的。佩裳是广州西关富家子弟，平时最喜欢充官场，多与政界人物来往，家中养了十几个姨太太，儿女三十馀人，子女既多，做爸爸的很容易就记不清他们叫什么名字，有时在路上父子相遇，儿子认得父亲，但父亲却不识儿子，久已传为广州笑话。佩裳交游极广，应酬亦繁，在羊城有大名流之称，当日广州有一家务闲居俱乐部（设于宝顺大街近谷埠之处，其时西堤大马路尚未筑成也），为官场行乐之地，佩裳几于每日必到，与官僚酬酢。至于官绅人家有红白事，更是少不了他的。歌中的“急擊电铃通讯忙”就是说他到黎家行弔，见待客共分三等，连忙打电话向报馆报告，请往弔者有所警惕也。

本事注释之后，全歌读起来就觉得趣致横生，真可说是羊城文坛掌故了。但还有些“馀波”可说一下的。黎湛枝的业师萧炜基（字寅廷，举人出身，有文名），对黎很是看顾，黎家贫寒，问字时，萧老师常留他在家中吃饭。谣传萧炜基往弔，黎湛枝竟然以三等之礼施之于老师，因此报纸载有一诗诮之云：“头等官厅二等餐，官分顶戴别红蓝。当年饔飧先生馔，今日还须列第三！”黎见诗，立即前往师门负荆请罪。这件事也是无稽之谈，因为有了此歌，似乎馀兴未尽，好事文人就一时兴到写出来以为谈笑罢了。刘筱云先生与萧炜基为莫逆交，这首诗是他念给我听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

从"食酒"谈到鼎釜之类

潮州人叫喝酒做"食酒"，外地人听了一定会觉得奇怪，酒怎能食呢？潮州人叫喝茶也叫"食茶"，如果"考古"一番，食酒正是雅到不能再雅，然而又极通俗之至也。梁晋竹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有《食酒》一条云：

> 有阘阘子作日记册云，某日买烧酒四两食之。人遂传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国传曰："定国食酒数石不乱。"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则酒之言食，其来有自。

食酒一辞，可说是其来久矣。潮州人一定要叫饮酒为食酒的，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如果说食酒不通，非改叫饮酒喝酒不可，我敢保证一班人必以为太不通俗，但在古书中，食酒却是雅辞也。又，潮州人叫买酒作"沽酒"，也是雅到可以，香港人只叫买酒就算了，不讲究是否与古书有关。

因此我想到文章的通俗与不通俗问题。我国的文字太复杂艰深，非改良不可，改为多用口头语及通俗的字句，是目前一急务，不过我国地方太大，方言太多，例如"食酒""沽酒"在甲地是通俗的方言，但在乙地却又太不通俗而甚至古雅了。这些都是文字学家要去解决的问题，我对于这一行完全不懂，不敢说一句，

现在且说一些古雅与通俗的趣事。

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时，有一晚和几个朋友在高梦旦先生家中吃饭，饭后谈到商务印书馆的一些趣事。高先生不知怎的忽然谈到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便讲一个笑话给我们听。他说，商务在教科书时代，专致力于编印教科书，所以设立一个教科书委员会之类的会议，凡着手编辑一部教科书，就召集编辑开会，讨论一下怎样着手，内容是什么，由谁负责种种问题。某次开会讨论所编的初级小学国文课本，其中有一课由蒋维乔先生编写的（蒋先生在三年前才逝世，九十多岁了。他是研究静坐的，近六七年还有上海教人静坐，重新写过一部静坐的书）。

梦旦先生见文稿中有个"釜"字，就以为太过古雅，恐怕初小学生不懂得，不如改为通俗而人人都懂的"鼎"字。他将这个意思对蒋先生说了。蒋先生大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鼎字虽然是古代烧食物的食具，但太过不通俗，小学生一定不懂，还是用釜字通俗些。梦旦先生不服，对他说："鼎字是日常所用的字，通俗非常，你怎能说它是古字，你的釜字才是古呢。"蒋先生闻言有些不高兴，反驳道："鼎字怎见得是日常的通俗字？"梦旦先生也带些愠意说："哎哟，怎不是通俗字，小孩子哪一个不知道鼎是什样东西？"于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吵到面红面绿，险些儿拍案而起。忽然梦旦先生说出一句："我们福建人叫烧饭烧菜的镬做鼎，怎见得不通俗？"蒋先生听他这样一说才有点愕然，再详细谈一下，才知道是误会，双方打个哈哈就算了。

福建人和潮州人都叫镬做鼎的，广州人的"镬仔"，潮人叫"鼎仔"，镬字在潮州人口头中是不易读出它的音的，釜字还可以。但读书人又不同了，他们读惯古书，知其音，而且还会用其字。据《辞海》说："汉书刑法志注：'鼎大而无足曰镬'。"那末，镬

字也是古香古色的与鼎为“同胞”者也。

我在八九岁以前住广州香港，后来回潮州读书，听见家人叫“鼎仔”，不知鼎是何物，有次听见人叫“鼎仔”，婢女递上一个来，原来是镬，我才觉得好笑，明明是镬，何以叫鼎。过了几年，读书稍多，才知古人叫食器做鼎，与镬同用。由此看来，在南方，鼎与镬都是由雅而通俗化了的，北方则以釜及锅为通俗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琉璃厂书铺参案

近日读王冶秋先生著《琉璃厂史话》(一九六三年二月出版)，其中第五十四页，引孙殿起的《书肆三记》所述宝名斋老板李钟铭一案，以致工部尚书贺寿慈被参降职的经过颇详。孙著我未见过，但我觉得他们两人所记的尚可补充，兹就所知记之于此。王冶秋先生所引孙书，系已将文言文改作语体，并加有他的意见，今照录出：

> 宝名斋是同治年间山西文水县人李炳勋(字崇山)开设的书铺，是当时书铺中最大的一个；有九间门面，有："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的谚语。崇山交结大官，如工部尚书贺寿慈等人。……到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到宝名斋买书，据说要架子上高处某书，铺伙不愿取下，张也怀恨在心，于是借故奏了一本，倒不是如孙殿起所记说他"私占官街、窑产"，而是说他招摇撞骗，甚至可以卖官鬻爵，包揽户部报销等事，最足以打动皇帝的是说他"戴五品官服"，"出入景运门"，景运门是宫内西华门进来到太和门的门，这是禁中，一个普通人如何能进?皇帝看来，这种事情太过危险了，于是马上就准奏查办。把他驱逐出境了。

王先生这一段记事之后，又引张佩纶《涧于集》所载光绪五年

二月廿五日附片所奏，今先录如下：

> 臣闻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或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带用五品冠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而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烜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以致别滋事端。……

张佩纶的附片说李钟铭在职官引见及验放之时，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因为景运门内外这一区域，凡是职官都可以出入的，但王先生引孙殿起原文改写之后，将景运门写成是禁中之地，还说："景运门是宫内西华门进来到太和门的门，这是禁中"，这是错误的。景运门属于外廷（过乾清门以内的地方才是禁中），其门在保和殿后左侧，与国史馆，值班房，内左门相近，其右为内右门，再右为军机处，其右为隆宗门。景运门在左，隆宗门在右，中为保和殿，官员如果被引见至乾清宫，多由景运门或隆宗门分由内左门或内右门而入乾清门的。景运门与西华门无关，西华门在午门内太和门中间，距东边的景运门远得很呢。如果说由东华门入，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而入景运门，那就对了。因未见孙殿起原书，不知是孙书误记，抑是王先生改写时

弄错。凡是职官皆可以出入景运门，景运门既非在禁中，则皇帝亦不必认为官员出入景运门有危险了，这是作者的误会，假如作者弄清了景运门的所在地，就不致如此。

清廷随下上谕，其中有一句："该侍讲所称该商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一节。李钟铭与贺寿慈究竟有无戚谊，著该尚书明白回奏。"又"著都察院堂官将该商人传案，逐款讯明，据实具奏。"

廿八日，又有御史李蕃奏："商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又名李炳勋，书铺住宅，侵占官地，并将栖止贫民义院霸占造房，请饬严讯。"清廷亦于同日下上谕："著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见"光绪朝东华录》）读这一记载，孙殿起说李钟铭"私占官衙、窑产"，不尽全虚，王先生于此未曾深考。

贺寿慈奉旨后，于二月廿七日奏云：与李钟铭没有关系。《光绪朝东华录》载是日上谕说：

> 贺寿慈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据称，该尚书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等语。著都察院堂官懔遵前旨，将李钟铭传案，确切查讯，据实具奏。

这一"明白"回奏，贺寿慈推得一干二净，说他与李春山"并无真正戚谊"。单看《光绪朝东华录》是不明白他所说"真正戚谊"之意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月廿八日，录此上谕，于文末附注云：

> 外间皆云贺寿慈之妾李钟铭所赠，今立以为夫人，而钟铭之

妻，贺之婢也，今亦冒五品封。贺日往来其家，呼之为女，而钟铭呼贺为丈人，此回奏所云“非真正戚谊”，乃假邪戚谊之供状也。（按：李慈铭最喜月旦人物，其对此案，只有“假邪戚谊”之讥，并无口诛笔伐，盖李与贺前此亦有一度香火因缘也。《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云：“乞大理卿贺寿慈书家慈六十寿联，取其姓名吉祥也。”）

贺寿慈这样回奏后，立即引起言官不满，三月初四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黄体芳，就有“大臣覆奏欺罔，据实直陈”一摺，是日上谕云：

（黄体芳一摺）据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与商人李钟铭毫无瓜葛，惟李钟铭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停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覆奏之语，显然欺蒙等语。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岂容稍有隐匿，自取愆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著该尚书据实覆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著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钟铭严切讯究。

这一来贺寿慈才着了慌，初六日立即据实覆奏，不认有亲戚关系，是日所发的上谕有云：

贺寿慈奏：遵旨据实覆奏，并自请治罪一摺。据称该尚书曾向李钟铭所开宝名斋书店购买书籍，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去冬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辒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

书等语。贺寿慈此次所奏各节，何以前次回奏时未经陈明，且恭演龙輴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贺寿慈着先行交部议处！（按龙輴车系天子殡车，此时正准备安葬同治帝后。）

初十日，吏部拟贺寿慈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即由从一品的尚书，降为正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本是都察院左都御史，于光绪三年九月升工部尚书，现在降回原衔门，比原有的都御史低了三级。

至于李钟铭所得的刑罚，可于光绪五年闰三月三十日的上谕见之。《越缦堂日记》于是日钞录上谕后，加以评论，现在摘钞如下：

上谕：都察院、刑部将李钟铭讯明具奏，此案李钟铭即李炳勋，由商人捐纳监生，布政司经历(按：系从六品官)，考取誊录，既得议叙，仍在市井营生，夤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又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实属不安本分，李钟铭即李炳勋，业已革去职衔，著照所拟杖六十，徒一年，俟年满后解回山西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闻李炳勋之罪，死不足赎，其私和命案，贿卖官爵，俱凿凿有据，自惇邸以下，大学士宝鋆、载龄、尚书毛昶熙、万青藜、李鸿藻等皆与之亲昵，而鸿藻尤狎之，不止贺寿慈一人也。满洲大僚无不纳交者，其造宅也，挟诸贵之势，逼死其邻之老漆工，人无不知之。凡奏参查办之巨案，多为之夤缘

消弭，居间取贿，外省大吏入京，无不以重金委之。张佩纶之疏下，朝士过慰之者，车数百辆，厂市为之塞道。今之定谳，投鼠忌器，避重就轻，所入爰书者，皆市井本分之事，不特舍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也。

李钟铭是判徒刑一年，杖六十，递解回籍的，并不如王先生书中所说"驱逐出境"这样轻描淡写的。我们读李慈铭附注之语，知道李钟铭是个专门替官场拉皮条的人，他之开设书铺，似乎意在掩护，正业还是替人打点。例如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的上谕，就有一段关于李钟铭活动的事，今摘录于此：

前据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云南东川府知府孔昭钤被戕一案，总兵杨玉科以重金交通京官为之游说，得免弹奏等情，降旨令何金寿将该总兵交通者何人，指实覆奏。兹据何金寿奏称：杨玉科以重资开设云丰泰银号，该总兵以边省之人，远来京城安一汇号，又以数万金交商人李钟铭书铺内，并与李钟铭结交拜盟，往来亲昵。该总兵初次入都暂住旬日，即与该商人密交。又与礼部主事高蔚光认作亲戚，竭力应酬，恣其挥霍，委曲结纳，皆重金交通之明证等语。著刑部将高蔚光，李钟铭等传讯。……

刑部传讯这两人，但这时候李钟铭已在狱中，他就绝口不认有这件事了。李钟铭既已服刑，而贺寿慈虽已降官，但言官对他仍居高位，甚为不满，于是有六月初九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字竹坡，宗室，郑孝胥、林纾、陈衍皆为其所取中的举人）所奏"获咎大员，声名甚劣，请旨开缺另简"一摺。是日上谕云：

贺寿慈前因与商人李钟铭往来一案，降三级调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缺，吏部开列在前，是以补授，该副都御史既未孚众望，年力亦究就衰，著即行开缺！至所奏贺寿慈复用，系枢臣之意。贺寿慈回奏不实，则为欺罔，恭演龙蟠车顺道购书则为大不敬，枢臣拟旨不曰"欺罔"，不曰"大不敬"，而浑其词曰"殊属非是"。及都察院刑部定案，竟免置议等语。……都察院会同刑部覆奏此案，声明李钟铭与贺寿慈交易往来，讯无干预公事情弊，应否免议，请旨定夺。当以贺寿慈业经降调，降旨免其再行置议，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也。惟机务甚烦，关系至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勤慎，毋得稍有疏忽！

宝廷此摺立言得体，于是朝命贺寿慈开缺，原奏开头数语有"贺寿慈补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闻命之下，朝野骇然。夫朝廷用人，每曰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词锋犀利，政府就不得不令贺寿慈开缺了。上谕末后数语，戒饬军机大臣承写谕旨留心，就是责怪他们用"殊属非是"而不用"欺罔"、"大不敬"，此即李慈铭所谓"避重就轻"也。

贺寿慈原名于逵，改名霖若，字云甫，湖北江夏人。《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五年二月廿三日云："贺云甫尚书今年八十，闻尚健甚，数年前尚举一子，亦人瑞也。"到光绪十八年贺始逝世，年已八十三矣。

这件案的详细情形大抵如此，在琉璃厂书铺中可说是一钜案，故详记其本末以谂读者。劾贺寿慈去官的宝廷，三年后以公毕回京，半途买妾，自请从重惩责。《越缦堂日记》述其事后，录

无名子嘲宝廷诗云："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臼；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义女句即指此事，可以说是此案的"馀波"。（相传此诗出自易哭庵手。）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小说中的诗人李士棻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九，引缺名笔记，说我佛山人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影托的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作者只列举晚清这几个名人以概其馀，这些名人大都是政界人物，至于艺术界的名人，吴沃尧也有写入小说里而未为缺名笔记的作者所提到的，譬如大名士李玉轩便是。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一回描写的那个上海洋场名士李玉轩，就是影射同治、光绪间的大诗人李士棻。士棻是四川忠州人，字芋仙，小说中“玉轩”两字与芋仙同音，所以作者就用这两字来影射他。《中国人名大辞典》李士棻条说他是“道光拔贡，博学工诗，同治初知彭泽县，移临川，政声卓著。去官后，贫不能归，流寓上海几二十年。光绪间卒。有天瘦阁诗草、天补楼行记。”(士棻的诗名《天瘦阁诗半》，非诗草。又其人流寓上海不过八九年，亦无二十年之久。)

芋仙本是李士棻的号，后来他又以悔馀道人、迂仙、天补道人、二爱仙人、童鸥居士等为别号。吴沃尧在小说中将李士棻写得很是卑鄙不堪，说他把一个七品县官丢了是因为名士狂态而致然，这是诬蔑李芋仙而极尽谴责小说的能事。芋仙是一个天真的

诗人，疏狂则有之，说他无赖，未免有点过分了。吴沃尧与李士棻也许不相识，吴氏到上海谋生后一二年，芋仙已死，当然和他没有什么仇怨，而在小说中把他写成这样下流，无非是作者拿他来代表当时上海的名士典型，予以谴责一番罢了。

书中第二十一回那个"我"，就是作书人的自称，作者写"我"带了家人到上海，住在旅馆，等候轮船往南京。"我"在旅馆忽闻有争吵打架之声，就走出房外看是什么事情。请看小说中的描写：

> 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个北京口音的攒着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道："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一面提起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道："我怕你了，我是个王八蛋！"北京口音的道："你应该还我钱么？"四川口音的道："应该应该！"北京口音的道："你敢欠我丝毫？"四川口音的道："不敢欠！不敢欠！回来就送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北京口音的冷笑道："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我看着你不过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那个"我"和北京口音的人请教起来，才知道他名叫王伯述，他们是有点亲戚关系的。于是作者就借王伯述的口骂那个四川名士李玉轩，从王伯述口中说出李玉轩那种狂态和丢了县官的故事。这一段描写很生动有趣。现摘录于此，再加以说明。

> 伯述道："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一个实缺知县，他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我道："他欠了世伯书价么？"

伯述道："可不是么？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藩台抚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么抚台也怕了他呢？"伯述道："说来话长，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乐意，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一直跑到花厅上去，此时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他也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不准吃烟？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这不是反了么！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对准藩台面前摔了过去，嘴里说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发了狂，犹如疯狗一般，在那里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也不等后任来交代，收拾了行李，即刻动身走了。"……

这是小说所描写李玉轩丢官的原因。芋仙是曾国藩的门下士，国藩很赏识他的诗，称他"时吟大句动乾坤"，可见其推许一斑。自曾国藩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在江西做知县也受人排挤了。（国藩为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死后，李宗羲继任，便不回护他了。）芋仙和江西藩司刘秉璋、巡抚刘坤一不睦，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刘坤一劾李芋仙"知县亏短库款

并肆闹官厅请革职拿问摺"云(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之九。):

……兹查有前署临川县事，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李士棻，前在临川县任内交代，据该管知府朱澄澜禀：据现任临川县知县汪以诚申报，李士棻任内经理各款钱粮，逐一查核，计亏短正什款银五千四百三十二两二钱一厘。……本年四月间，据李士棻之媳李周氏，因索回籍盘费起衅，前赴府县及藩司衙门，呈控夫弟李文琛私藏微存银两，复经藩司刘秉璋批饬抚州府，将李文琛发县押令完缴。乃李士棻及其子李文琛始终顽抗，延不清交，亦不与后任会算。八月二十九日晚，李士棻突至抚州府衙门，声称交代并无亏短，伊子在县患病沉重，坐索释放始去。复据朱澄澜禀经臣批饬克日指款揭报严参各在案。不意李士棻并不遵照定章在郡清理交代，复于八月二十九日晚潜回省城，定更时突至藩司衙门禀见。该司刘秉璋以该员交代亏短，理应在府完缴，且时已昏暮，未便接见。讵李士棻踵前在该府署故智，竟自闯入宅门，直至客厅，肆行喧闹。刘秉璋当传南昌府及南昌、新建二县来署，晓以体制，并亲出接见，面加训饬。乃李士棻狂妄如前，有似疯状，经该司饬令府县，将其押带赴县，听候参办。……臣查该员李士棻……胆大妄为，玩法已极，若不严行参办，何以重库款而肃官常！除饬查明该员寓所、任所资财，严密抄封，并飞咨四川督臣……将(该员)家产尽数查封备抵外，理合据实奏参。……

李芋仙之丢官是这样的。但写起小说来，这样未免太过平凡，小说家就要用生花之笔来渲染，将故事写得有趣，就不得不

写他将乌纱摔在上司脸上了。芋仙死后，黎庶昌给他所作的墓志铭，文后附有跋语，亦可见其为人，今摘录之如下：

光绪九年，余在日本，有传君道卒者。其言甚碻，遂撰此文寄哀。君本旷达士，不拘行检，正不必以公家言为之饰讳。……然君仕江西，实有善政可纪，当别叙述。文成逾年，始闻君尚存，因录附寄视，君喜出望外，以谓此等风谊，虽古人亦何多让，颇复商订字句，一皆从之。是年冬，余奉讳归里，犹见之沪上，抵家数月，而凶问至矣。君生于道光辛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乙酉年（即一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八月初七日，实年六十有五。上海县知县莫君祥芝（笔者案：书法家莫友芝之弟）经纪其丧。……配罗氏，子文琮，即松存，先没，文琛，即菊存，君卒三年，亦没。孙四：炘、炯、焯、熯。著述成者，有《天瘦阁诗半》六卷，续集曰：《天补楼行记》一卷。炘等以本年某月某日，葬君江西省城外西山，寓书来告，因自日本伐石谋转致豫章，使埋诸垅趾。光绪十四年五月，黎庶昌附记。”（他的诗集名甚怪，据其自述，近体诗多于古体，中间又多散失，故曰“诗半”。）

芋仙的诗，在同光间不愧一作家，吴沃尧的小说说他的诗有类猜谜，实不足信。吴沃尧说：

“他（玉轩）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在报上，有人恭维他是什么姜白石、李青莲，所以他越发狂了。”我道：“想来诗总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咏自来水

的一联道：‘灌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谜谜儿么？这个叫做姜白石李青莲，只怕姜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

这话说得太过刻薄，李芋仙的诗何致如此。但作者是写谴责小说的能手，他要暴露洋场才子的种种丑态，故以李士棻为其代表罢了。

李芋仙自江西罢官后，先在南昌住了几年，后来才移居上海，时与天南遁叟王韬等人唱和，他的诗常登在王韬主持的《申报》上。黄公度在旧金山做领事，读到他的诗，特从美国汇了一笔钱给他为买酒资（芋仙在北京眷优伶，在上海又眷名妓姚倩卿等人）。芋仙和黄公度绝不相识，忽然得一海外知己，作诗谢之云：

老名士有值钱时，惭愧虚声海外驰。叔度汪洋千顷量；谪仙烂漫百篇诗。

闲同遁叟餐香积；深感清流致酒资。世视故交行路等，谁知刘孔结新知。

芋仙的诗才甚优，但他的《天瘦阁诗半》却没有《人境庐诗草》那么著名，世人只知人境庐，知天瘦阁者极少，亦以芋仙名士潦倒，而眼界不如黄公度那么广阔之故。芋仙在江西很做过一番事业，如兴学济贫，尊贤息讼，皆黎庶昌所谓善政，在这一方面，他是不下于黄公度的。曾国藩复李芋仙的几封信，有赞他安民防弊，乐于闻过，可见他在江西任上不是一个怎样坏的官员（见新近出版的《曾国藩未刊信稿》），他之被二刘严劾去官，闻系因他

办理临川教案，与上司意见相左。他的诗注中有说：

予需次江西时，上游中有二人嫉予者，百方陷制。……及办临川教案，吃亏忍辱，终不自明，誉望日隆，上游阳许可，而阴借交代劾之。五年中，彼嫉予二人，声迹甚劣，乃亦被人先后劾罢，天道可知。

所谓“上游二人”，乃刘坤一、刘秉璋也。此虽片面之辞，但也可作为参考。

芋仙在沪时，贫穷潦倒，至于乞朋友为他出钱印诗集，印成不过几个月他就死了。姚倩卿见他沦落异乡，赠他一千元，劝他回四川，但他没有听从，终于客死上海。他的自甘潦倒，纯是旧日文人的一种名士作风。他因为自己是个老秀才，没有范仲淹那样为秀才扬眉吐气，因此做了一首诗，诗题《过上海县学宫》，写他牢骚之气，希望也有老秀才群而和之。诗写得很有风趣，今录于此。

门外无人乞福来，月逢朔望殿门开。行香踵例惟官府；饭水忘源是秀才。
庙祝醵牲趋若市；里魁箫鼓哄如雷。匆匆暂作循墙走，兀坐舆中笑几回。

诗登在《申报》，不久后，有笔名“琐蛞生”者，自言非秀才而深慕芋仙足当庄子大秀才之称，遥和一诗，今亦录出，以结束吾文。诗云：

楮帛纷纷请祷来，人情都望福门开。身能履正思文正；心更怜才似子才。

上善最宜方以水；高言不啻殷其雷。僧窗岑寂愁难破，日取名章读几回。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

《孽海花》所记的官场旧事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论述曾朴的《孽海花》时这样说：

> 孽海花以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载于《小说林》，称《历史小说》，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相传实常熟举人曾朴字孟璞者所为。……书于洪、傅（即洪钧与赛金花——引注）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诚如所传，则改称李莼客者实其师李慈铭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引注：越缦堂骈体文集四卷，系光绪廿三年所刻，去其死已四年。之撰乃孟朴之父，即经营常熟名园花石林者也），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

所评之语极允当。《孽海花》之美中不足，不能列为艺术水平高的作品，就是坏在"形容时复过当"，甚至连老师李慈铭也描写成一个狂妄下流的人，这是令人反感的。首先写《孽海花》的并非曾孟朴，一九二七年《孽海花》的改本，曾氏自言"这书造意的动机，并不是我，是爱自由者，他非别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

天翻，他发起这书，曾做过四五回……”此书首五卷十回，已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由小说林社出版了，后来《小说林》杂志于一九〇七年出版，才继续刊出，鲁迅先生所说“光绪三十三年”刊出，略有误。

续写《孽海花》比较好的还是张鸿的《续孽海花》，近日我从友人借来略读一过，觉得还是比不上曾朴所写的万一，这大概是文学才能所限。因为今年是庚子，六十年前那一个庚子，颇与《孽海花》有关，我重读这部小说，稍有所得，就写些人物故事的索隐，这里所谈的，是一个北京木厂的老板。

《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受辱”，是描写一个发了大财的库丁的趣事。清朝末年，捐官之滥，久已成为笑话，不过有钱人想捐个实缺的外官，最多只能捐到四品的道台为止，三品就多少钱都办不到，至于虚衔与顶戴则二三品也可以。西太后当政之初，入京走门路的人，只不过走王公大臣之门，还不敢直接向宫里着手，后来她不想利权旁溢，索性派李莲英经手。有一回她竟然和珍妃争放一个缺，被珍妃顶撞了几句，老太婆一时恼羞成怒，痛打了她一顿，打入冷宫。《孽海花》所说那个捐官的库丁余敏，是实有其人的，照书中所说，光绪帝知道余敏是库丁出身，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便在召见时捉弄他一下。这一段写得很是精彩。摘录如下：

(余敏)正在眼对着鼻子，静听上头问话，预备对付。谁知佛爷这回只问了几句照例的话，兜头倒问道：“你读过书没有？”那余大人出其不意，只得勉勉强强答道：“读过。”佛爷道：“你既读过书，那总会写字的了？”余大人怔了一怔，低低答应个“会”字。这当儿里，忽然御案上拍的掷下两件东西来。就听

佛爷吩咐道："把你自己的履历写上来。"余大人……顿时面白目瞪，拎了笔，铺了纸，俄延了好一会。只见他鼻尖上的汗珠儿一滴一滴的滚下来，却不见他纸头上一画一画的现出。足足挨了两三分钟光景，佛爷道："你既写不出汉字，就写国书也好。"可怜余大人自出娘胎没有见过字的面儿，拿着支笔，还仿佛外国人吃中国菜一把抓的捏着�儿，横竖不得劲儿，那里晓得什么汉字国书呢？这么着，佛爷就冷笑了两声，很严厉的喝道："下去罢！还当你的库丁去罢！"余大人正急得没洞可钻，得这一声，就爬着谢了恩，抱头鼠窜的逃了下来。……

这段文字，也许形容得有些过火之处，但还是很合情合理，书中说这件趣事是龚平尚书（暗射翁同龢）对钱唐卿（暗射汪鸣銮）说的。汪是曾孟朴的岳父，作者将这故事写入小说，大概是亲闻诸岳父的。据龚平对钱唐卿所说，余敏是走李莲英的门路的，而光绪帝居然胆敢不卖帐，拆散人家的买卖，所以下一次才有鲁伯阳一案（即珍妃经手的），所以报东门之役也。

余敏一事，发生于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四月，这时候光绪帝亲政已久，西太后对他没有事事干涉，还有权可以用人，不过军国大政还得请示，至于放个把道台、知府，他是有全权的。书中的余敏，是影射四川盐茶道玉铭，余敏与玉铭读音相同。是年四月初八日《光绪朝东华录》载：

谕：昨日（初七日）召见新授四川盐茶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著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四川盐茶道员缺，著张元普补授！

翁同龢是亲告汪鸣銮这个故事的(据《孽海花》所说)。这一年四月初八日翁同龢的日记有这样写着：

新放四川盐道玉铭，曾充库兵，开木厂，又与中官结连(案：中官即太监，大约与李莲英有关——引注)。中官遣令赴粤索钱，遂报捐道。中官殴之，乃忽有此除，物论哗然。今日奉旨召见，询问政事，未能谙悉，开缺以同知候选，放张元普。

日记只记玉铭不懂政事，没有记写履历的事，因为同龢为人谨慎，日记中不敢写得太过详细。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也有记玉铭这件事，相当有趣，可与《孽海花》并阅。它说：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至壬辰间(即光绪十七八年，公元一八九一、二年)，此后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弛纲弢，乳臭之子，汛扫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四川盐茶道玉铭者，都下木商，籍隶内务府，入资得同知衔者也。其谢恩召见时，上询汝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二字为木厂字号，记者忘之矣)。"上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作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入息，比木厂更多数倍耳。"上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汉文乎?"嗫嚅良久，始对曰："能。"上乃

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某人某族人"数字，字大如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者即玉铭二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上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

岳瑞所记大抵不谬，但没有说玉铭是库丁出身。他写玉铭对皇帝说做官的入息比做生意好，这恐怕是岳瑞想象之词，玉铭就算愚蠢到极点，他初次召见时，未必就敢于这样肆无忌惮的。这些话若出在《孽海花》就不足为奇，反而可以增加趣味性了。翁同龢日记说玉铭捐道班，这是对的，李岳瑞说他只捐个同知职衔，与事实及常情皆不符。凡是有钱的人谋放道台，没有不先花钱捐个道班，然后一放就是实缺，断没有悭吝至此而捐个正五品的同知职衔的。由同知职衔一放就是实缺道，实在没有这个道理。

玉铭的结局，据《春冰室野乘》说，他的道台做不成，仍回木厂做掌柜，因为承办醇亲王祠堂工程，吞没钜款，又串同太监盗窃醇王府的东西卖给外国人，事发后，清廷下令逮捕，玉铭逃入西山某寺，削发为僧。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

李涵秋和他的小说

在香港的旧书店中，偶然见到一部李涵秋著的小说《广陵潮》。这是我小时候喜欢读的小说之一。四十年前，这部小说曾风行大江南北，我闻它的大名始于一九二二年，到下一年七八月才设法买到一读，已是在作者逝世后数月的事了。我从旧书店回家后，立即找一九二三年的日记，一查提要，查出李涵秋死于五月十三日（阴历癸亥年三月廿八日），那是根据上海的《时报》扬州通信记下来的。

我在乡下读书那三年中，读上海出版的流行小说并不多，知道李涵秋的大名，还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二日大风灾死人十万之后。记得是九十月之间吧，我的侄儿伯昂有一天从汕头回来，带了六七份上海出版的《时报》，他说该报副刊《小时报》载有李涵秋的长篇小说《怪家庭》很有趣，从此我就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因为伯昂不将《时报》寄来，我就无从继续看下去了。下一年三四月间，我有一位名叫竹园的堂兄订有《时报》，我每隔三四日就着人到他的书斋景东别墅拿《小时报》来看，如是者又过了几个月，后来才向上海订了一份。

李涵秋死后，《怪家庭》没有刊完，听说后来也印了单行本。据说这部《怪家庭》以前在汉口的报纸登过的，到一九二二年刊于《小时报》才改名为《怪家庭》。李涵秋享盛名后，他的小说常是两个名的，例如在甲地用这个书名，在乙地又另用别一个书名，而

内容和作者的名则一样。大概在一九一二年到二二年间，李涵秋的小说很受读者欢迎，各地的报纸和书贾都争着向他要作品，他往往要在同一时期中写五六篇长篇小说，以应付市场。但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就和报馆当局约定一稿两用的方法。现在拿《广陵潮》来说，这部小说的前数集是辛亥以前李涵秋在汉口报界工作时写的，初名《过渡镜》。后来又在上海报纸刊出，改名《广陵潮》。至于他的不甚著名的小说如:《并头莲》、《双花记》、《瑶瑟夫人》等，则多在汉口甲报登后，又照用原名登于乙报，报馆当局和读者也不以为嫌。

一九二二年《时报》主人狄平子聘李涵秋主编《小时报》，他在上海过不惯洋场生活，数月之后，即回故乡扬州，专心写他的小说(他曾任两淮高等小学，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教员多年，到一九一九年前后才辞去教职)，《时报》当局为了尊重他，仍准他遥领主编之名，另指定一人代理他的工作。当日上海的报纸对于副刊很着重，必定请个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的人做主编才可以壮声势。李涵秋在上海主编《小时报》，世界书局的主人沈知方立刻动脑筋，请他主编一个旬刊，定名《快活》，李涵秋的一部社会小说《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在《快活》连载的，没有登完，他便去世了，似乎后来另有人为之续成，由世界书局印单行本出版。

李涵秋死后三个月，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特地出版了一期《李涵秋专号》以为纪念，封面题字出自袁克文之手，印刷极精。记得第一页印有袁克文手书挽联，句云:“呕出心肝长吉死;别成梼杌耐庵传。”又有涵秋的弟弟蓉漳所作的行述，并附死者遗物——眼镜、胡桃等的照片。过了不久，李涵秋的老友江都贡少芹(在汉口报界工作多年，后来在上海主编《小说新报》)也出版一册《李涵秋》，称他为“当代第一流小说名家”、“小说大王”，书中

又说张弧(北洋军阀时代的财政总长)曾评《广陵潮》一书，“叹为空前绝作。……论近代小说名家，许以涵秋为第一。”所下的评语，当然是肉麻得很的。

到底李涵秋的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怎样呢？据我看来，除《广陵潮》较好外，其它都写得并不好，单是这部书，就可以使作者在中国小说史中占一个小小的地位了。《广陵潮》是一部数十万言的大著，李涵秋在世时，一集一集的跟着出版，全书未完，到他死后，由程瞻庐为他草草续成若干回便算了事(似乎是由第八十一回起。到一九二四年八月二日，世界书局出《红玫瑰》周刊，程瞻庐又作《新广陵潮》，署款作“江都李涵秋残稿，吴门程瞻庐续撰”，约数十回，后亦印单本)。《广陵潮》里面的人物很多，记得是写清末民初扬州一个破落户少爷，和他的表妹淑仪相恋，但这个女子早已和一富家子订了婚的，后来那个富家子因革命而被枪毙，淑仪守寡，终未能与表兄成为眷属。这个故事是以悲剧收场的。李涵秋写此书时，颇能一气呵成，没些儿松懈，而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又描写得十分深刻，使读者对于书中那两个男女主角起了很大的同情心，说它不是文学作品，似乎不很公允。但全书的坏处就是因为要拉得长，所以处处都夹杂些无聊的描写，摭拾街巷趣事插入其中，因此这部书的文学价值不算很高，充其量只是流行的通俗小说中较好的一部罢了。

李涵秋的小说有很多缺点，他所描写的社会上种种情事，多不是他亲自体验得来，而是得自道听途说，甚至把古人所写的谐趣笑话故事，也改头换面写在书中。这是他的社会生活圈子太过狭隘之故。他写了二十年小说，自从《广陵潮》问世一举成名后，就一直躲在扬州，很少出门，所以他的见闻极狭，甚至在小说中有坐马车游虎丘的笑话。据贡少芹的《李涵秋》一书所说，李涵秋

的小说材料，有一部分是在扬州时“召里中贫无聊赖之好事者代为探访，以事实新奇与否，定价值之多寡”。他付出的酬劳，每则由一角钱到三四角不等。这样的找资料来写小说，是旧日某些小说家的一种办法。写得好的就像《儒林外史》，不好的就像李涵秋那些小说了。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小说，是不能拿了许多话柄放在里面穿引而成的。

李涵秋（名应漳，秀才出身）只活了五十年，他写小说的时间大约有二十年，长篇小说有三十多种，除上面提到的，还有：《战地莺花录》、《好青年》、《镜中人影》、《侠凤奇缘》、《自由花范》、《雪莲日记》、《双鹃血》、《情场之秘密》、《情错》、《梨云劫》、《魅镜》、《活现形》、《姊妹花骨》、《怪姻缘》、《还娇记》、《青萍吼》、《琵琶怨》、《平沙梦》、《爱克司光录》、《众生相》、《无可奈何》、《秋水别传》、《情天孽镜》、《孽海鸳鸯》、《玉痕小史》、《雌蝶影》。（最后这一部是用包柚斧之名发表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小说家毕倚虹

阿英先生编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收有《光绪宫词》一首，作者署名毕一拂，初不知是谁，后来才想起这个人是民国十年至十五年(一九二一——二六)在上海享盛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毕倚虹。这一派的文人中，也有极优秀的人材，像毕倚虹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宫词》似乎一共三十首，每一首都附有小注。作者写此诗时，不知年岁有多大，因为庚子事变时，他只九岁，事变后若干年他才写，自然是摭拾或参阅前人所记的事而加以咏叹，未必所说皆为信史，我们在今日只有侧重欣赏它的文学价值而已。

毕倚虹的小说没有多大成就，他的名著如《人间地狱》、《十年回首》等，在四十多年前确曾被上海一部分小市民所欢迎，但其影响之大远不如与他同时的李涵秋的《广陵潮》及稍后数年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他的小说早在三十年前已为读者所扬弃，这足以证明他的小说只是流行一时，没有什么艺术性，在中国小说史中恐怕连一两行的地位也占不到。他在文学上稍有成就的只是诗词方面(这只是就他个人的成就而言，其实他的诗词尚未到家)，所以在他死后三十馀年，还有人偶然选他一诗入书中，为今日的广大读者读到，这也可说是他的幸运了。

我最先读毕倚虹的小说是一九二三年五月。我家自一九二二年九月起，订有上海《时报》，它的副刊《小时报》是李涵秋主编，

李涵秋有一长篇小说《怪家庭》登载，我也曾零零碎碎地读过一些。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后，因李涵秋逝世，《怪家庭》中断，继之而刊者是署名清波的《黑暗上海》。当时我也看了几段，但我不喜看连载小说，后来也停止不看了。过了几个月，知道这个清波就是毕倚虹。这时候苏州一班文人组织的"星社"，出版一部《星光》，专刊短篇小说(分上下册，为不定期刊，主编人是范烟桥，赵眠云。范君今日还健在，七十一岁了)，每篇附有作者小传和小影。毕倚虹的小传署名"逸梅"，是郑逸梅所作的。读后我才知道毕倚虹的生平，因为当时颇喜欢他的诗文，大有立心将来亦为小说家之意。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所买的《星光》，久已失去，一九六〇年四月，郑逸梅先生在上海旧书摊见有一部，就买来送给我。披阅之下，如见故人，现在把毕倚虹的小传摘录于下：

毕君倚虹，苏之仪徵人，髫龄侍父宦湘中，遂家西子湖上。年十二，即以诗文与海内外文人相质证。光绪末叶至上海，《同文沪报》、《消闲诗社》倚虹即列席其间，与时流投赠唱酬。十五走京师，官兵部郎中。倚虹耻为资郎，日闭户读书，喜与京曹之落拓名士游。已而改官秋曹，决狱为归安沈侍郎家本所许，侍郎固中国改编法律之泰斗也，爰为延誉公卿间，奏驻爪哇泗水领事馆。中国在爪哇初无领事署，倚虹其第一任也。行李戒途，抵沪而武昌事起，遂罢南溟之行，因流滞海上。南北统一后，胜朝旧官，多弹冠相庆，书来徵召，倚虹卒不北上，喜吴淞海天空阔，乃挟笔砚读律中国公学。……民五(指一九一六年——引注)以后，狄平子、包天笑延之主《时报》笔政，兼主于《小说时报》。《时报》中之《小

时报》，即倚虹所手创也。时包天笑主任《小说画报》，倚虹乃托名春明逐客，撰《十年回首》一书，详述其京曹旧事，胜国遗闻。……倚虹之长篇白话小说，此第一种也。亘上袁寒云极称之。时倚虹流连风月，眷一妓，好事不成，又以父命去杭。……民九复来沪任报事，前年(指一九二一年——引注)倚虹以忧去杭，幽居不吟咏，遂肆力于小说，包天笑之《星期》，周瘦鹃之《半月》中刊之最多。每一篇出，辄为纸贵。袁寒云誉为小说界中今无敌手。……今年(指一九二三年。因《星光》系一九二三年夏间出版——引注)将来苏沪执行律师事务。……倚虹著作为余所知者，有《光绪宫词》、《清宫谈旧录》、《销魂词》、《几庵绝句》，而说部中尤以《白报》每日所刊之《人间地狱》为脍炙人口，化名为拏婆生。其他短篇文字，繁冗不胜枚举矣。

过了不久，从《晶报》上知道毕倚虹在上海以毕振达之名执业律师，于是我知道他名振达，是中国公学法律系出身的。一九六〇年我重读郑君所作这一小传，觉得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倚虹死于一九二六年阴历四月初一或初二(因为初四日《晶报》登刊他的死耗，我曾录在日记中)，说他享年三十五岁，我曾写信问郑逸梅先生倚虹的逝世正确日期，一九六〇年四月七日给我的回信只说："毕几庵生于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三十五。"这一来，我就觉得毕倚虹小传所说的有很多不可靠，似乎有吹牛与夸大之嫌。后来翻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夏季出版的《搢绅录》(北京荣禄堂出版，登刊全国大小文官的衔名，大抵由吏部与之合作，供给材料)，见陆军部有这一题名：

三品衔郎中，军衡司行走，毕振达，作舟，江苏扬州人，监生。

我怀疑这个毕振达就是毕倚虹。但倚虹是仪徵人，并非扬州人（入民国后，旧扬州府的江都、甘泉二县，合为江都县），又未所闻他一字作舟，我以为不是。但还不敢断定，就写信问郑逸梅先生，并问他三十年前所写的倚虹小传有什么根据，毕绮虹怎会在十六七岁做郎中，又会"折狱"，二十岁左右就派为驻泗水第一任领事。郑先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三日复我一信，内中有这几句："星光毕倚虹事略，乃倚虹亲写给我者，较为可靠。"至此我才恍然，《星光》所载的是毕倚虹自写的，大概避免有自吹之嫌，所以用逸梅之名发表，既经郑君说明，我就不再追问下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读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四五三页《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第九段毕倚虹小史，内容与《星光》所刊的完全相同，只不过开头数句是"毕君倚虹，名振达，号几庵，又署清波"，与《星光》开头的不同而已。而写此小史的人是旧日一位小说家严芙孙。何以本是郑逸梅而今忽变为严芙孙呢？颇令人费解。三十年前《星光》刊毕倚虹小传，影响不会很大，现在既然有人出版研究这一派文学的参考书，以后必定有人根据这些材料来写文章的，但毕倚虹自写的小传，多有不实之处，因此我就想考证一下，指出文中那些地方不可信。我先于今年（一九六三年）三月四日发表了一篇《毕倚虹夫妇》的文章在《古与今》周刊，略说毕倚虹十八九岁就在陆军部做郎中，恐怕不会有的事。不久，《古与今》周刊发表了春云先生一篇题为《关于毕倚虹》的文章，认为我怀疑毕倚虹"冒名顶替了毕振达的名字，以

前清京官资格入吴淞公学读法律”的说法是不必要的。于是春云先生就列举毕倚虹的家世，说他的父亲毕畏三很早就替他保捐郎中，倚虹十六岁就入工部衙门办事，后来由工部转兵部，清末新官制成立，又调到外部。“适陈恩梓（苏州人，包天笑的业师）为新加坡领事，倚虹为他的随员。”到上海时，因辛亥革命，陈恩梓回苏州老家，倚虹遂流寓上海。

依照春云先生的说法，毕倚虹简直未有被清朝的外务部派为泗水第一任领事之事，只不过是一个新加坡领事的随员而已。我在四月一日的《古与今》又发表了一篇《再谈毕倚虹》，略说刊在《星光》的倚虹小传是倚虹自己写，用郑逸梅之名发表的。我还列举倚虹自说在兵部做三品衔郎中及泗水领事为不可靠。因为实缺郎中是要到部办事的，倚虹既在军衡司行走，以一个十八九岁毫无经验的青年，是否能胜任？至于他说“改官秋曹”为沈家本所赏识，更不会有的事！一个十多岁的人，怎会“决狱”呢？

四月八日春云先生又发表了一篇谈毕倚虹并回答我的文章，对我引《星光》倚虹小传之说，仍十分怀疑，他以为我是凭空捏造的。他说：

> 读××先生《再谈毕倚虹》一文，颇见×先生对于倚虹生平，剖析甚详，但中有两点，我将申述之：……×先生说毕倚虹自作小传，“小传刊于一九二三年范烟桥主编的《星光》上集，用郑逸梅之名发表，其实是倚虹自作”云云，×先生这样写，想必有所据。但我没有见过《星光》，最近在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中，亦载有倚虹小史，其中所说的与×先生所引的全部相同，该书说明是严芙孙所写，严所写的文人小史，大部不实（此人大烟癖，潦倒至作一测字先生

而死)。×先生认为倚虹自写小传，用郑逸梅名字发表，因此骂他是"吹牛"，讥他是"夸大"。但据我所知，毕倚虹并未作过自传交郑逸梅发表。而且这小传中纰缪甚多：他从未到过法部，而说他改官秋曹。即使到法部，一个郎中能决狱吗？至于沈家本，只怕未见一面。况且外放领事，系外部之事，与法部何干？他明明是一个随员而已。这些以讹传讹，明眼人一笑置之。再说：×先生所见的《星光》刊于一九二三年，其时倚虹又早脱离报界，到浙江做官去了(他是浙江沙田局局长，局址在萧山)。……难道在此期间(一九二三年)"吹牛"小传发表了吗？我这一则小文，不是"孤证"(×先生说：倚虹写的《十年回首》小说是孤证)，也不是小说。好在郑逸梅先生亦常在本刊写稿，可以去问他的。(伯雨案：上文的"孤证"因我在四月一日文中说春云先生引《十年回首》小说，自言十六岁入工部办事。我说倚虹"十六岁那一年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但工部早于三十二年五月裁撤，已经没有这个机关了，倚虹何从入署办事？他所写的小说，只是孤证，作者在小说中可以随便说，随便夸大的，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就要找些实证旁证来证明了。")

到四月廿二日出版的六十三期《古与今》，刊载郑逸梅先生给该刊编者一信，今摘录于下：

谈到《星光》集，确系一九二三年范烟桥赵眠云继续《星报》所刊行的一种杂志。当时我也帮忙拉拢许多作家，曾向王西神索得了《十七年后的离婚》，内容是影射毕倚虹的夫人出走，家庭发生变故而作的。因此我就想到倚虹，也去函向他要

稿。倚虹就写了一篇《离婚后的儿女》寄给我……同时照片也寄来了，并附有自作的小传。他说："这篇小传，不是自传式，而是用他人口气写的，就用了你的名儿发表吧！"我就一字不易的给他发表了。"十五走京师，官兵部郎中"云云，的确原文如此。……至于《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毕倚虹小传，那是用严芙孙旧稿。芙孙这篇小传，大部分是抄录了倚虹自作用我名儿发表的那篇小传而成的。郑逸梅，四月十四日。

郑先生这封信，自然可以使春云先生疑团顿释，亦可知我说毕倚虹吹牛夸大绝不会错（我在文中只说他吹牛而已，并未骂他。我和倚虹亦系神交的朋友，不会在他死后三十六年来骂他的）。春云先生文中说"小传中纰缪甚多"，今证实为倚虹自作，则春云先生亦会跟我一样说他吹牛夸大了。

我老是怀疑《搢绅录》中的毕振达与倚虹无干。任兵部郎中的毕振达年龄当在二十五以上，也许其人已在辛亥改革后即逝世，倚虹和他是同宗，甚至同为"振"字辈，于是买了死者的官照，改名振达，入中国公学读书，也许有此资格可以缩短入学期限，早日毕业。他既然冒名作弊于前，以后就要一直作弊下去，吹到天花乱坠，即对老朋友也不肯说真话了。（六部郎中，职位甚大，负部中某一司之责，等于现在的司长，不能挂名不做事的。候补郎中未有实职，可以挂名待补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一出身就做负责一司的郎中，怎能胜任，清末政治虽腐败，但六部中要用得力的司员，绝不肯以毫无资历的人充任重要司员的。所以我说毕振达另有其人就是这个原因。）

毕倚虹的长篇小说，约有十种，计为：《十年回首》、《人间地

狱》、《黑暗上海》、《苦恼家庭》、《春江花月夜》、《猩红》、《红粉金戈记》、《极乐世界》、《写意朋友》等，又有一部《毕倚虹小说集》，大概是收集他所写的短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完全是在报纸、杂志上登载过的，其中的《人间地狱》，书未写成，作者逝世，由另一人为他续成。当时在报刊登载的长篇小说，大都有回目，据包天笑先生说，《申报》老板史量才尤其注意小说的回目。《人间地狱》是在《申报》的《自由谈》连载的。倚虹对于回目很讲究，人家只是调平仄而已，他还要讲究对偶、典故，细心推敲，好像作诗一般，有时写好了一个回目，还拿去和包天笑先生商量。这样为了一个回目，小说内容就不能不迁就回目了。这也是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特点之一。

《人间地狱》何时开始刊登，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我在一九二三年春间初读《申报》时，已见登载。这部小说大抵以柯莲荪（影射作者本人）为主脑，写上海社会、娼门一般情形，把当时在上海文坛活动的人物如包天笑、姚鹓雏、袁寒云、严独鹤等都写入书中，颇能风行一时。读者尤其喜欢它的回目，说它对仗工整，平仄调协，字面又极风华瑰丽，有词章气味。我现在还记得几个回目，不妨写出来给读者欣赏。如："珠镫千幛，热境诉幽情；凉月一丸，轻车飞短梦。""小院微痾，偷闲弹泪；荒村斜雨，商略归魂。""蜡泪酒痕，徐娘温旧梦；竹声花影，月老示灵签。""雪夜度凄清，量珠换梦；银镫照憔悴，射药回春。"后揭的一个回目，记得在一九二四年刊在报上时，下比的"射药回春"误植为"射回春药"，报馆中人与读者皆无留意，史量才也许因事离开上海，没有照顾到，如是者有十几天，有一日，《晶报》刊出一文叫《人间地狱的春药》，至此时《申报》才予以更正。这是旧日上海文坛一个小小的笑话。

倚虹的妻子杨芬若，是诗人杨云史之女，李经方的外孙女。芬若之母李道清也是词人，芬若少承庭教，也工诗词，著有《绾春词》、《绾春楼诗词话》。倚虹所选辑的《销魂词》，即以芬若之作殿后。夫妇皆工词翰，闺房唱和之乐，宜无间矣，不知怎的后来杨芬若为一天津人李凤来引诱，离家出走，终于与倚虹离婚，他们结婚十馀年，留下三男两女给倚虹去照顾，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据吴眉孙所说，杨芬若在西湖出游，为杭州聚丰园老板李凤来诱惑，遂与李来往甚密。从王西神所作的《十七年后的离婚》小说看来，杨女士被引诱，大约是倚虹在杭州狱中吃官司之时。）

一九二三年倚虹在杭州与吴中名士汪晴初之女琫琤相识，由恋爱而结婚，一九二四年元旦在上海举行婚礼，是年十月，汪女士以产后失调逝世，倚虹写有《十月姻缘记》用宣纸仿宋印刷，附于讣文之后，当时也寄一册给我。（《十月姻缘记》又附刊于周瘦鹃的《半月》杂志中。）汪女士逝世未到半年，倚虹又和一个产科女医生缪女士结婚，婚后年馀，倚虹病逝，三十年来，缪女士以医术自活，并抚养遗孤，生活非常清苦。包天笑先生收养倚虹最小一子，名庆杭，教养成人，后来改名朔望，与一印度女子结婚，今在北京外交部为高级职员。一九四九年，友人蔡致通在九龙寓所请我吃饭，坐客中有个毕姓青年，我心中一动，私下估量也许这人是倚虹的儿子，一问果然，他名叫庆康，中央大学毕业，在中央信托局（似乎又是邮汇局，与蔡致通同事）任职。我当时不便问到他母亲杨女士的情形。（我猜测此子必杨女士所生，因缪女士在那时候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朋友某君说，毕倚虹之死，似乎是有自取之嫌。据他说，倚虹以三十多岁的壮年人，每日作文三二千字，本不算怎样劳瘁

的，无如倚虹"好色如僧"，以致身体日趋孱弱，名医臧伯庸喜与文士交游，见他这样，就力劝他休息半年，把身体弄好了再从事文字工作，倚虹告以一日不工作，家中十口就有饿死之虞。臧问他月中开销要多少才够，他说极紧束也要四百元，于是臧医生慨然月送他四百元，强迫他休养，每日又替他诊治注射，一月之后，身体渐见康强，两人皆欢慰。忽然有一日，倚虹大病，急延臧医生诊治，臧医生觉得很奇怪，就不声不响，忙去倚虹熟识的一家旅馆调查，才知道前几天倚虹和一丽人在旅馆住了两晚。大约十日后，倚虹就死了。

袁寒云日记，丙寅(一九二六年)年四月十三日有云：

> 得海上友人书，悲悉倚虹病殁，挽之曰："地狱人间，孰能赓续，论当世才名，自有文章不朽；桃花潭水，君独深情，念西风夜驿，空教涕泪长挥。"上联指所作《人间地狱》小说，下联谓余前岁北来，君送别车驿，欲伴余渡江，再三谢阻始罢。不期自兹遂不相见矣。伤哉！

四月十六日日记又有云：

> 哭倚虹二首曰："放眼人间皆地狱，几回呕血泣哀弦。可怜初结鸯鸳侣，一瞥东风梦不圆。""芳娆殒折古难全，慧业匆匆感逝烟。一语江都真悟彻，不才乃得永天年。"昔地山师挽江阴何诒威进士，有"不才乃得永天年"句。吴县余冰人，针神沈寿之夫也。悲妇为奸徒所夺，撰痛史纪之，见寄一册，漫题曰："绝代针神余沈寿，弥天冤苦吁无门。可怜一卷孤鹣语，尽是啼残血泪痕。"冰人自号鹤口孤鹣。

本是哀悼老友毕倚虹的诗，接着又记余冰人之妻沈寿女士为张謇藞葬之事，似乎也为毕倚虹之妻杨芬若被人所诱而发慨叹，其记于此，殆有深意。地山为扬州方尔谦之字，倚虹是他的表甥。

四月二十二日日记又云：

> 再哭倚虹二首曰："江南此日肠真断，湖上当年梦有词。绝代文章传小说，弥天泪语几人知。""小别三年一弹指，人天终古念音容。低徊一卷销魂语，忍检遗诗怆箧中。"

读寒云日记中的挽词，可见他们两人的交情一斑。我虽未见倚虹一面，但五载神交，对于他的早死，当时也曾伤感过，现在摭拾他一些遗闻轶事，草为此文，藉作识名的四十年（一九二三——一九六三）纪念，亦想使人知道三十年前上海文坛有这样一个丰才啬命的文人。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记忆中的徐凌霄

徐彬彬先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从事新闻活动，比汪康年、黄远庸等人后数年，但自康、黄谢世后（汪死于宣统三年，黄死于一九一五年），写新闻通讯的记者，似乎没有一个像徐彬彬先生那样受到广大的读者欢迎的。前几天得上海朋友来信，才知道徐先生已于一九六一年春间逝世了，享年七十三岁。

我小时候也读过徐先生的新闻通讯，但不十分懂，所以对他没有多大兴趣，倒是他主编的《戏剧周刊》（《京报》副刊之一）我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在欧洲偶然也读到他刊在上海《时报》副刊的《古城返照记》，同时读他的通讯，才对他生了景仰之心。当我未往欧洲求学之前，几乎有个机会做了徐先生的学生。我虽然对他很钦仰，但没有机缘见面，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偶然替《实报》、《实报月刊》写些文字，在雅集中才和徐先生及其令弟一士相识。（《实报》是华北一张著名的小型报，管翼贤创办的，日本投降后，管以汉奸罪被枪决。）那时候徐先生尚未到五十岁，但已经有些老态了，在我看来，他大约六十左右。此后我也和他会过几次面，还将我有个时期差不多要入平民大学听他的课的事对他说了，如果真的成了事实我就要尊称他为老师了。徐先生听了"老师"二字，连称"不敢，不敢。"十足像唱京剧一样。幸而我没有做他的学生，只和他做朋友，所以他也称我为高先生。

徐先生名叫什么，我一向没大留意，只知他写新闻通讯稿署名彬彬，写掌故文字，偶然也用此名或用凌霄汉阁之名，这都是他的字与号，不是名。但提起徐彬彬或徐凌霄，在二十年前稍为留心国内文坛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他是江苏宜兴县人，在清朝时代，寄籍顺天宛平县。他的伯父是戊戌新党，以得罪西太后革职永远监禁的徐致靖(光绪二年翰林)。致靖二子仁铸(光绪十五年翰林)、仁镜(光绪二十年翰林)是他的堂哥哥，一门都是书香人物。彬彬先生一共七兄弟，他排行第四，一士第五(今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他俩兄弟都是在北洋大学念书的，彬彬学的还是工程，但他从未做他的老本行，为什么学非所用，我不大清楚。他虽是江南人，但似乎未居江南，说的是一口京话，小时候，他们跟着父亲宦游山东、直隶之间。

曹锟贿选时期，我正在乡间读中学二年，最爱看上海《时报》和《申报》，其时彬彬的通讯常在《时报》出现，我读了不大懂，但有一印象极深，至今不磨泯，就是他某一篇文章的题目《因风想玉珂》，我见了立即耐心读下去。这一句本是杜工部诗，我对于杜诗颇熟，见他用来作标题，觉得新颖可喜，读下去之后，发见文与题称，趣味横生。原来文中说的是当时一个北京卫戍司令赵玉珂(字子声，天津人)不知为了什么和财长王克敏吵架的趣事。事隔三十七年，已记不清了。赵玉珂在当日并非著名人物，但三十年后的今日我还能记得他的名字，那是徐彬彬先生的通讯之力。

民国六七年以至廿五六年间，徐先生不愧是写北京通讯的好手。它的特点颇多，一、笔致轻松趣味，能把北京的新闻写成像小说戏曲一般，有妙喻，有批评，有时夹议夹叙。二、善于综合报道。他能把许多不相连的事情，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像穿珠子

一般穿成一串，使读者得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三、他精通清末民初掌故，对于政府中人的身世与历史尤其熟悉，写起通讯来，对某一人物的性格、立场、背景皆瞭如指掌，能据此而推断其种种行事。四、善用戏词。在报道文学中常常用戏词加入，令人读了增加兴味，能收雅俗共赏之效。

说到戏词，这真是徐先生的本领，他本是戏曲学专家，精皮簧，他作谈戏剧的文字，不止是单会谈唱工与做工，并且会分析剧情、剧本，用活的方法来评戏。那时候新文学运动勃兴，京中的维新人物崇尚欧化，将京戏批评到不值一文，他们认为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皮蓝得娄的戏剧才是"科学"的。彬彬先生则力矫其弊，以西洋剧学的眼光来评京戏，详为比较，极力保存中国歌剧的伟大传统。一九二四年邵飘萍革新《京报》，孙伏园脱离《晨报》入《京报》编副刊，彬彬先生主编一个《戏剧周刊》，最为读者所拥护。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给南京的中国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主编《剧学月刊》，是年一月第一卷第一期出版（至三卷九期，改由南京中国戏曲音乐院出版），为二十年前研究京戏的权威刊物，由这位权威戏迷主编，最适合不过。真的，他不愧是个戏迷，无论写文章或闲谈，几乎总是以戏为喻。三句不离本行，戏词冲口而出。

徐先生主编《京报》那个周刊之时，我正读中学三年级．通过了《京报》，我又知道邵飘萍主持北京平民大学的新闻系，聘他为教授，他讲的功课颇多，由文字以至广告学都有。平大是汪大燮、张一麐等人创办的，在"野鸡大学"中算是比较出色的一家，中国的大学设新闻系，平民大学也是最早的一家。一九二五年，我极醉心新闻学，立志要从事报业，打算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这一科，其时新任校长是杜国庠先生，他极力赞成我入平民大

学，他还写了公函去给汪大燮校长，凡本校毕业的学生，不必考试就可入学。但后来我没有到北京，上欧洲去学西洋文学了。如果当日我去平大，当然是徐先生的学生，也许与名记者张友鸾等人为同学了。

《古城返照记》是徐先生写的一部长篇文字，似乎是小说又是笔记之类，因为当时北京已改北平，故有是作。开始刊于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在欧洲零零碎碎的看了一些。可惜此书没有出单行本。徐先生写此文，运用戏词，摇笔即来，生动之至。他生平主张创一"剧体文"，与语体文并行，他说戏词也有它的特点，那就是声韵圆湛，句法整齐，和文言、白话方言小说皆有不同之处。可惜此议未见诸实行。

他和一士合写的《凌霄一士随笔》，于一九二九年始刊于天津的《国闻周报》六卷廿六期（七月七日出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前后共刊载八年，可惜也没有刊单行本。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听雨楼随笔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